

赵柏田 著

帝国的迷津

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
新旧知识交汇，古老的中国正向近代转型
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
这些我们看似耳熟能详却又对之隔膜甚多的人物
无不面临政治、人性、知识或爱欲的煎迫与选择

作者摒弃宏大、僵硬的教科书式历史叙事
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不为人注意的“边角废料”
为一个个历史人物重建了鲜明的形象
也为一个辉煌而又沉重的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和轮廓
当代中国重温昔日语境，或可不无镜鉴之处





定价：29.00元

赵柏田 著

帝国的迷津

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赵柏田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9

ISBN 978-7-101-06267-0

Ⅰ.帝… Ⅱ.赵… Ⅲ.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Ⅳ.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9630号

书　　名	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著　　者	赵柏田
责任编辑	徐卫东　李洪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年9月北京第1版 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7¼　插页2　字数23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267-0
定　　价	29.00元

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代自序

历史正在沦为消费品。

消费历史，正在成为现代人职场打拼和茶余饭后的一道什锦拼盘，由此带来的危险，是在一种乡村教师式的喋喋不休或痞子腔式的解构中，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性和审美的愉悦彻底消解。在这样一个过量消费的时代，诲人不倦的伪启蒙读物和捧哏逗乐的娱乐风稳稳当当地占据着市场排行榜的前位，而"为了让历史学更富有人性"（马克·布洛赫语）、试图擦亮历史之镜的著述反倒更有可能湮灭无闻。

当尘埃落定，历史的魅力会不会因为它在一个时代里曾被当作时尚物品一样来消费而有所逊色呢？显然不会。因为这魅力正来自过往的时间长河里那一张张消逝的面容，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那数不清的人与事，当他们穿过落日的灵栅，都去向了哪里？历史中的人与事，呈现在纸上的词与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探幽抉微的喜悦，更能激发起我们被禁锢的想象力？

在自谦为"一个技工的笔记本"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66—1944）吁请世人，"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在这位年鉴学派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历史诉诸于情感会有损于理智，都是荒唐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当我在这里开宗明义要为自己的历史叙事方式找到一个合法化的背景时，马克·布洛赫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句告诫一下子跳了出来。

马克·布洛赫已经死了，死于1944年纳粹射出的一颗子弹，也是殉身于他"史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即现实世界保持不断接触"之信念。他那种为了让

历史学更富于人性的努力，至今还在人文知识界产生着恒久的影响。正是他，和其他优秀的历史学家一起，启示我走上了这条沿着人物的内在纹路观照与体察人性的道路；也是他，启示我在回溯历史暗河时不忘倾听人间的消息。我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也是向他这样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家、向历史现场的记录者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的一种方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的近百年中国历史，是本书展开的一个背景。这一较长时段，也正是晚清知识界在感时伤世中喊出的“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王韬语）的时代。其时，旧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却早已过了黄金时代。在西方武力撞击之下国门被迫洞开，新旧知识、观念交汇形成的锋面，让无数官员、学者的人生和学术面临着歧路，在巨大的迷茫中无所适从。传统旧学与新知识——所谓“西学”，这两种知识体系并无福柯所说的“相似性”，所以它们不可类推，不会仿效，不会交感，而是在同一个世界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观念的冲突伴生着痛苦的裂变，这痛是人生之痛，更是家国之痛。本书所涉及的部分人物，如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穿过时代的永夜，已经沐浴在了新知识的曙光下。他们大多活动于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学界惯于把这些人称作“通商口岸知识分子”），西潮的涌入，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东部中国这片狭长的沿海地带最得风气之先。不过，即便是在新派的阵营，也是不无冲突和分歧。还有一些人物如杨度、李慈铭、段光清等，他们和同时代更多的文人学士在旧文化的框架内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传统已经渗入到他们骨髓里，无论思想还是行事都不脱旧文人的格局与习气。

本书试图搭建一个人性与观念史交织的平台，让官员与学者、传教士与海盗、思想家与冬烘先生、维新人士与保守派大员悉数登场，在现代性与传统、道德与人性之间角力争逐，呈现出一帧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浮世绘。

考察本书所述十余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中叶，跨度一百余年，他们中大半是官员兼学者，个别以布衣终身，都以自己的方式或深或浅地介入了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和官场。因此本书也在一个侧面上，触及了晚清以来官僚政治中人性的一面：这些官员（学者）的长处和弱点，他们面对新事物的疑惧与不安，他们个性的怪诞与乖张，他们之间的思想争锋与利益争斗，以及他们对这世界从幼稚到成熟的描述。他们中最优秀的一些人，已经堪称那个时

代的思想精英。诚然，在近代中国做一个思想家，首先意味着要有承受失败的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些先觉者就像一个个与巨人赛跑而注定失败的人，他们大声呼告着，要告诉那个巨人前方何处是悬崖，何处是坦途，但他们的声音总也追不上那个踉跄着前进的巨人。

本书描绘的这些个案，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迷津：急剧的政治变革往往超越时代思想，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几乎很少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中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任何思想家都很难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引领着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如同春天的气候一般多变的近代中国时局，使得很少有几位思想家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原有思想并构成严密的体系，以加速度行进的时代导致了思想家们一个一个地落伍（这一观点，亦可参见马勇先生的《严复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他们的思想就像一支支不失锋利的箭簇，铆足了劲离弦飞去，却总是脱靶。有几次看似已经命中了近代中国的软肋，但巨人不知如何一转身，那箭还是轻轻滑过，飞驰着，落入历史和时间无穷的幽深处。

可悲可叹就在于，后来的世代里，当中国的奔跑获得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时，后起的一群人丢弃他们的前辈就像丢弃一个个恶梦的影子。

在近代中国，政治向来是政客和野心家谋求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舞台，而不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因此凸现出一个极大的矛盾：要改革的没有权力，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又不会主动、积极去改革，结果会酿成大众共同参与的暴力，最终可能形成暴政与推翻暴政的历史循环。现代性之于中国，是一个多么漫长、曲折、艰难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迷津依然是现在时。

本书同时试图把这些人和事放到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进行考察。套用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说法，爱欲以及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正可以投合知识分子追索复杂性的激情，它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铰接点”。尽管，历史阐述从社会、政治史向身体学的转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就已初露端倪，但在中国，这种把大脑与感官结合起来的叙事，对早已习惯一元史论的读者的阅读神经还是不无挑战意味。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用一个词概括之——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当退无可退，无所依傍，也是我在绝地里完成新一轮

空翻的时候了。

窗外，寒冬夜行人正吹着轻快的口哨经过。新年凌晨的钟声即将敲响，新事物的气息弥漫而至。我俯首谛听内心渗出的一丝声音，这声音渐趋宏大，又消融于无边的夜色。

我从历史的边缘经过，我以叙述为生活。

2007年12月31日

目 录

迷津
——林则徐与徐继畬的一次交锋

一　还乡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一个被疝气病和头晕病折磨已久的老人离开昆明,踏上了东归故乡之路。此人就是刚刚卸任云贵总督、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的林则徐。岁在己酉的1849年,林则徐六十五岁,在官场驰驱了大半辈子的他已是力疲心瘁。尤其是近十年来,从遣戍新疆伊犁,到重新起用后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衰惫之躯已越来越让他有力不从心之感。

去北京,还是回老家福州?动身前,林则徐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任职北京的女婿沈葆桢竭力促成退休的老丈人进京居住。林则徐早先亦有此意,曾委托京中老友代为觅屋,但京城官场繁重的应酬让他一想起来脑袋就发怵。不出门吧,恐怕引起招怪;出去应酬吧,又与告病名实不符,万一哪个小人背后射来一箭,尤为不值。更让他担心的还是北京寒冷的冬天。这几年一直在南方过冬,从来不用穿什么大毛衣服,万一不适应京城如许寒冷的气候,旧疾转重,那真要把一把老骨头扔在皇城根下了。

但是,故乡福州也并非宁静的乐土。二十年不履故土,林则徐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文藻山背后倾圮的老屋和庭院里疯长的荒草。几亩薄田,外加几间东倒西歪屋,使他归来事农圃的田园生活设想也会在事实上成为一个泡影。从云南昆明刚启程至曲靖,在写给女婿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能否在故乡长住表示出忧虑。这一忧虑随着家乡的逼近越来越困扰着他。扶病东归至南昌,林则徐在百花洲淹留了四十余天。固然是旅途过于劳顿,他要觅医诊治,但在一封写给朋友

的信里，他流露了近乡情更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往，尚未可知。

卧榻之侧何人，让林则徐一提起来就耿耿于怀？

他的故乡福州城，已在 1844 年的夏天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向西方世界开放。1845 年 1 月，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争得他的领事馆人员入住福州城内乌山积翠寺。从家乡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此事时，林则徐已在署理陕甘总督任上，此事曾引起他的忧虑与警觉。一个宦游在外的人，怎忍心看着故乡成为一个"腥臊之窟"？那时他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慨叹："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彼时距 1840 年的那场中英之战才过去四五个年头，作为这一改变近代中国进程的事件的主角之一，林则徐已经深感历史的吊诡了。

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下旬动身，至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林则徐终于抵达想回又不忍回的故乡福州。从昆明到福州，这一程路他走了近半年。姑且不论交通的不便和身体上的原因，他实在是走得过于慢了一些。

自道光十年(1830)离开福州，二十年过去了。文藻山的房屋久未修葺，也少人打理，再加临着穿城而过的闽江的一条支流，地势低洼，汛期发大水时留在梁柱上的水线还宛然可辨。欲行另购房屋，却又力不从心，他多年行走官场，但没攒下什么钱。林则徐把住宅第三井的双层楼房稍作收拾，就住了进去，这就是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楼上是他的藏书室兼工作室"云左山房"。

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现在有时间去回忆自己并不宁静的一生了。从京城的翰林院，到武昌，到广州，再至遣戍西北，这就是他的官场之路。人生就像一个白痴画的并不太圆的圈，他现在又回到了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这座多雨的南方城市。他读书，写作，整理宦居各地时写下的诗篇，日子过得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但病痛袭来时遮天蔽日的黑暗却时时挑战着他的意志力。有时，他不无悲观地觉得真的熬不下去了。这一时期往来信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形象：

力疾返里，委顿难支，破屋本在省垣，只得复仍其旧，摒挡一切，深觉累身。

喘咳、气逆及鼻衄诸疾，较前瘥减，惟疝气下坠，不独拜跪之难，并行坐亦不能自适，时时作痛。

但比身体的疼痛更甚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这撞击他内心的痛，至死都未能平息。

二　从内陆到沿海

1850年，驻节福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帝国的著名能吏徐继畬。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返回福建出任福建巡抚并兼办通商事务。道咸年间的帝国政坛，这般朝令夕改的事情并不只是落在徐继畬一人身上。按帝国官制，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都驻节福州城，但这一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由徐继畬代理总督职务，他成了福州城甚至闽、浙两省事实上的一把手。

现在，他的官帽上沿缀着一颗红珊瑚，官服的前胸后背都绣着锦雉。作为全国十五名巡抚之一，他的级别是从二品，上司的缺席使他兼署闽浙总督一职，同时他还兼任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等职，以便更好地做好节制军务、考核群吏、监督乡试、代表朝廷管理地方上的财政税收，以及时人视之为畏途的办理通商事务等工作。

这个学者型的官员179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有着浓郁书香的缙绅之家。在帝国官场上，徐继畬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应该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在博学的父亲的指导下，还是幼年的他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训练，尽管十九岁中举后，伴着青春期的闷骚他度过了十三年苦闷的时光，但1826年的会试及第，及后来朝考中名列第一的辉煌经历，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场的宠儿。经皇帝召见，他荣幸地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国家的最高学府继续他的学业，并在不久后晋升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在1826年进翰林院之前，徐继畬在他的山西老家度过了人生的头三十年。关于山西，不错，它确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是"一个巨大的堡垒"：高高的黄土地、岩体坚硬的群山、河谷、陡峭的崖壁，这一切构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它无疑应该划入到费正清博士所说的"内陆中国"里去。在接下来的混乱年代，这些地理和文化的屏障使得传统中国在这里保留下了最好的样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徐继畬生活的十九世纪，使得这个内陆省份闻名遐迩的，还有执当时国内金融之牛耳的山西票号和赶着骆驼走南闯北的山西帮商人。徐继畬的老家在五台山南麓的一片丘陵地带，在这里，青年时代的徐继畬肯定目睹过汾河岸边的商业中心喧闹繁忙的景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当他后来有机会到东部沿海任职时，这一切都将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翰林院呆了十年后，这位年轻的官员踏上了帝国官场的晋升阶梯。此后他辗转于多个职位并获得快速的升迁，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到广西浔州知府、延津绍道台、汀漳龙道代理道台、福建粮台、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直到1846年出任福建巡抚一职，从翰林院出来不到十年，他的级别由从五品升至从二品，连升六级，成为帝国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当他跻身于高级官场这一变化叵测的环境中时，他的升迁有时连他的家人也难以置信，因为有时才隔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得到提拔。他在沿海地区的发迹无疑得益于翰林院十年打下的社会关系，这在道光年间的政坛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众所周知，他与道光皇帝童年时代的好友、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族大臣穆彰阿有着密切的来往。当然，作为一个善于处理海疆事务的"夷务"专家、一个颇具才略的行政官员，徐继畬得到北京方面实权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最初来到福建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当时沿海形势吃紧，战争一触即发，徐继畬从广西调任延津绍道，管辖闽江上游地区，后又奉命兼署汀漳龙道，驻守漳州。应该指出的是，就在他到达闽南沿海时，一支英国远征军也抵达了中国东海岸。这支舰队由英国人乔治·懿律率领，以"鳄鱼"号为旗舰，在北上天津的途中，封锁厦门，炮击定海，直如摧枯拉朽，并最终迫使道光皇帝完全转变了对英国的强硬立场。

道光二十一年(1841)，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构筑的厦门防线失陷，四百多门火炮和六七千精兵没有抵挡住三十余艘英国军舰的进攻。此时，徐继畬奉令死守

漳州。目睹英国人攻陷厦门,这个博学的中国官员如此写道:“寝食不遑,心力交瘁”,“逆夷叵测”。对他来说,冥顽不化的西方人实在是一个谜,他们强大的武力也让他感到惊奇。朝廷卷入这场无望的战争,在务实的他看来实在是愚不可及。在战败后写给山西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称英国人是“红毛”中最强大的种族,生活在距中国七万里远的地方,侵占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其船坚固庞大,其炮猛烈,其海军相当强大,并称“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

或许是北京强硬的后台起了作用,战败并没有让徐继畬丢官,相反,他在第二年五月被提升为广东按察使,接着又任广东布政使,并于同年九月再度回到福建出任布政使一职,成为该省的三把手,奉命移驻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

他与天朝帝国之外的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了解,当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开始与西方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医生、领事、商人和海员。他还多次和被他称为“西土淹博之士”的美国传教士兼旅行家雅裨理进行对话。徐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西方地理文献,并自制了部分地图。雅裨理称这个钦派专员是自己见过的中国官员中“最爱寻根问底的”,“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与徐继畬有着良好关系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员还有李太郭、高民、阿礼国等人。无疑,这些人对徐继畬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徐也在与他们的交涉中表现出他的才干,抬高了他在清朝官场中的身价。

令人吃惊的是,在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后,这个精干的官员于政务之余在厦门写出了三万余字的《瀛环考略》,并在多次增删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定名为《瀛环志略》付印出版。全书共十卷,十四余万字,四十二幅地图。此书几乎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沪上名士王韬读到这本书后,把它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并列,誉之“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慨叹徐继畬“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二十年后的《纽约时报》甚至如此评论:“中国历史悠久的整个地理学体系,被这位东方的伽利略改革了。”

徐继畬在序文中略叙了成书的经过：

>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

《瀛环志略》最终成书，除参酌了历朝正史和兵家地理等中国文献记录、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著作外，还直接以与西人的访谈和口述为资料，徐继畬这样自述：

> 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所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他对世界地理和形势的了解，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一位1845—1846年间在福州访问的美国人史密斯这样记述道："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上，这位督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在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满了中文名称。"

《瀛环志略》在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间，一直是国人了解世界地理最受器重的著作，对帮助国人确立世界图景实在是功莫大焉。据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统计，

这部著作起码影响了以下诸人：魏源、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曾国藩、康有为和梁启超。魏源的《海国图志》由六十卷增补至一百卷时，曾从这本书中辑录了四万余字。1876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使西途中每到一处便取出随身携带的《瀛环志略》，与当地情形相对照。出使西方四国的薛福成，更视此书为了解西方世界之津梁，并有心为之编撰续集。梁启超1890年乡试落第，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此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后来他这样谈及此书影响："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直至戊戌变法时期，这本书还是在知识界最受欢迎的西学读物之一。

由于职务变动的缘故，徐继畬开始面向大海，而正是从海上吹来的新思想的清风，使得他的内心深处起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他不惜以个人遭受谴责为代价引进西方知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徐继畬后来因乌山事件罢官，虽说是政局变动之故，更有士大夫非议乃他思想上"不忠"所致）。据德雷克的研究，这种良知来源于清代的三种重要思潮：第一，作为经世致用学派的拥护者，他强调高效能的政策对于巩固国家的重要性；第二，作为对广泛收集的信息持必须进行估价和严格审查态度的经验论者，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从什么来源，收集有用事实的重要性；第三，作为王阳明学说的忠实信徒，他坚定信仰着知行合一的理论。

这个从来没有海上生活经历的北方人来到沿海地区，一下子使自己置身于弥漫着湿热暑气和灾害性台风袭击的亚热带，开始时肯定有过某种生理上的不适。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并适应了这一气候，包括如同东南沿海台风天气一般多变的政治气候。不幸的是，他的妻子从山西来到此地后终因水土不服于1846年永远地离开了他。徐妻作为一个官妇于1843年甫抵福州城，一来就"畏寒，畏暑，畏风，时时作患"，她总想回山西老家，但徐不愿让她独自回去，他说服妻子留了下来，并答应她安排好引退事宜后一起回老家。1846年从天象上说是个灾异之年，春夏之交淫雨绵绵，一连下了近三个月，可一抵六月之末，突然酷暑难当，本就不服水土的徐妻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这一悲伤曾经像刀子一样锐利地刺痛着他，但官场上的得意（他升任福建巡抚也在这一年）肯定缓释了这一伤痛并让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政务。由于福建沿海多山，陆上交通困难，从驻防的厦门到省城福州，他常走水路。这一沿着海岸线的途程是厦门、福州直线距离的整整十倍。徐继畬乘船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

往返，沿途形成的一个个优良港湾，数以百计的海上小岛（其中不少是海盗的理想避风地），用来捕鱼和贸易的舢板，以及生气勃勃的海上贸易场景，无疑都映入了这个北方人好奇的眼里。

福州的生活也同样强烈地吸引着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员。如果没有战争，那真是个怡养性情的好地方：春天，捕鱼的鸬鹚跃入闽江；精美的"花船"泊于江边，如同一幅水汽淋漓的中国水墨画。到了盛夏，水牛在泥淖里打滚，以消减闷热的暑气；官员们也带着他们的家眷远离熙攘喧嚣的闹市，来到恬静的山水田园中。这座历史悠久、有着六十多万居民的古城，处于风光秀丽的闽江的环抱之中，江岸峭壁林立，稻田层层。狭窄的河流穿越崎岖的内陆山区，为福建内地发展贸易提供了水道。沿江两岸，有生长茂密森林的群山、藏匿猛虎的巢穴和景色如画的寺庙。在福州的货场，从闽江上游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同时这座古城还以出产精美的漆器和各种竹制器具驰名中外。在富有南国情调的大街上，如同《清明上河图》里所描述的一般，汇聚着画匠、灯匠、裁缝、金银箔匠、伞匠、弹棉花匠、杂货商、药商、玉匠、图章雕刻师，以及室内装饰师开设的一家家店铺。

然而，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徐巡抚也有他的苦恼。由于对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存在不同理解，英国人屡次要求入城居住，而城里的士绅官民对之又抱着强烈的敌视态度。如何安抚民众情绪，又不开罪洋人以致酿成冲突，徐巡抚担当着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一想到这个棘手问题就头疼不已。

三　乌山之争

地处福州城西南角的乌山（乌石山）是城内的一处名胜，山高不足百米，却也林壑幽静，风光佳美。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此山秀色直可比拟海外的仙山蓬莱、瀛洲，而朱子祠、九贤祠等历代建筑又使它成了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文脉的一个象征。

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一桩突发的事件惊破了这里出世般的宁静，而林则徐和徐继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这座小山。

这年六月，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通过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ell）租赁了乌山神光寺的几间房屋，租期为六个月。由

于不习条约条款，侯官县令兴廉在租约上盖了官印。徐继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加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说英人搬出神光寺。但是，金执尔以此事需经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由予以拖延。

此事引起了林则徐及城内部分士绅的不满，激烈的情绪开始蔓延。不几天，绅士们发出一封“致英吉利夷官公信”。福州城内书院的学生也在鼓动之下提出抗议。林则徐还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声称“现居桑梓，利害切身，事关省会安危，亦不敢始终缄默”，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众所周知，由于对《南京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英文解释间存在着分歧，五个通商口岸城市是否允许外国人自由居住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民众多有抵触情绪，而以广州为最，直至发展到市民自发以武力行动驱逐入城英人。

徐继畬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他认为，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外交手段，从容处理，使英人自行搬出，以免扩大事态。而林则徐认为，这样做太过软蛋松包，应像广州拒绝英人入城那样，采取断然措施，并主张成立民团，防止英国人的军事威胁。他在上书中一连提出十二个问题质问当局，并情绪激昂地表示，如果战事不可避免，年老又多病的他也在所不辞地挺身而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

为避免酿成更大冲突，徐继畬派出士兵在神光寺巡防，这更激起了士绅们的不满。“夷性犬羊”，官府干嘛还这么护着他们？

按照帝国官场不成文的惯例，致仕官员是不可干涉地方政务的。干政就要冒剥夺荣誉、官衔的风险，但林则徐豁出去了，他不仅带领福州城里的士绅们闹事，还秘密联络在京闽籍言官上奏，要他们弹劾刘韵珂和徐继畬，终于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大案。

时局的动荡使朝廷又有了起用林则徐之意。七月初，借一次传旨的机会，徐继畬表示想到林宅看望林则徐。徐继畬的这一举动自然不无彼此沟通、修复前嫌的意图，但林则徐以疝气未痊为由婉拒了。这两个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人物，终于失去了一次对话的机会。

八月，在遥远的京城，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向咸丰皇帝上奏，陈述诸绅士的观点，对徐继畬和刘韵珂发起了攻击。同日，奉上谕颁发了一项敕令，向军机处通报了有关外国人试图入福州居住的报告。皇帝指示，刘韵珂、徐继畬务要实现“总

期民夷两安”，看似是简单的一句话，实际操作起来却难如登天。

徐继畬的上司、闽浙总督刘韵珂从外地阅兵回来，知悉事情经过，认为林则徐等人的做法实在过于激烈。这个在夷务问题上惯使阴招的总督大人想出了一个妙法：住在城里的不就是一个医生一个传教士吗？那就不让百姓去听教、看病；不要让房主去收租金；雨季到了，也不要让工匠们去修葺房屋。这般不露痕迹地施加压力，时日一久，洋人必会像过了汛期的洪水一般自动退走。他把这一妙法称之为“藉民拒夷”。

总督大人这一背后下绊子的“抗夷妙法”，在以往可说是屡试不爽。福州的通商口岸是1844年夏天向西方人开放的，但在刘韵珂的主政下，福州名为开放口岸，实与闭关无异。刘韵珂的暗中部署有二：一，英商不是看中武夷山的茶叶吗？那就派兵设卡，多多刁难，让茶商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就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交易。最先遭殃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到福州停泊一月，做不成一笔生意，带着满脑子黄金梦来到东方的山姆大叔们把带来的商品抛价销售也无人问津。更绝的是，为了早日送客，总督大人又让城内商人购买少许商品，以作洋人回老家的盘缠。总督大人的阴损招数收到了预期效果，开埠第二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三十七万元，而接下来的1846、1847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如此之差的生意，令英国人曾打算舍弃福州，考虑要温州开埠。英国的外交官们一直都没有看出这位笑咪咪的一品大员暗中在做手脚，行阻挠钳制之术。据说，总督大人的这一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和密片，正折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密片则在皇帝那里留中不发，惟一得悉内情者惟心腹徐继畬（时任福建布政使）一人。

在对待令人头痛的英人入城问题上，总督大人也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谋术。虽然中英双方对《南京条约》里英人入城问题的解释存在分歧，但在领事官入城问题上应是没有争议的。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初至，刘就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把他们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因领事馆的房屋实在过于简陋破败，且在这座潮湿的城市里一逢雨天就漏个不止，英国驻华公使再提领事入城的问题。刘韵珂勉强同意，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靠城墙人迹罕至的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操之我手。在给道光皇帝的密片中，刘韵珂的这一番表白让皇帝十分欣赏：

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

1850 年即位的咸丰皇帝，在外交事务上一改道光时代的软弱，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强硬态度，刘韵珂的秘术开始行不通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是堂皇的胜利，而不是暗底下使绊子得来的小便宜，对刘的申斥也就越来越严厉，在廷寄中一次次要求刘、徐断然采取措施。当时士林，人们更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直接的对抗，对刘表面上的“媚夷”十分反感，而对他暗地下绊子的“制夷手法”又毫不知情。刘韵珂落了个两面都不讨好。

多次受到皇帝的责怪，刘韵珂坐不住了，老谋持重的他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结局，于年底借前往浙江阅兵之际，称病请求给假。咸丰看穿了他的把戏，准其开缺，“回籍调理”，由徐继畲代署总督。整个咸丰一朝，刘韵珂都默默无闻，直到咸丰帝死后，他才应召赴京以三品京堂候补，未几病死。

林则徐也坐不住了，六十六岁且又久病的他，雇了一条小船，沿着闽江一路视察两岸的形势，一直走到入海口。在考察福州海防后他写出了一个详尽的报告递交官府。在报告中，他建议在闽江口修建和加固马尾的北岸炮台、南般炮台，连江的长门炮台和琅岐的金牌炮台。

这年八月，林则徐的本家侄辈、诗人林昌彝回到了故乡福州。他的老家就在乌山脚下，从他家的楼上就可以看到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他称之为“英逆之窟穴”。林昌彝把楼名取名“射鹰”，谐音“射英”，楼上客厅里还挂着一幅《射鹰驱狼图》，并以一副楹联自述心志：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林则徐十分赏识此人，称他这幅图真是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在一种假想的英雄主义情怀的激励下，林则徐和林昌彝等一干人成天谋划着如何将“英夷”驱逐出城。林则徐在写给外甥和女婿沈葆桢的信中略叙了此间发生的事情经过，遭受“猜嫌”，“焦心劳神”，并担心当局会由于他“夷务议论未合”而截留信件：

幼丹吾甥如晤：……兹九月初二接七月廿五日一书，初六又接八月初四日一书，暨前后所寄邸报，俱已收阅无误。其七月初寄去信内未将端节来函提及，只是漏叙，并非原信遗延。盖彼时与当轴尚少猜嫌，不至被其匿信。迨

六、七月来为夷务议论未合，难免虑此。此次初六所接之信附入安报中来，最可免人猜忌。惟内有京报，恐封缄加厚，或另匀作第二封，别写酒资，俟府间代付之后，愚仍划还；抑或与冰如互商，两边自寄，均可酌量耳。……此间居家情形一言难尽，而出去又有不能之势，焦心劳神转较在滇为甚，不知如何可了。近事另缮数纸，封入冰如信中，自能转述，兹不复及。都中闻见仍欲时时得之为妙。手此顺问近佳暨合宅均吉。九月初六夜灯下。

仍然倔强地支撑着局面的徐继畬，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外人看来处变不惊的他，在一封写给堂兄的家书中流露了内心的苦恼：

弟畬禀请哥哥大人安！八月间折差晋京，寄书一函，未稔于何时可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令兴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声势凶凶，几致酿成大事。弟以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启，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夷人公启，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复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为抚驭无方，继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徇庇汉奸。现已一一复奏，尚未知旨意如何？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疾。

林对当局抱不信任态度，徐则把乌山神光寺事件归咎于林“意在沽名，急欲驱

徐继畬就神光寺事件致堂兄服先信

逐"，情绪之对立可见一斑。把林、徐两人信对照着看，两人之分歧表露无遗。面对清议汹汹，徐继畬已经预见到下台是迟早的事，请堂兄提前安排起了回籍后的盖房、设馆授徒等事宜：

> 计今年家中饥荒，买地钱七百五十千，还槐阴赵姓老债钱二百五十千。二宗已是一千千之数。此外杨姑爷钱一百千，有娃子钱八十千。李璋表弟家，弟从前曾许接济，长年屡有信来，可安顿钱四十千。又达人表叔两次信来索借，自因写碑谢礼嫌少之故，今可再送钱五十千。并致意以本欲多竭微情，因已在下台之际，两袖清风，甚为抱愧。三存、三才回时，弟许以再各寄买驴钱二十千（共四十千），此数宗合起，又有三百余千。今共寄去银壹千两，打各项饥荒，暨吾兄用度外，如有存余，可为明春盖房之用。外另寄银壹百两，系弟前应承为继贤兄打饥荒之用，可交继贲转交六婶母。弟到家后，至多停歇二年，即须赴介休设馆。闻义安村之十方院，现尚完好。以此为老学究藏拙之地，亦甚妙也。此禀，即颂嫂嫂安，合家都好！庚戌九月初六日弟继畬禀
>
> 可另提钱十千与继埙为树儿添补一切之用。

英人半年租期转瞬即到，依约搬出了神光寺，徐继畬安排他们迁进领事馆附近一处道观暂住。因政令运转的迟缓，此时，皇帝还在一封封星夜传送的命令中严厉责备徐继畬在奏闻事件真相上如此拖延："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绅民能否相安？"

在朝野的一片谴责声中，皇帝命令守旧的宠臣徐广缙追查事件的责任者。未几，可能是被福州士绅们的声讨热浪搅昏了头脑，又指示新任闽浙总督裕泰继续查访徐、刘在办理此案中的问题。尽管裕泰在上奏中说徐、刘"实无措置失当"，但皇帝还是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由将之革职并召回北京。在这之前不久，被视作徐的靠山的穆彰阿和耆英已被咸丰皇帝解除了职务。

纷扬一时的神光寺事件似乎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是范文澜的"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这一论断过于深入人心了，长

久以来，正统史家普遍认定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在此一元史论的视角观照下，林几乎成了钦定的民族英雄、一个神话般完美的人物，而乌山事件中站在他对立面的徐继畬，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了妥协投降派。

诚然，林则徐任职广州时对西方事务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关注，1841 年 8 月他于贬谪途中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促成了魏著《海国图志》的问世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但从乌山之争这一战后林则徐惟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认知的思想和手段，再考察他在复出后，于时局和未来中国的走向也没有什么新的建言和行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所谓救国“八字要言”，更多关注的还是器物层面的建设，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建设与革新。林则徐曾谈到他对时局的看法：“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复出后的他选择了在尽量不打破旧体制平衡的框架下去除积弊的做法，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且有过之，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平叛、课赋、救灾、禁烟，一桩桩都办得尽心尽力相当出色，不愧为道咸年间帝国的一名能吏。但我们还是十分遗憾地看到，他的心智、精力过多地被这些传统事务缠住了，而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要务却好像被他放在了一边：那就是，面对外来势力、面对一种异质文明，中国如何去应对，知识分子如何去应对，这才是最值得考虑的大计。

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林则徐到了新疆伊犁后，变得格外消沉。“肺热脾寒交相为祟，温凉药剂两不相宜”，“终日萧闲，一无所事”，他给朋友和家人的书信充满了类似的牢骚。西北干燥的气候和弥天的沙尘对林则徐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实在是苦不堪言。从林的书信与日记来看，他似乎一直都在生病，最关心的事也就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复出再邀圣恩的可能。当奕山、奕经作为替罪羊被判斩监候的消息传到新疆，在一封家书中他还在为自己“雪窖冰堂”而庆幸。林在 1845 年底被道光帝起复为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再迁云贵总督，作为当朝封疆重臣，此时他的权力比战争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什么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而是默不作声？蒋廷黻先生在写于 1938 年的《中国近代史》中说，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并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他的原话是：“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敢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

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其实,林则徐的视域在这里也就到了尽头。倒是茅海建先生的推论更让人有共鸣:“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

徐继畬比林则徐小整整十岁,考察这两个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及他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林则徐更多地从道德和器物的层面看问题,常常囿于传统思维;而徐继畬是个更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有着更为广阔的视域、更为明达的认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还是作为一名帝国的官员,都必须顺应世界的潮流。

林则徐、徐继畬,还有同时代的魏源、梁廷枏,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最为先进的思想家阵容。他们从一间密封的铁屋子里探出头来,开眼看外面的世界,已是惊世骇俗,若能再前行几步,登堂入室,自有另一番风光。但在我们寄希望于林则徐前进的地方,他却停下了步履,走入了心智的迷津,这自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都未能辨明中国的方向,这又不是个人所能承载的历史的隐痛了。

或许,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这一研究理路来自出色的历史学者袁伟时先生):一种如林则徐,致力于抵制外来势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被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改造原有的社会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势必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徐继畬在乌山事件中的遭遇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四　林则徐的终结

当东南沿海上演着这一场争锋的时候,在遥远的北回归线附近的广西桂平县(1836 年徐继畬任广西浔州知府时,桂平县城北的金田村还是他治下的一个普通村庄),一群愤怒的拜上帝会会众正在为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南方的大动乱作着预

演。外侮又添内扰，促使咸丰皇帝下决心再次起用平叛专家林则徐。林钦差不顾病体难支，带着三儿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等，于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初二从福州星驰就道，赴往广西。他默念赴戍新疆时写下的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是此番出征的自勉，但也不无垂老之年仓促上阵的悲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林钦差是在不舍昼夜地奔向他生命的终点。

至漳州，林则徐的旧疾复发，疝气下坠。至广东潮州，泻吐不止。再行不远至普宁县，林钦差一行的步履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十月十九日，辰时，林则徐在普宁行馆去世。距他从福州动身起行，总共十七天。他的口授遗折充满了对皇帝的愧疚和深深的遗憾：

> 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

据说临殁时的林则徐十分痛苦，一声声地喊着“星斗南”三字，迟迟不能咽气。“星斗南”，是一种星象？还是一处地名？谁也不解其意。

有一种传说，说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收买的厨师下毒致死，但终无确凿的证据可觅。

乌山事件还留有一条尾巴：道光三十年的中秋节，福州城的一群土著去乌山赏月。借住山上的传教士错误地以为宣讲主的福音的时机到了，在人群中散发一些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这座儒家传统深入人心的城市回报他们的是一把大火。福州入城，在英国人的记忆中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

五　徐继畬的退隐生活

徐继畬又将如何呢？

他刚被召回北京谒见时，咸丰皇帝环顾左右，对廷臣说：“徐继畬乃老诚人，何谓欺诈？”当皇帝问及林则徐为人，徐继畬还是没有隐瞒他的观点，说林为人“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

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皇帝给他安排的新职位是太仆寺少卿，主管蒙古东南的马群和牧场。如果徐继畬的记忆没有发生差错，他精神上的导师王阳明三百多年

前在明朝留都南京也获得过同样的职位。皇帝指示这个“老诚人”，什么时候想向朝廷提出建议，尽管上奏。不久，一封关于提高行政效率的奏疏使徐继畬重获咸丰帝信任，他被外放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人们都以为他要东山再起了，但任职福建时期惹下的麻烦最后还是让他丢了这个刚到手不久的官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未竟的职务使他在归来的时候“差囊”里有了四千余两学生们孝敬的银子，这终于使得他解职后回到老家五台县东冶镇时买下了一块地，“乃得苫盖数椽为藏身之地”，并觅下了百年之后的一块埋骨之所。不然，以他在沿海十余年节省下的可怜收入，还比不上山西的一个普通商人。

就这样，参加过海疆那场似乎毫无胜利希望可言的战争，在办理通商事务中坚决不给强大敌人以任何口实的徐继畬，伤心地离开了纷乱的边疆和朝政，离开了近代中国的舞台，退隐老家山西。1853 年元旦过后不久，撤职回到五台县的徐继畬向祖先的在天之灵献上一篇祭文。在祭文中，他对自己走上仕途以来没有机会上坟祭祖深感抱歉，同时向先祖剖白了他为官时的清廉自守：“继畬谨守先训，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力图补救。”

此后十余年，在山西这个自然屏障形成的要塞中，徐继畬回到了与外面世界隔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天地里，从狭缝中观察外面的世界。他把自己的书斋称为“退密斋”，寓意“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密”。这一命名里透露出的信息，暗示着他从广阔的世界后撤，又回到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上去。尽管他说从政二十余年留下的是“惊悸残魂”，并时时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警戒自己，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还是会让他一看邸报就“展转终夜，目不交睫”。

作为八口之家的男主人（徐继畬的家庭由两妾、一女、一嗣子以及若干佣人组成），接下来徐继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为家庭的生计去设法挣钱。最后，他来到了地处汾河谷地的商业城市平遥，接受当地官绅的邀请，出任超山书院的主讲。在这里，他每年能有上千两银子的收入。据他自述，这些钱的来源分别是：书院束脩三百两，当私人教师三百两，受托为当地士绅刊集的文集写序及写墓志铭三百两。但他慨叹一直没有余钱，因为超过生活基本需求的那部分钱，由于地方不靖，都被官府征作了治安和防务费用。

从 1856 年起，徐继畬在平遥呆了将近十年。作为书院的山长，他有了充裕的时间从事他感兴趣的学术工作，尤其是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时，他恢复了一个古

怪的爱好，那就是对八股文的赏玩。这一被后世的维新人士讨伐得声名狼藉的古怪文体，在徐继畬的眼里却充满着智力悬念和无穷魅力。他不无吹嘘地说，自己的八股文水平之所以如此之高，并非天赋异禀，而是得益于在翰林院十年的磨砺之功。作为一个八股文专家，他在平遥专事八股文的教学，还编选了数部八股文的选本以作学生的范文。联想到他在《瀛环志略》中表现出的对自由主义思想和西方制度的关注，他这一古怪的爱好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或许，这正好呈现出了那一代思想家身上都有的两面性吧——他既可以是传统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一个守旧者。

像所有退下来的官员一样，徐继畬在平遥城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作一些类似于今天的"老干部体"的诗歌。临老学诗的徐继畬似乎这才发现诗对于心灵疗治的莫大功效，大量的闲暇时光就在平仄声韵的推敲中被打发了。平白如"高鸟东南飞，倦极思故林；宦游二十载，乡里乃重临"式的陈腐句子，总脱不了大多数官场失意人物的人生叹喟；而教馆生涯之余随口吟下如"残雪在山晴露脊，峭风吹野湿无尘"这样一些清丽的诗句，却迅速为年过六旬的他博得了巨大的声名，同时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益，地方上一些附庸风雅者在刊刻诗文集时纷纷托他写序，他可以从中获得一笔笔不菲的酬金。但是，这个教书先生、前政府官员还是保持了必要的谦虚，当一个叫田逢露的学生向他学诗的时候，他回答说，自己并不工于诗，"弟子问道于盲矣"！

尽管徐继畬被迫返回到了传统中国的心脏地带，但他沿海期间写下的石破天惊之作《瀛环志略》还是把更多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引向外面的世界(比如说，曾国藩、董恂等中兴名臣从他的书中汲取了思想的资源，而后世的康、梁，更要以此为起点构筑他们的维新思想)。同治三年(1864)夏天，徐继畬在山西接到了赴京的命令，他扶病入都，并在这年秋天受命为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供职，协助处理外交事务。在这个颇有威望的专事帝国对外关系的机构里，徐继畬加入了同治中兴领导者的行列。作为自强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同志有奕䜣、文祥、董恂、薛焕等人。后来，他还兼任太仆寺卿，负责朝廷马政的管理。这一晚年到来的荣耀常常令他有恍入春梦之感。

为了表彰这个勇于探索世界真相、正直的地理学家对"天朝"以外西方各国史

地的介绍，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a）在北京专门组织了一个盛大仪式，将一幅华盛顿画像赠送给徐继畬。这幅画像是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让国务卿西沃德请人按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原作一直挂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里。早在咸丰三年（1853），浙江宁波府向美国政府赠送一块花岗石碑，上面镌刻的正是徐继畬的著作中介绍华盛顿在缔造共和政体中业绩的一段文字（后来这块石碑被砌入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的墙壁上）。热情而又天真的美国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徐是"因称颂我们伟大的首任总统而遭到放逐"。参加赠接仪式的中方代表为徐继畬和总理衙门其他官员，美方除了蒲安臣，还有继任代理驻华公使卫三畏和公使馆其他成员。

蒲安臣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

> 前时约二十年，兄台著有《瀛环志略》一书……书内讲明各国之记，详述各国士人君子，则推华盛顿为冠，不但胜外邦之士，并超越中华各前代之贤师勇帅。所称华盛顿"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因思此三代圣人大德光辉，照耀于今四千载之久，而华盛顿得此数语，翻译宣布于本国各部，士民咸读而称快，感谢兄台之褒奖……前二千三百年，中国孔夫子论恕道及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语，与耶稣吩咐人说，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等语相同。华盛顿甚愿将此理宣之天下。统观此数端，顿之善与儒都之善无殊，我两国之人何不互相思想乎？

蒲安臣在祝词中还说，您了解世界、了解华盛顿的努力，使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贬十多年，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并且越过陆地和海洋，送到您的手中。当您看着画中的温和的面貌时，请不要回忆由于您努力想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华盛顿和西方各国而遭到罢免的悲伤岁月，恰好相反，您应当为有今天的局面而欢欣鼓舞……

《纽约时报》以《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为题报道了这一赠接仪式，盛赞《瀛环志略》的作者是一位"伽利略式"的勇于探索真相的科学家：

> 这位著作家在二十年前，因称倾我们伟大的首任总统而遭到放逐。最近

> 因蒲安臣先生的斡旋，他似乎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荣誉和报偿。……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中，对"夷人"的历史进行研究，成了中国人从事研究的学科中最危险的，而一位正直的地理学家却敢于重蹈伽利略的覆辙，这位作者就是徐继畬。

这是徐继畬在帝国政坛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就在这一年秋天，他以年老体病为由辞职，再一次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内陆中国和儒家文化滋养过他，晚年的他又在这里获得了心灵愉悦和最终的安慰。能在出生地山西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这让见惯了官场起落的他不能不感到命运对自己的垂青。

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在一次官方色彩的庆祝他中举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七十九岁的徐继畬被朝廷授予饰有红宝石顶珠的头品顶戴。此后不久，这个"东方的伽利略"在家乡的土炕上平静地去世。

在他的身后，这个世界正乱云飞渡。

附记一：关于通商口岸的入城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英南京条约》在中外关系史上是一座由"天朝"时代转入"条约体制"时代的界碑。条约共十三款，关于入城问题，条约第二款中文本是这样表述的："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据此，可以解释为：外交官员可以居住"城邑"，英国民人只能居住于"港口"。

南京条约英文本，对此款的表述措辞不同。原文为："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r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 Consular officers, 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

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臣民及家人仆从，从今以后获准居住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或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阻挠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从英文本来看，英国外交官员和民人都可以入城。

从南京条约该款的执行来看，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已实现入城，后因租界的设立，反从城中搬了出来。宁波亦实现入城。厦门城只是一个直径为两华里的军事要塞，故未有入城之举。广州因民众反对，坚拒英国官员和民人入城。

——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584 页

附记二：华盛顿纪念塔内的宁波石碑

为纪念首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兴建的华盛顿纪念塔（Washington Monument），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塔高五十五英尺，内部中空，是世界最高的石制建筑，也是该市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特区有明文规定，市区内不得建造高度超过此塔的建筑。其内墙壁镶嵌有一百八十八块由私人、团体、各城市、各州和其他国家捐赠、镌刻着各种图案和历史故事的纪念石碑。浙江宁波府所赠为惟一一块中文石碑。碑呈长方形，高一点六米，宽一点二米，碑文书法工整挺秀，石碑正文及前后所记文字为：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夷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这段评价文字见于《瀛环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向被视作中国最早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标志性言论。台湾学者张其昀这样谈及徐继畬的贡献:

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孙中山)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

1998年6月29日,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北大演讲时又重提了这一历史事件,以之作为“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的见证”: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想。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想。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想。

人物档案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进士,入翰林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重实际调查,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初,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卓有成效。次年上奏道光

帝，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

为了解西方情况，他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并译外国律例、军事技术等著述，开创了近代中国研究西方的风气。1840 年初任两广总督，次年流放新疆。1846 年被起用，署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50 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病逝于广东普宁县。赠太傅，谥文忠。著述有《林文忠公政书》、《信及录》、《林则徐日记》等。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入翰林院。数年后，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鸦片战争爆发后，赴福建汀漳道。其后，历任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等职。咸丰元年(1851)，被召回京，任太仆寺少卿。两年后被派回山西督兵镇压太平军。咸丰六年(1856)，应平遥超山书院之邀，出任该院主讲达十年。同治三年(1864)，再次奉召进京，供职总理衙门。后授太仆寺卿。

为政廉洁谨慎，涉猎广泛，所著地理专著《瀛环志略》十卷是中国最早研究世界史地的杰作之一，对晚清以降的思想界具有较大的启蒙作用。此外，他的学生还编辑他的遗著有《退密斋文集》六卷，《古诗源评》十四卷，《两汉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各一卷，《五台徐氏本支叙传》等。

先觉者悲歌

——王韬和他生活的年代

一　黑暗中的笑声

咸丰五年(1855)一月的一天下午，墨海书馆中文编辑王韬和几个朋友清谈后，到酒楼小饮，乘着酒兴又到勾栏访艳。厮混到傍晚，几个人才散去。王韬还是没有回他位于书馆后面租住的小屋，踩着冬日满街的夕照，去老闸访了一个有些时日未见的朋友，又一同赶往另一家妓院。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新来的叫福云的姑娘。调笑一番，他回去记下了对那个姑娘的感受：

福云颇有媚态，惜芙蓉面上多生桃花点矣。

两个月后，王韬再度游春，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神圣与世俗交织的一日：

是日礼拜，赴五老峰听英人布道。下午，往访蒋剑人，一同赴虹桥左边勾栏访妓。接客者为沪上名花，来自扬州。稍可人意。

上午在教堂唱哈利路亚，下午逛妓院，人格分裂一至于此，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还会有人信吗？但他确曾是受过洗的，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记录名册上十分清楚地记着他是1854年8月26日受的洗，尽管他怯于在人前提起。当然受洗并非来自他内心深处对拯救的渴望，而只是为了生存——活着，并且活得更好，那是他行事的最大原则。道理显而易见，在王韬来到上海的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更容易博得洋人的好感，因而也易于找到工作并获得较高薪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若干年后当他的生命受到当局的威胁时，是他曾为之服务的洋人的庇护使他得以绝处逢生。

如果我们还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从事着一份高尚的甚至称得上是神圣的工作（帮英国人翻译《圣经》），他那散发着无耻、靡乱、放荡而荒淫气息的个人生活就全成了对万能的主的嘲讽。教堂一妓院，神父一妓女，这不无荒唐的比照里隐隐然传出了上帝在黑暗中的笑声。可是，本文主人公却在神圣与世俗间面不改色地从容穿梭。哦，这几近无赖的生活，这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如果你有幸生活在那个时代，是不是也会和他的朋友一样叫起来：天哪，这就是名士风度啊！

1855 年是王韬来到上海的第六个年头。在二十五岁的王韬的眼里，上海自然不是初来时那般让他好奇与激动了。这几年，经历了太多事，这座城市也尽褪姿色，只见荒芜——具象的上海和作为内心映像的上海都可作如是观。

从苏州老家来到这座城后的第二年，妻子杨梦蘅的突然病故令他悒郁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总觉得，自己移家上海对妻子的去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抑郁的情绪甚至带进了再婚后的生活。他在墨海书馆与洋人的合作也有颇多的不顺心。但是，他还是走出了郁郁寡欢的心境，在这座初现殖民地风格的城市里找到了位置。一般认为是书馆优厚的报酬使他变得能够忍受在这个日渐喧嚣的城市生活，但更重要的一点原因，则是他的朋友圈子的不断扩大。和他一样，这些朋友都曾经深受儒学经典训练，取得过秀才以上的功名，又是因为西方人的出现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的。他们性情不一，或激进，或冲淡，或古怪，但又无一例外地才情横溢。自从 1849 年秋天来到这座城市，王韬就发现，满上海到处都有他的同类。那些朋友帮助他在这座容易迷失的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坐标。他的日记，几乎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他和这些朋友的相处：喝酒，品茗，郊游，访书，吟风弄月，纵谈国事，同访青楼并交流彼此的猎艳心得：

> 六日甲寅：午后读《前汉书》。薄暮，正斋来舍，与之散步至大境阁访壬叔……
>
> 十有八日丙申：午后至正斋舍，同往画舫轩啜茗……既别，经天主堂观剧，为扫秦一出，极佳。

（《茗乡寮日记》，咸丰二年七月初六日、咸丰二年八月十八日）

十有八日乙丑：薄暮，偕舍弟至城北茶寮……是夕正斋购得稻蟹，留余夜饭，持螯置酒，剪灯清话，其乐何如也？

二十四日辛丑：羹饮后，枕书、壬叔与余共游教坊，绝无粲者，重貌则牛鬼蛇神，重心则魑魅魍魉，余见之废肽而返。

（《瀛壖杂记》，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咸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辛丑：午后蒋剑人来，剧谈天下事，以文集相示。

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自言曾至英国览海外诸胜。余即书其所道，作《瀛海笔记》一册。

（《瀛壖日志》，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咸丰三年七月中旬）

二月朔甲午：是日礼拜。至五老峰听英人讲解圣书。午刻至城西……继又遇蒋剑人，因与往虹桥左侧访艳，勾栏二室校书扬州人客，不甚媚……

（《蘅华馆日记》，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罄三大爵。

二十五日：梁阆斋来，同遄勾栏访艳。见有小憨校书，稍可人意。顾年才十四，尚未梳栊，而一种娇憨之态，真觉我见犹怜也。

（《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二　生活在边缘

从这些记述来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上海，与王韬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不外是李善兰、龚橙、应雨耕、蒋剑人等人。他们大多是精于西学的一时之秀。被丁韪良称作“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的李善兰是浙江海宁的一个诸生，却著有《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学》等多种算学著作，据说这样的成就即便放到近代早

期的英美国家也足以成为名人。应雨耕为浙江人，在英国领事馆当通事。蒋剑人为上海宝山诸生，时在慕维廉处教中文，佐译过《大英国志》等西学书籍，据说还是个不错的诗人。他们三个人称"三异民"，一个画家朋友给他们三个画的一幅画就叫"海天三友图"。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龚橙，他是著名诗人、公羊派学者龚自珍的儿子，时在英驻上海领事馆任翻译。在《淞滨琐话》中，王韬这样描写这位朋友：一个著名的藏书家，一个落落不得志的酒徒（此人对酒的兴趣与王韬最为投契，晚间无事，两人常常聚在一起痛饮），志大才略，行事古怪。王韬显然对与这位世家子交往感到满足。关于龚橙志趣上的古怪，王韬披露了一个细节，有段时间龚不顾一切地钻研梵语，没日没夜地吟诵梵诗。在这篇文章中，王韬也没有避开龚橙为世人所诟病的一节，因为据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龚不但为1860年的英国远征军引路，还暗示这伙强盗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王韬记述道：龚橙的晚年颓唐不振，"白眼视时流"，世人常常目之为怪物。贫困交加之下，他只好靠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为生。他宠爱的两个侍妾也离开了他。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心智极为迷乱的状态下剪碎了价值千金的字画，"发狂疾死"。

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归属的人，他们是先觉者，但也常被时人目为叛逆者。家国之耻，文化认同之惑，在王韬和他的朋友内心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使他们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而又放荡不羁。他们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知识结构而成为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行为乖僻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不再是旧文人，因为他们的生活行事方式正在逐渐脱离古老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但他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的说法，这一群"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沿海地带一种新的现象：他们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生存，在当时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将日益显示出重要性。从本文主人公王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随着时日推移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

三　灯火楼台

天色在申江上渐次暗去，江对岸马路上的新式路灯，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内部

客厅的枝形吊灯，次第亮了，好一派灯火楼台，如同一双双魅人的眼。姑娘们开始忙碌。她们涂红了嘴唇，描黑了眼圈，梳洗停当后，等待陌生的男子们。她们尚没有勇气走到大街上去（不过，也快了），但也自认不讳她们的身体是待价而沽的欢乐制造机。她们在被称作校书室或勾栏、青楼、妓院的地方接待一拨又一拨的寻欢客，檀板轻叩，朱唇微启，用娇嘀嘀的声音唱一支支腻人的小曲儿。粉白的颈脖。衣襟上的香气。略微提起裙子时露出的仿洋的雪白的衬里。她们洞察男人心，理解性欲的机制并体会到其间的苦涩。这些姑娘，这些女人，她们从苏北，从更远的内陆的村庄和集镇而来，离开她们的父母、丈夫或者儿子，来到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成为城市的污秽欲望的一个个出口。她们的生活永远是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引起的一场场旋风。城里的男人们管她们叫：神女，流莺，卖春者，卖笑女，青楼女子，女史，校书，海上花，妓女，或者婊子。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尽管还没有半个多世纪后那样妖魅惑人，但风月场上这些成群结队的绮罗粉黛已足以让王韬这样的利比多富余者兴奋，让他们在感官的愉悦和偶尔的道德焦灼感的交织中投掷进大把的金钱与时间，在昏睡和慵懒中享受女人的抚爱。

人们见惯了王韬一次次乐此不疲地往妓院里送银子，也见惯了他衣衫不整地坐在酒楼里，和一帮狐朋狗友招妓痛饮，通宵达旦。在醇酒妇人间过活的王韬，生活之放诞无状在世人眼里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更让道德家们大跌眼镜的是，青楼逛便逛了，他还用《花国剧谈》、《艳史丛钞》、《金玉蟾》、《申江十美》这般的香艳文字来意淫一把，用一种不无夸张的语气谈论自己的一场场艳遇：

> 惟是余虽吴人，自试事外，鲜入城市，山塘泛棹，但作清游，灯舫征歌，只佐谈屑。丙午之秋，应试金陵，曾识任素琴、缪爱香两校书，固是年得魁花榜，而为此中翘楚者也，他处则皆游屐所未涉。而侨寓沪中为最久，亦尝问名曲里，浪迹芳丛。月地花天，寄豪情于一醉；灯红酒绿，抒绮思于千言。

无酒不欢，无妓不宴，这个上海混混全然一派名士气了。想喝酒了，写信给朋友："今晚拟造高斋，效康骈剧谈，风雨过从，亦最难得事。昔者元直访水镜而呼餐，楚元为穆公而设醴，敢援此例，以告足下，但当目为酒人，幸勿诃为恶客也。"缺

钱用了，送诗给朋友："今朝又是花朝了，早起诗成酒未酤。偶忆孙郎多诺贵，酒钱还肯送来无？"新娶的妻子林氏对他这个浪荡子也措手无策。他好像是要加速自身的堕落来证明天地的不仁。

欢场生涯提前预支了他的健康，从 1849 年抵沪到 1862 年被迫离开，王韬在上海的十三年，正当他生命中的二十岁到三十多岁的黄金年华，但从他的身体状况来看，他显然已经未老先衰。从自述来看，他患有"酸齿"、"咯血症"（肺结核）、"肝气不畅"、"烂脚"等多种疾病，外貌"精不泽肤，气不充骨，销铄之验，殆已见端"，到三十五岁便已经"目眊齿腐，面皱发稀"。体态则过早发了福，以致被一帮朋友戏称为"吴门王胖"。这哪里还像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分明是一具被欲望蚀空了的朽尸。

近人陈振国先生曾访问王韬妻兄杨醒逋（也是他的朋友）之孙，并从杨家得到了王韬旅欧时写给杨醒逋的十几封信札，所撰《"长毛状元"王韬》一文给我们的主人公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小像：

> 他的体态臃肿，貌亦不扬；复因屡受环境的刺激，致成早衰。三十五岁以后，便已目眊齿腐，面皱发稀，所以，并不似我们想象中的"金马玉堂"中的风流人物。但好色的憧憬，老而弥笃，这也可见他生活的畸形了。

但他内心里还是那么的骄傲，作诗自夸道：万言羞学纵横术，四海谁知经济才？似乎所有的浪子行径，都是因为平生襟抱未开，怀才而不遇，于是乎，即便是以妇人醇酒销磨时日，也是因着有"奇哀"在心中了。

然而，熟悉他的朋友们不会不知道，早在十七岁那年，他还是个吴中甫里的秀才时，就已踏进风月场并醉心此道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天，王秀才在他的老师顾惺等人的陪同下，心雄万丈地前往南京应举人试。一住进贡院附近秦淮河边钓鱼巷的龚家，"画槛临流，疏帘映日"，连流动的空气都甜腻得让人心尖儿颤颤，听着左右青楼嗷嘈不绝的弦管之声，师徒两人的心就散了，野了，再加南京城里"衣香鬓影，粉腻脂柔，犹有六朝余习"，于是相偕走街串巷，寻找"佳趣"去了。龚氏水阁之西的文漪楼和微波小榭，有任素琴、缪爱香两个"校书"艳帜高标，姐妹花含睇宜笑，颇得人怜，两情既洽，小宴遂开。他还带着这两个烟花女子在秦淮河

上荡舟游览，见者都笑着说他："阿兰坐拥两美，艳福真不浅哉！"（《漫游随录》，55页）他只是一脸得色，笑笑作罢。

从《漫游随录》里的《白下传书》、《白门访艳》等篇来看，他一会儿忙着写"贻某女士书"，一会儿又要赶到某"校书"家吃酒，真是其乐何如！龚氏水阁他们租住的屋子里，空留下一堆翻开的书籍和没有做完的八股文。考试失败自是意料之中，反而消除了他们心头的禁忌，"屏帖括而弗事，弃诸生而不为"——功名算个鸟！整个儿把自己泡在了六朝金粉之地的温柔乡里。"轻颦浅笑温存语，国士何尝不爱怜"，七月初赴南京，一直捱过了八月中秋，师徒俩才携着一大堆艳词绮句恋恋不舍地回转老家。

像章回小说中所有的落第秀才一样，那时候，我们的主人公铩羽而归后也是视科举如蛇蝎，以至发展到一见了笔墨纸张就会有呕吐的心情。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悒悒不能自解者数日，迩来文字因缘忏除殆尽，旧时结习，弃若隔生。"说实在的，像他这样一个自信过头的年轻人，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打击，如何在这打击中缓过劲来走以后的路。在这之前的王韬，就像他自己夸饰的，"志锐气壮，自以为可奋迅云霄，凌躐堂奥，讲学则摧锋折角，谈诗则祧宋追唐"，经此一挫则几成抑郁症者。他把自己锁在房里，拒绝见任何人，这引起了家人的紧张，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个举人家的女儿赶紧成亲。此女文化不高，容仅中人，却娴静寡语，颇有大家闺秀之风范。王韬嫌她本名不好听，为她取了个新名字，叫"梦蘅"，寓怀念从前相好过的某女士之意。但是，已经变得不再新鲜的性事并没有让年轻的新郎沉迷，更没有让他内心的挫折感有所稍减：在他的想象中，似乎历史上所有怀才不遇者的悲哀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不寐披衣夜深起，侧听空阶残露滴"，一个深夜不寐的新郎，不管怎样的理由，总是形迹可疑的。

路也不能说没有，在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科举失败者还是有以下几种选择的：一，考下去，直到考白了头；二，决裂，比如做个洪秀全；三，遁迹山林，不问俗事；四，教读乡间，诗酒自娱，像他的父亲王昌桂一样。王韬选的是第四条道路，去离家二十里外的锦溪做了一个乡村教师，挣些束脩以补贴家用。

蛰居甫里乡间，王韬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写作。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那时候的生活："韬屏弃帖括，一志读书，阅先贤典籍，未得万中之一，迩年妄怀述作，而凤毛麟角，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学问。"

倒是一帮酒友使他很快就走出了自闭心理。和他们混在一起,王秀才很快就成了一个高阳之徒。酒,兼具水之形,火之性,是这个世界除了女人之外另一样带给他快乐的东西。它们共通的特质就是都能使他燃烧。一个人不管迷什么,只要他上了瘾,什么都可以成其为放纵的理由:四季更迭,花开花谢,友朋相会,吊死贺生。酒那么好,女人那么飘渺,爱情那么虚无,王秀才真个是无事不酒无时不酒了。在一封写给妻子、嘱她为自己煮好醒酒汤的短信中,王韬为自己描画了一幅雪夜醉归的理想中的自画像:"朝来彤云如幕,山容不开,殆天工欲飞六出梅花矣。亟宜端整诗牌,涤除茗碗,以待滕六之至,余已折短简以招同志,约于桥南酒家,冲寒毕集,夜深薄醉归来,烦卿剪冰芹烹雪水,于清寒中作冷淡生活,亦嘉话也。"

见他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妻兄杨醒逋以娘家人的身份来教训他,倒惹他吐了一大滩苦水。于是妻兄明白,这人口才好,腹笥也好,说不过他的。如果不是西潮涌入,如果不是他在上海教书的父亲的突然去世把他推上了生活的前台,王韬肯定还会在这些旧式文人生活习性的驱使下走下去,任他天资再高、才学再好,也终究是个唐寅式的风流才子,放浪形骸,牢骚满腹,并最终一事无成。

四　淞沪漫游

1848年的春节刚过,因在上海教馆的父亲王昌桂滞留沪北,无法归里,王韬前往上海省亲。这是他与上海的首次遭遇。行船一入黄浦,王韬觉得"气象顿异":

> 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王韬初到上海时,适逢上元灯节,满街都是看灯的人,"士女如云,观者塞涂,爆竹之声通夕不息",一片承平雅颂之声。"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这是上海给这个来自苏州府甫里的乡村青年教师的第一印象。

十六年后遁迹香港,他把这一西潮涌入的景观描述为前所未有的"变局":

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在乡下的时候，王韬想必早已听闻了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的大名，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的书他更不会陌生。于是趁这次到上海的机会王韬特意前往寻访。他忠实地记录了这次造访：“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

好客的麦都思还领他参观了印书车间。青年王韬在外来世界的事物面前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他发现，书馆窗户的玻璃纤尘无染，室内则像琉璃世界一般敞亮。他还注意到，印书机器的动力竟是牛，“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

种种迹象表明，麦都思一见到这个饶有学问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他，并有意吸纳他到书馆来帮助工作。为表示诚意，他还从内室叫出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让她们在水晶杯中倒满葡萄酒殷勤相劝。王韬第一次喝这酒，发现它味甘色红，回味悠长醇厚，与平时喝的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麦氏的两个女儿又各为王韬弹奏了一支钢琴曲，曲声抑扬有致，不由让王韬生发一丝绮丽的遐思。

但是，王韬还是拒绝了麦都思牧师向他发出的邀请，因为对国运的担心压倒了他对另一种文明的欣赏。特别是当他在来上海的途中看到外国商船和军舰在中国内河游曳的时候，一种本能的民族主义情感已经使他对大批“蛮夷”齐集沪上深感忧虑，途中的四首感事诗里流露出了他压抑不住的愤怒。(录王韬《春日沪上感事》之一：海上潮声日夜流，浮云废垒古今愁。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共征求。朝庭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然而，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要把他推向上海，推向中西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漩涡中去。

第二年夏天(184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意味着这个爱做梦的青年不得不结束他的梦幻季节了，自此以后他要独自承担起赡养母亲、兄弟和妻女的责任了。这一年又是大灾之年，因江南暴雨引发的米价飞涨使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麦都思邀请他担任的那个职位所提供的优厚酬金。他曾这般叙述这一段因缘的开始：

“己酉六月,先君子见背。其时江南大水,众庶流离;砚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麦都思先生遣使再至,贻书劝行,因有沪上之游。”

平心而论,王韬后来在墨海书馆干得不错,与洋人雇主相处得也不错。“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他这般自述。他帮助麦都思牧师修改、润色的译著,雇主都很满意。他译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被公认为“文辞雅达,音节铿锵”,尽管招致批评,说他加工润色过的《圣经》与其说是基督教教义,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但《新约全书》还是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至1859年它已被再版十一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一译本仍在中国流传)。

咸丰六年(1856)二月初九日,郭嵩焘往游沪上,特地造访了墨海书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约略窥见王韬当时在墨海书馆的工作情形:

> 次至墨海书馆。有麦都事(即麦都思)者,西洋传教人也。自号墨海老人。所居前为礼拜祠,后厅置书甚多,东西窗下各设一球,右为天球,左为地球。麦君著书甚勤,其间相与校定者,一为海盐李壬叔,一为苏州王兰卿。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王君语言豪迈,亦方雅士也。为觅《数学启蒙》一书,为伟烈亚力所撰。伟君状貌无他奇,而专攻数学。又有艾君,学问尤粹然,麦都事所请管理书籍者也。
>
> 外赠《遐迩贯珍》数部:前格物理一二事,而后录中外各处钞报,即所谓新闻报也。刷书用牛车。范铜为轮,大小八九事。书板置车箱平处,而出入以机推动之。……皮条从墙隙中拽出,安车处不见牛也。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
>
> 王君挈眷寓此,所居室联云:“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亦有意致。询其所事,则每日出坐书厅一二时。彼所著书,不甚谙习文理,为之疏通句法而已。……

如本文开篇所述,为生活和工作环境所迫,王韬皈依了基督教,但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为此忍受了“卖身事夷”、“附腥慕膻”等种种的指责,深受同胞的怀疑与鄙视,而内心又没有真正找到归属感。常常,在与传教士们一起工作了

整日后，他又一人向隅，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身言行，谴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饥不择食以至"误陷腥坛"。从赴沪之初至去港之前，整个五十年代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充满了自责与怨艾。1850年秋，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自去岁杪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白驹过隙，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作为一个有着浓厚的"华尊夷卑"意识的传统文人，他和他的朋友蒋敦复一样，和教会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受洗，另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与教会的关系，甚至变成一个渎神者。

咸丰九年(1859)三月的一天，朋友管小异前来拜访，言及他拒绝美国传教士延修《旧约》一事。管小异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不外乎陈腐的"天朝"理念，把不合圣贤的所有学说斥之为异端。王韬听了却汗颜涔涔，如坐针毡，他在当日的日记里郑重忏悔道："噫！闻小异言，窃自叹矣。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一失足，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虽然，已往者不可挽，未来者犹可致，以后余将作归计矣。"

以缺乏宗教诚意去苛责王韬毫无意义，他之受洗入教，本就是出于趋利避害的世俗和功利考虑的权宜之计，或许，在这个人的身上本来就缺乏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和追求。

五　一场多角恋爱

读王韬的著作，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从1849年起居沪的十多年间，他的文字几乎很少涉及到西方。考虑到他是生活在一个西方人日渐增多的城市里，又是为西人工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或许是因为，王韬居沪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从广西金田一路横扫而来的太平军打乱了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阵脚，使帝国的朝政和士人的心态都处于内乱的阵痛中，因此所有的外来事物对当时的知识界来说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了。而对功名之心炽盛的王韬来说，有什么比让他尽抒襟抱更重要呢？当然，谈到个人理想，对王韬这样一个在传统教育下

长大的人来说，无论从目的、途径和方法论来说，都要跟所谓的天下苍生系连在一起。

南京应举人试失利后的第十年，亦即1856年，对帖括制艺早已生疏不堪的王韬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去昆山参加这一年的科考。临阵磨枪，自然不可能得中。三年后，再赴江南年考，还是没有考中。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后来他向太平军投书一事案发、即将赴香港避难前，他还抱着再次应试的不切实际的念头。他甚至连做梦都想着金榜题名的美事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像一个因过于专注于某事而变得精神恍惚的白日梦患者一样告诉我们，三十岁生日之前的某一晚，他梦见自己的前生，是一个住在杭州西泠桥畔姓贾的读书人，聪慧而又善歌舞的妻子去世后（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死去多年的妻子），发愤赴省城应试，终获高第。从他生日那一天自我解嘲的记述来看，他深深淹没在"壮志未酬"的苦恼中了：

> 是日予生日，家人为烹肉煮面，聊以解嘲。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

类似的梦他还做过好多，足以让他回味良久。在一本叫《华胥实录》的小书中，他像欧洲神秘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一样，追记了早年那些梦幻的片断，并写下了一些呓语式的诗歌。"余以生为至悲，以梦为至乐"，他这样向我们说。但遗憾的是这本梦境日记从未出版，我们只能从他当时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略知那一时期他梦醒不分的生活之大概：

> 夫人处宇宙间犹蜎蠕耳，其所历之富贵声华，曾不能一瞬，则生平之丰啬荣辱，悲喜合离，境也、遇也，而无非梦也。石火电光，镜花泡影，应作如是观……人虽觉而如梦，余虽梦而犹觉。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机，尔我莫辨。使余长梦以终其身，勿觉以迷其性，则感促欢淹，亦云达矣。

据他后来在《眉珠庵忆语》中所说，他之所以不出版这本小书，是因为这些梦

境片断除了记叙一个少年对功名的白日梦般的向往，其间还充斥着太多的情色意味：

予曾著《华胥实录》一书，纯记梦中与女士相遇之事，颇涉狎昵。女士见之，始则颊微赫，继而泪，继忽大愠，即欲持白父母。以情婉求之，不可。方缓颊间，其父母俱从堂中出，予窘甚，将逸，而女士已拭泪危坐。女士父母见其神色变异，问其故。则以天寒衣冷对。明日予至，即以书纳还袖中，予曰：昨日令人心胆俱裂，今请焚之以谢过。女士一笑而罢。

此时的王韬，他的处境正如同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他看不清门洞后面的东西，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通向幸运还是灾难。受建立不世功业的欲望的驱使，他只好像一个花心男子向多个女子试探一般，与教会、清政府、太平天国谈一场多角恋爱。

王韬选择了挟策以进、上书言事这一旧式文人普遍常用的干政形式或进身之路，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1859 年，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徐有壬出任江苏巡抚，极有可能是通过好友李善兰（时在徐有壬的幕府中）的介绍，王韬开始向徐上书。在信中，他指出在中国所面临的“贼乱”和“戎祸”两大危险中，“戎祸”固然是天下之大患，是“乱之所生”之渊薮，但从摆脱危险的可行性角度分析，“贼乱”却是需要最先解决的难题：

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然欲御戎必先平贼，二者盖有相因之势。而欲平贼则请以和戎始。

还有许多条陈是直接呈给地方官苏松太道吴煦的，内容几乎全是关于保卫上海和剿杀太平军的“管见”。政治上的极度敏感使王韬一直关注着太平军在帝国东南的动向，并成为这一事件最激愤的记录者之一。在听了三个从杭州来的朋友说起太平军攻占杭城时从清波门至武林门“烈焰亘天，号哭之声震地”的情状后，在日记中他这样表达对“长毛”的仇恨：“呜呼，斯民何辜，罹此大恸？一片佳山水，蹂躏至是，可为扼腕。愿从大侠，出箧中匕首剜其腹也。”兵临城下，他是决意殉国

了，连死在哪里名声更好都考虑到了。他说："且云间城陷，仓促自殉，人以为避贼不及而然耳，何如在此间从容就义之为更美乎？"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隔一年，他的"平戎策"的投递方向陡地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呈向了太平天国当局，其中的建议与策略几乎无一字之易，改变了的仅是官衔、称呼而已。

同治元年(1862)一月，王韬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携妻女返回苏州甫里老家。由于战事吃紧和气候恶劣，直到五月他才回到上海。蛰居乡里的日子，他写下了一篇题为《臆谈》的文章，探讨当下时局，对这个帝国的病症开出药方。取名"臆谈"，即一个疯子的独语，可知其胸次大有块垒。文中所述君主应让渡部分权力、提高官僚机构效率等观点，实可以看作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两百年后的一个回声。由此可以推知，这个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框架内，来自西方的挑战还没有进入他那双观察时局里的眼里。事实上，尽管和西方人在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他对他的外国朋友的描述还是有待于继续"进化"成人的"狄夷"："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阴鸷桀，其天性然也。"除了这篇《臆谈》，在此期间他还做了一件使其命运河道陡转的事。

这年三月初六日，在上海西南部王家寺(位于七宝附近)发生的一场战役中，清军击败了太平军刘肇钧部。在落入胜利者手里的各种文件中，有一封署名黄畹、字兰卿的长信，是托人转交给忠王李秀成的。这封信指出，只要避免与外国人在华势力直接冲突，太平军终将占领上海，并探讨了进攻上海的具体方略，即所谓："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江苏巡抚薛焕在该信曝光后"阅之大惊失色"，后怕不已，火速派飞骑送往北京。李鸿章在接获报告后也认为其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朝廷严令追查黄畹下落。种种信号表明，此人正是王韬。于是追捕在所难免。

三月二十七日，同治皇帝在"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专办通商事务"的同一道命令中降旨，"捉拿逆党黄畹"：

……据薛焕奏，英法将士会剿贼匪获胜，搜获伪谕逆禀呈览各折片。逆党黄畹为贼画策，欲与洋人通好。设其计得行，于军务殊有关系。阅该逆禀内，于洋人多丑诋之词，业经薛焕饬令吴煦告知英法领事，破其奸谋。仍著薛焕会商曾国藩、李鸿章妥为办理。至该逆所称派拔党与赴洋泾滨潜住，并勾

结游民作为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现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

不知是不是早年译《圣经》积下的善德，关键时刻，洋人出面了，王韬的雇主、墨海书馆新的主持人慕维廉与苏松太道吴煦交涉。王韬的老上级吴煦(他曾任命王韬为团练局董事)此时大耍两面手法，先是以书面的形式保证不伤害王韬，后来当得知王韬秘密潜回上海的消息后即派兵前往书馆抓捕。此举激怒了英国领事麦华佗(王韬前雇主麦都思的儿子)，认为吴不但欺骗了王韬，还欺骗了英国，是一个反复无常、"失信无耻"的小人，于是把王韬从墨海书馆接到英国领事馆避难。其间，王韬的母亲在甫里老家于忧伤与惊吓中去世，噤若寒蝉的王韬也不敢前往吊唁，只能以头抢壁遥寄哀思。避居斗室，愁痛纷集，那时他连死的心思都有了，百无聊赖中写给妻兄杨醒逋的几首诗，步的也是当年苏东坡狱中诗的韵："早拚骨肉填沟壑，妄冀功名祟鬼神"，"地下惊魂招弱弟，江边收骨仗贫妻；比邻杞菊成虚语，合葬天随旧宅西。"终于，在领事馆度过了担惊受怕的一百余天后，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仓卒登程"前往香港。

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王韬的突然转向？他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是什么？普遍的说法认为他是为了保全家人性命，才写下这封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的信；他向太平军献策延迟对上海的进攻，则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他身上时时鼓涨着的欲望，或许会找到一条解释他的行为的更合理的途径。此事发生的1862年，王韬来到上海已经十三年了，当其他人舒适地躲在传统的背后做着海上寓公时，天天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他发现自己已无可奈何地置身于道德混乱的氛围中了。他确曾希冀着通过投书献策来获得"拔擢"，但一次次扑空的热望反过来让他失望愤懑。怀才不遇、被迫谋食西舍、"贱等春赁"的经历更使他对既得利益者怨恨不已。无条件的忠诚逐渐让位于一种审视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有资料表明，年初送母亲归里时，王韬曾陪同传教士艾约瑟有过一次南京之行。古怪地融合着儒教乌托邦、基督教义、性禁欲和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政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与天国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的特殊关系(他们在墨海书馆相识，并一起研读过《圣经》)似乎也在对他作出暗示，站在这一边赢得权位和

影响的机会或许更大些。看到朋友们一个个志得意满而自己还身陷困顿，在太平军中功成名就的诱惑肯定十分强烈，这足以战胜他对大清帝国迟疑不决的忠诚。于是，情势逼迫他在“忠诚”与前途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洪仁玕在香港受洗后，于 1854 年 5 月来到上海。在这期间，他与上海的传教士团体尤其是伦敦会来往密切，一连几个月，他都在麦都思那里读经书一小时。这期间王韬正作为麦都思的主要助手在墨海书馆工作，因此他们在那个时候应该有所交往。王韬 1854 年 10 月 29 日的一则日记可为辅证：“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

终其一生，王韬一直对上书太平天国一事矢口否认，并声称这是当局对他的政治陷害。1880 年写于香港的《弢园老民自传》对此也难免不进行一番修饰和遮掩。王韬自辩说：当时太平军在江苏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官员都是地方土著，与他相识，于是他趁身在敌占区之际做起了策反工作，“密相结纳，说以反正”，“激以忠义，勉以功名”，殊不料竟被不明真相的当事者疑为“通贼”。“老民急还沪上，犹思面为折辨，顾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这自辩看似堂皇，却是那么无力。考虑到他流亡二十余年亟欲归乡而想让清廷对他有个好印象，他急于洗刷自己的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在这篇数千言的自传中，王韬还回顾了自己的家族史：他有一个弟弟，二十七岁就去世了；有一个姐姐，也已去世。妻子杨梦蘅，婚后四年(1850 年)病死于上海。膝下无子，两个女儿，一个出嫁后不久死了，还有一个生下来就是个哑巴。他约略计算了一下，从始祖至今的二百四十余年间，七叶相承，五代单传，仅得男子十有五人，从侄三人又相继夭殁，王家这根藤上只剩下他这颗老瓜了。

“老民”——王韬在这篇传记中的自称——感叹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刻酷”了。“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刻酷”，当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一定回想起了种种的不幸：科考落第的耻辱，父亲的突然去世（由此带来的经济重荷使他提前结束了人生的梦幻季节），妻子的死（这又让他早早品尝了伤情之痛），接下来还有为逃避叛逆罪指控的长久的流亡，直至他写作这篇自传时还不能回到翘首以望的故国。于是，对一个愚蠢地拒不承认他的才华的制度的憎恨，与不愿赐他一个子嗣以尽孝道的不仁慈的“天”的忿恨之情在这篇自传文字中融合为一体了，使之通篇都充斥着忧时伤世、愤懑郁勃之气。过早地看到死亡，没有子嗣承续香火，个人太多的不幸遭际，使他对生命抱着一种不可知论，并对宗教的救赎表现

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

> 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天不独厄老民,而或将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线之延,至老民而斩矣。噫嘻!不大可痛欤?……老民族党无存,密亲盖寡,侧身天地,形影相吊,岂天之生是使独欤?老民每一念及,未尝不拔剑斫地,呵壁问天也……至于身遭谗谤,目击乱离,怀古伤今,忧离吊逝,往往歌哭无端,悲愉易状,天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于香港的一封信件中,他曾这般解释他的生死观:"我父母死,我不能与之俱死,饮食衣服如故也,游戏征逐如故也……我妻死,我不能为之不娶,琴瑟好合如故也,闺房宴笑如故也,而茫茫万劫,永无相见之期,悠悠经年,并无入梦之夕,命尽缘绝则死,夭殇短折亦数之莫逃。佛氏谓人深于情者可结再生缘,亦妄也。"他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人生则气聚,死则气散,既死后之有无,不得而知。"对死亡的恐惧像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一直压着他,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是白色的虚无还是黑暗的忘川之水?因为人生事事都可以亲尝其境,惟有死亡的幽暗国度,没有一个人可以遨游一番以后回来告诉我们。"见人死则幸我之尚生,而又惧我之必死","人生不能无死,壮岁而死,与百年而死,等死耳"。正是这种生死夹缝间的悲欣无状带来的心理重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酗酒、嫖妓和最终吸食鸦片成瘾——1884 年后,他和他后来早亡的弟弟一样成了一个瘾君子——的真正原因。

六 "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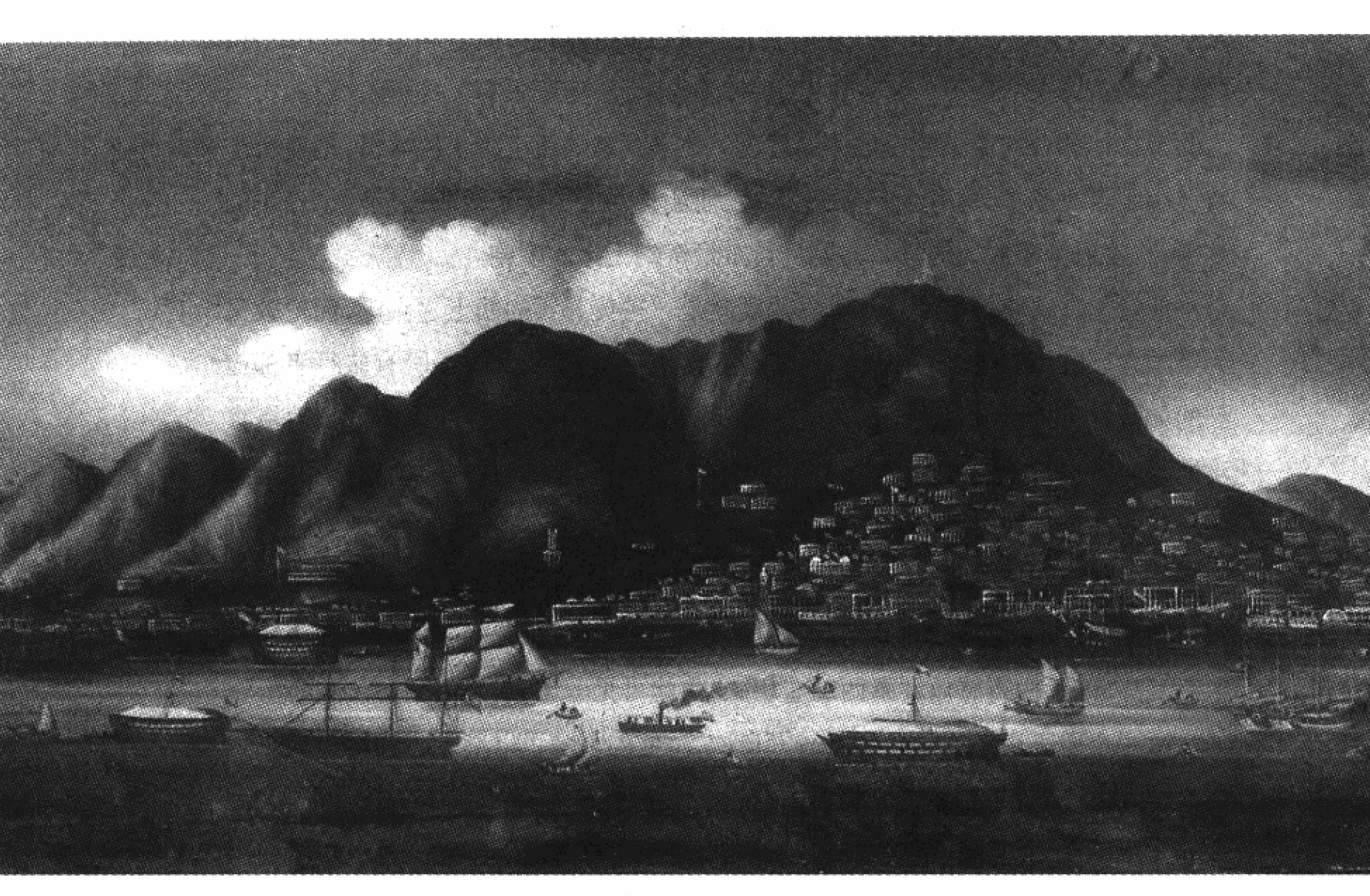
船与岸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的那片水域,把王韬与熟稔了的朋友圈、与这座他渐渐喜欢上的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分隔开了。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1862 年 10 月 4 日),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号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那一刻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心情,想来是依恋与怨恨并皆有之。他以一种伤感的笔调在甲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

他或许以为只是短暂的避难，却孰料一去二十年，他才能再次回到上海。

从 1862 年到 1884 年，王韬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的身份，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活，此时正当他人生的中途，由三十四岁而至五十六岁。流亡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意义是：当命运之手把他推上流亡之途的时候，也就是把他推向了世界。所以近人钟叔河先生乃有这样的话：“‘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

以一种苛求的眼光打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叶的香港，真个是一无是处：地不足游，人不足语，市民以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弥漫着一片浮躁之气。王韬这样记述：“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尘上。”他注意到，上环那些碧窗红槛的房子，多是妓院，姿色妍媸参半，佳者媚眼流波，大多则是仅有中人之姿的“咸水妹”。这个殖民城市让他吃惊的还有竞相夸富的奢华之风，“热闹场中，一席之费多至数十金，灯火连宵，笙歌彻夜，繁华几过于珠江”。他这样记述初到时的心情，“翌日午后抵香港，山童赫而水汨減，人民椎鲁，语言侏离，乍至几不可耐”。后来他搬了住处，“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但还是不习惯，常常牵念家中，夜深了写家书，“隔墙忽有曳胡琴唱歌者，音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而对性喜交游的王韬来说，更为不堪的是面临着既无新朋又失老友的孤独之境。他将自己的名“瀚”改为“韬”，表字“兰卿”改为“懒今”、“子潜”、“仲弢”等，将所居之处命名为“天南遁窟”、“弢园”等，似乎打算从此躲开多灾多难的尘世，韬光养晦、隐姓埋名地度却余生了。

他在香港的主要谋生手段，是帮助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将中国典籍英译。这套“中国经典”在欧洲的出版确立了理雅各杰出汉学家的地位，也让他的“中国助手王博士(Dr. Wang，即王韬)”成了西人眼中的中国一流学者。理雅各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王韬：“只有第一流的本地学者才对我有价值，而在此我找不到任何人能与之比肩。”五年后，即 1867 年冬天，理雅各因身体原因回苏格兰老家度假，不久来信邀王韬前往。这年底，王韬离港前往欧洲。《漫游随录·新埠停桡》一节自述其出国原委云：“余至香港，与西儒理君雅各译十三经；旋理君以事返国，临行约余往游泰西，佐辑群书。”



香港开埠图(油画)

(晚清佚名绘)

他的旅行线路，是经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港到苏伊士，再从苏伊士乘火车到亚特兰大。有日记癖的王韬忠实地记下了沿途所见，比如晕船的感受、印度洋上的飞鱼以及与船上新结识的外国朋友的愉快交谈。在开罗停留的三日，他还记下了“出埃及记”这个故事。在一位法国朋友的陪同下，他坐马车游览了马赛，“楼台金碧，皆七八层……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巴黎这座城市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令他深深着迷。他喜欢塞纳河上的米拉博桥，站在桥上看夕阳下逝水汤汤，真有今夕何夕之感。他还喜欢上了豪华饭店里枝形吊灯下的宴会，欢宴后坐着主人的马车去剧场看布景奇幻无比的歌剧。

他对伦敦这座城市走马观花后的观感是：“盖英邦实为西土之沃国，而伦敦又为英国之腴区焉。”理雅各以大英帝国子民的自豪感带他参观了所有旅行者都应到的如下地方：大英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水晶宫，名人蜡像陈列馆。但他更喜欢的是坐在火车站旁的一家小酒店里喝酒。那里有个笑盈盈的漂亮姑娘招待他，并总是好奇地向他询问中国的事情。姑娘的父亲是个火车司机，这使他有机会问出一个久藏在心里的问题——火车车轮飞快转动摩擦所产生的火花为什么不会引发火灾？姑娘的父亲告诉他，那是因为有人发明了冷却剂，可以让车轮在转动中不发热，他不由得感慨：“泰西制造精微，由此可见一斑。”

做一个无所用心的漫游者的最大自由，是他的眼睛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追逐大街上的女人们，而不必担心被人说长道短。他说他所见之英法“名媛幼妇”，一个个都大胆而又贞洁，学问也好，“即于初识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同席，出则出车……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

“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这是伦敦一家照片馆请他摄影留念时，他在照片背后题诗中的两句。看来即便他身在天涯，念兹在兹的还是风尘中的故国。

就在王韬前往欧洲途中，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江苏甫里老家。长女苕仙，时年二十二岁，回乡后，亲友们开始为其张罗婚事。候选的女婿有两个，一为秀才，一为买办，妻子决定不下，写信向远在英国的丈夫征询意见，王韬作出的选择颇令人寻味：“苕女姻事，论者两家，一吴兴秀才，贫甚；一嘉善人，现为西人供

奔走,美名曰买办,其实则服役者。弟以其品太卑,愿舍买办而就秀才,不以目前而论。”

他在英国住了两年,和理雅各一起在苏格兰中部进行了几次不长不短的旅行。期间,生性倜傥、雄才好辩的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讲到快意处,还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在牛津大学他讲演“中国之道”,涉及到了中西文化和哲学观念之别,他这样记载:

> 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监院者特邀余往,以华言讲学。余备论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中国人无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其中肄业生之年长者……特来问余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若何?余应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

1870年1月,王韬和理雅各及其女儿玛丽踏上返回中国的漫长旅途。在英国将近三年,虽然思乡病发作时,心情时常会像欧陆多雾的天空一般阴沉,但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就像他在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余处境虽厄,而游览之奇、山水之胜、诗文之娱、朋友之缘亦足以豪,几忘其身之在海外也。”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至此已发生重大变化,在返国前写给妻兄杨醒逋的一封信中,他历数自己思想的几大转折:少年时仅“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科场不利,出外谋生,“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及至自上海到香港,又到欧洲,又经历了三变,“初变而为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再变而殉名节……妄欲以虚名动世”,最后才发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应当有用于世。欧洲之行的另一收获,是这些旅途见闻为他后来创作的三部短篇小说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这些模仿清初伟大小说家蒲松龄奇幻故事笔法的小说,尽管充斥着对异国风

情的猎奇和六道轮回之类的陈词滥调，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和香港风行一时（王韬的这三部短篇小说是《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第一本出版于1875年，后两本出版于1887年）。

回到香港后，因理雅各不久又因事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生活来源。他曾一度打算入曾国藩幕，但此事尚未付诸行动曾国藩就去世了。还有一次，他几乎马上就要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任职了，但“长毛状元”的恶劣名声使他无法回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以写作为生，投身新闻业。事实上，此人身上还真有着近代报人的典型素质：喜好冒险，阅历丰富，兼具理想主义精神与怀疑眼光，既充满革新精神又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1872年前后，他参与了伍廷芳等人资助的《华字日报》的编辑工作并亲任主笔。1874年，又在监管香港墨海书局的黄胜等人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创办了《循环日报》。报名“循环”，寓含着他的循环史观，即相信历史如天体运行周而复始、生生不已，中国有望再度成为强国。他自任主笔，仿欧洲报纸的体例，每日于首栏刊发政论文章一篇，宣传“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改造中国。他在报纸这一大众传媒上的率先之举使他成了“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林语堂语），更有新闻史家称他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称其在报业界的地位足与后来梁启超在杂志业的地位相抗衡。其实他早于梁启超就认识到，报纸是缩小政府与民众隔阂的最佳手段，它不仅能把官方消息最大限度地下达，也能把民意迅速上传，而且报纸的广泛发行，还能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滥用权力。二十年前，未能进入官场使他饱尝失望的痛苦，现在，新闻记者和时政评论家的角色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了他自我实现的追求。他在报业上的成功，事实上也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他从没有放弃过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从皇帝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僚的权力分配，他都有一套激进的看法。他希望实行“良政”，希望当下中国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政治架构。在这一时期写给丁日昌的一封信中，他考察了吏治败坏的制度性和道德性病因，并建言政府中“吏”职的充任者应有较高的道德和知识素养：“至于佐官为治者吏也，舞文坏法，半由于吏，以吏无责成而品望又卑贱，其惟利是视宜也。……官或一岁数易，吏则累世相传，官多深居简出，吏日周旋于民间，其足以欺蔽

官者，势所必然。夫以世所卑且贱之人，而欲责以士君子之行，亦势所不能。"他用"大同"一词来描述他理想中的政治秩序，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康有为的先驱，但他还没有康那么激进。众所周知，康有为的"三世说"来自公羊学派对儒学典籍不太正统的解释，而王韬早年尽管和公羊派学者龚自珍的儿子龚橙交好，但他这一思想的根源不是来自传统儒学，而是直接来自于西方语境中遥远的未来世界"道必大同"的预言。

除了新闻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王韬为时人称道的还有《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这两部历史著作（都由他自己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特别是《普法战纪》一书，实为中国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新的起点，此书让他名动公卿，博得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文武大员的一致赞誉，同时更使他作为一个外国事务专家而广为人知。书还未付印，就有大量抄本和盗印本上市。书成刊行之后，文人学士更是争欲一览，趋之若鹜。两书所述虽是欧洲历史，受知识界瞩目之原因却在其"用世"之心，就如他在《普法战纪》序言中所说的："此盖天之特欲兴我中国，故使东西之交由渐而合也。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普之强，云乎哉。"

七　东游扶桑

让王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学术畅销书在日本也大受欢迎，不仅日本学界视为瑰宝，野心勃勃锐意变法的明治政府军部还把《普法战纪》翻印颁行全国，称其"卓识伟论，鼓舞一时风痹，实为当世伟人"。于是，光绪五年(1879)，当王韬因患结核病需要休养，并表示愿意一睹东洋风光和美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他马上受到了日本人的正式邀请。

日人中村正直为王韬东游日记写序，记述了他和几个友人邀请王韬访日之缘起：

> 忆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斋几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能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田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

之下，约共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明治十一年，先生遂来游。于是，成斋、鲍安为东道主人。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

东渡前两日，王韬在上海有马洋行会见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官员、曾经游历中国内陆且与学界名流广有交往的学者竹添进一郎。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竹添还为他饯行，并亲送他上船。这似乎兆示着其日本之行将有不错的收获。《扶桑游记》开篇（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记）即载：“自吴门归，摈挡行李作东瀛之游。偕钱昕伯至有马洋行，见日本文士竹添渐卿。渐卿名光鸿，称进一郎，自号井井居士，肥后人。曾至京师，游西蜀，溯大江而南，著《栈云峡雨日记》及诗钞，传颂一时，所交多海内名流。笔谈良久，甚相契合，约明日为杯酒之会。俞君荫甫谓井井重意气，喜交游，洵不诬也。”次日，王韬偕友人应邀赴宴。初九日，日本驻沪领事品川忠道设宴，日记又载：“品川忠道招饮，暮偕渐卿、昕伯同往。……是夕，渐卿饮酒甚豪，颇有醉意。品川领事馈洋酒四瓶，偕译官吴硕送余至船。渐卿虽稍醉，亦掉臂踊跃而前。”

从日记来看，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初九日登船，十一日夜半至长崎，随后的途程安排依次是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至七月十四日游记终止，历时一百二十八日。旅行刚开始时，就像任何一个好奇的观光客一样，首先吸引他眼球的是那种表面上的异国情调，一个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符号帝国”：奇异的服装、口音，矮小的树林、居室，同样矮小的日本男人。但是，他很快就从旅行者的角色中摆脱了出来，住到了日本友人的家中，和他们吃同样的饭菜。1879年春夏居留日本的这一百余天，好像是以更铺张的规模重温了五十年代他在上海的风雅生活：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四个月中，充满了不停的宴请与回请、拜访与回拜、艺伎、诗酒、旅游观光以及应人之邀作序写跋等等。

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学者还不是很多，以王韬的学问才情，日本友人说他是百年来访问日本的最杰出之中国人想来并非阿谀客套之词。在一次对话中，安野重绎甚至把王韬比作“今时之魏默深”，甚至称魏源比不上王韬，因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等书，忧国之心可谓深矣，但对于海外情形涉猎不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在某种程度上，王韬也把魏源看作一个了不起的先驱，而把自己当作他的“师（夷）长（技）”论的当然

继承人。他这样回答:“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对方乃叹:“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

从《扶桑游记》中我们可以知道,王韬一路游山玩水到过的名胜,有神户的千岛瀑、大阪的造币局、西京的天满宫、华顶山、东京及其附近的墨川、忍冈、浅草寺、飞鸟山、日光山等。其中以在东京所居之时间为最长,约有百日之多。

与维新派人物、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江户的结识,是王韬在日本的收获之一。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八日,他去拜访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是日并晤参赞黄公度太守”。黄遵宪还陪同他考察了明遗民朱舜水航海来日本后在江户的遗迹“后乐园”。两人相交虽新,相契却深,每至酒酣耳热,则剧谈天下事。多年以后,王韬在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作序时还愉快地回忆说:“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履追陪,殆无虚日。”

当然在日本居留期间,王韬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狎妓饮酒上。刚到长崎的第二天,王韬就去茶屋领略了艺伎的风貌。闰三月十二日的日记记载,他和几个朋友刚进去坐下,就叫来了两个艺伎,他以一种不无挑剔的目光观察她们:“一年仅十四五龄许,雏鬟覆额,憨态可掬。顾其装束殊可骇人,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携三弦琴来,以牙板拨之,声韵悠扬。歌多咿哑之音,声呜呜然,有类于哭。两歌既阕,一则起而翩跹作舞。日本女子无不长袖广裾,腰束锦带,带余则垂于背。衣多织花卉禽鸟,绮错绣交。其舞之进退疾徐,亦饶有古法。”艺伎能为当筵之奏,不能为房中之曲,如此古风,让王韬联想到了唐宋间的营妓与官妓,这样想来,这东瀛小岛真是人间乐土啊。

到了神户也是这般,“顷之,开尊歌舞,一如长崎。各人皆席地坐,飞觞劝酒”。朋友还给他找来了一个叫阿朵的当地女子,“年十六七,姿仪中人,而微作男子相”,虽然不是十分中意,他还是笑纳了。在大阪的温泉洗浴后,有一日本女子邀请他去她半山腰的家中玩,他去了,但见花木萧疏,庐舍整洁如新,真有汉时刘阮误入天台山遇见仙女之感。到了西京,艺伎数量之多、装束之华丽,又胜大阪一畴。王韬如是叙述那一夕的欢宴:“时帷幕下垂,灯火千万盏,皎同白昼。乐作幕启,则正面坐女子十六人,以八为行,盖舞伎也。两旁各坐十人,皆手操三弦琴,盖歌伎也。歌声一作,舞者双袂翩然齐举,两足抑扬,进退疾徐,无不有度。二八对

列，或合或分，或东可西，约一时许始毕。”宴会散后回到客店，客店老板给他招来了两个姑娘：第一个脸白如雪，走近了看，全是粉霜，且年纪也太大了些，他不中意，又换了一个，是一个看上去才十五六岁的身材单薄的姑娘，“灯下视之，洁白无比。余倦已甚，拥之而眠，不觉东方之既白”，最后他这样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们，“柳下坐怀，实非难事”。

平时更是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筵，每筵必召艺伎，四个月中，他几乎一直醉卧在美人的裙下，游遍了当时日本的花柳胜地，对各地的名艺伎已经了如指掌。连邀请他来访问的日本朋友冈千仞都说他：“先生儿女之情有余，而风云之志不足”，“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

日本之行，在享受日本女子的温柔的同时，他留下了著名的《扶桑游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部猎色笔记中五十多个日本艺伎的名字，小春、小今、阿朵、小胜、小铁、阿滨、阿清、小紫，不一而足。一个人到了知天命之年还那么色，难怪日本友人疑惑了。但是，王韬并不这样认为，好色难道跟年龄有关吗？再进一步说，像信陵君那样醇酒妇人过一辈子，那好色，还仅仅是好色吗？话这么说似乎有点强词夺理了，但自认“光明磊落之士”的王韬认为，嗜酒好色，只不过是率性而为，“流露天真”，一个人又何必为了取悦于庸流“矫形饰节”，“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日本友人安野重绎这样为他辩解道：“自古卓落不羁之士，无所施于时，则往往作汗漫游，寓意文墨，娱情花柳，以慰其抑郁无聊。”朋友吴瀚涛题诗赠他，中有“白壁青蝇宁足浼，美人醇酒亦堪哀”句，他觉得真是说中了自己一生之病：千古文章寸心自知，五大洲形势也尽在胸壑，于今老境将至，功名却还如天边装满鲜花的马车一样遥远！虽还强说着“天下事今犹可挽”，但霖雨苍生的夙愿怕是一辈子都不得实现了。于是乃有这般醉中走笔奉和：“卅年空下才人泪，四海谁知国士风”，受伤的心总是隐隐痛着，却还是那么傲气。

八　重返上海

已经无从细致地描绘出王韬拖着老病之躯，一次次奔波于港沪之间游说清朝大吏设法取消朝廷对他的通缉令的伶仃身影。流亡二十三年后的 1884 年春天，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经李鸿章默许，他终于又回上海了——

"载全家于一舸由两粤而返三吴,卜筑三椽寓居春申浦上"。为了这个盼白了头的梦,此前一年,他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江西巡抚潘霨要他入幕的邀请。在一封写给盛宣怀的信中,他谈到了倦游后的打算:

弟自读书饮酒之外,了无所好。明春决作归计,行将于吴山越水之间,卜筑三椽,为菟裘以终老。从此杜门却埽,息虑寡营,藉以自全其天,虽有苏张其舌,不复出雷池一步矣。潘伟如(潘霨字)中丞之聘,弟已力却,诚以生平所挟持者,浅不足以献当道也。归来之后,蔬食菜羹,尽可优游以卒岁。

浪子倦游,似乎铁了心要做个本分人了。

这一年他五十五岁,看不出来身体有什么不好,但久染成癖的逐歌征色的爱好却有增无减。在他离开的这二十年里,这座城市的色情业随着洋人的足迹和鸦片的泛滥走向了鼎盛,烟馆、妓院在千家以上。走在曾经熟悉复又变得陌生的大街上,这座城市在炽烈的商风吹拂下日趋华靡的享乐主义风尚让他恍如化鹤归来的丁令威,但见城廓依然,人民却非。以一个老色鬼特有的眼光,他发现城外环马场一带,几乎成了销金窟。绮罗结队,粉黛成云,莫不尽态极妍,逞娇斗媚,全是一个个笑可倾城的绝色;而虹桥左侧的曲巷中,也是灯火辉耀,笙歌如沸。"沪城青楼之盛,不数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珠帘。舞树歌台,连瓷接栋。每重城向夕,虹桥左侧曲巷中,灯火辉耀,笠歌腾沸,无不争妍取怜,弄姿逞媚。门外细车骄溢,飞尘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贾,辄坠鞭留宴。"若非欢场中的常客,怎能如此历历如数家珍。为了防止他被青楼里的小姐们淘空了钱袋和身子,他的妻子林氏在他外出时必派一位忠实的老仆随行。一过晚上十点,这位老仆人就会遵照夫人的意思,在王韬耳边密语几句,催促主人应该回家了。这经常会搞得正在兴头上的王韬下不来台。对妻子约束他绮游,王韬深感不满:"偶以空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花,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偶有拘挛。此真尘海中苦恼众生也。"。他经常来往苏杭之间,最远的一次是在几年后在山东巡抚张曜的邀请下去了山东。据说那都是为了避开日益让他讨厌的妻子。

这一时期他写给盛宣怀的数十封信,可以帮助我们切实地了解在新旧交替、

中西交汇的过程中，这个“亦中亦西”的人物在上海的著述、交游和日常生活。

甫回上海，王韬即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开设弢园书局，资金来源主要是自己的投资和朋友共同集股，用以排印自己的著述和师友之书。这一时期的日记和书札中颇多这样的记载：“旅沪以来，惟以刻印书籍自娱”，“以毗陵活字板法创设书局，排印生平著述，兼及他书”，“抱病以来，惟事刻书，终日一炉香，一瓯茗，静坐雠校，置一切事于不问”。他的一部分书很受欢迎，如《遁窟谰言》，江西书商翻刻改名为《闲谈消夏录》用以赚钱。《弢园尺牍》的销路也不错，“重刊两次，俱已告罄，今又在歇浦以活字版排行一千部，其价二百元”。但是，刻书的纸料工值颇巨，月必五六十金，这些畅销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收益。骨子里的士绅意识又束缚了他的手脚，于是书局后来就开不下去了。

除了在《万国公报》、《申报》等媒体上发表大量文章，这个公共舞台上的活跃分子还写了一本说狐谈鬼、专记烟花粉黛之事的小说《淞隐漫录》，1884 年夏秋起在《申报》馆发行的《画报》上连载，后由点石斋出单行本，被书商易名为《后聊斋志异图说》翻刻，流行甚广。他自称生平对品竹弹丝、棋枰曲谱一无所好，写作这些文字是他最好的消遣，“聊作一时之消遣，而藉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也。”他自哂这些自娱笔墨可作他的“醇酒妇人观”来看。这倒也不是自谦之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说，王韬小说“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自居沪第三年接受唐廷枢、傅兰雅的联合邀请，应聘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一职，直到去世，每年得银一百余两，这是他各项收入中最有保准的一项。这一工作收入少，事务繁多，尽管他很早就想辞去，但在没有足够的收入之前，他还是没有正式提出辞职。在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他诉苦说：“院中并不致送脩脯，惟岁馈笔墨百金，冬节五十两……俸少事多，兼以有病之身，不如辞之为快。惟是贫士年少一百四十元之入，未免稍形支绌。”

他在上海的日常生活还是二十年前那样浸透着浓郁的士大夫气：读书赏画，到妓院把酒纵谈，与朋友游山玩水，作诗唱和。无应酬的日子，就一炉香、一瓯茶，写写字，看看画。夏季燠热，虽不能像富贵人家那样雪藕调冰，浮瓜沉李，但也有自己享清福的方法：“闭关静坐，不出户庭，扫地焚香，吟诗读画，聊作消遣而已。”他以圆山大迂为号画了许多山水，题写了许多扇面，送给盛宣怀等人。

他与上海的几个文人圈子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来往。这些朋友里有传教士、

新派文人、旧式文人、西方文化机构中的雇员和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官员，这个长长的名单可说是华洋杂处、新旧交汇中的一张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化地图：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黄遵宪，马建忠，郑藻如，张斯桂，郑观应，伍廷芳，唐廷枢，张曜，方照轩，方铭山，张之洞，盛宣怀，林乐知，傅兰雅，张焕纶，华蘅芳、俞樾，孙锵铭。

1887 年夏天，时年六十岁的王韬回了一趟苏州，节目无非是游园会友、载酒看花。其间，他特意去看望了这一生中与他保持着最长久友谊的朋友、妻兄杨醒逋。时年六十四岁的杨醒逋称自己正在学禅修道，“遇世事以空字了之”，并劝他也看开些。王韬这样回答：“不能也，弟好货，好色，歆势利，趋富贵，无异于世上一切众生，于生死关头亦未勘破，大抵是哀境多，乐境少了。”王韬这般说自己并不全是自嘲，此时的他恰似老房子失火，正处于与沪上名妓王莲舫的热恋之中。据说他还盼着莲能结实，为他生个儿子，但“渠本无心，侬空有意”，王莲舫还是他嫁了。王韬后悔没有早一点量珠聘玉，贮阿娇于屋中，这个失意的老情人如是慨叹：从此蓬山远凡尘，掉头休更问前因。平生心事都孤负，岂独伤怀到美人！

晚年的王韬大多时间借寓他人房屋，每月租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在一封写给妻兄杨醒逋的信中说：“沪上屋价贵，见居环马场边最热闹之地，楼房三椽，月需十八金，而储书已苦无隙地。”还有日常开销：“惟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计家中食用，与弟杖头买酒所需，月须得七八十金。”明知上海居大不易，但还是不肯搬回苏州老家，因为他巴望着上海能为他这样靠笔谋生的文人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大约到了 1889 年，有了一点积蓄之后，他才开始在华界买地造屋，建造城西草堂，“以为读书娱老计”，但终因财力不足，直到 1896 年，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还在说，城西草堂犹未落成。

归沪后的王韬几乎一直被病魔缠身，身体急剧地衰老。与此相应，他的精神状态也变得颓废不堪。国事的不幸和个人经历的坎坷使王韬提前步入了人生的晚境。“老民外感于时势之艰难，内愤于措施之颠倒，旧疾陡发，诚使祈死得死亦复何憾。”——他这样自叹。到了晚年，于前述咳症、目疾、“烂脚”之外，又添“风痹”、“肠红”诸症，更被失眠症和健忘症困扰，“略致思索，辄通夕不能成寐。见客问姓名，转顾即忘……握管三四行后，意即不相缀属”。不仅自己病，妻子林氏也体弱多病。1896 年一场大病，伏枕四月，“医药之费，参茸之需，约略三百金，亦窘甚矣”。在与盛宣怀的信中，他一再谈到大病数旬后日日在药炉边作生涯的苦况。

像所有曾经迷失于欲海的浪子一样，在梦幻与忏悔中，淹没他的是世事的虚无与幻灭之感。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希望拥有一个清洁的人生，离这个污垢的尘世远些，再远些，但一切又似乎太迟了：

一昨病中，遍历幻境，顿豁悟人世一切是非，从此当一意离垢，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依大比丘座，即登彼岸，不昧宿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如影如尘……

九　迷雾中的脸

胡适曾这样评说王韬：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乡。这种评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肯定和赞扬了王韬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抨击了他置身的那个百病丛生的时代。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思想家评传丛书里有一册《王韬评传》，称之为思想家。但是，尽管他头脑敏捷思路开阔，却算不上一位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他与官场广有联系，却从未谋得一官半职来推行他的改革主张。他不是外交官，但他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卓越贡献远非一名普通清朝外交官所能企及。他写过一些虚构性作品，如小说《淞隐漫录》，还撰写过历史著作，但他远不止是个小说家或者历史学家。那么他还是什么？报人？士绅？还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当我们透过时间的迷雾努力要去看清他时，他的面目却似乎更模糊了。或许，这辨认的指向越是具体、越是明确，离一个人的本相倒越远了。

由此我想到，在王韬这样的过渡性人物的身上，或许蕴含着比他自身的经历更为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他的遭遇和经历的困惑，也在同时代更多的人身上发生着。这样，尽管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价值却可能是巨大的。换言之，在走向近代的中国，他或许只是一块并不重要的跳板，但却是我们据以眺望和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绝佳窗口。这是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意义，也是我现在以叙事的方式重新走近他的意义之所在。

就像费正清所说，近代世界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作为那个时代较早有海外游历经验的知识人，王韬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正在经历剧变。他对地球的“西北”（西方世界）与“东南”（中国）进行了一番比较，在刚与柔、动与静这一传统的中国语境里出人意料地表达了他的地缘政治学观点：“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面对来自外面世界的威胁，只有求变，“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他这样表达他的有所保留的变革论：“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在他的信仰系统中，“天”必将站在中国一边，“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因此知识分子要善于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而变的目的，就是“自强”，就是让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强盛：“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

1894年，王韬的生命已经可以隐约看见终点。世界的飞速变动，使得他那种局部变革观显得落伍。更多的表达民意的现代手段，也使得他在报界的地位不像在七十年代香港时期那样引人注目了。就在这一年，他亲眼目睹了曾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一页记忆的弹丸小国日本击败中国。病中的王韬对清军的畏葸妥协连战皆溃，深感忧虑与痛心：每得一音，辄欲拔剑斫地，把酒问天，而至于击碎唾壶也！也是在这一年早些的时候，他约见了一个从广东出发向李鸿章上书的南方青年，此人名叫孙逸仙。孙氏活跃而性急的性格和无畏的气质，给病中的王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是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多年以前挟策献书的自己的影子，王韬帮助他修改了上书，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希望正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三年后，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三日，王韬去世。

再一年，亦即1898年，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在仓促中实施，又在匆忙中拉上了帷幕。

附记：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经过及与王韬之关系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撰写《上李鸿章书》，并开始筹划北上天津请愿之事。他在这封洋洋八千余言的请愿书里这样宣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包括外国观察家，都把李看作当时了解西方、致力于中国富强的一流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是孙中山曾经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孙中山大学毕业时曾由校方推荐给李，虽然这事最终未成，但孙中山相信李鸿章对他的情况必定有所知悉。

孙中山为了这次上书作了许多人事上的铺垫，大概是这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他托已经卸任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写信给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准备到上海后通过盛宙怀的引荐再搭上盛宣怀这条线，最后能够接近李鸿章。

1894年3月间，孙中山偕同窗好友陆皓东来到上海。陆曾是上海电报局的领办生，而盛宣怀则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这一层关系似乎又为上书成功添了一枚筹码。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拜访了他的香山老乡、著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并在郑寓见到了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孙中山在大学时曾读过王韬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合译的英文版"四书五经"以及王韬发表在报纸上的不少政论文章，便把上书的内容也告诉了王韬并征询意见，王韬则在辞采上"重新替他加以修正"，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朋友罗丰禄写了一封荐书。郑观应与盛宣怀极熟，又慨然提笔作书介绍。

柯文在所撰王韬传记中这样叙述他们的相逢：

> 1894年早些的时候，一个活跃而性急的年轻人，为了给这方土地上最有实权的官员李鸿章上书宣传改良主张，从华南家乡出发上路。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结识了一位颇为著名的主张改良的老者。这位老者帮他修饰上书，使之更易为人接受，又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引荐信。这位年轻人便是孙中山，这位老者即是王韬。

持着盛宙怀、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引荐信，孙中山于6月间抵达天津。盛宣怀当时正在天津筹备办东征转运。据通行的孙中山传记，盛宣怀收到这两封信后，即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李鸿章其时正忙于处理因朝鲜问题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没有安排接见孙中山，但还是收下了他的上书。但据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是王韬介绍了李鸿章幕府中的洋务文案罗丰禄，递交了上书。但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一劳师动众的上书归于失败的结局。

当孙中山一行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中日甲午之战已经爆发。他对这个病入沉疴的帝国已不抱任何希望。这年10月间，孙中山由上海转道日本至檀香山。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也正始于这一年。

柯文称，王韬的著作可能对孙中山产生过一定影响，但1894年两人在上海的这一相逢，却徒具"象征意义"：

> 前途无量的孙中山不久就以中国革命家而闻名世界。而王韬却在度过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于1897年5月，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于黯淡中溘然长逝。

人物档案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后改名瀚，字兰卿，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出身于塾师家庭。1849年到上海，受雇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翻译宗教和科学书籍，历十三年，广泛接触西学，并于1854年受洗入教。1862年，因风传他化名向太平军将领上书献策，遭清廷通缉，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庇护下逃往香港，此后改名韬，号紫铨，别署天南遁叟。

他在香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至1870年随理雅各去英国继续译书，游览了伦敦、爱丁堡等城市，到牛津大学等处作过学术演讲，并顺道游历了法、俄等国。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他以深刻印象和强烈刺激。1874年起创办《循环日报》，积极宣传变法自强。1879年游历日本，受到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欢迎。1884年获李鸿章默许回到上海，翌年主持格致书院，热心宣传西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1897年病逝于上海。

王韬一生勤于笔耕，著述不下四十种，计有《火器略谈》、《西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西学原始考》、《重学浅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弢园文录外编》等，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小说笔记等多个领域。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中国古典典籍介绍给西方读者。王韬在近代中西学的双向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暴民到顺民
——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

一　晨光下的嚣动

一道霞光从东海冉冉升起，越过万顷波涛，越过早春潮润的空气，落在被城墙和濠沟拱卫着的宁波城的大街小巷上，落在停泊于城外河流的三桅帆船上。连接绵长的石墙的五个城门——南门、西门、北面的永丰门和东面的东土门、和义门——在清晨的空气中嘎喇喇地打开了，来自府城四乡的农民鱼贯进入城中。鼓楼的钟声敲响了，提示着人们，咸丰二年(1852)早春新的一天的开始。

天边刚露出浅浅的鱼肚白，城中几条主要的商业轴线上，学徒们打开了店铺的排门，纷纷摆上当地产的竹器、木材、瓷器、糕点、药材、鲜鱼、咸鱼、鱼胶、盐和来自杭嘉湖平原的丝绸与棉花。最后一班巡夜者的身影像阳光下的露水一般渐次消失。光线仍然幽暗的小巷里，一夜寻欢作乐后的人们苍白着脸色踉跄归家。随着日影渐渐升高，早春酒浆一般的阳光慷慨地撞入了每家每户，并流淌在市尘喧嚣的大街上。

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宁静的湖心，从奉化江边的南部商业区通往市中心府台衙门的几条主干街道上，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哭喊声、杂沓奔跑的脚步声交杂着乒乒乓乓关店铺的声响，一阵忙乱后，大街变得洪水过后一般干干净净。一个消息插着翅膀一样传遍了城中每个角落：来自鄞县南乡的愤怒的农民们在烧毁了县署后，正在向市中心的知府衙门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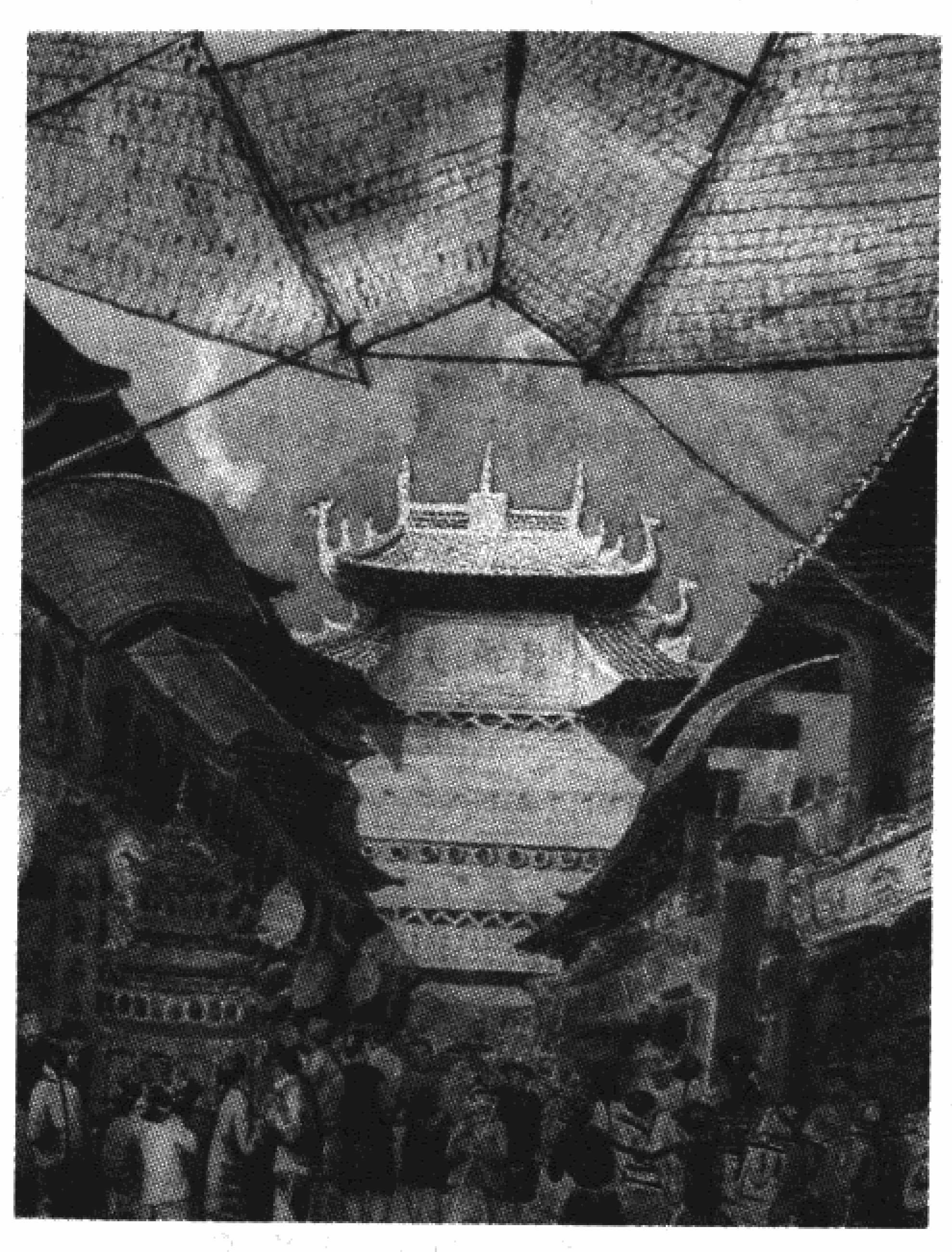
这一天，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蜂拥入城的暴民们把宁波知府衙门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衙役们早就逃得不知去向。农民们抢出了收禁在大牢里一个叫周

庠生的监生，又把知府大人毕承昭押解到城隍庙的戏台上，百般凌辱威吓之后又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犹觉不解气，他们又一把火把宁波知府衙门和鄞县县署烧了。

来自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这天早晨正好在街上闲逛，他惊异地看到，一长列农民鱼贯着进入了城里的知府衙门。年轻的观察家记述道：商店都关了门，四下死一般寂静，一支大约两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街上蜿蜒而行，队伍的前面举着飘扬的旗帜。他问行人，这个示威游行是什么意思？有人告诉他，这些人是要求政府削减赋税的。随后他观察到，在农民们的申诉要求遭到政府官员的拒绝后，他们的愤怒以一把大火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农民们捣烂了知府衙门，并把府台大人的办公用品和绸缎枕头、纱巾窗帘、木雕座椅等其他奢侈品拖出来堆成小山，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暴动发生时，城里的生意都停了下来，部分居民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骚扰。尽管如此，这一暴动在丁韪良看来基本上还算是有纪律的，因为他发现，当抢劫发生时，一部分暴动者守着衙门的某处房屋，禁止闲杂人等出入，担任守卫任务的农民告诉这个好奇的外来者，这里是银库，皇帝的钱是碰不得的。这也就是说，农民们不满的不是赋税本身，而是宁波地方官员为自肥腰包而加诸其身的各种苛捐杂税。

本文写作素材，一是来自曾任宁波府鄞县县令的段光清退休后撰写的回忆录《镜湖自撰年谱》，一是来自小约翰·威尔斯的《1688 年全球史》。诚然，在笔者之前，已有人从利害计算的角度考察过 1852 年春夏发生在宁波鄞县的这个故事，但鲜活的历史如果提前预设了一个观念去观照，难免牵强，恰恰见出历史的贫乏来，倒不如不作解释，只事演绎，纯以叙事为指归，而叙事本为史学之正宗，就像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学家刘知己所说，“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文中将聚焦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初叶浙东的以下人物：粮户、盐贩、府县一级的官员、衙役及拥有监生资格的乡村知识分子，并试图从以下三个层面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是钱粮征收中对士绅阶层和普通粮户的区别对待引起的民变，二是盐贩为了生计对代表盐商利益的官府的暴力抗争，三是民众如何抛弃并最终出卖他们选出的领袖。



十九世纪中叶宁波街景(水彩画)

（爱德华·克里[E. H. Clee]绘）

二 红封与白封

这场1852年早春发生在宁波城的暴动，起因则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不知哪一任县太爷定下的规矩，从那个时候起，鄞县百姓向官府纳税，就有红封、白封之分——缙绅人家用红色的纸封钱投柜，普通农户则用白色的纸封钱投柜。红封按市价以两千二百文钱折银一两，白封则要三千二百文钱折银一两。按照这项地方政策，府、县两级政府的小金库及其官员的灰色收入，全要由升斗小民去承担，而缙绅大户人家，则可以免交部分"陋规"。

咸丰二年正月的一次宴集中，监生周祥千和众亲朋好友说起红封白封的事，都愤愤不平，众人怂恿周祥千领头向政府请愿。正逢酒酣肠热之际，周祥千说一声"好"，酒杯一顿，即带众人到附近的土地庙求签问神。大概神的旨意也是说此事定能成功，周祥千当即在土地庙向各乡发信，"邀同四乡百姓入城，请平粮价"。

鄞县县令冯翊得知他治下的一个小民领头"聚议"税收制度，这还了得，当即派差役把周祥千抓到县里。官家太清楚了，小民聚在一起，危险就会产生，因为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老实人变成暴徒、把一个懦夫变成登高一呼的豪杰（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可以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尽管后来周祥千分辩说，他们"请平粮价"的意思只是要求均平红白封，并没有要求取消国家税收之外的额外部分，更不会削减政府利益，但冯县令还是以聚众构党的罪名把他关了起来。故此有了本文开头民众冲击官府、抢人放火的一幕。

大概是周祥千被抓前两个月，如同这一事件的预演，鄞县东乡一个叫张潮青的私盐贩子也遭到了冯太爷的拘捕，随后又被激怒了的东乡人救出。东乡靠海，当地土著食盐都买私盐。本朝自开国以来，也对这些沿海地带的小民网开一面，允许他们手提肩挑少量私盐，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物品。东乡就属于这种官方特许的贩私盐者的地盘，俗称"肩引之地"。但是持有官府核发的运销许可证的盐商为了扩展市场，买通官家，在政策上获得官方的支持，"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提供的盐了，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商的供货渠道来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无疑加大了百姓的日常支出，断了张潮青们的生路，导致一大批私盐贩子的失

业。张潮青串连肩贩和乡民，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冲突既开，渐呈愈演愈烈之势。

这年正月，浙江巡抚常大淳（后调任湖北巡抚，咸丰二年十二月战死于太平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时）到宁波府城商谈招抚海盗事宜，地方官府为了确保巡抚大人的安全，先缉捕了一批积年不获的惯犯、逃犯和其他社会不安定分子。私盐贩子张潮青因是请愿运动的急先锋，早被盐商们视作眼中钉，盐商们趁机活动，冯知县觉得到时候万一闹事的确有损地方形象，就差人把他关了起来。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在监生李芝英和另一个肩贩先锋俞能贵的率领下进城请求释放张潮青。乡民们在衙门前黑鸦鸦地坐成一片，恭恭敬敬地烧香下跪，求保张潮青。那一张张肃穆的面孔叠合在一起如同一场隐含的风暴，足以吹翻一艘大船。

冯知县仗着巡抚大人在城坐镇，以为乡民们必不敢滋事，因此任他们在衙门前跪着，自己不露面不说，连派个幕僚或衙役安抚一下都没有。显然，冯知县的判断在这里出现了问题，他不是太自信就是太迂腐了，他不知道"夷扰"（鸦片战争）以来，政府的权威在民众心目中已大打折扣，那些草头小民已不怎么害怕这个软包蛋的政府了。山海之地培育出东乡人强悍好争的民风，见跪求无效，他们便转为强干，冲入县城监牢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急放号炮，调集驻军，令他气恼的是，那些草鸡似的官兵似乎集体耳聋了，等了半天，衙门前连一个官兵的影子都没有。

后来，周祥千与继任鄞县县令的段光清说起此事，认为东乡人之所以闹腾得如此肆无忌惮，关键的原因正在于：官不足以服民心，而兵更不足畏。

巡抚大人在宁波的遭遇尚且如此灰溜溜，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两个月后的"平粮价"，自然闹腾得更大了，不仅抢了人犯，还放火烧了衙门，揪斗了平时看上去凛然不可冒犯的知府大人。这般扬眉吐气，小民们怕是做梦都要笑出声来呢。但是，他们很快就要笑不成了。无能的知县冯翊已被上级革职拿办，新任知县段光清正在从江山县到宁波赴任的途中。更让人一听就不由得缩紧脖子的消息是，主管全省刑事、治安工作的浙江按察使（臬司）和浙江盐运使正调集兵马，亲自督兵前往宁波平暴来了。

举人大挑（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出身的安徽宿松人段光清（号镜湖），官阶不高，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能

员。在出任鄞县县令之前,此人已在官场跋涉多年,历任浙江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地县令,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一下就摸准了东乡百姓担心事情闹大遭官府报复的心理,到任次日,即不带一兵一卒,只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抚人心来了。

他差人传来几个年老的乡民问话。

段光清问:事已至此,你们真的要一县同反吗?

乡民说:哪里敢反啊,只不过前段时间听周祥千说,征收钱粮分成红白两封名目,大家都深觉太不公道,才一同邀集进城请平粮价。

段光清说:衙署都让你们放火烧了,还说没有反?

乡民们惊恐起来,面面相觑。有人大着胆子,问新来的县太爷:事情到了这一步,如何是好?

段光清使出了他在赴任途中就思虑成熟的一招,他让乡民们回去各写一份呈文,呈明某乡某村某人某月某日并未入城滋事,且申明本户应该缴纳的钱粮情愿照常缴纳。段说,这样一来,将来官府捉拿周祥千,你们也就没有了干系。

乡人们还犹豫着:一来这样做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领头人,良心上一时还说服不了自己;二来呢,他们对段光清作的保准还将信将疑。边上书役一叠声地开导起了乡人:这新来的段太爷昔年做过慈溪县令,他的政声我们东乡人很早都知道,他决不会欺骗百姓,听他的,准没错!

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终于见了成效。五天下来,自鄞县北乡始,继而东、西、南三乡,段知县共收到乡民呈文三百八十余件。当初一呼百应的周祥千事实上已被孤立了。

三　进军东乡

此时,浙江按察使和盐运使亲率的数千人马已经开到了宁波。

段光清从一开始就反对用兵。他向宁波知府毕承昭报告说,百姓都已交上呈文,与周祥千划清界限,还愿意照常缴纳钱粮,光是捉拿周祥千一人,就不必劳动军队的大驾了。按理说,毕知府作为宁波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自然不愿意军队来干涉地方事务。原来,因为前宁波知府罗镛平日暴虐待民,这次乡民进城,带着对

罗知府的仇恨，烧毁府衙，连带将毕知府也凌辱一番，所以毕知府倒是坚决主张用兵，借以泄愤。至于按察使大人和他手下的副将、参将们，他们巴不得在宁波府这块富得流油的地方狠狠捞上一把，既可中饱私囊，又可砍一些暴民的脑袋去邀功请赏，何乐而不为？于是，用兵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军队像饥饿的蝗虫一样每天飞出去抓人，周祥千闻讯已经躲了起来，官兵捕之不获，在抓了四个南乡人后，转而跑到了东乡石山衕，前去缉拿张潮青等人。张潮青正好不在家，官兵扑了个空，便纵火烧毁了两间民房，抢了许多财物，捎带着抓了十三人准备回城邀功。东乡人丝毫没有防备，他们没想到官军竟如强盗，待到反应过来，急急鸣锣聚众，拿着铁耙、鱼叉等家什扑向官军，官军见势不好逃回城中。

省城大员听说东乡人聚众抗拒，不由大怒，决计向东乡大举进兵，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听话的刁民。臬司让鄞县县令审讯胡乱抓来的十三个人犯，段光清不干，告到了知府那里。他说，如果不让我做这个鄞县县令了，问问口供也无妨，既然还要我做鄞县县令，又要我去审讯，将来我还怎么在地方上开展工作？到时怕真的要闹得官民对立如同水火了。

进攻前，臬司派员向地方索取地方供应，段光清当面顶撞道：我本来是江山县令，鄞县县衙都烧毁了才调我来这里的，你们向我要供应，我又向谁要去？以前的知县怕撤职对你们百依百顺，我还巴不得你们告状让上司撤了我呢！他忠告军方，征集来的官船的水手大多是东乡人，以东乡之船运兵去攻打东乡，恐怕没多少胜算，还是以不用兵为好。这些话全被一心躁进的臬司当作了耳边风。

三月二十六日黎明，五更刚过，数千官兵纷纷攘攘地向东乡石山衕进发了。这一日大雾，几步开外莫辨人影，给军队的行动更增加了困难。他们闹哄哄地登上百来艘紧急征调来的民船（划船的水手大多是东乡人），一边还一个劲地咒骂鬼天气，责怪地方官供应不周。看他们那模样哪像是来打仗的，倒像是前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踏青活动。在开往东乡石山衕的途中，他们兴高采烈地一路抢掠着，据说一个产妇床上的棉被也被他们抢走了。

东乡人这下给逼到了绝路上，他们在张潮青、俞能贵和李芝英等人的号令下，埋伏在临河的羊庙里，架上洋炮，待运兵船前队一过盛垫桥，即放炮为号，一拥而出。官军猝不及防，被炮打死者不计其数，前头的船见事有变，急急摇回，又被桥

洞卡住（驾船的东乡人故意为之），官兵被预先埋伏在桥上的乡人拦桥砍杀，弃尸河中，驾船人这才摇船而去。仅是俞能贵一人，就杀了十多个官兵。

这一战，官兵死了二百余人，而大小文武官员也死了二十多人，计有湖州副将张蕙、南塘通判袁廷举、候补知县蔡琪、秀水县丞李祺等。仁和知县德成（此君曾经担任过鄞县县令）躲入了麦陇中，被乡民发现后，也被拖出乱棍打死。带兵的张副将、薛参将，一个被杀，一个被活捉。没死的官兵也被乡人剥去衣物，光着屁股逃回城里。据后来赶到现场的段光清记述，现场惨不忍睹："上田下河，死尸乱倒，田泥血汙，河水红流。"

弥天的大雾终于消去，太阳出来已过早饭时分，官军大败的消息早已传至城中，商铺纷纷关门。还有消息说，杀红了眼的东乡人正一路尾随而来，准备攻打府城捉拿臬、运二宪。鄞县县令段光清受上级委派前往东乡谈判，本想以先前拘捕的十三个东乡人换回被俘的薛参将等人，东乡人见十三个乡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临时变卦，不仅拒绝交还俘虏，连段光清本人也差点被俞能贵所杀。

段光清回城，已是夜里二更，到道署内间向知府等官汇报情况。当是时，受伤兵丁和死者的家属坐在道署大堂上，号哭谩骂，带了一个医生朋友前来参加救护工作的丁韪良牧师见了，也觉触目惊心。拆烂污的按察使和盐运使见事情弄得如此不可收场，对坐无言，最后按察使对知府等地方官说，我们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还是暂时退回绍兴为好，这里的事就拜托诸位了。毕知府同意这个做法，于是臬、运二官连夜带着一干兵将出城逃回绍兴。

事变之后，东乡人自发组织起一支乡民自卫队，每夜手执兵器轮值巡夜，防备官府报复。官兵经此大败，也不敢贸然下乡了。看起来风平浪静，但谁说其下不是凶险万状呢？有消息说，镇海有个不得志的孝廉已经投奔了石山衙，此公出谋划策说，不妨先拿下府城宁波，再取绍兴、杭州，与一路东来的太平军汇合。听到这样的传言，怎不让人心忧如焚？宁波知府和鄞县县令都明白，如果平粮价定盐界的事没个交待，这事还不能说完。

就在此时，段光清收到了一封没有具名的神秘来信。

信中说：从正月开始闹平粮价到现在，又是打仗又是死人，闹得早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钱粮如果不开征，动乱就不能算真正平息。鄞县的钱粮征收，向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在您若持平了粮价，老百姓没有不积极配合缴纳

的道理。如果取消红封白封之区别，把银与钱之间换算的标准定为每两银子折钱二千六百文，这样做，民间财力不会干枯，官府的开销也不会减少一厘一毫。如此一来，民心安定，各安生业，原先跟随周祥千入城滋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做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起来了，周祥千一孤立，东乡的盐贩张潮青、俞能贵之流，也就蹦跶不了几天啦。

段光清接读此信，觉得持论平允，但又担心城中大户不愿配合，于是拿着这封信与士绅中的头面人物进行了一次协商。他们都认为可以实行。这样，咸丰二年的钱粮总算在这年四月顺利开征，人心也渐渐平定了下来。

果然，钱粮开征不久，南乡的周祥千自动到官府投案自首来了。因宁波府衙烧毁后尚未来得及重修，毕知府临时住在考棚内，周祥千就坐在试院大堂的地上，等待官府来人缉拿。毕知府因前次受惊，还未缓过劲来，怕民心反复，不敢出来见周祥千，委托鄞县县令段光清料理此事。

段光清赶到现场，看到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如同蚂蚁一般，沸反盈天。段光清没有派人立刻拘捕周祥千，相反，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动作，走过去拉着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做事，一身承当，你今天主动来这里，丝毫不波及同乡，无愧为大丈夫矣！"又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声说："若不是周祥千今天主动来投案，恐怕尔等身家都不得安静，所以尔等皆应该感激周祥千一人！"此话一出，鼎沸的人声突然消歇了下去。

段光清走入后堂，见毕知府一个人枯坐着，双眉紧锁，似有无穷心事。毕知府说出了他的忧虑：周祥千这次归案，实在是接了个烫手的山芋，按大清律条处置吧，又怕人心反复激起大变；不处置吧，这么重的案子，上头也不好交差。正踌躇着，段光清出了个点子。段光清的意思是把这个案子推到上边去办，一边派人护送周祥千向躲在绍兴的按察使、盐运使去投案，一边禀明上级，希望他们考虑到鄞县东乡的张潮青、俞能贵等人尚未拿获，缓办此案。这样一来，使宁波地方上的百姓闻之益无疑惑，石山衙的乌合之众也就涣散了，那些党羽一散，首犯张、俞等人也就不难擒获了。

商议停当，他们委派曾代理鄞县县令一职的高县丞押解周祥千动身前往绍兴。在盐厂门上船时，周祥千问：上官一定会问我的罪吗？段光清对周温语抚慰，说：你是主动投案，情有可原，到了上边说不定还可以从轻发落呢。

到了绍兴，臬、运二司果然没有为难周祥千，禀明巡抚大人从缓办理，每天好酒好菜款待着。至于周祥千后来如何，下文再提。接下来继续叙述石山衕那边的事。

南乡既然平定，官府就要开始打东乡的主意了。东乡民风彪悍，再加刚刚经历了一场流血漂橹的战事，办起来自然难度更大。段光清想到赴东乡谈判时曾经会晤过一面的监生李芝英，兀地灵光一闪，想出一个离间计来。

那次段光清带着十三个乡民上石山衕谈判换回被俘的薛参将，虽然事未成功，又差点把自己搭了进去，但有惊无险之后，他观察到，石山衕并非铁板一块无从下手，张潮青虽是肩贩运动的急先锋，俞能贵也骁勇善战，他们的谋主实为监生李芝英。李芝英这人看起来与官府对抗的决心并不是很大，而且早在段光清做慈溪知县时两人就熟识。那次谈判失败后，李芝英亲自送段光清下山，段光清问他，你们真的要造反吗？李芝英答道，百姓抗官是出于无奈，官兵如果不问罪百姓，百姓哪里会主动进攻。段光清告诉他，杀死了那么多官兵，官府岂能不问罪，但如果抓到了为首倡事之人，也可敷衍了事，官府交了差，乡民那里也不会大规模波及。段光清看出李芝英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反骨的人，分手时劝他早日为自己谋条后路。

段光清很清楚，他治下的这些小民，当他们是单一的个体时，一个个对官府都毕恭毕敬，甚至不无惧怕，打死他也不会做出焚烧官衙、洗劫商店这样的事来；但当他们聚合在一起，形成组织，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就会失去效力，狂热而盲目的激情像巫术一样赋予他们神奇的力量，这足以诱惑他们生出杀人劫掠、以下犯上的念头，并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诱惑。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各个击破，拆散这个庞大的群体，把小民们从乌合之众中剥离出来，从组织中的一员还原为孤身一人。

段光清通过江东一个姓陆的外科医生约见李芝英，在天童村河下的船中秘密会见。段光清以免去追究李芝英的刑事责任为承诺要求他予以合作。李芝英同意合作，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先划定盐界。段光清爽快地答应了，回城后即刻禀明知府，备下百根石柱，上镌“肩贩地界”字样，出示晓谕。没多久，界桩一一安插到位，东乡人当初提出的要求似乎全都得到了满足。聚在石山衕的乡民一下子走了不少，那个镇海来的孝廉也不见了踪影。

李芝英好久没有露面，说是卧床不起了。俞能贵去看望他，李芝英流着泪假惺惺地说：盐界既定，乡人各自安居，谁还和我们一同抵抗官兵呢，看来我也要像南乡的周祥千一样去投案自首了。俞能贵这时才似乎明白了什么，跳着脚大骂：中了毕、段两个老贼的奸计了！李芝英在一边沉默不语。

四　告密者

转眼到了五月，暖风吹熏下，江南已是草盛麦黄的季节，张潮青、俞能贵虽然还仍旧盘踞在石山衖，身边的党羽却日渐少了，铁了心跟定他们的不过十来个人了，且防卫也渐显疲态。段光清跟毕知府说，捉拿张、俞二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派兵前往缉捕吧，那些兵已被吓破了胆，派差役下乡又恐乡民滋生疑心。段光清建议，只需广发告示，明彰赏格，说专拿张、俞二人，其余概不追究，乡民有能擒此二犯送案者，每名赏洋八百元。

东乡人杀官拒捕的动静委实闹得太大了，到了六月，风闻此事的闽浙总督吴文镕派手下一个游击专程来到宁波，送来二百张告示，中有"不日大兵云集，必致玉石不分"这样的恐吓性语言，要求宁波府及鄞县广为张贴。段光清以东乡党羽即将肃清、告示一出易让乡民惊惶更激事变为由，请求暂缓张贴。

某日，段光清正在大堂问案，街上忽然哄传有数百名东乡人手执器械蜂拥入城了，正往县署方向而来。衙役书差以为东乡人又攻进城来了，正惊慌着，一个浑身湿衣好像刚从河里爬上来的东乡人冲进大堂，跪着禀告说：昨夜，张潮青自石山衖只身潜回村中。得到消息后，村中数百家聚在一起商议，既然县里已经出了告示，说不株连乡邻，只抓张、俞二人，还有优厚的赏格，我们何不把张潮青捉拿了送到县上来，以保东乡一方安宁呢？于是全村人一起同心协力，黎明时分一起前往兜拿，张潮青闻风，知大事不好，从宅院后墙跳入河中，乡民们把他从河里捉将上来，就这么着五花大绑地送到县上领赏来了。

段光清问：张潮青既已归案，那么俞能贵呢，为什么不一起抓了来呢？

乡民们说：可能还在石山衖吧，但也不好说，闻风逃了也说不定的。

段光清说：县里贴了告示，捉住张、俞一人，赏洋八百，本官说到做到，这八百两银子你们先拿去分了，如果捉住了俞能贵，再来领八百元。

乡民们领了钱，一个个笑逐颜开，争着说：我们这就去，请县太爷后面跟了来；如果俞能贵逃得不远，一定可以抓获。

毕知府让段光清多带些兵前往。段光清说：没必要，如果俞能贵真的发狠抗拒，以他的身手官兵也不一定打得赢他；如果俞能贵逃跑了，恐怕也是追不上的；如果他既不逃又不抗拒，乡人捉拿他就绰绰有余了，我就一个人去看看情况如何吧。

众人赶至石山衕，俞能贵早已不见踪影。接下来让段光清吃惊的是，乡人们抓俞能贵不着，竟押着俞能贵的家眷和一个通风报信的俞氏族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段光清说，昔日作乱，不止这一个俞氏族人，岂能尽抓？能贵一人犯法，与家人何干？再说当初也宣布过，只抓张、俞二人，但既然大家把俞能贵的家眷都押来了，案情重大，他也不敢擅自放了，只是剩下的八百两银子，一定要捉到了俞能贵本人才可以领走。乡民们只好悻悻然散去。

过不了多久，有告密者说，俞能贵躲在奉化县海边拆开岭上一处废弃的庵里。本县乡民不便越境去抓，于是官府派了一名把总，领了十余个兵丁前往。不数日，果然押解着俞能贵回来了。宁波方面把张、俞以重犯的规格装到木笼子里，解送到省城杭州。

很快，省里把张、俞二犯连同早先投案一直好酒好菜侍候着的周祥千验明正身后砍了头，首级解回案发地宁波悬示，此案也就算了结了。宁波知府毕承昭、鄞县知县段光清，因办案有功，俱各升官，不提。

这个故事的尾声，还要由本文实际的主人公——东乡的民众——来续写。他们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虽然犯了国法，但起初也是为了乡民的利益才与官府周旋。都是乡里乡亲的，看着两人的脑壳成天悬挂在头顶晃悠，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他们请求不要再悬挂那几颗头颅了。段光清同意他们所请，让地保把这三颗脑袋一并埋了。

五　奔跑的疯女人

到了八月，一度有谣传说，南乡人要为周祥千报仇，吓得道署内有人越墙逃跑，竟至跌伤。其实此事纯属好事者的杜撰。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曾经呼啸来去

的暴民们如今变得出奇的温良驯服，只有周祥千的妻子发了疯。

后来段光清下乡视事时还见过这个疯女人，在村口跳着脚大骂乡人是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尤。村里人都围着她看笑话。

段光清见此情境，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到他晚年退休后回到原籍地安徽宿松，以写作回忆录打发余生时，眼前还不时掠过那个在鄞县南乡的田野上到处乱跑的疯妇人的身影——风吹动她的一头乱发，如同枯萎的秋草。

人物档案

段光清(1798—1878)，字俊明，号镜湖，安徽宿松县仙田庄段家老屋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于乡，二十四年(1844)以大挑一等，用为知县，发往浙江，历任建德、慈溪、江山等县知县，后任宁波府知府，补西防同知。咸丰四年(1854)，升为杭嘉湖兵备道，调补宁绍台兵备道。咸丰八年(1858)，升浙江按察使，晋封吏部左侍郎、光禄大夫。同治四年，复任杭嘉湖兵备道。

晚年撰有《镜湖自撰年谱》，记述一生主要活动。书中对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情况有详细的记载，对当时政府腐败、官吏无能、社会动荡的现实均有所反映，其中对这一时期浙东商业和海运情况、海塘工程的记载，尤为值得重视。

一场殖民地爱情的始末

——罗伯特·赫德在中国的最初十年

一　去东方之路

罗伯特·赫德，爱尔兰人，一个酒类杂货店主的儿子。父亲是卖酒的，祖父也是卖酒的。这个十足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物于咸丰四年(1854)夏天来到中国，大约是从六十年代初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四十八年。刚开始，这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在社交场上从不放过这样介绍自己的机会：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文学士，科学奖学金获得者。

现在，这个年轻人正在去往中国的船上。

让我想想，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舱内？舞会？还是听随船的牧师布道？我现在让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蓝得虚空的海水出神。好了，他转过脸来了。一张阴郁的脸，很瘦。绷紧的下腭好像承受着内心的某种折磨，又不要让这种折磨显露出来。你会说：一张神经质的脸，就像一个过于羞怯和紧张的青年艺术家。

从南安普敦到亚历山大，再经陆路到苏伊士，由苏伊士到锡兰的加里，再经加里到香港，长长的七个星期，全是在北半球的酷暑下。沿途可以在新加坡欣赏宣礼楼，上教堂做礼拜，还可与槟榔屿街上的猴子逗乐，倒也不至于寂寞。这些东方港口城市无一不在大英帝国治下，既富异国情调却又似曾相识。此外，船行之处无非是漫长海岸线上的巉岩、渔船、丛林和寥寥可数的吊脚楼。海上生活为酷热所笼罩，暑气从头顶的烈日和远处岸上袭入船舱。女士们身披白纱，裸露着玉臂秀腿，太阳不太猛时就在甲板上慵懒地泡在帆布做的简易水池里。惯于寻欢作乐的人们昼伏夜出，一到暮色从海上升起，救生艇的阴影下都是拥吻的男女。

这一年他十九岁，体力和情感与大不列颠帝国一样正处于上升的勃发阶段。情欲之花在他体内隐秘的角落正在绽放。就在开始中国之行前，这个女王学院的优秀学生受魔鬼的诱引，和他的同学坏男孩斯旺顿一道，“走上了叛逆和邪恶的道路”——当然，每个男人都要经由类似的堕落之路才能到达上帝那儿——他在一个放荡的中年女子的身上失去了他的童贞。不久，他感到身体的不适，伴随着尖锐的疼痛。显然，作为快乐的代价，那个不贞洁的女人让他染上了某种惩罚性的疾病。

这里似乎有必要像小约翰·威尔斯一样回过头来简述一下 1854 年的全球史：当其时也，牛气冲天的大英帝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已抵达最遥远的地区。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德意志和意大利尚未统一。美国正在锐意向西扩张进入堪萨斯。蒸汽机已在海上开始服务，让巨大的轮船穿过风暴自由游曳。由于对动荡中的中国时局认识不清产生的误会，从广西山地杀出的太平军将使四亿中国人皈依基督的宗教喜讯正燃起欧洲每一个乡村教士的热情。

对一个有抱负有见识的年轻人来说，1854 年去中国正是一个最佳时刻。

于是，当这个年轻人有幸得到一百英磅的路费和两百英磅年薪的许诺，就从南安普敦港乘坐“堪迪亚”号轮船动身上路了。此行他的身份，是为女王陛下去远东服务的外交部随习翻译，一个低级职员，隶属香港总督（当时是包令爵士）管辖。他的目的地，是那个古老帝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宁波——按早几年抵达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先生的说法，“宁波”这个名字并不像字面那样意指“宁静的波浪”，而是指“使波浪宁静下来的城市”——不远的过去，一场旨在打开贸易之门的战争，已经让那儿成为一个通商口岸。

一路上，这个勤于内省的青年都在忏悔所犯下的罪孽：“不良的交往把我从安守本分的道路上引开，我所遭受的惩罚不仅有心灵上的损失，更有肉体上的折磨。”海上的溽热使那种难与人言的病更为折磨。他想，这就是亵渎神明的代价。我现在多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啊，他对自己说。为了重回主的身边，他规定自己从今以后做一个圣徒：一、读圣经，早晚各读一章；二、不说谎；三、戒烟，饮食适度；四、力求圣洁，“不因想着那些引向罪恶的欲念和行为而犯罪”。

可是，海上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那犯下罪行的一幕在回想中竟越来越显得销魂而美好。入夜的海风把甲板上女人们的香水味和轻佻的笑声送入舱内，他觉得

身体里好似有一只老虎咆哮着要跳将出来,关也关不住。实在没办法了,我们的年轻人只好背对上帝,趁着黑暗以手指头告乏了事,当然事后肯定又是无穷无尽的忏悔。

快两个月后,船到香港,走下甲板的年轻人形销骨立,如同大病一场,但这里还不是终点。在这里的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他作为额外人员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将转往宁波担任领事馆随习翻译。从香港出发前往上海的船上,他开始稍稍放任自己,读带在身边的司各特和库柏的小说,翻阅中产阶级的《笨拙》画报消磨时光。当湛蓝的太平洋水变成黄褐色,泥流涌向船舷,大河的入口向这个年轻人展开了他中国之行的第一页:肥沃的田野、宝塔和驮着牧童的水牛。尽管离船靠岸还有几个小时,赫德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小说胡乱塞进行李堆里,准备下船了。

"阅读小说应当受到谴责",这时,他对一个结识不久的法国人说,那人正捧着一本《巨人传》为里面的饕餮场面拼命忍着笑呢,"因为小说虽然能使我们得到教益,但它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对邪恶和不体面的景象——比如说性交——的想象,因此它使我们接触到罪恶和污秽"。

二　领事馆小湾

罗伯特·赫德是乘坐"厄林"号从上海到宁波的。10 月中旬的一天,船从镇海炮台"高傲的眼皮下"驶过,进入甬江。然后他看到了宁波——不,不如说是他看到了这座抵挡海盗的要塞下的大队帆船。林立的船桅几乎把城市从视线中遮去。

这是他对这个东部小城的最初印象:这是一座咸鱼气味包围着的保守主义的城市——保守主义尤其通过士大夫阶级的惧外憎外心理表现出来,是根深蒂固的官绅家族集中地,终日响着算盘声和桐城派古文的诵读声,某些物品被视为这个城市的特产:漆器、木雕、镶嵌银饰的家具和一些贵金属制品。

大多数传教士住在城东三条河流汇合处的岬角上,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学校、礼拜堂和几座简陋的房屋。英国领事馆坐落在离河岸稍远的一个长条形的岬角上,这一段河常常被叫作领事馆小湾。从领事馆的窗口,可以看到河对岸坟地的

荒草。

我们十九岁的年轻主人公开始在英国驻宁波的领事馆内孤独地工作，他的职责是主管送交中国海关的船运报告并学习汉语。可以想象他对这一工作并无多大兴趣，他更向往的是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被派遣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既然所有的道路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他希望很快投身到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工作中。怀疑和恐惧的确有，引诱的确在进攻。"感谢上帝，"他说，"感谢上帝我仍然喜欢宗教"。

可是穿上教士的长袍难道就能免受魔鬼的诱引吗？他应该记得雨果曾经描述过一个因情欲的折磨而变得神经质的神父——巴黎圣母院的克洛德主教。主教大人爱上了在广场上跳舞的吉普赛姑娘艾斯美拉达，因为得不到这个姑娘，在嫉妒和失望中把她送上了绞刑架。

主教去牢房看那个姑娘，像一只狗一样爬到女犯人面前说："姑娘，怜悯我吧，在我的伤口上涂点香膏吧，请你一只手惩罚我，另一只手爱抚我吧。"

结果呢，吉普赛姑娘用一阵可怕的笑声打断了他的乞求："神父，你的指甲里还沾着血呢！"

于是她只有死，还拉上了同样爱着她美丽容貌的敲钟人夸西莫多。

1855 年 2 月 3 日，赫德穿过近郊的田野出去散步，看见了几座坟墓。其中有一块石碑，是被海盗淹死的美国传教士娄理华的墓碑，上面写着："我是这土地上的一个陌生人。"那一刻，他对不可知的未来感到了恐惧。留在中国还是回英国？当牧师还是当律师？还是去经商？他就像一个旅行者来到一个岔路口，前面有五六个岔道，可他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最后他决定留在这块土地上，学会官话和难听的宁波土话，然后从事传教工作。他相信这是他来到这里的责任。

宁波土话听上去音调刺耳、粗鄙不文，以致有俗语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佬谈恋爱"，但为了与当地人打交道，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学。丁韪良牧师教给他一套自编的拼音，这套拼音系统以欧洲语言中的元音为基础，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可以把宁波土话拼写下来。丁韪良还教给他洋泾滨英语，一种在开放口岸经常被用来取代汉语的混合语。

牧师还给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个英国人一大早让他的厨子去买十八颗 yangmi(*杨梅*)——一种类似梅子的水果。

“你猜他买来了什么?”牧师卖关子。

“是什么?”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厨子回来时气喘吁吁地挑着一扎羊尾巴——这种既大又肥的羊尾巴在当地一向被视作珍馐佳肴,一面还向主人表示歉意,因为他在街上跑了大半天也只找到了十二条羊尾巴。”

赫德大笑:“翻译就是误解,这话真是一点没错。”

三　黑暗中绽放的情欲之花

当夜色笼罩岬角,情欲之花便开放了。这黑而又黑的苦难之花啊,和着夜色中潮水的呜咽,让可怜的年轻人饱受煎熬。这煎熬,即便他抱着一腔传教士的热忱也不可抵御。看来上帝也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无所不能。他渴望着异性的爱,欲火中烧,与日俱增,又不可遏制。只有异性的气息会让他狂躁的内心变得宁静。

“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位年轻而富有生气的传教士的妻子在我身旁,我就会感到愉快。”他在写给国内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信中还不无醋意地说,我在宁波,必须自己动手给衬衫钉钮扣,穿着无跟又无尖的袜子,自己动手弄吃的,而你所在的教区呢,想必有许多女孩子都乐于为你的手帕镶边,为你织袜子,做衬衫。可怜我这个倒霉的单身汉,这两周来还没有同一个英国女人说上三句话,只对一个美国人点过头,除了那个倒夜壶刷夜壶的老太婆,很少看到中国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随着年事增长,这种挣扎不再那么尖锐了,但从日记中可以知道,内心里他对于女色的挣扎从来没有中断过,不论故态复萌还是出于幻想,或出于对一个中国情妇的思念,他的内心都矛盾不已。

近乎幽闭的日子好像让年轻人变得谵狂。他吹嘘,自己正在爱上一个十四岁的中国姑娘,“她的脚只有两英寸长”。同时,还爱着这里的两个英国姑娘,他已与她们握手六次。还爱着一个在此地的爱尔兰姑娘,已见过她七次,并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与她讲过话。

领事馆里只有一个英国人,一位叫密妥士的副领事兼总翻译,他也是一个单身汉。他们很少交谈,工作也大都是“在纸条上涂写”。除了和传教士们喝茶,晚

上的时间如何打发确是一个问题。密妥士先生有时会带着他去拜访城中的英国人家庭，或参加一些小型聚会。到宁波不久，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战斗，击退肉体的世俗情欲。年轻人太需要一个对手了，他把自己视作了最大的敌人。

然而发生在身体内部的战斗毕竟是可怕的。

“考验最激烈的时候只有被引诱的个人、引诱者和上帝知道。”

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罪恶感要把他推向一种禁欲生活，但内心里有一种力量强烈地引领着他立即退回到世俗生活。在深夜的书写中，深感寂寞并对女人充满幻想的年轻人记录了生活带给他的各种烦恼、诱惑，道德上的斗争和苦恼的时刻。他涉世不深，却又雄心勃勃，富有见识。日记还显露出，他还把握不准自己的方向和潜在的能量，正摸索着培养自身的处世技巧、耐性和精明的头脑。

出于某种考虑，他和传教士们保持着时断时续的接触，所谈无不是一些宗教问题。但当每周末去教堂做礼拜时，所有人都看出了他的兴高采烈。这不由让人怀疑，与其说他是为了去听传教士们索然无味的讲道，倒不如说是为了寻找机会和年轻妇女接触，并体会异性之温馨。

一个礼拜日，他照例去教堂听一个浸礼会牧师讲道。那天讲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当讲道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一只黄狗钻进了屋子，站在另一个教士的旁边。牧师在上面讲对一切事物要仁慈、克制，下面的教士们对那个不速之客忙开了，你打它一下，我踢它一脚，吓得黄狗尖叫着在人群中四处乱窜。先是女人们笑出了声，然后是站着的教士们。赫德也快活地笑出了声。

“上帝啊，救救这些渎神的人吧！”牧师在台上连划十字。

没事就去城外打猎。他打下过麻雀、斑鸠、稻鸡、知更鸟，还有一次差点打下一只猫头鹰。每当他背着猎枪出行，身后就会跟上一大群孩子，阵势浩大的队伍开出去，让他再也找不到一只鸟。他向孩子们作出吓唬的样子，但他们还是远远地跟着他。这很快让他兴味索然起来。

难道生活真的无趣到了只能在晚上听听更夫打锣和敲竹梆子？铛铛铛。梆梆梆。深夜划破空气的敲打声倒是很有规律，尽管音色变化少，效果还真不错。

年轻人很快找到了新的消遣，去城墙那边散步。宁波的城墙是石砌的，因年

代久远而呈灰色，墙上缠满了爬山虎等匍匐类植物。赫德目测了一下，墙体足有二十至三十英尺高，周长足有六英里。城墙顶部开阔，足以行驶一辆马车。站在城墙上，无论是往城里看还是城外看，都让他心旷神怡。第一次去，在城墙上走到一半的样子时，散开了的蛋黄一般的落日似乎在向他发出警告，如果走得再远一些，就得留在黑暗中了。他离开城墙，从城中直穿过去。当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时，他迷路了。他不知道是继续往前走还是留在原地。当他看到住处的屋顶时才安下心来。

城墙上行人很少，只有士兵、乞丐和传教士。他喜欢早晨去那儿散步。那时，这座城市刚刚醒来，他看着嘈杂的市声像潮水一样慢慢地涌上来，内心感到充盈，觉得尘世的可爱。

一天清早，他在城墙上遇到了奥尔德希小姐。奥尔德希小姐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很早就立志献身于上帝的事业，但因父亲年纪大了，不得不在家照料，直到她父亲去世。她先在爪哇呆过几年，鸦片战争结束后来到中国。尽管那时她已经不再年轻（四十岁），但还是学会了阅读中文。奥尔德希小姐天生丽质，颇富家财，却一直没有结过婚。这并不是说缺少求爱者，这个老处女至少拒绝过别人一两次吧。她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在城市中心的呼童街租下一套大房子，开办了这个城市最早的一所女子学校，据说也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几所女校之一。她一天中最好的消遣，是由最中意的几个女学生陪同，爬上城中九层高的宝塔顶，坐在那里，呼吸着海边吹来的清风，度过漫长的午后时光。

矮小的老处女由一个拿着灯笼的仆人陪伴着，正喘着粗气沿着石级走上来。她身穿一件花丝绸晨衣，严严实实的扣子一直扣到头颈底下，头发用绿色的蝴蝶结系住。这个女校校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看得他心里发毛。

他急忙向她问好，语气里带着自己也不觉得的殷勤。他听说，奥尔德希小姐办的女子学校里，有几个漂亮的女助手，他早想结识她们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奥尔德希小姐十几年前就来宁波了，称得上是这座城市传教士中的老前辈了，他理所当然要为她让道。行为古怪的老处女摸出一瓶治头痛和驱除异味的药水，往手掌上洒了几点，又添加了些随身带着的鹿角精，揉了揉太阳穴，说："年轻人，我每天早晨五点就来城墙散步，想不到你起得更早。"

"能陪小姐您一同散步，不胜荣幸。"

陪同老处女散步的结果是他得到了邀请。本市的英国人要到雪窦寺游玩，奥尔德希小姐希望他能同去。就在那次游玩途中，赫德看上了老处女的一个助手——年轻美艳的戴尔小姐。看着她惹火的身段，赫德心里暗暗发誓要搞到她。要不是他紧张得舌头打了结，倒真的要脱口而出向姑娘求婚了。上山时，赫德一直有意走在戴尔小姐的轿边，一想到马上就要宣布爱情，年轻人就喘不过气来，有六七次差点晕倒。

"我是个什么样的青年呀！"他忍不住埋怨自己。

最后他总算找来了一只小狗作了戴尔小姐的替代，这当然比一个年轻女子要差远了。有聊胜于无吧，他把自己最喜欢的外甥女的名字给了它——诺拉。

到了秋天，一些年轻的中国女子开始进入他的视野：比如阿蝉，阿金。她们可能是领事馆里的同事介绍他相识的，也有可能是华人邻居或仆役的女儿。他为她们心跳，发烧，忽冷忽热。

为了搞到她们（*尤其是最小的一个*），这个年轻人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向她们献些小小的殷勤，赠送扇子和盘花钮扣。当女孩们拿着这些扇子来到他的房间向他道谢时，他是多么想拥吻这些少女啊。可是他又为自己的腼腆而害臊，只好把欲望发泄到夜晚的日记中："我对这些小姑娘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后者。"

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在异国，自然少不了忍受当地女子好奇的眼光。当有几个中国妇女从窗外向他窥望时，他感到被侵犯，但也不无白人男子的优越感。他告诉自己，在这里我要自持，在我的周围有许多诱惑，让我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吧。

"昨日一个年轻妇女从窗口向我窥望，她长着一张狐狸的脸，母豹的臀。"

他这么说时，朋友讥笑他是中了这个国家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的毒了，因为此人在他的短篇故事集《聊斋志异》中，惯于虚构一些狐狸精变的魅人少女，来抚慰落魄书生的性幻想。

"我还看见一个很漂亮的中国女孩在领事馆附近，她的外貌并不特别像中国人。"后来他打听到那个长得像混血儿的女郎是领事馆里一个仆役的女儿。

"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像两粒子弹一样准确地命中她们的乳房和屁股？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他说得如此痛苦，像在暗室里忏悔，让人不同情也不行。

"但艳梦像三江口的潮汐一样没有止息，自慰时我不得不想着她们，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战斗。"

这个过分相信文字的年轻人，喜欢对一切事物包括自己脑袋里的念头追根究底并且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爱探索的头脑在没有被事实说服之前是不可能接受别人的意见的。但他终于说服了自己：既然用五十到一百元就可以买一个长得还算标致的女人，让她成为你的私有财产，且每月花两三元钱就可以养活她，既然寂寞是如此之深就像秋天的荒草，既然思念被禁止的欢乐是有罪的，抱有这类想法又害怕实施它会更加地不幸，那又何不摆脱空想去切实地行动起来？

“肉体与灵魂交战，引诱不断出现，良心告诉我不要向它们低头，它们产生的点点世俗欢乐都会被内心的谴责所摧毁，可是引诱是如此强大，让我心生眷恋，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战斗。”

1855 年的一些零散的纸页上，他以不同寻常的热情描述了他的一个中文老师的婚礼。他还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宁波的妓院，它的内部陈设和做生意的方式。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年轻人曾在那些花柳之乡过夜，但他肯定进去消受过。

他坦白，一些老于此道者还传授给他少花钱在妓院里过夜的办法。那就是两个人一起去一间屋，在那里让一个姑娘服侍他们，装烟呀，递茶呀，然后两个人一个睡前半夜，一个睡后半夜。

“如果一个女人在街上说，今天生意好哦，凭着她的衣饰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操那种营生的。”他向朋友吹嘘说。

本市的外国人经常举行一些宴会，那时他们都会带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夫人出席。某次宴会后，年轻人写下了一首诗，准备给它配上《友谊地久天长》的调子：

在宁波府我们能听懂的话不多
看不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可以搂着细腰散步
但在宁波府我们仍然有一些欢乐
音乐会，舞会和游戏
中国习俗与古老英国的好方式混合在一起
在宁波府我们品尝着冒到杯边的酒趣
爱本地少女，抽雪茄，饮酒
如果不在宁波府享受某种生活，那是我们自己的错

四　动物世界

11 月底下了一场大冰雹，天突然冷了，早上起来，赫德发现玻璃杯里的水都结了冰。看来冬天真的到了。

天空不再是无云的湛蓝，太阳也变得有气无力。从江面呼啸而过的西北风吹得窗户格格作响。它们带来了急急南驰的大块乌云和刺骨的寒冷。

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新历已是 1855 年 2 月，一大早，云消雾散后，赫德渡过甬江去药行街天主教堂。经过城隍庙时，他看见人们围桌而坐，许多衣着华丽的人走来走去。锣鼓号角喧天，噼啪的火枪和鞭炮声中，舞龙的队伍开了过来。赫德饶有兴味地立在人群中观看。

一条用彩绸和竹篾扎成的巨龙，由把头藏在鳞光闪闪的龙肚子里的数十个男子举着，忽而匍匐，忽而转身翻腾，其模样就像是鳄鱼与大蛇的混合物。后面跟着的是一大群飘在空中的仙女，每一位仙女都是由衣着鲜艳、容貌出众的年轻女子扮演，用细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金属丝网吊在半空中。站在人群中的赫德不由得用刚学会的土话叫起好来。

“那是谁?”有人惊奇地问。

“赫老爷。”一个人说。

新的一年开始了，他很高兴这座城里的人们开始认识他。

即便是在宁波这样的小地方，赫德也感受到了天下不靖的震撼。去年 10 月他取道上海前往宁波时，清军和太平军正在上海近郊进行拉锯战。过了旧历新年，传来了太平军攻下了江西省与浙江省交界处的玉山县的消息。风传一些上海三合会的秘密信徒已经来到了宁波。一天赫德去道台衙门，看到了几个装在竹篮里的血淋淋的人头和七八个被捕的嫌疑分子。为防止他们逃跑，兵士们把这些犯人钉在木板上，钉子钉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肉上（**此系布兴有的船队从舟山惯盗手中夺回“宝得来”号时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这个地区更迫切的问题是葡萄牙水手和广东水师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恶狼争当保护者的利益争夺。过往的商船请葡萄牙人护航，这惹恼了以布兴有兄弟为首的那些海盗出身的广东水师，他们扬言要报复葡萄牙人。有关动乱

的谣传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有消息说，报复性恐怖活动已在酝酿之中，不久将要爆发。在宁波的外国人进行了一次冷餐会，筹划对策。但是，赫德以为，“作长夜之饮的人无法应对仓促事变”，拒绝赴宴。尽管如此，睡觉时他还是在枕头底下压了一支左轮手枪，并把床边的窗户打开，准备必要时就跳窗逃跑。

漫长的雨季开始了。整个城市成天变得灰蒙蒙的，往空气里随便伸手一攥，就是一大把水汽。床单长出了霉点，不穿的衣服和鞋子长出了绒毛，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霉烂。某个特别闷热的夜里下了一场特大的雷暴雨。一道闪电，同时伴随着震耳的炸雷，好像大炮在头顶开火一般。次日早晨起来，赫德吃惊地看到，闪电击中了河里泊着的一艘船的前桅，桅杆折断，余下一截的下部有一道明显的参差不齐的凹槽。这不禁让赫德后怕，要是雷电击中了他住的房子怎么办？

雨季过后到处是明晃晃的阳光，空气中充满了蜜蜂采蜜的嗡嗡声。鸟儿也忙于表现爱情。群狗似乎在比赛谁的舌头伸得最长。年轻人身体里暂时偃旗息鼓的战争又重新开张了。

一个闷热的夜晚，空气中充满蛙鸣，赫德坐在桌前。桌上散乱地堆放名片、家信、记账本、道台大人的信和《辉格》、《信使》、《国内新闻》等杂志。不知什么时候，两只蛾子飞了进来，在他写字的时候静静地坐在纸页上，赫德似乎觉得它们很有礼貌地看着自己，就像中国传说中那种上了年纪的女才子。然后又飞进来一个大家伙，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开始有些激动，年轻的绅士带着两只蛾子围着灯追逐着。

一整个晚上他都被蛾子翅膀的拍打声扰得睡不好觉。迷迷糊糊入了睡，梦里还是那些谈情说爱的蛾子。就像当地那个美丽的传说中的一样，它们幻化成了俊郎的男子和楚楚动人的女子，到后花园私订终身，又在去省城杭州读书的路上十八里相送。

那些日子，造访他屋子的还有以下这些不速之客：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蜘蛛，捣蛋的甲虫，军团一样在头顶飞舞的蚊子，蟋蟀，蝗虫，蜥蜴，忧伤的纺织娘和小商贩一样机警的壁虎，还有一些爱跳舞的小动物，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他被这些小昆虫闹得不胜其烦，身体内部的战争逐渐演变成了他与动物世界的战争。

窗外又如何呢？同样是不得安宁。当然更多的是忙着唱歌求爱的青蛙。“青蛙在路边蹦跳，数目之多令人吃惊”，他说，“有各种颜色和形状，有许多就像一块

泥。有一次我走近时看到一块泥土忽然裂开,好多青蛙四处跳散开来,吓了我一跳。"

长这么大,他第一次看到了蛇,好家伙!足有四五英尺长,它隐秘地在草丛中悄悄溜过时,他觉得上帝的造物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比这位老兄更像是狡猾的化身了。

有一天,竟然有一条蛇钻进了他卧室的木板底下,"我对这位绅士感到有些紧张"。还有一次,这邪恶的化身钻进了他放在桌上的衬衫里,要不是他准备穿那件衬衫前抖了抖,那条蛇怕是真的要缠上他的脖子了。这让他一想起来就后怕不已。

"我用手杖打死了它,它足有五英尺长,最粗部分的直径有一英寸半,在卧室里看到这东西真是太恶心了。"

夏天似乎提前到来了,天空没有一滴雨,到处又都是明晃晃的阳光,这让他感到难以忍受。早晨的时候希望晚上到来,夜晚来了又希望是早晨。一般,傍晚六点钟他就带着小狗诺拉出去,到领事馆背后的山丘上,手脚四伸地躺在一块坟地上,看看四周,吹着凉风,做些不着边际的梦。

"我开始像畜生一样地生活,睡觉,吃饭,写字,抽烟,闲逛,不想家,没有烦恼,也没有思考",他抱怨说。

五 阿姚

大概在7月初的某一天,由于不胜昆虫们的骚扰,赫德搬出领事馆,住进了怡和洋行在宁波的代理人帕特里奇船长的家里。

1855年7月1日的日记中,赫德描绘了这个夏天带给他的种种病症:"先是腹泻,然后在星期四便秘,我服了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仍然病得很厉害,今天多少好些,但舌头仍很脏,嘴里有一股很讨厌的味道。昨天和前天热得厉害。今天上午身体非常虚弱。简直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到哪里去才有风吹进屋来。"尔后他记录了这天下午两点钟后的一场大雨:"先是刮大风,再是雷暴,雨点大如普赖斯小姐的顶针。由于这场雨下午变得凉爽宜人,蟋蟀、蝗虫、蚊子和青蛙现在都忙着歌唱。"最后他按捺不住兴奋地说:"明天我去帕特里奇船长家暂住,以度过热季。"

帕特里奇船长这年三十出头，却已是显赫一时的商人。他的鸦片生意做得很大。一住进他家，年轻的领事馆翻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优裕起来。我们可以设想那是在一幢气派的大房子里，长驱而入的江风吹动洁白的落地窗帘，屋里安放着远洋运来的英国家具，架上陈列着主人搜罗来的各式古玩。宅内婢仆成群，她们懂得洋人的喜好，善于逢迎，无一不令人心满意足。

见多识广的船长自然有能力解决朋友的性苦闷。我们还不妨进一步设想，帕特里奇船长自己就有一个中国情妇，通过这个女人，给赫德搞个把年轻姑娘怕不是什么难事。

大约是在 1857 年夏天，一个叫阿姚(Ayaou)的宁波姑娘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这个出身低微的船家女儿是赫德在中国的第一个情人。

赫德的日记早在 1855 年的夏天就戛然中断了，显然，赫德后来在整理日记时把有关性苦闷和与情人同居的日记一并销毁了。这一时期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篇赫德日记是 1855 年 7 月 29 日，它包括以下散页：一些未写完的致友人的信件，若干篇宗教经文，关于宁波日常生活的一些片断，还有一些显示日记作者文学素养的虚构故事的片断。

日后名满天下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爱惜羽毛，不想让人看到有此暧昧关系的记载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过多渲染结婚之前的男女情事也未免使他未来的妻子难堪。当然，按照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标准被看作放荡和见不得人的事，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可能是这个人在中国最富有意思的经历。

赫德日记的整理者之一费正清先生发现，消失的赫德日记为 1855 年 7 月 29 日至 1858 年 3 月 20 日，长达两年九个月。在这一删节过程中，赫德把有关那个女人的记载连同那些多事的年代中许多外交和商业史上日常事件的记载一起销毁，这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实在是无可弥补的缺憾。

费正清推测，赫德出于塑造自身形象的考虑删减这部分日记的时间，当在 1902 年海关职员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因打算为赫德写传记而要求阅读他的日记的前后。马士本想写一部以“赫德爵士和他所组织的那个伟大的中国海关”为核心的历史性传记，因为赫德的谢绝，他才不得不“用一部历史代替一部传记”，写成了被称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参考书”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到了 1906 年，赫德就有关使用他的日记一事，最后致函马士：“关于我

的日记,本来打算在我归天之日付之一炬,然而在1900年的兵乱中虽然其余一切皆荡然无存,此物居然得以幸免,真是不可思议。但此次幸免于难,并未使此物获得任何不同寻常的价值,而我还深恐其不仅难于理解,反使涉猎者徒耗精力,得不偿失。我估计目前我已写到第70卷,要把它从头到底重读一遍,并把其中不能用的部分剔除出去,可能需要花费五六年时间,而且我的生活必须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稍许的变化。"但幸运的是,可能因为日记过分庞大,赫德在处理这个时段的日记时删减未尽,还是有关于阿姚和他的私生活的信息泄露出来。顺着日记残片和赫德与在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的通信,阿姚这个和他一起生活了七年的中国女子得以在下文的叙述中重新浮现。

我们大致可以猜测,由于长年生活在这座海边城市,这个叫阿姚的女子有着终日被海风吹拂的黧黑的肤色。考虑到她日后要为赫德生下三个子女,她应该有着一个预示着丰盛生殖力的硕大的屁股。给洋人做情妇,她的社会地位应该不高,据赫德的日记记载,她是沿海船家的女儿。赫德养着她,想必还要定期付出一笔费用,其中有一部分要支付给她的家庭作为补偿。我们还不妨设想,她长着一双健康的天足。

这个精明的年轻人自然不会有在这个小地方作长期投资的想法,无论是金钱的投资还是感情的投资,他都没有这个打算。他希望等他的任期结束——一般是四年——他就可以回到爱尔兰向家人和朋友吹嘘他在远东的神奇经历。没错,他是被情欲包围着。没错,他向往着在异国有尽可能销魂的艳遇。但在这个开埠通商才十来年的小地方,他不需要爱情,他只要一个女人,折磨得他寝食难安的是一种殖民地情欲:它绚烂而短暂,放荡而有节制,充满了异国情调。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显然背叛了他的初衷。

他喜欢上了和这女人做爱。她浑圆结实的臀就像一艘再大的风浪也无法掀翻的船,可以载他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他激发了这女人的情欲,又甘愿做这情欲的俘虏。当高潮到来,他是多么着迷于她汗水的芳香,着迷于那具丰饶的身子里发出的潮汐般的叹息啊。而且,房事之后拥着这个当地姑娘学说土话又是多么地令人销魂。

做个传教士的想法早就一去不返,祈祷的时间也大大减少。上帝出现在意念中越来越变得像个稀客。他再也不提回贝尔法斯特去。(1866年春天的回国度

假是个例外，他要回去与正式的夫人完婚。）对女人的爱，古老帝国的房中术，像锚锭一样把他固定在世俗世界里，而他也无需再去考虑来生会遭受什么样的报应。

和阿姚的同居时期——保守的测算是在1857—1865年的七年间——成了他一生享受艳福的高潮时期。他好像要把对女人的幻想和激情在这个宁波女人身上耗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让未来的赫德爵士永久留在中国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他和这个女人的生活经历。在文化上，他依然是个异乡客，要靠经常通过阅读来自伦敦和爱丁堡的期刊来慰藉心灵，但在情感生活中，已完全以中国为中心了。

他生活在中国，这个女人却让他毫无他乡之感。

六　强弩之末

新一卷的日记开始于1858年的春天。

这年3月，赫德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二等帮办，并在不久后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出任联军委员会秘书，成为执掌占领期间广州实权的人物之一。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是带着阿姚从宁波赴香港，再乘炮艇"福雷斯特"号前往广州的。如果我们注意到，5月时阿姚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那么很有可能，赫德就是在船上搞大了她的肚子。

保存下来的1858年3月至12月的广州日记，偶尔会出现阿姚的身影：

5月20日，两位不期而至的军官进入赫德的住宅，他机智的情人躲入后堂，未被看见。5月26日，"阿姚（怀孕）两个月了"。7月8日，"我正经受一种心理上的变化：对异性比过去想得少了，不喜欢那种想象中的私通了"。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赫德把她送到了澳门。偶尔派仆人阿志给她送钱。或许是因为囊中羞涩，有一次阿姚向赫德开口要七百元钱，这颇使赫德不快。显然，她的怀孕让她不仅销声匿迹，而且还失去了往日有过的关怀。

他怒气冲冲地记载那些不愉快的会面场景："我的女船娘回来了，她于前夜从澳门回来。她向我要200元。我一定要和她断绝关系。""阿姚最起码的要求是700元，或最少200元，没门儿！"（1858年8月15日的日记）

"给阿姚125元，我的意思是这就了结了关系。"（1858年9月19日的日记）

阿姚怀孕期间，年轻的领事馆官员又开始另觅新欢。他毫无廉耻地记下他的艳梦："星期五，从一个美妙的梦中醒来，梦见把 MM 捧在怀里，亲吻她——这样甜蜜——紧贴她的前额。"

他开始频繁地和一个叫阿依的广州女孩幽会。他去东北门她的住所去看她，送给她钱，又把她带到自己宝塔街的住处。星期天，他和阿依一同骑马去广州城外的南郊和西郊。如此迅疾的发展速度，无疑更适合他那种殖民地情欲的发泄，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许这只是一个性苦闷的男人在同居女友怀孕期间的拈花惹草。总的来说，这个花心大萝卜同时还算是一个有良心的男人。大约是在这年底或下年初，阿姚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娜，可能是舔犊情深，赫德义无反顾地离开情人阿依，迅速回到阿姚身边，和她恢复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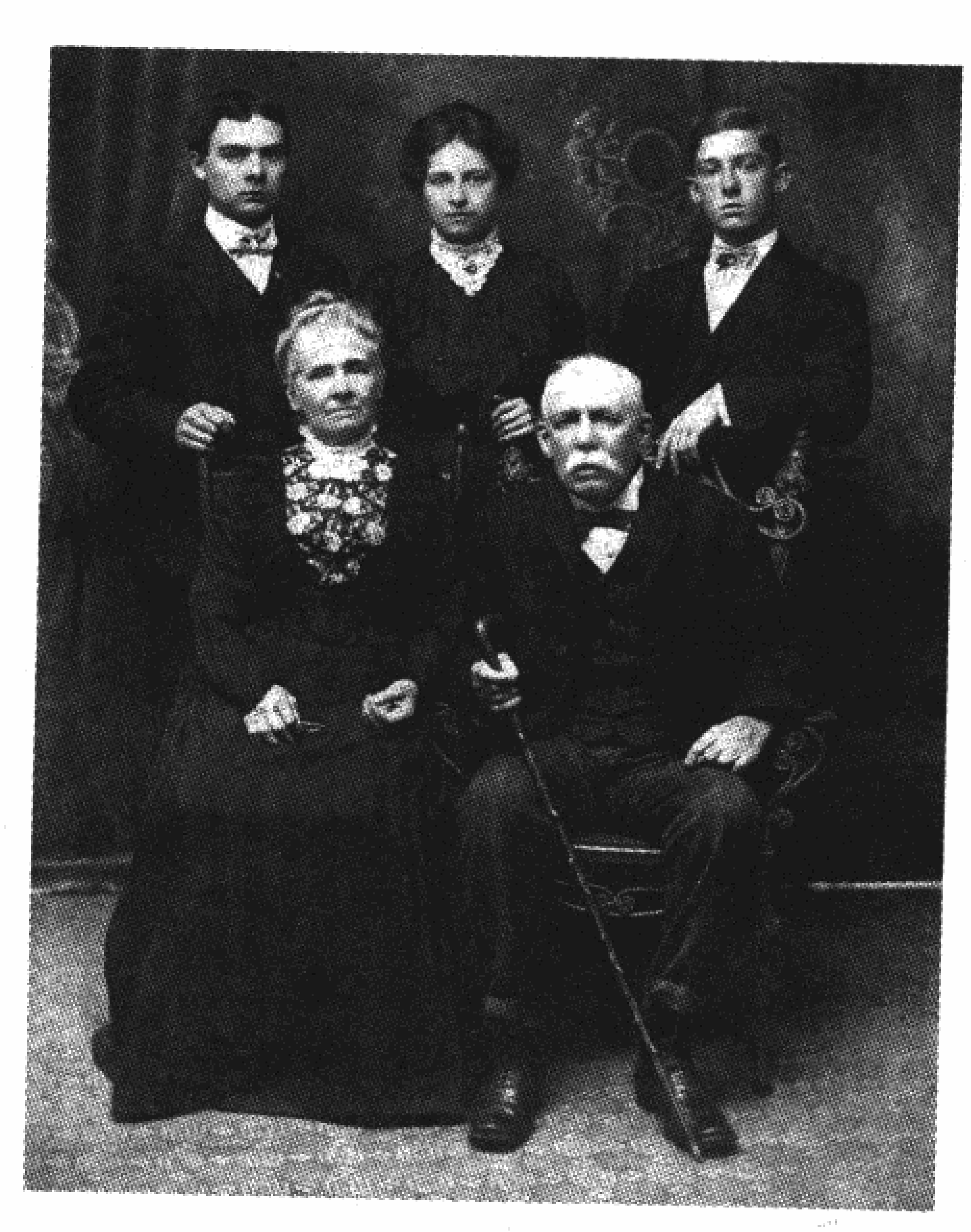
后来阿姚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赫柏特·赫德和阿瑟·哈特。（1866 年春天，趁带着"斌椿使团"访问欧洲之际，他把这三个孩子作为养子女送回英国，托一个同他有业务往来的商店司账戴维森先生和他妻子抚养，并接受英国式的教育。）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是总税务司署搬到了北京，还是出去巡视各口岸城市的关务，他经常会回到上海，看望这三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

1866 年春天，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在遥远的东方有着冒险经历并取得成功的罗伯特·赫德回到北爱尔兰，迎娶他的未婚妻赫斯特·简·布莱顿小姐，阿尔玛郡波塔当的一个小镇上的医生的女儿。这一年他三十一岁，布莱顿小姐十九岁。在这之前他们从未见过面，只是在赫德一个姑妈的介绍下通了几封信。出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作正式妻子的考虑，他闪电式地向她求婚，得到了她和家人的同意。他们在都柏林举行了婚礼，在浪漫的基拉尼湖畔度过了蜜月。

年底，赫德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和几个招聘来的同文馆教习回到了北京。海关处理不完的事务在等着他。

他马上有了这样的感叹："夫妻生活确实干扰了一个男人的工作。"

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四十五年，其中有二十一年是在北京共同度过的。余下的二十四年，赫德夫人住在伦敦卡多根广场一座舒适的房子里。赫德供给她足够多的钱款，用于旅游和娱乐，还不时转送给她中国官员送的珠宝、皮毛和丝绸等昂贵的礼物。作为报答，丈夫不在场时赫德夫人履行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妻子应尽的职责。他们经常客气地音讯往来，互致亲切的问候和祝福。



罗伯特·赫德和家人

此后出现在公众眼前的罗伯特·赫德,完全是一位整日案牍劳顿的官吏的形象。他时而还会在社交场上与一些妙龄女郎应酬交际,颇有绅士风度地献献殷勤,或真或假地说一些表白爱慕的话,但他再也不会像五十年代在宁波时期那样对她们充满性幻想。

在结婚十年后一场神经衰弱症之后,他和赫斯特·简·布莱顿的夫妻生活虽未完全废弛,但也见出了败象。或许,早在 1866 年,赫德先生在都柏林挽着赫斯特·简·布莱顿小姐的手走进婚姻殿堂时,他已是强弩之末了。

他的激情,已经在中国耗尽。

1875 年 11 月,在一封有关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写给他的伦敦代理人金登干的信中,他抑制不住地流露了对这个女人的思念与愧疚:“她(指赫德与阿姚的大女儿安娜)的母亲是人们能想象得出的最可爱、最有理智的人,她父亲原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但后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是个傻瓜。”

没有一个人知道阿姚后来怎么样。据赫德告诉他的儿女们,她在 1865 年生下小儿子阿瑟·哈特后去世了。由于资料的缺乏,我无法否定赫德的这一说法。她或许是死了,比如死于生最后一个儿子阿瑟·哈特时的难产或其他疾病。但对这没有先兆的死,我总心存疑惑。

更大的可能,会不会是新婚在即的赫德把她像一只旧雨靴一样遗弃了?联系到日后身居高位的赫德为人日益谨慎和圆通,越来越爱惜自己的羽毛,这不是没有可能。离开赫德后的这个女人,她或许在广州嫁人了,或许回了宁波老家。她的情夫在以后的日子里把日记中她的痕迹几乎全剔除干净了。没有一个人再提起她,就好像她本来就不存在。

她就像一粒灰尘消失在流转的大气中。

人物档案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玛郡之波塔当。1853 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1854 年 5 月来华,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1858 年被调到

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1859 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 年起代理李泰国在上海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 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64 年，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1865 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赫德居住北京四十多年。1908 年 4 月，休假回国。1911 年 9 月 20 日，赫德病逝于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清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赫德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他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清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纵横四海

——海盗布兴有事迹考

一　绿壳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东海岸，"绿壳"这个词肯定会引起某种不愉快的联想：一群群海盗打着尖利的唿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从那时候起，"绿壳"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中就成了形容一个人凶狠样子的专用词，比方说，你这个人像绿壳，或者，你这个人眼神像绿壳一样凶。横行于浙闽沿海的海盗船之所以有这么古怪的名字，是因为这些船只形如蚱蜢，船身漆以绿漆。

大约是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广州、香港周围的海域是这些绿色蚱蜢的天然牧场，以凶猛好斗出名的广东海盗们，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提着刀剑火枪在南中国海域上呼啸来去，追逐着货物和女人，孱弱的清朝水师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些绿色蚱蜢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曲折北上，蔓延到长江口外，他们的巢穴集中在浙江沿海一带。这些广东海盗比起四十年前他们的祖先来装备更精良，也更凶狠、更狡诈、更贪婪，比如臭名昭著的海盗头子"阿爸"的海盗船队。

"阿爸"本名叫布兴有，和他一起从事冒险事业的人是他的弟弟布良泰，人称"阿郎泰"。传说布氏兄弟手下有一千多号人，上百艘"绿壳"，还有一艘装备有重吨位火炮的"金宝昌"号。这样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船队的战斗力是积贫积弱的政府所建立的水师望尘莫及的（对当时的朝廷水师，时任宁波府鄞县知县的段光清就曾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平时捕盗既不敢前，护粮又不肯往，致朝廷虚糜饷项，水师真可废矣！）。

这些海盗们成群结帮，抢劫商船、渔民，有时也对落了单的洋人下手。1847年，美国北长老会教士娄理华在从乍浦回宁波的途中被海盗抓住后淹死。（娄理华被海盗淹死一事的记载来自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生活在宁波城的英国领事馆见习翻译罗伯特·赫德的日记。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来到东方的狂热的年轻人一样，赫德那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娄理华式的传教士，为传播上帝的福音殉身。他后来成了权倾一时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08年卸任回国。）1855年，传教士丁韪良从宁波去普陀与在那里度假的妻子会合时，也遭到过海盗的袭击，他们抢走了牧师的鞋子和手表。正当他们要劈开牧师的脑壳时，上帝保佑——这帮水手中一个听过布道的人认出了他，不然也就没有日后的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了。发了善心的海盗们在详细询问了如何看手表刻度的问题后，留给他一只较小的船和一坛酒。靠着这些，他在海上飘荡了三天后回到了陆上。

二　招安

咸丰元年(1851)九月，"阿爸"带着这群海盗入侵浙江海门，直逼黄林洋。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门被占十日。污水一般涌入的海盗洗劫了所有商铺，放了一把火，带上俘获的女人和物品，又向宁波府的石浦港开进。

浙江巡抚常大淳命令宁波知府罗镛急赴象山县剿灭海匪。罗知府故意慢腾腾地上了路，如他所料，等他赶到，海盗们已经潮水一般退去了。于是罗知府奏报大捷，谎称自己如何如何卖力，如何如何想尽办法募船募勇，总算把海盗打败了。以善良出名的巡抚相信了，拨给他一大笔银子劳军。可事实上，知府大人连海盗的毛都没碰上一根呢。

常巡抚善良到了什么地步？他不杀海盗，不杀囚犯，有《清史稿》为证：

> 常大淳，字兰陔，湖南衡阳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出为福建督粮道，署按察使。晋江县获洋盗三百八十馀人，总督欲骈诛之，大淳力争，全活胁从者近三百人。司狱囚满，大淳曰："囚不皆死罪，狱无隙地，疫作且死。"乃分别定拟遣释，囹圄一清。历浙江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母忧归，服阕，授湖北按察使，迁陕西、湖北布政使。三十年，擢浙江巡抚。

过不了多久，“阿爸”的海盗船卷土重来，且来势更猛，罗知府那个蹩脚的谎言就穿绷了，巡抚想不到鼻子底下都有人敢骗他，震怒之下，严责宁波知府尽快消灭海盗。可闹了几十年的“绿壳”有那么容易消灭吗？罗知府进退两难，有个高人指点他，海盗头子布兴有其实早有归顺朝廷之心，他这次闹得这么凶，其实也是为自己作一个晋身之阶，抚台大人催得这么紧，眼下不妨先请个中人和布氏兄弟谈谈招安的事。

海盗头子开出一个很大的价钱才肯投降，这笔价钱有多大？反正宁波府出了不够，还要省里出。布兴有还要求给他一个官职，常巡抚也同意了。巡抚大人本就是以善良出名，能不动兵戈把为祸海疆多年的“绿壳”平下去，再大的价钱他也肯出。布兴有得到了承诺，如果他带着他的船队归降，他将会被授以六品顶戴。受降仪式在宁波举行，巡抚大人也专程从杭州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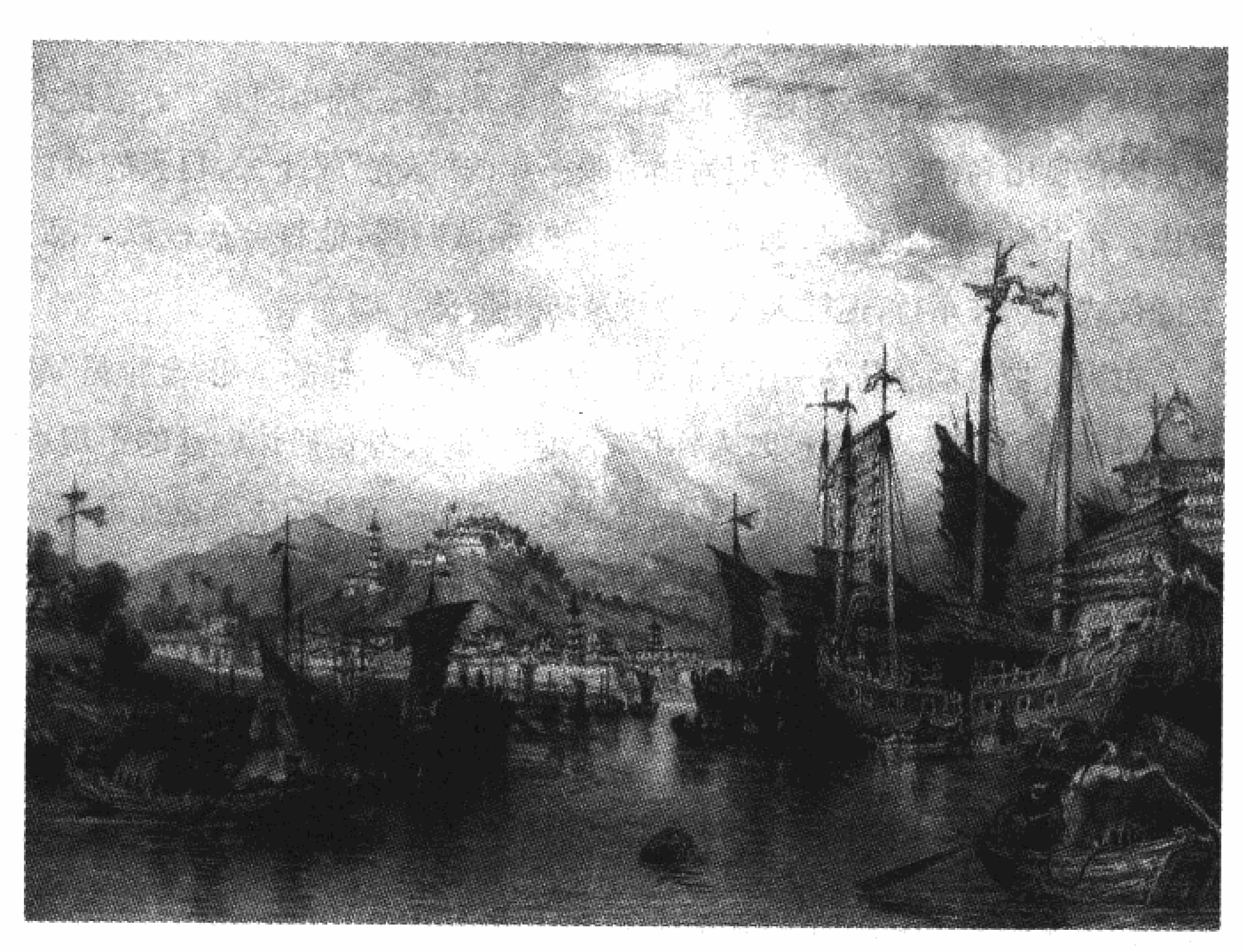
布兴有带着浩浩荡荡一千人的船队开到宁波海域，他的坐船“金宝昌”顺着甬江一直开到了府城。这艘被时人称作“活炮台”的大海盗船让朝廷的正规水师可开了眼，这艘船和英国的五百吨级船一样长，一样高，船身漆成黑色且带有一道红线，装载有大批火炮。布兴有上得岸来，伏地请罪。巡抚大人自然不免安慰一番，经过繁琐的仪式正式授以六品顶戴。于是闹了多年的“绿壳”海盗一转眼成了政府武装，编入大清海军的正式序列。受降仪式上一件小小的意外是，巡抚大人带着大群随从登舟时，前海盗们发炮相迎，把他吓得差点儿掉下海去。

布氏兄弟纵横四海多年的“金宝昌”号后来分配给了定海水师，这就像自己的女人被人家抢去，“阿爸”恨得牙都痒了，却又毫无办法。定海水师久不出海，船上的器具都朽坏了，这些老爷们又不会修，就一直搁着。怕事情闹僵，宁波府鄞县知县段光清筹集了一笔经费把船修饰一新，仍然交给布兴有兄弟管带。

后来，江苏巡抚许信臣得知宁波府有这么一艘船坚炮利的“金宝昌”，写信给浙江巡抚，请求调拨此船去攻打被太平军占领的上海，于是布氏兄弟又驾着此船前往上海助攻。

三　捕盗

“阿爸”的船队都泊在宁波近郊的内河，部下放任惯了，积习难改，常常上岸骚



甬江入海口

（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

扰，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他们在宁波城内盐门附近有一家大商行，转手赃物。直到新任鄞县知县段光清到任，此人手段厉害得紧，前海盗们才不得不收敛了些。段知县怕他们在岸上再惹出什么事来，命令布兴有带着他的船队，开到海上为商船护航。就像骑手想念草原，前海盗们也想念大海多日啦。

这是一支一百二十人的小型护航船队，每名兵勇月给口粮十二两银子。开始的时候，巡抚大人不同意这么做，因为这要花去一大笔银子。我们知道，咸同时代的大清水师都是些吃干饭的，省里每年拨给水师将近十万元的巡洋经费，可是他们的舰艇从不出洋，空领库款，从没有抓获过一个海盗。无奈之下，浙江巡抚规定，实行监督制度，以后水师出洋，移知该管各县，用船几艘、带兵丁多少，一定要县里查验，开具清折，方能领到经费，捕到海盗后另行奖励。

话说布兴有带着他的缉查小队，出洋十余日，就抓获了十七名海盗、二艘盗船，还用火炮打死多名海盗头目，己方只是损失了一名兄弟。这怎不让巡抚大人喜煞，拨给口粮的事也不反对了。就这么着这些从良的海盗们终于吃上了军饷。不久，鸦片商人、怡和洋行在宁波的代理人丹·帕德里奇船长的“宝得来”号被舟山的一帮海盗劫走了，布兴有带着他的船队赶去，因对方是舟山海盗，他们一点情面不留，追上去一阵狠打，夺回了商船。他们也为道台带来四颗人头和七八个犯人。这些犯人都被钉在木板上，钉子钉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肉上，像抬猪猡一样抬进了宁波城。

四　恶棍来了

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来到1853年前后的宁波港，无法不为这样的景象所打动：无数满载货物的帆船停泊在那里，它们有的刚从北方抵达，有的将远航南方的福州、广州等港口。摆渡船在其间来往穿梭。时时响起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不是欢迎一艘货船到港，就是祝愿一艘即将起航的船一路平安。

附近的海域上，游弋着大群挂着葡萄牙国旗的三桅帆船，这些葡萄牙水手——腰间插着左轮枪和酒瓶子、全世界都臭名昭著的恶棍——是被当地商人雇来护航的（他们在公海上也顺便做些敲诈勒索的勾当），他们的头目之一是一个曾经让人劈开过脑袋的名叫恩卡纳考的水手，他直接听命于后来担任葡萄牙驻宁波

领事的J·F·马奎斯船长。

源远流长的海盗传统，使得护航系统应运而生。本来，国家出钱养着军队，捕盗这样的事，水师自然责无旁贷，但他们自己几乎也像强盗，当时以鄞县知县署理宁波知府一职的段光清就这样说：从前水师巡洋，商贾往来平安，渔人出洋捕鱼亦蒙其惠，每年渔人孝敬水礼，所以报其功德，然营中援以为例，竟成陋规。如果真的能让盗匪绝迹，即便每年要交巡洋费数万串，老百姓也就认了，可是夷祸中国以来，水师之势日衰，钱还照拿，活儿却不给你干了。海盗横行，清朝的水师又不顶用，商家便出钱雇佣广东水手或外国武装帆船护航。

最早的时候，这笔业务是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当然也有配备火炮的商船参加，像"斯派克"号、"孔子"号等英国商船都接过这样的生意。护航需要收费，他们每和海盗打一仗就要索取一笔不菲的费用。后来这业务就有些走样了，一些没有商业信用的家伙把普通商船宣布为海盗船，横加勒索，把那些船上的货物说成是合法的掳获物予以瓜分。大概到了1848年后，此笔业务基本上落入了葡萄牙人之手。大批亡命之徒、走私贩子、强奸犯、性倒错者、敲诈勒索者蜂拥而来，他们有的来自葡萄牙本土，有的来自果阿或马尼拉。

编入了大清帝国海军的"阿爸"船队，为商人和商船保镖、护航正是其业务，这难免与葡萄牙人的生意构成竞争，官府解决这冲突的态度是"以贼制贼"，支持布兴有与葡萄牙人进行竞争——说白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鸟，去争个你死我活吧。东西方的海盗在北纬三十度线附近的海上狭路相逢，其结果不难预料。

下面的事，用当时在宁波城里的丁韪良牧师的话来说，是"一场充满血腥味、没有任何高尚行为的戏剧"。

五　火拼

1854年4月，宁波渔民以每个汛期五万元的高价，雇佣了葡萄牙人的三桅帆船为他们护航和保卫渔场。"阿爸"手下的广东水师为了从对手那里夺回这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发动了火拼。

先是有一个葡萄牙人被暗杀，随即两个广东人被报复性杀害，尸体几天后被海浪送回岸边。不久，葡萄牙人悄悄地从澳门派来一艘科尔维特式轻巡航舰。该

舰于7月10日抵达宁波，它得到的命令是消灭广东人的水师舰队。为了躲避攻击，布兴有的平底帆船退入了内河，停泊在宁波城的盐门附近。攻击者无视当地官府的权威，强行逼近，短距离开炮，要将它们轮番击沉。

炮弹嗖嗖地飞过沿河人家的屋顶，一瞬间人们都以为葡萄牙人炮击宁波城了。死神离人们是如此之近，一个在街上行走的姑娘被炸断了腿。一颗二十四磅重的炮弹落到了道台衙门，幸运的是没有爆炸。

有消息说，“阿爸”的手下要抓城里所有的欧洲人为人质，或者杀了他们复仇。恐慌笼罩了在宁波的外国人社群，他们在英国领事馆的枝形吊灯下通宵研究对策，却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传教士们和领事馆官员找到了这座城市的最高军政长官宁绍台道，道台大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马奎斯船长要求中国人对打死的葡萄牙水手作出赔偿，同时提出以后不得为难葡萄牙的三桅船，并要布兴有画押具结。

“阿爸”手下的这些前海盗们找到了另一种报复方式，等到科尔维特式轻巡航舰结束炮击，他们集合起残部，尾随追击。葡萄牙人把三桅帆船停泊在葡萄牙领事馆前面的一个河湾摆开阵势。布兴有带着那些如狼似虎的部属乘着潮水上涨靠近敌船，拔刀跳上了敌船的甲板。这下葡萄牙人的大炮再也发不出威力。葡萄牙人被赶到了河岸上的一个坟场，他们在那里负隅顽抗。他们在逃跑时不是被砍死，就是被子弹击中后背。有三四十人被俘虏，双手缚住后扔进了河里。还有一些人被驱赶回他们的三桅船——船被拖到沿江上游一些地方，前海盗们架起一把火，把这些俘虏烤成了人干。葡萄牙领事馆也遭到洗劫，前海盗们爬上屋顶降下了葡萄牙国旗。最后，幸亏一艘前来调查这一冲突的法国战舰“卡布里休斯”号驶来，才使葡萄牙人免遭没顶之灾。

“卡布里休斯”号离去后，葡萄牙双桅船“蒙德哥”号带着十二艘三桅船溯江上驶，向道台要求归还被俘的船只及解决其他事宜。得到的答复还是老一套，就是要求双方自行解决争端。于是广东人和葡萄牙人又摩拳擦掌，准备继续战斗。后来因为英国海军出面干涉（他们当然也是为了保护本国利益），葡萄牙人才不得不启锚前往上海。

如果追溯历史，这并非是葡萄牙人在宁波港遭到的第一次大屠杀。据记载，一次更为可怕的复仇行动曾于三个世纪前降临在位于甬江口的葡萄牙人居住地

上。那时候,葡萄牙人在一种虚假的幻觉中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海洋的主人,从马六甲海峡到远东,到处都是他们的三桅船。在宁波,葡萄牙人也从事着贸易和海盗的双重职业,巧取豪夺加上敲诈勒索,两者都生意兴隆,赚得钵满盆溢,直到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群有着绝顶武艺的蒙面人把他们统统消灭。

六　与福建水手争斗

有三个广东海盗,一个姓温,一个姓陈,一个姓郑,他们看到布氏兄弟吃上了军饷,也来投诚。道台很犯难,不收吧,正规水师无用,三个海盗头子都是广东人,布兴有碍于同乡情面也不一定肯去捉拿,收了吧,养不起。三个盗首一商量,把三艘大船缴上去,每艘留几十名水手,其他都遣返了,于是他们也入了朝廷水师。

道台养不起那么多人,禀告上司批准,让他们去金陵大营帮着打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可是金陵大营那边又以口粮太重,把他们打发了回来。前海盗们成了被踢来踢去的皮球,回宁波途中忍不住手痒又做了一票生意。这次他们打劫了一个福建商人,连船带人扣了起来,等拿到赎金才放他走。这个福建商人后来也到了宁波,冤家路窄,在一次宴会中,他认出了这三个水师头目就是打劫自己的海盗。这个精明的商人没有当场发作,回去后他告诉所有福建商人,要注意这些广东水师,那可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饿狼呐。

宁波东门一带福建水手最多,福建商船大多泊于桃花渡江中。这儿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和广东人结下了梁子,一看到广东人踏入他们的地盘,总是不放过凌辱的机会。有一次,布兴有的一个手下去东门办事,被福建水手一阵乱棒赶了出来。福建水手说,我们闽商八帮,再加家丁一帮,共有九帮,在宁波城里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广东人在城里的不过几百人,何不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去,烧了他们的船,这样我们的气出了,海上也太平了。于是他们各执器械蜂拥入城,驱逐广东人。

我们知道,广东水师可都是海盗出身,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些骄悍的前海盗操起兵器赶出城门,两相猛斗,一会儿就有几个福建水手砍翻在地。道台大人出衙弹压,但见广东人放炮,福建人放枪,烟火弥天,对面不能辨人。还有好多人在街上哄抢。道台命令抓人,总算止住了抢劫。

福建商人一纸诉状告到巡抚大人那里，新任的浙江巡抚是他们的同乡。他们说：我们说起来算是大人的同乡，却一点好处也没有沾到。现在的海盗大多都是布氏兄弟的党羽，除去了布氏党羽，那么海盗也就绝迹了。大人为什么厚于布氏兄弟，薄于同乡？巡抚把信交与道台看，让布氏兄弟停止与福建水手交火，着布兴有来省。道台担心布兴有不知官场礼仪，跟上级顶牛，让一个典史陪着去省城，也好有个提醒。新来的巡抚问了投诚经过，布兴有都一一直言相告。巡抚说，你是个实在人啊，这就回宁波吧，不要再与福建水手争斗了，日后我还要保举你。布兴有回到宁波，把手下招进了内河北斗河。

道台对客商们说：水师既不堪用，广东人你们又不信任，以后商船护航一事，你们就自己筹划吧。后来，走南线和北线的商号各出三万吊钱，雇佣洋人兵船护洋（走北线的商号还打算出钱买一艘洋船护航）。福建水手看占不到什么好外，也就回去了。行至石浦，他们的船遇上一艘护航的洋船，正一口鸟气没处出，就开足了马力进攻。福建人的船炮位很大，击中洋船，打断了一个外国水手的脚。洋人从最初的打击中反应过来，迅速校正炮位，对准福建人的座船开火，一下把它击沉了，其他船呼啦一下跑得干干净净。洋船到了宁波，道台上船检阅，一圈看下来，道台叹道：夷人船炮，其在水面，真无与为敌也。

七 捕杀九丁

广东海盗，随布兴有招降的称“旧帮”，后来的又叫“新帮”。新帮的人特别横，因为商号雇了洋船护航，他们在海上断了生路，就都来到宁波。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叫高成的惯盗，此人还有个绰号叫九丁。

开埠以后的宁波，五方杂处，商船辐凑，货船入港，九丁的海盗船也常常混入。把船泊在三江口后，九丁的人就上岸做案。开始的时候，他们把窝做在妓院里，控制了老鸨和妓女，然后讹诈嫖客。那些游春者不敢声张，只好吃暗亏。后来他们就胡天胡地起来，三五个人一小队，怀揣短刀，大白天公然在大街上掳掠人口，私刑勒赎，多者千金，少则数百贯。一时间搞得人们白天也不敢上街。原先担任捕盗任务的布氏兄弟，此时为了防堵太平军，被调到杭州驻防去了，九丁的人马更加胡作非为起来。

驻扎在宁波的浙江提督陈世章，也是广东人。九丁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打通关节，认陈做了义父，这样他就可以时常出入官衙了。人们奈何九丁不得，恨九丁，更恨提督。告状纸雪片一样飞到了总督和巡抚的案头，总督责问巡抚，巡抚责问道台。总督给巡抚的信里问：提督糊涂，难道做道台的也袖手旁观？此时的宁绍台道张景渠是现任巡抚王有龄从苏州带来的，故巡抚在信上的话也骂得凶：你快拿了我的信给提督看，让他赶紧把九丁办了，如再狐疑，我先参了你这个道台，再参他提督。

道台拿了信，像拿了块烧红的烙铁，给提督看吧，如果他真的是九丁的后台，那城中不就乱了套了？不给他看，又怎么捕获九丁？

此时正在宁波筹措军饷的浙江按察使段光清——杭州失陷，布氏兄弟拼死护着他杀出重围——参谋道：不把信给提督看，总督、巡抚那里交不了账，要他看了信就把九丁抓来，也不太现实，姑且不论提督是不是九丁的后台，就是他手下的兵丁，恐怕也早就被九丁收买了。还是先拿总督和巡抚的信去探探虚实，看看提督是什么态度，提督虽然是个武人，不太知道检点，但也是个在官场混久了的主儿，武官中他还算是个要脸的人，想来会有一个态度，然后，不让他手下的营官知道，以免通风报信，差布氏兄弟率领二三十个兄弟把九丁抓了来。

张道台不放心：布氏兄弟不也是广东人吗？会不会走漏了风声？段光清说：布氏兄弟与九丁面和而心不相洽也。

张道台虽是个理财好手，与武人打交道总有点怵，再说提督是省里的官，话说重了说轻了都不行，就请按察使大人走一趟。

按察使大人带着总督、巡抚的信去见提督，闲谈了很长时间，让提督挥退手下官兵，说有要事相商。按察使大人问：城中有个叫高成的，大人认识吗？提督答：都是广东人，怎么会不认识？按察使说，高成在外面做下的事，大人不可能都不知道吧，可是因为大人和高成有来往，外面说你什么的都有，现在总督和巡抚大人都有信写给道台，你不妨一看。提督看完信，汗流浃背，咬牙顿足骂道：高成就是我老子，我就是高成的儿子，我不杀高成，我不为人！按察使大人劝他尚要忍耐，不要走漏了风声，否则狗急了跳墙，就不好收拾了。他咬着提督的耳朵说，你只要依计如何如何，说得提督一个劲点头。

到了中秋，九丁来到提督署拜贺，提督不露声色，一边和他吃着茶果，一边赏

月，酒吃到半晌，布兴有带着手下兄弟来了，提督陡地变了脸色，指着九丁高声责骂：你在宁波的名声太坏了，搞得我也难以做人，你做下的丑事连总督和巡抚都惊动了，你自己去跟道台大人说清楚吧。

是夜一更时分，月亮在宁波城中撒下银子般的光泽，布氏兄弟押着九丁送入道台衙门，城中尚有赏月不归的，都不看月亮来看杀人，一边说，这个人老早就该杀了！九丁被杀后，他的手下都逃散了。

八　攻城

从1851年到1864年，在帝国南方的长江流域，打了十四年的内战。十四年的屠杀和饥馑，使这个国家减少了一千万到两千万人。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穿过昔日富庶的长江以南省份，看到的就只会是腐烂的庄稼、冒烟的村庄和让死尸喂得眼光发绿而四处游荡的野狗。1861年宁波被太平军占领期间，也成了一座死城，许多河道里充斥着污物和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经是一座拥有五十万居民的富庶的城市。

占领宁波的太平军是首王（范汝增）、戴王（黄呈忠）的数万部队，这些被称为长毛的反政府武装在东北门外沿江筑起了石头工事。与他们在三江口外对峙的，是清朝水师、英法联军的炮艇和一些忠于政府的书生带着的乌合之众。

同治元年（1862）四月，布兴有——此时已升为游击参将，手下是一支千余人规模的部队“广济军”——带着他的船队为前锋，从三江口直攻和义门，其余各部跟进。英法海军在舰艇上连放排子炮，城堞上碎石飞扬。首王和戴王带着部众打开西门和南门向余姚和慈溪方向逃窜。清理战场，缴获炮械无数，粮食数万斤，把俘虏和来不及逃走的伤兵都砍了头。

九　结局

太平军逃到了慈溪县，布兴有带着他的“广济军”继续进剿。久攻不下，新任道台史致谔给江苏巡抚李鸿章发去一封十万火急的信，请调华尔的常胜军协同作战。那个时代最大的冒险家之一、美国人华尔（Huaer, Frederick Townsend

Ward)自1851年以一艘三桅船上大副身份首航来到上海,因战功卓著,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水师炮船雇员升任副将,赏戴三品顶戴花翎。

1862年9月18日,华尔带着一千人的常胜军自上海抵达宁波,迅即在英国炮舰"哈代"号和法国武装船只"孔夫子"号的掩护下开往前线。先是在鹳浦和首王的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然后一路追击溃退的太平军,于9月20日直抵慈溪城下,被围在城里的是范汝增、黄呈忠、何文庆所率太平军一部。

当华尔带着随从登上一个土坡,用手中藤条对着城墙指指点点时,一发太平军打来的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脚下炸开,一块弹片正中华尔的前胸,炸开了一个大洞后又从后背穿出。救回到船上,华尔只来得及口述一个关于他死后财产分配的遗嘱,就昏迷不醒了。他最后带着再也不可能实现的无数野心死在了宁波府城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里。

当时,布兴有将军正站在离这个美国人不远处的一个土坎下,爆炸的气浪把他高高地掀了起来。他从空中落下时,看见城头升腾的黑烟,看见燃烧的云梯,看见满地黑压压的人群就像蚂蚁一样厮杀着、搂抱着滚作一处。他的手下兄弟挥舞着雪亮的马刀,一个个大张着嘴巴怒吼着向城墙发起攻击,但是他什么都听不见。

庸人列传

——上海往事里的道台们

无一例外，他们穿的朝服前襟上都绣着一只代表官阶的野鹅，脖子上挂着两串珊瑚或琥珀做成的朝珠。这不容小觑的装束表示他们在上海担任着要职：苏松太兵备道，或称上海道台。

他们抱拳作揖。他们颐指气使。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喜欢旁若无人地使用鼻烟壶和牙签。不管他们来自北京、广东或者内陆省份，到了上海，都学会了一口蹩脚的英语，学会了社交舞、使用银饰餐具、品尝葡萄酒和咖啡。他们的身上有着官场中人常有的傲慢、偏见与愚蠢，庸俗的面相流露着自以为是的精明。他们留着长指甲的手，常常无聊地捻动着脖子上珊瑚或琥珀珠子。以前，这些手要么是握着刀把的，要么是数鹰洋的。

一　小地方

许多当事人都能够证明，上海，这个到处都是柱子、圆屋顶和豪华建筑物弧形线的城市——马路上成天穿梭着汽车、马车和人力车，河面上也是一派活跃景象，满载货物的帆船、渡船、拖轮、小汽艇或者沙船上，到处窜动着黄皮肤的人群——在1848年之前还是毫不起眼的地方。“它那平庸的外貌有着一种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看不到几棵树。到处是坟堆。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污水沟和小河汊纵横交错。低矮肮脏的茅屋，全是用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在苏州河北边低洼泥泞的棚户区里，每年春夏之交的潮汛总是把河底的淤泥带上来。这个阴沉肮脏的街区是犯罪的高发地带。

只有在苏州河、洋泾浜、黄浦江围成的英租界内，出现了一些欧式建筑，意大利式的、希腊式的、或者中世纪式的，这些宫殿一般的房子出现在这个地方是如此突兀——就像是从荒漠中突然涌现出来似的。一位英国耶稣会神父在1847年夏天来到上海时这些新建筑曾让他目瞪口呆，他这样说："英国式的城市像通过魔术般地建立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奇迹。这里的建筑不是欧式房屋，而是各式各样的宫殿。"

二　被欺骗的林则徐

对于那些从水路来到东方的最初的冒险家们来说，中国是球形的。一个法国海军军官在写给他未来妻子的信中说，当他们的船从马赛港起航，穿越大洋，一路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来到吴淞口外，"环绕着球形的中国肥大的腹部缓缓地坚定地向前航行，仿佛温情脉脉地抚摸着一个美丽成熟的果实的表面"。

这一标准的殖民者心情——"我是多么贪婪地想榨出这个果子的汁啊"——在他未来妻子那里激起的回应，是她建议把他们不久将要举行的婚礼放在中国沿海的美丽城市，上海或者广州。"亲爱的，你不是在信中告诉过我吗？生活在中国是奇妙的，因为人们在那儿与逝去的几千年时光频频接触，我希望我们的新婚生活就从那个古老的国度开始。"三个月后抵达的邮轮，捎来了那个浪漫的法国女人的这番话。

此时的上海，自然不再是那个被人不屑地称为"沪渎"的小渔村了，甚至也不再是那个叫"华亭海"的港口小镇，自十六世纪晚叶伟大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这个城市的一些高级官员中传教，"SHANGHAI"这个词，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传教和贸易使团的正式文件及教士们的私人信札中。到了十九世纪前叶，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商人因为不满意于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试图打开在中国北部的贸易，当他们的船沿着海岸线上"球形的中国肥大的腹部缓缓地坚定地向前航行"时，贪婪的目光肯定一次次地抚摸着这个黄浦江边的城市。陆续有一些贸易使团的船只抵达这个城市的港口，但就像他们在中国沿海的其他城市厦门、福州、宁波等处遭受的经历一样，无一例外都是被拒绝登岸。这个肥美多汁的水果，就像外面套着一个金属的罩子一样，想咬一口都无从下嘴，这怎不让人急煞。

此时有个叫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的家伙,此人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代表,乘坐“阿美士德勋爵”号从澳门前往中国北方,到了上海这个商埠。他终于像一只远道而来的蚊子一样挤进了帝国没有闭合严实的大门,提着一份精美的礼物前去拜会了道台大人,一个叫吴其泰的河南人,1820年的老翰林。据他后来写下的报告《船行中国北部商埠的过程》称,在1832年7月他抵达这个商埠期间,每周平均有四百条载重在一百至四百吨的中国平底船入港。这个精明的英国商人推断说:“这里是长江的出海口,是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外国人从这里的自由贸易中将会取得极大的利润。”他在街上贴出了邀请中国商人前去“阿美士德勋爵”号购物的告示。

靠着贿赂,这个获准进入道台衙门的英国人终于得到了一杯茶水的礼节性款待,但也仅止于此。当他提出开展贸易的请求时,道台大人不置可否,只是端起杯子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随从们知道这是吴道台送客的暗示,于是催促胡夏米应该告辞了。他回到船上没多久,道台大人一手漂亮书法的批示就送达了,催促他遵照旧例继续回广州一带做生意,“令行驳饬,原呈掷还,即行开船”。

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后来报告说,胡夏米一行自闽浙至江南,始终未能登岸,再加沿途看到官兵严查商船,壁垒森严,害怕了。“伊等已经悔悟,不敢再求买卖”,已在水师统领关天培的严密监视下返回南方。但事实上,“阿美士德勋爵”号并没有向南航行,而是经由山东半岛后去了朝鲜。众所周知,林则徐是一个诚实的官员,他不可能杜撰这么一份欺骗性的报告上呈皇帝,那么只剩下一个解释,那就是他的属下上海道台吴其泰报告给了他错误的消息。吴没有把收受英国人的精美礼品一事向上级报告,更隐匿了与胡夏米的私下会面。

三　十年后

在胡夏米来访十年后,另一艘英国船“纳米西斯”号在一个黑暗而又狂风大作的夜晚来到了上海。这一天是1842年6月11日。“纳米西斯号”上乘载的不是商人和商品,而是能发射三十二磅重炮弹的崭新火炮,还有枪弹和刺刀,以及由蒙哥马利上校率领的第五十五团的英国军队。

几天内,第五十五团在海军副帅威廉·帕克所率船队支援下,迅速占领了吴

淞口要塞，击沉了大量中国战船。尽管遭到英勇的陈化成的拼死抵抗，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还是占领了上海，并在十日后撤离这个城市向江苏省的镇江和南京进发。

这场战争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两个月后在英国军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按照条约，从那以后，上海以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这五个城市的大门，要随时随地向英国人敞开了，他们可以随时居住于这五个城市的港口，并不受阻挠地进行通商贸易。

条约制度取代了延续数千年的朝贡制度，"天朝"的屋柱子开始晃荡。

四　宫慕久

一个叫宫慕久的人开始登场。关于此人的面貌和性格没有更多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州一个传统的文人学士家庭，经过无数次考试后成了一个精通经典的学者和西南边陲云南省的一名基层行政官员。宫慕久于1843年3月来到上海出任上海道台这一东南地区的重要职位，但这一职位的重要性，连宫道台本人甚至中央政府的要员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点从宫慕久的官阶就可以看出来，作为管辖二府一州——苏州府、松江府（上海只是本府下辖七县中的一个县）、一个直隶州（太仓州）——及下属二十个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穿的是前襟绣着一只野鹅的正四品朝服。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需要派一位更高级别的地方大员驻扎在上海城里，专事上述这五个开埠的南方口岸城市与"番鬼"的交道。

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官员，宫慕久此前从没有涉及过外交事务——官方文件中称之为"夷务"。但眼下已不是这个职位刚设立时的1645年，他只须像任何一个地方官员一样负责辖区里的民政与防务，甚至也不同于后来的1725年，又加进了一项管理江海关、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海盗的任务，作为进入条约体系后第一个到任的上海道，他还要学会与狐狸般狡猾的外国领事和形形色色的买办打交道，处理上海口岸的所有对外事务。

当宫慕久从他任职的云南省走陆路赴上海履新时，英国派驻上海的首任领事，马德拉斯炮兵部队的乔治·巴富尔（Balfour）上尉也正从水路昼夜兼程赶来。

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外夷”，这个由《论语》和《朱子》培养出来的道台认真地承担起了他的新职责，布置了沿海的防御工事（尽管如豆腐渣般不堪一击），并对底层官员的人事安排作出了调整。为了与巴富尔谈判贸易和居住问题，宫慕久在心理上和行政上都作了大量充分的准备。但是不久他发现，上海的商人们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与他有着严重的分歧，一部分商人，尤其是福建省和广东省的买办，他们连做梦都想着与外国人做生意。有一件小事很说明问题：巴富尔想在城内寻找一个居留地，遭到了宫道台强硬的拒绝，但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站了出来，他把自己一幢位于城市主要街道旁的住宅租给了巴富尔。值得附记一笔的是，这套住宅有五十二个彼此相通的房间，并配备有豪华的家具。

当然对外国人的猜疑和反对始终是存在的，特别是这年冬天发生了一桩美国水手在乡间打猎时误伤围篱后的两个男孩的“狩猎事件”后，民间的排外呼声尤为强烈。而且，英国式的傲慢再加从他们的印度殖民地那里继承来的粗暴与无理，更使领事与道台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紧张。另一起涉及外交的事件发生在1844年8月，它可以用来说明宫慕久作为一个管理条约口岸的道台所承受的压力。现代史学家费正清对这一冲突作过如下清晰的叙述：

>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同知和知县等下层官员给领事送去一封信，其中的文字是以不合礼仪的风格写的。同时，他们还抓了一个姓姚的中国教徒，此人在战争期间帮助麦都思做过翻译。下午八点，巴富尔送麦都思去衙门，宣称姚某必须在一个小时内释放，否则领事将登上一艘英国船离开上海。随即姚某被释放。第二天早晨六点，巴富尔拜访道台，留下一份要求同知和知县道歉的备忘录……下午三点，没有得到道歉，麦都思再一次造访道台，要求道歉。晚上九点，原信件经过修改后送到，但没有道歉。午夜，巴富尔为此写信给道台，说他打算关闭使馆。道台在凌晨一点回复，要求推迟作出决定。黎明时，领事通知道台，维克森号（Vixen）船于中午驶往舟山，将无需允准通过海关，该船在那里会得到英国军队的帮助。道台说，他将于下午一点前来拜访。巴富尔回答，维克森号船于中午启航。道台中午前来拜访，拿出了尚未写完的道歉信，巴富尔同意再次升起作为信任道台标记的旗帜。稍后，道歉信送到，事件结束。

为避免可能的冲突，更是因为担心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毒化固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信念，宫慕久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建立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租借地，把他们与中国人分隔居住。稍后由他和巴富尔共同签署的《上海土地章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也就是这个文件确定了英租界的界线（北起北京路，南至洋泾滨，东至黄浦江），并使这块被租借出去的土地成了一个完全豁免中国法律的自治区域，一个“国中之国”。这当然与宫慕久最初的设计愿望相左，事情发展到后来的情况，不是他小小一个道台所能控制的，他就像打开所罗王魔瓶的那个可怜的渔夫一样无能为力了。

事实证明还是巴富尔运气不错。在福州和广州，同样的政策就推行不下去，那里的地方官员拒绝这样做，连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

宫慕久为自己赢得了擅长外交的名声。一位同僚将他的成功归之于优秀的个人品德。巡抚、总督等上级也多次表扬他的成就。中国文化向来有一种盲目的自大症，总以为美德是一种力量，可以轻易影响、改变甚至同化所有的外国人。一位叫俞樾的学者甚至说，在宫慕久的影响下，“夷”都已经变得“恳切而柔顺”。

宫慕久在上海任上四年，1847 年去南京赴任江苏按察使一职，不久病死。

五　青浦事件

在经过三年多漫长而不安的等待之后，这一肥缺终于落到了咸龄的头上。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候补道台，他一直是宫慕久身边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副手。在政治上他更为人看重的不是才干，而是身份。一个人的身上要是罩着内务府成员、前皇宫四等侍卫等显赫的光环，再怎么平庸，他也可以当个不大不小的官吧。1842 年战争爆发时，他是作为前往广东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的私人助手涉足外交事务的。用那位特别欣赏他的钦差大臣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咸龄除了他显贵的出身，又多了一重特别的资格，那就是来自帝国最动荡的前线的“广东经历”。

“夷务需要特殊的人才去掌管，”钦差大臣在一封于 1843 年上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我们的初步任务，就是为这些条约口岸职务寻找合适的官员。”

在稍后一份推荐候选官员的名单里，钦差大臣把他欣赏的助手放在了其中，

他向皇帝推荐说："咸龄有经验，他参与了虎门条约的谈判，并多有贡献。"

但是，看来这个咸龄的运气不太好，他上任没多久，3 月份，就发生了爆炸性的青浦事件。三个传教士跑到上海西南一个叫青浦的城镇散发宗教传单和小册子。在那里，上帝的这三个忠实子民像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猴子一样遭到了当地人的围观，部分愤怒的运河船工还以狂舞的木棒和铁链回答了他们的布道。这不能怪上帝的福音的无力，不，上帝永远是万能的。这些船工愤怒的真正原因是不久前政府开始通过海路将大部分漕粮运往北方城市天津，这也就意味着在运河上吃了一辈子水饭的他们失业了。这三个传教士被闻讯赶来的衙门差役救出。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立即要求惩罚为首的肇事者，并赔偿传教士的损失。咸龄拒绝了。他认为这三个传教士大老远跑到内地城镇青浦去布道，本身就是不明智的，这一冒失的行为是否符合条约的规定也大可置疑，由此带来的后果只能由这三个倒霉鬼自己去承担。阿礼国争辩说，上海去青浦二十六英里，在一天的行程之内，不应该视作超越了条约的限制。

咸龄没有与之继续争辩。夷性犬羊，跟一只狗或一只羊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施展了在广东时从钦差大臣耆英那里学来的一招，找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有往来的商人，希望通过他们与领事馆的友谊来解决问题。这种个人外交的策略遭到了意料中的拒绝。阿礼国威胁说，在凶犯得到惩治之前，中国的漕运船只不得离开上海，所有的英国商船也将停止缴纳税款。

道台大人也有他的苦衷，他之所以迟迟不处置那些船工，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地下帮会的背景，搞得不好就会引发更大的骚乱，甚至哪一天早上醒来自己的首级被人摘去也不知道。但是，英国人对港口的封锁如果不解除，延误了漕粮运输，那也是要掉乌纱帽的事情。怎么办？情急之下，道台大人又想出一招，组织漕运船趁着夜色秘密行动，像鬼鬼祟祟的海盗船一样，越过英国人的封锁线。

年轻的领事闻讯哭笑不得，他觉得他的对手长的简直是一颗猪脑袋。他一边继续威吓，说要调来一支舰队进行一次北上京津的远征，一边派副领事去南京，向驻守在那里的两江总督李星沅递交信件，以促使他关注此事。总督大人派了省里的布政使、按察使及上海候补道台吴健彰调查此事，青浦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是：肇事的船工被惩办，传教士得到了精神和经济上的赔偿，英国人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咸龄免职。

六　一个游手好闲的野心家

从咸龄免职到新道台到任，大概有两个月时间的空档，由吴健彰暂时署理道台一职。这段时间足够精明强干的吴健彰在外国人面前露一把脸了。

吴健彰来自广东香山，是当地很有势力的买办家族的成员，人们也叫他吴爽官(Samqua)。这一家族在鸦片战争前是当地垄断对外贸易的几家大商行之一。这个有着巨大政治野心的买办商人通过捐纳进入官场，并于1842年初作为一名候补道台来到上海(他的兄弟作为资本雄厚的怡和洋行的买办同时到上海发展)。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个固执的观念，认为那些以精通外交自诩的"夷务专家"——包括历任上海道台，都是一群智力有缺陷的庸人，任何事情在他们手上总是越办越糟。他的政治野心很早就被英国人看了出来，商人罗伯逊在写给总领事阿礼国的《关于在中国受辱的通信》中说：爽官是广东前公行商人，拥有巨大的财产，来到上海后"闲荡"——一个多么精确的词！——了较长一段时间，很明显，此人盯上了未来道台的职位。

操着满口广东话的吴健彰在官场上并不走运，他的候补道台的官职是捐纳来的，走的不是科举正途，这在向来讲究出身的官场常常成为一个取笑的话柄。他们取笑他鸟语一般可笑的口音，取笑他大字都不识几箩筐，连官话都不会讲。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人英语讲得不错，比那种洋泾浜英语要好得多。"大概吴道台对外国人说英语要比对他的上司说官话要多得多。"明着听是夸奖，暗底下还是中伤。

俗话说迟到者只能啃骨头，看着英国人在租界里造起了各式各样宫殿般的房子，法国人急了。此时法国驻上海的领事(同时也兼任驻宁波领事)，是曾任"希腊独立运动支持者"第一军团上尉的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此人后来在法国成了一个骑士式的人物，但在1848年的上海，敏体尼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出了名难缠的牛皮糖精神。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此人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是掩盖不住的直率和粗鲁。

同时，他还是一个有决断杀伐之心的人，抵达上海第三天，他就在老县城和洋泾滨之间的中国地界上租了一处房屋作为领事馆，并在破败不堪的屋顶上升起了

三色旗。这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写信给公使说:“房屋很小,但住在里面就像在法国一样。”

敏体尼一上任就立刻按照自己的意愿展开了活动。此时一个叫雷米的法国商人给他提供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雷米在广州住过六年,是个经营酒类和钟表业的商人,一到上海他就向领事提出了购买土地的要求。此事正中敏体尼下怀,当即向道台提出,“按照别国同样待遇”,划定洋泾滨南岸,“从城关开始一直延伸至将来需要地点为止”为法国租界。敏体尼选中这个地块,一是因为靠近老县城商业中心,二是三面都沿着可航行的水路,运转货物极为方便,另外他还得知,别国领事已经在打同样的主意了,所以更需要迅速行动。

吴健彰对外国人很熟悉,却素无好感,这个精明而固执的前行商自然不愿意接受敏体尼的要求,但碍于条约又不便公开拒绝,于是就给他拖着。这是中国官员历来最为擅长的一招。吴道台说,嗯,这事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吴道台说,此事与上海县有关,领事先生请先禀报知县,由知县呈报本道,再由本道上呈抚台和总督大人,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敏体尼按照道台要求的程序走了一圈,七天后,道台大人通知说,呈文收到,业已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到了秋天,风传一个叫麟桂的宁绍台道台即将正式接任上海道台。敏体尼急了,这事在吴健彰的任上如果不解决真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了,他的态度陡然强硬了起来。但已经迟了,吴健彰本无诚意,对继任者更是没有好感,卸任前,吴健彰大大地耍了敏体尼一把,他通知敏体尼说,可以考虑让法国人在英租界拥有一块土地,但前提是,“贵领事应先征得英国领事的同意”。

可以想象领事先生接信时的忿恨,他发出一份照会,指责吴健彰根本没有诚意实行“天朝的条约明文规定给予法兰西国以神圣权利的条文”:“您这种做法未免太不顾礼仪了,您对我,大法国的代表,竟然提议给一块属于英租界的地皮。我大而强的法国是按条约规定向中国的天子租地,并非向大英国租地。如果我要向我这位高贵杰出的朋友英国领事租地,我又何必惊动您道台呢?”

七　又蛮横又优雅的麟桂

麟桂也是一个满人。这个满洲八旗兵的后代有着他的祖先遗传给他的魁梧

身材和壮健体魄，脸部表情有一种游牧民族的凶狠蛮横的气质。的确，尽管他是一个从一次次的考场中获得顶戴的文官，却喜欢射箭和骑马，右手拇指上还戴着作为有身份的满族军人标志的玉石戒指。看来，后天的教养总也抹不掉一个征服者额上的粗鲁的痕迹。

想想看，从这么一个粗鲁的人嘴里，居然时常会冒出“四书五经”中的珠玑妙语和古代圣贤的格言，那是多么让人吃惊的事。

这正好见出了麟桂道台性格中的双重性。是的，他依然是粗鲁的，但你也不能否认他正在努力变得优雅。那么快，他就学会了汉人的精致生活。

他时常穿着一件宽大的紫貂皮袍子，袍子的毛皮里子不消说是柔软暖和的。光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翻边毡帽（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步兵作战时戴的高顶头盔），两串朝珠（象征他的官阶）宽宽地垂挂在胸前。缎面厚底的皂靴，使他行走时不得不像一个台上的戏子一样踱着方步。当他转动点燃的玉石烟筒，或者轻轻拨弄着朝珠上的一粒粒珊瑚，我们会发现，那双手尽管还是青筋暴露的（这样的手一看就是适合握刀柄），却已蓄起了色泽发光而又半透明的长指甲。

八　雷米的地皮

如前所述，雷米申请购买的那块地位于洋泾浜南岸。这块地面积约有十二亩，分属十二家地主，上面还有一些坟地，盖着一些房子。在讨价还价时，土地的主人提出：每亩要价三百两，每间房屋折价一百两，一百个坟墩迁葬费合计五十两，一片小树林要价二百两，两个茅坑（在外国人眼中那只是堆烂木板架在粪坑上）要价四百两。

雷米觉得这漫天要价近乎敲诈，又去找领事。敏体尼给麟桂道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希望我的朋友趁早些结束这件事，它已经拖得太久而令人厌烦了，请在他这个礼拜去南京之前，给我一份关于租界问题的告示，并下令房地产主按我所定的公道价格把地卖给雷米。

“我满怀信心地等待大人对我再次作出高尚和友好情谊的表示。

“祝你快乐、幸福、健康。”

麟桂做出的“表示”，是以官方的命令压制了那些土地主人的抬价。于是，八个月的谈判之后，仅仅是“一个店主和几个传教士”组成的法国人的贸易团体打下了租界的第一根标桩。

英国人又提出，要把他们租界西面的那块地包进去，麟桂也同意了。美国人提出在虹口租一块地，麟桂道台也慷慨地答应了。于是历来动荡不宁的上海一下子变得和谐起来。麟桂道台的“以夷制夷”术为他博得了“夷务专家”的美名。

尽管在一些场合他称这个领事那个领事为朋友，但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这些外国佬“狡诈、野蛮、未开化”。在一封写给皇帝的秘密奏折中，这个“外交专家”不无幼稚地建议，所有条约口岸的行政事务都由广东人来担任，理由是，广东人“深悉夷情，素称勇敢，遇事齐心”，连外国人也怕。这一愚蠢的建议经过高层官员的审议之后遭到意料之中的拒绝，麟桂为他的愚蠢付出的代价是于 1851 年被革去了上海道台一职（但满人的出身又使他迅速回升，于次年出任内陆省份山西省的按察使一职）。

麟桂的建议尽管没有被朝廷采纳，但他的去职的确使一个广东人——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健彰——重新登上了上海舞台。

九　东山再起

如果一个有着权力欲望的人整整十年都蛰伏着，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庸人跑马灯一样轮流坐庄，他的内心肯定会生出无数愤怒、嫉恨的小虫子，吴健彰就是这样。从 1842 年初作为一名候补道台来到上海至 1851 年末接到正式任命，不多不少，吴健彰正好熬了十年。

短暂的署理道台的经历，曾经让外国人领教了这个文盲道台商人般的精明与固执，同时还有他一口不错的英语。现在，正式粉墨登场的吴道台成了在上海的广东利益集团名正言顺的领袖和政治上的代表。他通过洋行的关系，委托一些广东籍的商人朋友进行了几桩生意上的投资，很快，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他的口袋。他还把许多广东老乡安插在道台衙门的重要职位上。甚至他的数百名卫兵，据说也是直接从广东招募来的。在两年后的小刀会叛乱中，这些从广东来的雇佣军后来又成了他的敌人，差点要了他的命。

英国的贸易主管抱怨，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上海就快要变成广州了。

十　天敌

但是，上海注定不会变成广州，吴健彰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天敌。此人名叫刘丽川，是秘密帮会洪门下面的小刀会（又称“天地会”、“洪门”或“三合会”，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的一个首领。说起来，他和吴健彰还同是广东香山的老乡，曾经是同行。刘丽川在成为帮会首领之前，也有过做买办的经历，和外国人打过交道。

这两个天生的对手在上海相遇了。

1853年9月8日凌晨三时，上海老城的居民们被猛烈的枪炮声所惊醒。事后他们得知，当他们还沉浸于梦乡时，小刀会的乌合之众已经占领了各个城门。天亮前，叛军包围了衙门及官员私宅。上海知县和一个随从被杀，道台衙门也遭到了冲击，库存的银两被抢。关键时刻，吴健彰的广东人身份救了他，小刀会（他们大多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人把他关到了一个屋子里，没有杀他。

虽说是占领了上海城，但小刀会的势力最远仅仅到达城墙边和护城河。西南边是政府军，东边隔着一条河也是清朝的军队，北边则是租界。当炮声一响，租界地区的外国人就宣布“中立”了。各国领事还告知本国商人，因暴乱使“海关行政已陷于瘫痪”，商人们可暂时将其应缴关税交与领事馆。法国人是第一个对缴纳进口税说不的，美国紧随其后要求“利益均沾”，美驻上海副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专门为此发出一则公告云：

> 谨告在华美国商人：签名在此的金能亨副领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他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获得指令：鉴于目前的形势，只要清国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出入港口而无须交纳海关税，那么，美国船只也只需在出发港提交文件，而无需出具清国的海关结关证明。清国海关对于其他国家船只实施的规定，同时也适用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

吴健彰让一个亲信带信给金能亨——他们一起合伙做过生意，吃过花酒，吴

健彰把生还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美国佬的身上。金能亨派来两个人，这两个人给吴道台化了妆，又给他一把破伞用来遮脸，把他带到城墙下面。他们交给吴健彰一根绳子，要他绑在腰里，上面接应的人会把他拉上去。吴健彰开始拒绝这样做，认为这有损堂堂正四品级的道台的脸面，但最后他在面子和性命之间还是选择了后者。

天亮时，城里几处着火的房子已经扑灭了火，抢劫也已结束。这个城市短暂的无政府状态结束了，街上到处是头裹红巾、身披红绦的小刀会众，他们在几个重要的街衢贴出告示，宣布鞑子已被驱逐，上海县城已经光复，要城内外士民各安生业。

有一个叫罗孝全的美国传教士拜访了自称“太平天国特派招抚大元帅”的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他在事后的记述为我们呈现了吴健彰的这个对手的面貌：刘丽川三四十岁的样子，像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身材很小，经常抽鸦片烟，长着一副老枪面孔，说话时的态度很和蔼，不像叛军首领，倒像一个不得志的书生。据罗牧师观察，这个自称大元帅的家伙与南京的太平军是否真正有联系实在大可怀疑。

富得流油的苏松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吴健彰就这样成了租界里一位特殊的避难者。他在美国领事金能亨的家里住了几天。期间，他把家眷托英国邮船“玛丽伍特”号送回了广东香山老家。令人吃惊的是，做完这一切后，这个被赶跑的官员离开了美国人的保护，重新出现在他的下属面前，他要与刘丽川好好干上一场了。

消息传出，刘大帅气坏了，他通告英、法、葡、俄、普鲁士等各国驻沪领事：“入城之初，我的士兵要杀吴健彰，我命令不伤害他和他的家属。后来，金能亨领事向我求情，允许他返回老家，我就派兵护送他走，南京方面还为此责备我。为什么美国人要帮助满清匪盗呢？”他还愤怒谴责金能亨为吴健彰提供了一艘武装船，要求各国禁止出售军火给吴健彰。

从9月底起，从各路调集而来的政府军就来上海戡定小刀会叛乱了，许多装着大炮的大木船停泊在黄浦江上，县城的东面城墙和大小东门都在炮火的射程之内。河上的船一条接一条，长达一海里。沿着苏州河直到县城西面城墙，政府军扎下大营，挖了战壕。协助吴健彰指挥各路人马的是一个叫吉尔杭阿的满人，他

的职务是江苏省署理按察使。但在看热闹的外国人看来,政府军虽然"像蜜蜂一样多","但不如蜜蜂那样忙得有用"。

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几场较残酷的战斗。更多时候,双方互射大炮,火箭像流星一般嗤嗤地在天空中飞。这样也好,起码要比长矛刺进胸膛的卟卟声听着不那么惊心。但在县城和租界地面,还是有好多房屋被打烂了,流弹把城里好多树林的叶子都打光了。政府军的实力应该是强得多,但要拿下县城看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围城快一年后,双方都有些厌倦了,于是出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小刀会会众站在城墙上,把他们缴获的战利品绸缎、布匹和古玩等用绳子绑得紧紧地放下来,城下的政府军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观看了货物的成色后再与上面讨价还价。一个叫蒙太尔多的英国画家把这一场景速写记录了下来。"生意照常",他记述道。城里城外都一样,看来战争也不能阻止某些人从中捞到好处。

十一　黯然落幕

在离开道台衙门十七个月后,1855年2月,吴健彰终于在法国人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下夺回了这座城市,回到了他阔别许久的道署。他宣布继续就任苏松太道和江海关监督。但等到这个城市重新安静下来,吴健彰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已不是一年半前的那个城市,他这个道台管理的地盘缩小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城市一下子变成了三个城市:英国租界、法国租界和中国老城。

吴健彰重回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在租界区重建在战火中被劫掠并遭焚毁的海关。帝国军费来源中,江海关的关税占着很大比重,目下财政日益拮据,朝廷早就严谕恢复。但是,这时曾经支持他收复旧城的外国人又转变了立场。吴道台没有足够的武力作后盾在陆上重建海关,只得把目光投向水上。不久,他宣布在两艘停泊于黄浦江上的兵轮"羚羊"号和"羊神"号上开征关税。但不幸的是,这个水上流动海关总是被外国军舰当作危险的邻居赶得到处跑。事实上,在吴健彰时代,上海一直是一个自由港,一个外国走私船只的天堂。

这个城市很快就要不再属于他。这个广东人执政时树下的仇敌太多,他们控

告他犯有以下两项重罪：一是“养贼”，与叛军暗通款曲；二是“通夷”，侵吞海关税款，与外国人进行投机买卖。令人遗憾的是，这两项指控都有貌似确凿的证据。吴健彰被传唤到苏州，向驻守在那里的总督大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所有罪行。他尽力为自己洗刷罪名，但上海的陷落和避居于外国领事馆毕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经数位朝廷大员会审，他最终被判流放新疆。

《东华续录》就此案如是记载：

> 已革江苏苏松太道吴健彰被参各款经怡良、吉尔杭阿等遵旨严鞫，虽讯无通夷养贼、侵吞关税各实据，惟以现任职官与本管地方夷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至贼匪攻陷上海，该华员既不能堵御，复避居夷行，捏报公出，情节至重，吴健彰著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最后关头，他要感谢他那个家族积攒下的巨大财富。靠着贿赂高层官员，以及捐献大把的金钱和军需品给政府，他得以保留候补道台的官衔继续留在上海，没有把性命断送在荒凉的西部沙漠。

他后来相继成为两江总督怡良和何桂清的顾问，并协助继任上海道台的薛焕处理一些对外事务。迟至 1860 年，据说还有大员保举他去北京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吴健彰死于 1870 年。

附记：上海道台

上海道台是清代驻治上海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普通称谓，为正四品职衔。其主要职责是监督该区的风俗与法律，总办或兼管辖区内的民政、财政、防务、学校、路桥等事宜。1843 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他们的职能扩大到监管“夷务”（即外交事务）和一些近代化建设项目。

对这一官职，官方史著对其称呼不一，约有沪道、巡道、兵备道、苏松道、苏松常道、苏松太道、江海关道、关道、上海道等十来种。通称“上海道台”或“上海道”，是 1731 年道台衙门从江苏太仓移至上海后在人们的口头用语中开始使用的。有

关清朝时期地方政府的详细研究可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人物档案

宫慕久，山东东平人，字竹圃，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1843 年 5 月任上海道台，直接参与同英国方面关于上海开埠的谈判。1847 年迁江苏按察使。

咸龄，满洲人。1842 年曾以四等侍卫随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43 年 10 月任候补道，在江苏参与外交。1847 年 3 月后任上海道台。1848 年 4 月，两江总督李星沅以处理青浦教案"原欠紧速"为由，将其撤职。后又任浙江宁绍台道、江苏常镇道。

麟桂，满洲镶白旗人，字月舫。曾任浙江宁绍台道。1848 年任上海道台。同年 11 月 27 日，与英国领事阿礼国订立协议，将英租界西界扩展至泥城浜，北界至苏州河。又应允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请求，将虹口划给美侨作为居留地。次年 4 月 6 日，又告示辟设法租界供法国侨民居住。法人对此十分感激，在界内以其名字命名了一条马路，即现进贤路东段。

吴健彰，广东香山人，原名天恒，字道晋。原为广州十三行"同顺行"行商。先以纳捐得江南候补道，入股美商旗昌洋行，为该洋行七大股东之一。1848 年 4 月咸龄被撤后代理上海道台。1851 年 8 月再次署理上海道台(先署后任)，1853 年与外国领事签订《上海江海关组织协定》九条，由英、法、美三国领事各派一人充任海关税务司，是为外人管理中国海关之开始。1855 年被参贬戍新疆。后为两江总督怡良和何桂清所用，与薛焕一起办理对外交涉事宜。他是近代中国从官商转变为买办官僚的典型人物。

名士风流
——李慈铭在北京

一 入京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不尽人意，李慈铭在家乡刚中秀才的时候，他的同乡、绍兴世家子周星誉已在北京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那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事。几年后，翰林院周编修风风光光回籍省亲，绍兴城里有上进心的青年纷纷与之订交，屡试不中的李慈铭自然也不例外。周编修看李秀才文章做得不错，人也一副精明相，劝他不妨走捐输一途。周编修认为，随着帝国军费开支的加大，为了改变拮据的财政状况而推行的捐纳制度，使得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不走科举这条独木桥直接进入了官场，这虽然被正统人士目为异途，但对一个久困场屋的读书人来说，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

因太平军叛乱致使南北交通阻滞，周星誉回京赴任已是1858年秋天了。周动身前，李慈铭筹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托他在京中代捐"部郎"(即花钱买个挂名的小京官)。周星誉离开绍兴，把李慈铭的一颗心也带走了，一次次去信催问，最终得知，报捐京官一事已有大致眉目了。

于是"赀郎"李慈铭兴冲冲地打点行装，准备上北京做他的小京官去了。

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十八日，挑了个吉利的日子，李秀才偕同友人动身离乡。暖风如酒，饮之欲醉，煞风景的是这风里时时飘荡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当此时也，江南地方不靖，政府军与太平军呈胶着状态，作战正酣。仅浙江一省，也是民变不断，激得一大批江南绅富挟资纷纷迁往上海。由浙江省城至京，水路三千一百三十三里，寻常驿程为三十日，因咸丰元年(1851)黄河改道后，原来的

支河入山东境后阻滞不通，“湖路”已不能行，须绕道由“山站”北上，再加要避兵乱，李慈铭此行自是要比太平光景费一番周折，耗时约两月有余，于五月十七日抵京。

著名的《越缦堂日记》——在李慈铭死后二十五年出版（《越缦堂日记》，正编五十一册，补编十三册，共六十四册，这是一部按日记叙述的读书札记和友朋文字酬答、书函往来、政治议论等的笔记，其中保存有不少重要史料，尤以明季遗闻、江浙掌故为多。）——所记沿途旅程如下：

三月一日，抵杭州。三月二日，自杭州启程，十里至临平山，一百二十里至海宁长安镇。三月三日，过石门县城，经秀水、双桥，至嘉兴。三月四日，午过嘉兴城，晚抵枫泾入吴淞江，泊牛车滨。三月六日，泊上海对岸。三月七日，抵上海泊小东门外，游洋泾滨。在上海盘桓七日，三月十四日自上海启程，七十里至嘉定县黄渡。三月十五日，泊嘉定西门外，下午游嘉定城隍庙，隔日，游嘉定花神庙。三月二十日，开船复赴沪上，六十里泊油车头，于二十二日午后抵沪。三月二十五日开船，三十里至周太庙。二十六日，四十里至青浦县牌头滨。二十七日，过昆山，九十六里至华亭泊。二十八日，三十六里至苏州，泊阊门外中水弄，次日移泊胥门。

三十日，夜放舟至接官亭。四月一日一大早，李慈铭看到运河上到处是官船，“舟从之盛，拥蔽江岸”，看了邸报，才知是钦差大学士桂良带着吏部尚书花沙纳、刑部侍郎殷成宝及布、按两司自苏州赴上海“与夷酋会议和务”。四月八日，一早开船，一百里至无锡，泊锡山驿。四月十日，六十里至横林。四月十一日，午抵常州，泊昆陵驿。听行客说太平军正在围攻扬州，李慈铭一行只得在驿站住下。过了四五日，传来了太平军退归六合、道路已经通畅的消息，即行动身。四月十六日，午过丹阳，晚泊丹徒新丰镇，满目都是兵火洗劫后的凄凉，“荒城废舍，举目廖落”。四月十七日，辰刻至丹徒镇。四月十八日，渡江，晚抵扬州，泊二道桥。四月十九日，过邵伯埭，居人尽空，墟市间大半闭户，沿途看到从六合方向过来的难民拖儿带女纷纷南下，“民生之惨，可为蒿目”。暮抵露筋祠。四月二十日，晨过高邮城，夜泊界首驿。四月二十一日，午过宝应县，夜泊淮安。四月二十二日，晨过淮关，已到清江浦。水路至此已到尽头，李慈铭一行从这里舍舟登岸。一路上不时看到政府军收拾战场，把战死的士兵架在一起焚烧，然后收集烬骨带回去，他听说

那些战死的都是四川兵。

四月二十三日，坐露顶小车，过黄河。说是河，其实只是宽达数里的一片洼地。向来此处为南北之界，但自从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口，这段河道就废弃了，“亦古今一变局也”。十里至王家营，在汤吉升商行雇车准备北上，谈定了每辆银二十两，正待出发，闻得前方有战事，只得住下，趁着余暇命仆人做车帘布帏。五月一日一早出发，行三里，算是真正过黄河了，“极望黄沙土舍，回忆乡居，如在天上”。五月二日，五十里至桃源县仰花集，再六十里至顺河集。五月三日，六十里至红花埠，入山东界。李慈铭记述道，以前去北京，过了桃源县一般是经宿迁、邳州入山东，取道阴平、胜县、兖州、滋阴、汶上、东河、东平、茌平、高唐、平原至恩县，名曰湖路，较为平坦。黄河改道以后，再加兵荒马乱，“北行者遂取径山站”，“驿程崎仄，艰苦万状”。

一入山东境内，行程加快了，五月四日，五十里过郯城，十里过倾盖亭，六十里至兰山县李家店住宿。五月五日，渡沂河，四十五里过沂州府，又四十五里至半城，“渐入山径，山骨岔起”，接下去有三四日的山路要走。四十五里至蒙阴县青驼驿投宿。五月六日，百里至沂水县龚家城。五月七日，九十里至羊流店，又四十五里至泰安县崔家庄。五月八日，行五十里至泰安府，一百里至长清县章夏镇。五月九日，七十五里至齐河桥，渡河。过了齐安县，山路才算走完了，行二十五里至晏城。五月十日，至德州。五月十五日，抵京。

途中的颠簸似乎预示着李慈铭到京后的种种不顺。

让李慈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心急火燎往京中赶时，周星誉的弟弟周星诒竟然移用了自己的一部分钱，捐了个外官到福建赴任去了。而他请托的“报捐部郎”一事，只办一半就搁在那了。闻听消息，李慈铭就像挨了一闷棍，半边身子都木了。他周星诒好歹也算是个风雅好古的读书人，和自己“道义性命相交”多年，怎么可以做出这般损人利己的恶行来？

此时的北方与南方一样不太平，僧格林沁亲王的军队正在津沽一线同英法联军作战，烽火连天际，北京城里的物价有如脱缰之野马般飞涨。流寓在京的李慈铭举目无亲，欲留不可，欲归又不得，境况之狼狈，实非语言所能形容。

周星誉深觉内疚，李慈铭请托的事没办成，款项又为其弟截留作他用，自己面

子上也下不来。为弟补过计，他让李慈铭住到了自己家里，还向翁同龢、潘祖荫等同僚鼓吹李的文章，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又推荐他到大学士周祖培家做馆师。周星誉不知道，他再怎么着也挽不回李慈铭的信任与好感了。那颗被仇恨的墨汁浸透了的心，把施回于他的所有关怀与柔情都视作了虚情假意。这个人一边心安理得地吃着周家的酒菜，一边在夜深人静时拿着一管狼毫笔在日记中恶毒咒骂周氏兄弟。他骂周星誉为"周蜮"，周星诒为"周小蜮"。在他眼中，他们兄弟俩就是传说中这种害人的怪兽，总有一天，他会好好地报答他们——"以直报怨，岂无其时乎"？

到得后来，他翻开日记每看到有周星诒名字处，就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干脆用墨涂去了。每一涂抹，就好像趁人不备暗中砍了对方一刀，说不出的快意。（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上的一处眉批："此处涂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来为予挚友，常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射影，极力挤予，致予流离困苦，屡濒于死，又向老母绐寿田金三百以去。呜呼，古来交道之不终者有矣。或势力相轧，或意见相忤，若予于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听，而计陷之若是，真禽兽不食其肉者矣。予见其姓名，辄痛愤欲绝。而年来踪迹甚密，日记中无一二页不见其名者。不能尽去，随见随抹而已。呜呼，以予之深于友朋，惟恐伤交道者，而至于如此。天下后世，可以想见其人矣。李生而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其时乎。特识于此，时辛酉冬十一月初七日。"后面又有一段话："此人真口蜜腹剑、虺蜮不若者矣。姑尽涂去之。"）

周星诒跑到福建，得补汀州府同知，移用了别人的钱，毕竟心里有亏，托一个朋友进京之便，想把李慈铭的款子还给他。朋友说：他写了一首《行路难》的诗那么恶毒咒了你，这钱其实不还也可以了。周星诒笑笑，还是让他带钱走了。那朋友到北京见到李慈铭，说，如果周星诒把你的钱如数奉还，友谊还能保持下去吗？李慈铭说，就算是本金和利息加倍还我，也不与这样的人做朋友了。于是那位朋友就把这笔款子藏匿了下来，到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归还给了周星诒。

在一部叫《萝庵游赏小志》的小品文集里，李慈铭大骂二周联手设计了一个圈套让他钻。这情形让知悉内情的潘祖荫看不下去了，周星诒挪用李慈铭的钱，操守自有问题，周星誉为弟补过，纵不能邀得李的感激，至少不应挨骂吧。他写了一封信规劝李慈铭。李争辩说，自己当初被害得"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

处都非”，不骂怎出得那口鸟气。周星誉一直没有站出来为自己声辩。

同治九年(1870)，李慈铭四十二岁生日，在朋友为他作的一幅肖像画上写了这样一段题识：“群毁之，未毁我也，我不报也；或誉之，非誉我也，我不好也。不如画我者，能似我貌也。有疑我者，谓我侧耳听开口笑也。”听起来好像修炼得宠辱不惊了，一字一句细看去，心里还是有着极大的隐痛。光绪十年(1884)，周星誉在广东盐运使任上被外号“铁汉”的御史邓承修参劾落职，传闻是李慈铭写的疏稿，借邓御史的手射出了一枚冷箭。以李睚眦必报的本性，他极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此是后话。

前朝名士冒辟疆的后人冒鹤亭(*他是周星诒的外孙*)，在一本叫《孽海花闲话》的书中记录了这段凶终隙末的恩仇经过。他大概很看不惯李的行径，说他“李以贽郎，从田间来”，意思是别看他后来成什么大名士，不过一个乡下人罢了。他记录外祖父的话说：当年李慈铭骂我，应该，但骂我哥，实在是忘本，我哥可没有一丝一毫对不住他的地方。

二　做了京官

就在李慈铭搁浅京城之际，太平军的一支部队攻下了绍兴城，李慈铭老屋被焚，举家迁到了鉴湖南柯山之萝庵。老母得知儿子落魄京师，不得已将自己养老的几亩田地变卖，得了三百两银子速寄京中。添上这三百两银子，李慈铭终于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部郎，成了帝国庞大的文官阶层中最底部的一粒沙子，以捐班郎中签发户部学习行走。

这个人马上就要尝到做小京官的苦头了。起先，李慈铭被派往广西厅，后又兼属陕西厅，到部没几日，奉派稽核堂印的差遣。这是一桩繁冗的苦差，他想辞掉但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只好硬着头皮去应付。后来与延聘他为西席的大学士周祖培说起此事，周认为他大可不必如此，既入官场，就要有思想准备从最苦最累的活儿做起，笑他“多读书不能做官”。他把这句话郑重记入了是年六月初四日的日记，以为这话正好切中己病。

如果说每日一大清早就要乘着骡车赶到衙门是帝国底层文官的职责所在，那么，种种层出不穷的差遣更使李慈铭视上班为畏途了。更苦不堪言的差遣是陪祭，



清末北京官员上朝途中

天麻麻亮就要在天坛候着，膝头跪得生疼不说，还得自备典礼上穿的朝服、朝靴、朝珠，像他这样捐纳出身、分发各部院的小京官，在三年学习行走期内是一律不给官俸的（李分发户部，可以领取一份不固定的养廉银），没钱置办行头，就只得向同僚借。自己小小的一个挂名部郎，有必要搞得这样辛苦吗？这样一想，愈觉衙门工作机械乏味起来。常常是消失好长一段时间后，李慈铭的影子才会像鬼魅一样晃动着在户部再次出现。一有什么不顺心，就与人当场翻脸，几乎把司中同僚全开罪了。

事实上，过了六月他就不到署上班了。但他还是不舒心，做梦都担心着哪天落个什么苦差下来。这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里他这样记道："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此虽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羽吏送知会来。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处。""人生有几许寒暑，乃尽为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几许精神，乃禁得此细事胶扰？"

不过，既为京官，即便是最底层的小文官，私生活还是相当令人陶醉的。同光年间，一些翰林闲员时常举行诗文酒会，李慈铭已薄享文名，再加与潘祖荫、周祖培等交好，盛夏的消夏集、隆冬的消寒集，自然都少他不得，那些游逛郊外名刹、笺召歌郎行乐的人群中，也总有他的身影。

日事宴饮而无所事事，养廉银的收入又不固定，虽说可以在广事应酬中得到回京外官的馈赠，但李慈铭毕竟职位低微，想来也捞不到多少好处。于是经济上渐渐不支，或向人告贷，或预支束脩，或向钱庄借款，年终一结账，总是债台高筑，当然大部分的钱都是在酒食征逐、歌郎冶游中挥霍掉了。他哀叹，照这样子下去，"更三四年必饿死矣"。

有朋友劝他戒狎饮、节游，还有人好心劝他回乡。说实话，这些他都不是没想过，但那一场场奢华的宴饮，那酒边的倩笑与回眸，实在太迷人啦，哪里是说舍弃就能舍弃得了的？这一来李慈铭就有点两边为难了——继续声色勾连吧，旧债还未偿清，而就此还乡，却又苦于川资，再说心也不甘。最后一个同乡朋友看他实在过不下去了，出于同情心出了一笔钱，帮他还清了债务，又留足了回乡路费，他才得以于同治四年（1865）五月离京返浙。

北京的两年，已经把他惯坏了。他已不再是两年前那个蓦然闯入的异乡人，一种靡烂的文化培养出了他超发达的感官能力。尽管这个城市里穷奢极侈的生活时常使人穷困潦倒，但在精神上确实令他醺然欲醉。一出都门，与冰凉的现实

撞个满怀，他就下决心还是要回到京都来——“泥店灯昏，掩襟独坐。回忆都下酒边婉娈，倚肩曼声，顿有天上人间之感”。

三　到处都是敌人

战后的江南，就像一场台风过后般狼藉，用那一年带兵收复杭州城的左宗棠的话来说是“一片劫灰，伤心惨目”。兵乱之后又是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水，大水过后，又逢母丧，让李慈铭觉得这世上所有的倒霉事儿都压到了自己头上。

以李慈铭在籍部郎加闻名京师的文士的身份，地方上的官员对他还算是客气的。此时的绍兴知府高贡龄，是他户部时的同僚，水灾过后地方绅士筹资修理海塘河闸，因这层关系，李慈铭在河塘上为他的兄弟谋到了分修一段工程的差事，自己也受了一笔好处。又有浙江巡抚马新贻慕名聘李慈铭为浙江书局总校勘，月薪二十两，又请他主讲蕺山书院。但对在京城尝过了奢华生活滋味的李慈铭来说，这些收入再加上田产租息仍是不敷用度。尽管经济局促，又是母丧守制期间，他还是多方凑借，以“番金四百枚”买一歌娘为妾。

同治六年(1867)，北京结识的文友张之洞前来浙江任乡试副考官。秋天，张之洞赴湖北学政任时，邀请他前往襄助文墨。李慈铭看乡居无聊，也就兴冲冲地去了。在武昌张之洞的幕下他只呆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据知情者说是他和张的相处并不愉快，这一个月中他为张作应酬书信数十封，却没拿到多少酬金，惹得他老大不高兴，于是拂袖而去。

同治九年(1870)，李慈铭浙江乡试中式。虽然中了举人第后致送贽礼、缴付墨卷刻费、应酬饮宴等花去了约四百两银子，他还是一脸得色：“料检一月来账目，付内外所需几及四百金。寒士得乙科，耗费至是，宜世之以读书为戒。”身份的改变使他又起了燕游之心，于年底前抵京，入户部销了假，继续做他的部曹闲官，一面准备明年春天的会试。

几乎是在意料之中，同治十年春闱报罢。同治十三年会试，再落第。光绪三年，还是榜上无名。虽说三试不中，十年蹉跎，李莼客却也已熬成冠盖京华一名士。名士就该有名士的风流，名士就该有名士的作派，屡叩帝阍之门不应的他牢骚满腹，贴出“杜门七例”以示愤世嫉俗：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

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所谓“七杜”，就是不为这七事出门，当然凡有饭局之邀、或有相公可以白相，那是屡邀不拒的。

在二十世纪初叶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孽海花》里，李慈铭第一次出场，是穿着一件“半旧熟罗半截衫”、坐在旧竹榻上看书，看到有客来访，就装起了病。来访者观察到，枕边一幅长笺，满纸抬头写的都是“妄人”二字，也不知骂谁。虽是小说家言，却也可见此人气量狭小，好骂成性，虚荣心极重，一有积怨则耿耿于怀，每思报复。绍兴文人的刻薄悭吝好骂人，或许是天性使然，但在李慈铭身上，我们会更多地看到考试怪兽驱赶下的人格畸变。文廷式《闻尘偶记》说他“秉性狷狭”，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说他日记中“诋毁时人不胜录”，连抄都抄不过来，当非虚言。前面说到的与周星誉凶终隙末仅是一例，在李慈铭的一生中，这样形形色色的敌人可说是数不胜数。

李慈铭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来自浙江仁和的谭献（复堂）：“心粗气浮，不能研讨”，说谭“大言自欺欺人”，“累于杭人习气”。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士子一样，谭献的科考路也走得颇不顺当，屡试屡败。功名既不得意，寄情于访友看花、搜碑求帖，出入风月场时作群芳会，说到底也不过是不得志的文人意绪阑珊寄托牢骚，所谓“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依出城”，都是漂在北京的无根转蓬，总要离开，逢场作戏正好补充情感和身体的空档，一时风气如此，谭献也不例外，可这又不知触动了李慈铭哪根神经，斥为“不自爱”。实际上，李慈铭自己时时出入欢场的行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篇《越缦堂菊话》，将男作女，浪掷笔墨，全是选歌征色咏赞伶官的肉麻文字：记钱秀菱“色秀可餐，清神善照，目虚鲜秋水，颊艳晨葩”，记朱霞芬“琼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肤清内朗”。更有“倩颜上酒春红重，纤手藏钩软玉交”、“明灯婉娈，似偏照深红羞晕”、“看素手暗启风帘，正眉翠含颦，脸红低晕，万种温存旖旎”之类的香艳文字，任谁看了都要心惊肉跳。

张之洞算是他贯穿一生的文字之交了，也是气味不投。光绪三年（1877）四月初八日日记中有一段话通论小人之尤，似是为张之洞而发，说他“议论少激，意见少偏”，“广结纳，争声誉，逞浮辩，恃客气，索隐行怪，厚自标异，外骄内谄，敢为诡诞”。观张之性情与为人，也是褊狭一路，且往往口是心非，湖南人王闿运就曾有“口舌为官，平日好爱文章，而不重气节”之评。张、李二人，文字结交一生，也明明

暗暗相互攻击了一生。

张之洞曾把王闿运的诗文与李慈铭相提并论，在张之洞看来，王闿运非六朝以上诗文不读，走的是“幽奥”一路，李走的则是“明秀”一路。李听了这话很不服气：“明秀”两字怎么可以说尽我的风格呢？最近我和朋友们写一些唱和之作，只求达意，不求高深，张之洞没有看到我全部的作品，难怪他说出这样不知深浅的话来呢。同治十年(1871)春天，张之洞安排了一个饭局，请李慈铭和王闿运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李慈铭借口生病拒绝了。私底下他评价王闿运的诗“粗有腔拍”，但“古人糟粕，尚未尽得”，其病在“肤浮填砌而诗益坏”，“读杂书而喜妄言”，继而实施人身攻击，“其人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并把王闿运与另一终生仇家赵之谦作比：“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挂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伧客一辈中人也。”他甚至断言，王闿运其人其作，很快就会腐朽，“日出久消，终归朽腐，姑记吾言，以验后来而已”，这已几近诅咒了。

他还把怒火烧向了同光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郭嵩焘。因马嘉理(A. R. Margary)案引起的外交纠纷，1876年，郭嵩焘受命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谢罪，把从上海到伦敦五十天的日记整理了两万余字抄寄总理衙门，总署以《使西纪程》书名刻板印行，一时满朝士大夫群议汹汹，李慈铭也插上一脚，在《越缦堂日记》如是开骂：

>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环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在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如此禀性，据他自己一种颇为自恋的说法是与出生在冬季有关：“秉生于冬，冬气寒，故性冷；得气于秋，秋性肃，故性傲”，但冬末又是春天的开始，“春气融，结胎于灵根”，他自负地以为这也是自己写得一手文章的原因。想来李慈铭在世时就把这日记给好多人看过，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难免造假，难免言过其实，所以后来有个叫周树人(鲁迅)的绍兴人说，读了李慈铭的日记，“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

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四　青年艺术家赵之谦

同治二年(1863)春天，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的赵之谦(1829—1884年，字扬叔、益甫，号悲庵、憨寮等，浙江会稽人，咸丰年间举人，晚清杰出艺术家，在书法与绘画方面均有较高造诣)，还只是个以卖字刻印为生的籍籍无名之辈。那时候，自号“悲庵”的这个年轻人刚从温州(太平军攻占浙江时他从绍兴老家跑到了温州)航海至京师，住在山阴会馆，会试不中，逆旅栖迟，南归既无盘缠，又无必要——他的妻儿已在战乱中离世——只得煮字为粮，靠着一手好字一笔好画谋生。此人身材魁梧，食量惊人，据说冬天也不戴帽子，头上汗汽如蒸，兴致上来了，就赤裸着身子在海王村的画肆里挥毫泼墨执扇纵谈，狂士作派竟与后来的行为艺术家有些相似。

在赵的周围，很快聚集起了一批艺术青年，那都是些和他一样充满任侠之气、又怀着各种各样梦想的年轻人。一些籍贯南方的官员也乐于与他交结，因为此人是金石字画的鉴赏行家，又有着渊博的版本目录学知识。颇具传奇性的一种说法是，赵曾短暂地加入淮军，正是在军中，他结识了皖派印人绩溪胡澍，遂成为皖派印艺的嫡系传人。在周星誉的推荐下，赵成了潘祖荫门下的一个清客，与主人谈文论艺、访碑刻印，一时颇受器重。

潘祖荫常这样说：他门下有两个能人，就像他的左右手，一个是李慈铭，诗文一时无两，一个是赵之谦，金石考证方面无人能及。有一段时间，潘祖荫迷上了金石，对诗文不像以前那么感兴趣了，对李慈铭也有所疏远，一向视作禁地的书房，倒是赵之谦能随时出入。赵之谦也是周星誉推荐过来的，李慈铭由嫉生怒，再加恨周及赵，在日记里一次次对赵破口大骂，斥之为“天水妄人”。绍兴名士好骂人，李骂赵，赵亦骂李，只不过赵骂过就算了，不像李骂了还要形诸笔墨。两人关系渐同水火。

潘祖荫是个酷好风雅的官员，一到春秋佳日，往往招集名流，觞咏为乐。赵之谦事先知道李慈铭在，肯定避而不来，李如果知道赵要到席，也肯定不来。这样他

们虽同在潘祖荫门下，好几年没有碰面，倒也相安无事。有一年春天，潘宅的海棠花开了，潘祖荫忽然心血来潮，想借此机会于杯酒之间尽释两人嫌隙，他约了两人，对他们都说对方不会到场。到了那天，李慈铭先来，赵之谦一见，转身就要走，被潘祖荫一把拉住，说既来之则安之吧，怎么可以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呢。赵之谦只好留下了，却半天不发一语。李慈铭的脸也是黑的。那一顿沉闷的酒宴也不知是怎么结束的，酒席刚散，走到堂前，两人就扯下脸皮破口大骂，就差演一出全武行了，潘祖荫花了好大劲才把他们劝解开。

同治十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见李、赵二人互相诋毁，成见极深，各种传说又沸沸扬扬莫衷一是，约潘祖荫遍请京都文士，于京郊龙树寺摆一饭局，调停李、赵矛盾。事先，张之洞给潘祖荫写了一封信："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不可无一绝大雅集，晚本有此意。陶然亭背窗而置坐，谢公祠不能自携行厨，天宁寺稍远，以龙树寺为佳。"还特意告知李，买一个面子，不要意气用事。李口头答应了。远在湘潭的王闿运正好偶有京辇之游，也赶上了这场热闹，与会的还有王懿荣、孙诒让等二十多人，端的是兴会无前。这次宴集由王闿运作诗，无锡秦炳文绘图，南海桂文灿作记留念，从叙述文字来看，李、赵没有当场发难，也没有留下什么笔墨。

从王闿运事后的诗来看，他的道义天平是倾向于赵之谦的，这或许也是他对李称他"江湖唇吻之士"的一个回应吧：

昔我京辇游，龙树会群英。

黄岩应公车，赵李正相倾。

潘徐并兼爱，张李谬铨衡。（王注：浙人赵扮叔、李莼客内外兄弟也，游京互相诋。宾客能往来两人间者惟潘伯寅、徐寿衡及余，而张孝达[指张之洞]独善李。）

余无门户畦，唇舌慕君卿。

以此骖靳间，欢然无妒争。（王注：李日记[指《越缦堂日记》]四十本。其中雌黄万端，于同人并有词例：上等称字，次等名，下者某，所不喜者加以绰号。目赵曰天水狂兽，潘、徐与伶人朱均称字，余与孝达名，子裳盖谁某例也。）

赵、李之间，真的是自此"欢然无妒争"了吗？我们只知道，直到光绪五年，李慈铭还在继续攻击赵之谦，《越缦堂日记》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载："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长于金石考据、在书法上开宗立派进而影响到近世吴昌硕、齐白石的赵之谦，真的像李慈铭说的这么不堪吗？还是高阳说得好：李慈铭与赵之谦都深受龚自珍的影响，不过李得的是龚之狂，如轻视前辈，及于师门；赵得的是龚之奇，而稍嫌浅露。而李慈铭平生短处，在蹈文人相轻的陋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五　进士李慈铭的经济生活

一边做着都下名士，一边他也没有放弃过通过科考出人头地的想法，愈是老，望名之心愈切。到光绪六年，此人终于会试及第。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二岁。从秀才到进士，他走了三十年，如果从童子时开蒙算起，考试的长鞭驱赶了他整整四十年。徐一士《庚辰谈往》里说李考中后让人刻了一个闲章自娱："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指这一年以廪生捐贡），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所谓四朝逢庚，不无自得自夸。五月初七日，引见养心殿，他特意穿了一件三十年前中秀才时制的纱袍。这一天下雨，淋个透湿，回来作了一首诗，中有"五十孤儿今释褐，官袍欲换倍潸然"句，悲欣交集，情见乎词。中进士之后向师座致贽礼，花去五十余两，却收得二百六十五两的赠仪，看来中与不中，就是不一样。

以他这样的资历，中进士后例应入翰林院，但他提出"请归本班"，仍回户部就原职，这是因为点了庶吉士，三年后才可散馆，他已一大把年纪了，等不起。更重要的一点是，翰林院中好些编修是他的学生辈，用他刻薄的话说是"乳臭翰林"，要他与少年为伍，认后生为前辈，实觉难堪。所以还是"以户部郎中原资叙用"，做这个挂名差使，月有俸米俸银，比在翰林院做文字工作，还须经常坐班，实在是舒服得多。既已两榜及第，作为朝廷命官，待遇自不是以前的小办事员可比了，他的主要收入，除了前面说到了户部特例的"养廉银"，开始有了俸米俸银，分到的"印结银"也日渐看涨。

养廉银的收入并不固定，最多的一年，光绪二年，他拿过四十三两七钱，最少

时，同治二年、三年，只有八两八钱。光绪六年中进士后，奉旨以五品即用，虽然仍是候补，但可支正俸的一半了。政府财政困难，按咸丰以来旧例，八折发放，每年得三十二两。到光绪十三年开始领五品全俸，为一百六十两。俸银之外，尚有俸米，以他一个五品京官为例，每年有十五石六斗的俸米可得，以每石一百二十斤计，折银每石可三两，每年可四十六两余。

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日记云："户部送来秋季俸银十六两。五品半俸四十两，秋季应得二十两，而书吏侵扣其四。行年五十余，今日始得此两流之秩耳。"

十一月初二日云："巡仓李御史送来俸米七石八斗，每石约一百二十余斤，尚洁白可食。行年六十，得此升斗，而举家色喜，可叹也。"

这里就印结银略作说明。晚清官场，举凡捐途出身的人，都要有一份同乡在职官员的保结，这种保结要缴纳一笔银子，才算完成手续。这笔钱按月结算，分发于本省在京官员，这每月分配的印结银便成了一般京官的主要收入。从理论上说。捐纳的人越多，现有官员补选的机会就越少，所以这笔钱养活了大批像李慈铭这样的下层京官，也阻挠了他们的升擢之途，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拿这钱岂止心安理得，简直是一边骂娘一边拿钱。这笔银子数量不少，据张德昌先生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统计，李慈铭最多时拿过三百八十六两余，最少时一百八十两。另外，张德昌先生还统计了李慈铭行走、候补、实授二十多年的京城生涯中，官职收入最少的一年，为同治四年，一百一十九两，最高的一年，为光绪五年三百八十六两余，按平均计算，行走期间每年官职收入一百七十五两，候补期间每年二百一十五两，实授期间每年三百九十七两。

张德昌先生在他的研究中锱铢必较地列出了李慈铭居官以来的官职收入、日常开支、宴饮应酬费用、犒赏费用、借贷情况等，且抽取同治二年和光绪六年为例（考虑到这两个年份在李慈铭为官生涯中的标志性意义），李慈铭的官职收入分别一百五十一点八两和三百五十点零九两，实际支出则为五百九十八点四两和七百五十六点零六两，收支差额分别为四百四十六点五两和四百零五点一六两。事实上李慈铭居官二十余年，并不只此两年出现赤字，而是年年是个倒挂户，那岂不是年年都要喝西北风去了？在李慈铭的经济生活中，另外两笔额外收入不可忽略，那就是润笔和馈赠。他有一则自订的墓志铭润格标准："墓志铭、墓表、散文百廿金，知好减四十金，骈文百六十金，知好减六十金。"朋友王懿荣请他为元配夫人写

墓志铭，应送八十两银子，大概一时不下葬，墓志铭的事也就搁了下来，一搁五六年，李一直惦记着这还没到手的八十两银子。

经常馈赠者，首推潘祖荫。潘久在南书房当差，凡有应酬文字常请李代作，当然会付以优厚的润笔。前后十余年，李在潘这里的收入当不下万金，还不包括他在穷困时向潘的借贷，一般而言，只要李开了口，潘从不会驳他的面子。自从李中了进士后，北京官场中人对他的前程有种种估计，或者是外放学政，或者是御史，看起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于是争相拉拢，馈赠日多，当时京城的韩家潭朱霞精舍即为他们经常饮宴之处。

这些人中除了都察院的御史们、浙籍翰林院学士，更多的是外放官员。清代财政混乱，与京官外官互相勾结牢不可分。外官可浮征勒索，但也担风险，有被弹劾的可能，同时有了赀金之后都想转任谋肥缺，所以在京官中必须有知己，广结交游以通声气。因此京官外放、外官回京，一般都要对京官有所表示。京官方面为了多沾余惠，也多方打探，借年谊乡谊之便，一有外官到京，即奔走相告。京官仰赖外官给予之馈赠，外官乞援于京官之通声气。京外官应酬娱乐，酒食征逐，在相互交结中谋得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如李慈铭光绪五年六月九日日记："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收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李慈铭中进士后，外官馈赠日益看多，最大的款项，是光绪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通过乡友赵泉、许景澄邀他主讲北海学堂，每年给他一千二百余两的束脩收入。李的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京官经济生活方面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数字。从记载来看，他好像从没有拒绝过一笔银子，所以近人高阳说，他最看不起李慈铭的是，有人送钱给他用，明知钱不清白，亦谓之"廉俸"，要是不送钱给他，凡致富者都被他视作非法所得。

历史学家杨奎松在详细考察了1949年后中共党政干部的收入分配制度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经过后，得出一个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造成的（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以李慈铭为个案看晚清官员的经济生活，举凡养廉银、印结银、外官赠仪等等，不一而足，亦可称之为"制度性腐败"。

李慈铭有个远房亲戚，是刑部的一个小官，李以他惯有的刻薄口气说他“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李沉沦下僚时的一幅自画像。曾朴在《孽海花》里写到庄伦樵做了翰林院侍讲学士，有客来贺连一餐饭也请不起，还被米店的一个伙计三番两次赶上门来催讨欠账，这种困窘想来李慈铭也同样经历过。根据李本人及同时代人的记述，李时常穷得“几不得举火”，把衣服典当了也好久赎不回来。向钱铺借，有时也不能按时归还。北京商家习惯，一年之中按五月、八月、十二月三次结账，餐费、酒资、冶游娱乐费，都可挂账，即便到了结账期也可以拖欠。李慈铭们都视这种拖欠为常事了，虽然衣服送进了当铺，有时不能“举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打扮得光光鲜鲜出去应酬，何况广事应酬也是生财之一道呢！

光绪六年(1880)前，李慈铭没有一年不去典质借贷。以前述李慈铭的年收入和购买力，远在一般水平之上，为何闹得如此之拮据呢？一种通行的解释是，做官要有排场，浮华的世风使他的钱囊怎么也鼓不起来。

比方说，北京的冬天到来了，李老爷一方面穷得把自己的皮袄送进了当铺，但又必须给衙门的仆役赏以皮袄。京官要保持京官的身份，犒赏即是一种方式。据张德昌先生统计，李慈铭经常性雇佣的仆人有三四人，其中女佣二人，厨师或车夫各一，这些人他不但要发工资，一年三节也要犒赏。

早在同治五年(1866)，李慈铭在绍兴老家，经济拮据的他不知怎的看上了一个歌女，竟然各方凑借，不管母丧刚过，“以四百元番金购置”来作了小妾。光绪四年(1878)北方大旱，京城到处有灾民出售子女，他又纳一个姓席的小妾。钱不够怎么办？还是老办法，借。向张之洞借五十两，张只给十两，李为之怅怅不已。这个女人的肚子不争气，十年了还没动静，于是李于光绪十三年(1887)毫不犹豫地把她遣去，一边还假惺惺地说“事我十年矣，伤哉”。不久，他又买了一个王姓姑娘作妾，名之以兰娘，字以襄男。这个女人还是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起，李慈铭从骡马市大街西的铁门移寓到有名的丞相胡同的保安寺街，这条胡同在宣南算是高档住宅区，王渔洋、翁方纲等都在这里住过，与米市胡同潘祖荫的住所也近。新居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广植花木。李慈铭颇以藏书自矜，住所大门贴有一联：户部郎中，补缺五千年；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里写庄小燕去城南保安寺街造访李宅：“进门一个

影壁，绕影壁而东，朝北三间倒厅，沿倒厅廊下一直进去，一个秋叶式的洞门。洞门里面方方正正一个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绿叶森森。满园种着木芙蓉，红艳娇酣，正是开花的时候。三间静室垂着湘帘，悄无人声。”这一年他的官职收入为一百二十三两，每年房租却要四十八两，修筑布置花木添置尚不包括在内。到了光绪六年后，月租增为六两，每年要交七十二两房租方能维持这样的排场。

他在终生爱好的戏曲冶游上的一掷千金更不必说了。以光绪三年为例，这一年他的一个弟弟在乡饥饿而死，而他却花了一百多两银子用于酒食声色之征逐。“余虽穷，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他这样说时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情。

六 “御前仗马”

如果你是十九世纪一个对现实有着诸多不满的小京官，那么就请你加入“清流党”。就像《孽海花》中的那个穷翰林庄伦樵，本来穷得连商家都要上门追讨米债，一入“清流”，以直邀名，顿时气焰熏天，看哪个不顺眼就上奏弹劾，管你督抚还是九卿，几年下来，“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

“清流”按人际和地理等因素分成派别，派别之间互相倾轧，比如同光年间的南派和北派清流。南派推尊潘祖荫，北派推尊李鸿藻。李慈铭与潘、翁来往较勤，自然倾向南派。李慈铭中进士两年后想放个学政，该跑的路子都跑到了，还是没有当成，眼看着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保举的都一个个放了好差，自然牢骚满腹，光绪八年(1882)五月八日日记里破口大骂：“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自重，李则饵张以为用，庭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丧心病狂”，他说“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最后还是让他做上了言官。光绪十六年(1890)，有乡友聚资经营，李慈铭捐五百八十两免试俸，得补山西道监察御史。比之学政，这是一个利益与风险极不对等的一个职位，很少有人愿意去，在北京官场就有“冷署”的说法。李慈铭以前经常嘲笑御史们尸位素餐，是“被锦勒、系黄缰”的“御前仗马”，意思是圈养在紫禁城里的马，纯粹是个摆设，以不鸣为贵，一鸣就要逐出宫门。现在他自己也入了这一行，不知会有什么感慨。以他平时喜欢雌黄人物、刻薄狷狭的个性，想来也会搞

出庄伦樵那样的大动静来吧，即便不让公卿倒屣，起码也要闹得个鸡犬不宁，可是让所有人奇怪的是，到任后的李慈铭变得格外的谨慎，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时人以为他锐气全消，实在是世故已深。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海军溃败，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时成众矢之的，翰林院一帮清流联名劾他“丧权误国”。惟独身为监察官员的李慈铭，不发一言。是他的思想超越了那些以清流自许的迂腐书生吗？这也未免高看了他。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十几年前，李鸿章请他到北海学堂讲学，并以这一名义赠送了他很大一笔钱。

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个重要年头，李慈铭死了。据说他是死于咯血。他在这个年纪（六十五岁）这样死法我情愿相信是早年靡烂的生活所致，而不是出于对国事日危的忧虑。从李慈铭一生的行迹来看，他好像一直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书，有酒，有名士风流所必需的银子和女人，惟独没有散发出新气息的事物。

回头来看1894年的战败，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场心灵的地震（甲午战败对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震撼，以梁启超的这番话最具代表性：“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他们正是由此在忧患中开始了现代性的追寻。但是，在本文主人公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表现；由于他最后几年的日记失踪，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到底在想什么。

人物档案

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候，后更名慈铭，字暨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朝同治九年（1870）中举，光绪六年（1880）成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年（1894）去世。博学能文，兼擅诗、骈文、词曲、考据。其学源于浙东（指黄宗羲一派），长于史学，而文辞典则，则又瓣香秀水（浙西秀水，指朱彝尊一派）所谓“浙西之士秀而文，浙东之士醇而朴”，兼而得之。

著有《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集》、《霞川花隐词》、杂剧《舟觏》、《秋梦》两种（合称《桃花圣解庵乐府》）等。其作品最著者为《越缦堂日记》和《日记补》。

缀网劳蛛
——西学东渐中的容闳

一　新知识与新人生

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乘坐"欧里加"号帆船从纽约启程，经一百五十四天航行一万三千里后，于1855年3月抵达香港，旋赴广东香山靠近澳门的南屏镇省视母亲。父亲去世得早，是母亲辛勤鞠育他兄妹四个成人，八年前他去美国时，母亲恐终生不能再相见，不忍爱子远涉重洋，只是他坚请之下才得成行。去国怀乡，常念母亲倚闾挂念望眼欲穿，重逢在即，容闳怎不喜极欲泣？他本来打算换一套中式服装，再把蓄了多日的胡子剃去，也好让母亲高兴。归家情切，结果这两件事都来不及办成，见母亲时穿的还是西服。

果然，母亲一见面就说他不应该蓄须，少年未娶，留这一大把胡子做什么？再说你上面还有个哥哥，不也没蓄须吗？容闳诺诺，答应马上就剃去。别说身体发肤，这时母亲让他做什么他都乐意的。母亲半生鞠育之劳，海天睽隔，他胸中爱母之忱，实在是"恨未能剖心相示"。（出身寒微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自述其幼年贫苦情形云："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每日清晨三时即起，至晚上六时始归。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仍不得已而改业，随老农后，芸草阡陌间……稻田中之泥水，深且没胫。"《西学东渐记》是容闳1902年定居美国后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原名为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在美国纽约由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出版。此书最早的中译本是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恽铁樵、徐凤石合译本，译名为《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恽铁樵先生长于清末民初流行一时的"新民体"文字，

曾主编《小说月报》，颇有影响，《西学东渐记》译文也用文言，但文笔典雅洗练，信而且达，尤其是书名译得独具匠心，很好地传达出了容闳以“西学东渐”之志，寻“维新中国”之路，却又屡遭曲折磨难的生命历程。）

当下依膝而坐，一一告知慈母这八年里旅美详情。他告诉母亲，他毕业的耶鲁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美国人向来视毕业于该校为荣誉。他获得的文学士学位，说起来与中国的秀才差不多。母亲把他那张羊皮纸封面的毕业文凭看了又看，问他，所持文凭和学位，价值几何，可以得到多少奖金？容闳说：有了这个文凭，找起工作来就方便多啦。对于我来说，大学校所授的教育，可比金钱值钱多了。人受过教育才有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重于财富：

> 知识即势力，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

他还以一种不无夸饰的语气对母亲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我可是第一个，今后，母亲您就是数万万人中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这是何等的荣耀呵。

在美国八年，容闳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半工半读，两年后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考入耶鲁大学。在耶鲁的四年，尤其是最后一年，他渐渐明白了他的一生应该做什么。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到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心中之理想既高，道德之范围亦广，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在一个毫无知识的时代，一个身受痛苦与压制的人是绝不会体会他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制的。他说：

> 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果真无知的人就是快乐的吗？容闳说，其实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成不了什么大事。回忆这几年，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

达到了求学之志，虽然所学不如理想的那样完备和系统化，但总算够得上正规标准的大学文科水平，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人了。他自问：一个知识人应该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将来的生活图景虽还模糊着，但已向他呈现出了大致的轮廓，此时的他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使中国更多的人享受同样的教育，通过输入西方学术和文明复兴中国：

>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他表示要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事实上，他的一生、尤其在本文叙述的 1854 年至 1872 年这段时间里，他都是为此目标不顾命运的坎坷辛勤地期待着、奔走着。

特韦契尔(Joseph H. Twichell)牧师 1878 年 4 月 10 日在耶鲁法学院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对容闳在耶鲁的表现有生动的叙述：

> 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1854 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

特韦契尔说，容闳本来有机会留在美国并找到工作，“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得到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由于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和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但是，这个人还要执意回去了，因为中国正需要甘为爝火的新人。

夏天，容闳来到广州，住处是一个当地人叫“咸虾栏”的地方，与行刑场很近。

这里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太平军战俘和城内暴民的地方。整个夏天有七万五千余人在此丧生。

一日，容闳到刑场去看，时方盛夏，空气恶劣如毒雾一般，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到处是来不及掩埋的无头尸体。刑场上的土吸饱了腐血，全都变作了赭色。据说叶名琛这个屠夫杀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被驱赶到了屠宰场。这般惨状，在刚刚接受过《人权宣言》等观念洗礼的容闳看来，比古罗马尼禄王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血腥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刑场回来，容宏只觉神志懊丧，胸中发闷，好几天都食不下咽、寝不安枕，刑场上的一幕幕惨状缠绕脑中，深感满人政府之无状，不由同情起了太平军，直想起而响应，冷静下来想想，又怕一时鲁莽断送了脑袋。来日方长，还是留着大好头颅吧。

二　三迁其业

找一个好职业，不仅仅为了家人衣食，而且是为了有所凭借，达到维新中国之目的。容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谋食亦谋道。在以下的几年里，我们会看到，容闳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蜘蛛，不辞辛劳地织着他那张求职与社交的网；随着这张网一天天增大，他终于凭着几个重要的支点实现了他对自己的期望。

他先去美驻华代理公使、传教士派克(Parder)处任职，月薪十五两。派克来华传教行医多年，又和他有同校之谊，容闳希望藉此多多结识中国高官。但是此时国门欲启还闭，各国尚无全权公使驻北京，派克这个暂代公使长驻广州，事少薪薄倒也罢了，只是跟容闳预想的目标距离太大，于是跳槽，转赴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月薪七十五两。这时处境略为丰裕，可以潜心研究法律，于是他听从朋友劝告，开始习律师业，想在香港律师界占一席之地，却没想到遭到英籍律师的全力排拒，深感在香港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多年以后回想生平，他还为昔日没当上律师而庆幸。困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能深入中国内地，不能与政府高层交游，纵使成为名律师，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1856 年 8 月，容闳搭一艘运茶船赴上海，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月薪七十五两，折合墨西哥鹰洋可达百元。考虑到消费差异，这一待遇已较任职香港时为优。工作并不繁重，上班之外，还有许多时间用来读书。呆了三个月，觉得这一职

位似乎也不是太适合自己。海关有一陋习，船上商人常与海关通事互通声气，勾结贪污，容闳觉得再混迹在这帮人中间简直是自污名誉，想辞职不干却又找不到一个借口。

于是，他和时任总税务司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有了这场对话：

> 容闳："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地位乎？"
>
> 李泰国："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

据容闳后来自述，听了这话，他二话不说就走，写了一封辞职报告递上。大意说，我和你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是在自己的国家服务，为什么不能与你们英国人享受同等权利，不能升到总税务司的职位？李泰国以为他嫌薪水太低，许诺每月增至二百两，但意欲寻找别一"光明磊落之事业"的容闳去意已决。同事见他甘愿放弃二百两的厚俸，都觉此人真不可理喻。然而容闳认为名誉对他来说比利益更重要，"凡欲见重于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入世谋生才一年，却已三迁其业，容闳也反思，如果长此见异思迁，冀望中的事业怕真的要像幻灯泡影一般了。

自上海海关辞职后，容闳在一家专收丝茶的英商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于商家内幕及经商方法已略知梗概。六个月后公司倒闭，再次失业，顿觉如投身于大海，四顾茫茫。容闳一度考虑以译书谋生，以此优游度岁，无拘无束，又可结交学界中一流人物。

这年黄河决口，沪上绅商界找到他，要他起草一则英文募捐启事，向在上海的外国人劝募。这则启事经沪上一份外文报纸登出，竟得外人捐款两万元，一时间，上海人都知道了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名字。一个叫曾寄圃的前同事介绍他结识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多年后他去安庆见曾国藩也是李善兰等一帮旧友从中搭桥——这不禁让他感慨"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厕身人海总在碰来碰去，有谁能料到结识的哪个人能帮助我们成就大事业呢？通过曾寄圃的关系，他进了英商宝顺公司任职。公司欲派他到日本任买办，他拒绝了，而是请求了一个到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的机会，说是想借此机会"略知内地情形"。

三　在中国内陆旅行

1859年3月11日，容闳坐上一艘当地人叫"无锡快"的小艇从上海出发，前往产茶区域从事调查、收购丝茶。这是一种来往于运河的平底小船，顺风时航速极快，逆风时需摇橹或岸上有人拉纤才能前行，在汽油船兴起之前，它是中国江南内河的主要交通工具。舟中装饰颇佳，日常用品应有尽有，丝毫没有陆上行走的风尘之苦。

容闳注意到，这些平底船的木料都异常坚硬，船上覆着穹形的篷，其下隔成小室铺以床榻可备乘客之需，拆卸下来又可装货物。当时浙、赣交界处的水道运载货物常用此船，后来随着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等内陆城市辟为通商口岸，这些平底货船渐被汽油船取代。这让容闳感到，西方机械的输入对传统的生计构成了极大冲击。他倒不是反对这种输入，只是觉得应该缓缓推行，"假以时日，俾人民得徐图他项事业，以恢复元气，不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

舟行三日，至杭州，这座十二世纪的故都给容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西湖边的巨寺、高塔、陵寝和湖上的桥。虽然这座江南城市韶华已逝，但这些美丽的建筑给这座城增添了一丝灵秀。盘桓一日，溯钱塘江而上，不多时就是一个叫江口的繁华集镇，但见河中帆樯林立，塞满了过往的商船。

船顺风扬帆而下，晚泊七里泷。遥望钱塘江东岸，露出水面的红砂岩，层次历历可辨。岸上还有红砂岩筑的房屋，四围山岭，晚景尤佳。翌日下午泊于兰溪，阻雨小住半日，夜半复行，至衢州。前一年(1858年)三月间，衢州曾被太平军围城四个月之久。过玉山，入江西境，航路折向西北，顺流而下，掠鄱阳湖南岸而至南昌，远远只见"城垣外观颇壮丽"，未及下船。既过南昌，航路折向西南，趋湘潭。这已是4月25日早晨了。

这里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商埠。外国商品在广东上岸后，必先集中于湘潭，由湘潭再分运内地；中国的丝绸茶叶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湘潭、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居留约十日，往各地收购生茶，装箱预备运往上海。

4月26日，离湘潭北行，翌晨八时至湖南长沙，入城游览，建筑街衢，皆多秽

污，再加空气潮湿，令人烦懑不欢。次日乘舟复行，遂过洞庭湖，渡扬子江，入荆河口，抵华容。这一路，水程十日，所见处尚有太平景象。到处都是庄稼，农人喝叱牛犊声到处都可听见。因找不到旅馆，容闳只好暂住在一家丝行里。听到消息，当地好多商人送来各种黄丝，以备选购。容闳购得各种丝样装运上海。两星期后，收拾行装准备归计。6 月 5 日抵汉口。1856 年太平军占据武昌时，汉口、汉阳亦同时失陷，汉口的一部分街区被焚毁。容闳到来时，一片焦土上已立起了新建筑，尽管草率急就，但也货栈林立，商业亦已恢复。事情办毕，重回汉口，自扬子江顺流而下，至九江，过鄱阳湖，依来时原路抵杭州，复乘"无锡快"，于 9 月 30 日抵上海。

这次游历，自 3 月至 10 月，凡七个月，经浙江杭州、江口、兰溪、衢州和常山，再转入江西南昌，后趋湖南湘潭、长沙，最远到达湖北华容、汉口，借此机会得以约略知悉中国内陆经太平军战乱后的状况。旅行之时，正值春夏季节，也是耕种时节，但田间陌上，殊少牲畜和耕作的农人，所经之处的荒凉，与先前阅读前人旅行日记所记的人烟稠密等情形大相径庭。这种荒凉，又以所经行的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为甚。

容闳回沪后，因人邀请又有一次绍兴之行，前往收购生丝。不知是因为过于劳累还是卫生条件差，这次短途旅行因容闳患上疟疾而不得不半途中止。病中恹恹，使他对这一城市没有丝毫好感。在他看来，处于山坳湿地、城中河道水黑如墨的绍兴称之为城市都有些勉强，而只是一条"含污纳垢之大沟渠"。

四 去南京

容闳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地旅行时，中国南方那场最大的战乱已到了中期，哀田地之凋敝，叹生民之多艰，他盼望着这场战争早些结束。在广州时，他对太平军的好感还在，正好两名美国传教士邀请他偕往南京游历。抱着了解"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一系列问题的想法，1860 年 11 月 6 日，容闳一行坐一艘"无锡快"从上海出发。

容闳在内地旅行时已得知苏州已为太平军占领，上海与苏州之间早就剑拔弩张。令他吃惊的是，气氛如此紧张，他们竟然没经丝毫盘查就到了苏州城下。按

容闳的计划，先入城拜访主将，求得一纸介绍信再赴南京，沿途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在苏州太平军营中，容闳一行还遇到了几个西方人，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法国贵族、美国医生、英国军火商人，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容闳一眼就看出来，这些人“各怀所欲”，都是野心勃勃的冒险家。

有了苏州驻军开出的介绍信，接下来在无锡、常州、丹阳等太平军辖区内的旅途果然顺利多了。运河早就没有了昔年的繁忙景象，有时河面上整日都看不到一条船。运河两旁的农田，皆已荒芜多年，草长盈尺，满目蒿莱，几乎看不到一片稻田。自无锡至常州，更是十室九空。偶尔遇到一两个因年老不能远逃的老人，提着小筐出售自制的食物，那种愁苦之状任谁看了都揪心。容闳认为，这责任不能仅仅由太平军来负，“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

11 月 13 日傍晚，容闳一行已经在船上看到了丹阳城堞，因暮色苍茫入城不便，他们便在舟中宿下，准备翌晨携介绍书入城。接待他们的副官自称姓秦，容闳后来才知道此人即是太平天国的天官秦日昌。秦日昌礼貌周到，为人又极蔼然可亲，给容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客人的要求，秦日昌向容闳一行介绍了太平军中的耶稣教，声称这一教义全都得之天王洪秀全。容闳觉得这些教义似是而非，大多荒诞不经。让容闳尤觉可笑的是秦日昌说他们的天王一到天界，灵魂便能御空飞行，又说他的肉体还能白日飞升。

当客人说到运河两岸的荒凉之况，秦日昌深表忧虑同时又感无可奈何，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遇战事，就要攻城掠地，人民退居山野，士兵驻守城中几乎成了惯例。不过他又辩解说，忠王李秀成驻扎苏州时，曾竭力禁止士兵抢掠，无锡有一个将领纵容手下焚毁民居，忠王得悉后毫不犹豫地把他砍了头以作警示。

秦日昌摊开一张作战地图，兴致勃勃地向到访的客人们介绍了今年春间粉碎政府军以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夹攻南京城的一次军事胜利。据他所述，运河一带、扬子江以北地区都已被太平军掌握，忠王、英王据上游正在谋取湖北，翼王经略四川、云贵等省，西王则驻扎镇江指挥江南全境，要不了多久，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将会大面积缩水。他们的劲敌、湖南人曾国藩，受伤后被困，已经在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战死了，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吃晚餐时，秦日昌表示，可以把船暂时留在丹阳城，他会派人妥为看护，太平

军会专门派人把他们一行护送至南京。11 月 16 日早晨，容闳一行徒步出了丹阳城，秋日清晨的空气异常清冽，路边枯草尖上已见微霜，日光一照消弥于无形。路上遇见的人，除了大队的士兵，几乎不见百姓。到了一个叫宝堰的小镇投宿时，敲开好几家客栈，门背后都是疑惧的目光，费了好大一番口舌，终于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一间空屋。缺少床榻，一行人只好以草铺地，席地而卧，半夜里冻醒了，破窗外的星星也好像冻得长出了绒毛，瑟缩着挤作了一处。

次日一早赶路，抵达句容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有传言说是太平军在镇江大败，溃退下来的部队要来此暂避，因此全城戒严了。两个传教士听到消息就要折回上海，容闳认为此处已离南京不远，无论如何也要赶去。一行人在道旁争论了大半天，容闳终于说服了他们。

赶着骡子，坐着轿子，一行人于 11 月 18 日抵达南京城下。城中美国传教士劳白芝(Rev. Roberts，即罗孝全，1802—1871 年，美国浸礼会教士，1837 年来华，初在澳门传教，后到广州，并授基督教义于洪秀全。1860 年前往南京协助太平天国办理外交事务)接到消息，已派人在道旁迎候。容闳看劳白芝牧师黄缎官袍，脚底下是中式高靴，也搞不清他在太平军政权中到底居何官职。

翌晨去拜谒干王洪仁玕，容闳才发现劳白芝牧师的寓所就在干王府第附近。早在 1856 年，容闳就在香港见过时任伦敦传道会中国牧师的洪仁玕，几年不见，没想到当年的小牧师已晋爵王位。干王对容闳一行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寒暄过后，即问容闳，对太平军怎么看？愿不愿意留下来一起共事？容闳告知：刚来此地，情况还不甚了解，对太平军没有成见，目下也暂时没有投身军中的打算，只不过来看看故人，“以慰数年来晦明风雨之思耳”。

不过，他还是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察访，颇有感触，但从建议的内容来看，他这道策书实是蓄意已久：

>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立海军学校；四，建立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容闳以为，这些建议他完全是因希望尽力于太平军而考虑的，也是切合当下实际的内容，“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

在第二次会面中，洪仁玕对他的七条建议逐条讨论，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给人的感觉是他认真研究过这些建议，且能礼贤下士，识见尤在他的族兄洪秀全之上。容闳说，洪仁玕“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建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但是，洪仁玕也表示，所提议七事虽然极为重要，但要一下子推行开来尚有难度，因为天朝的许多重要将领此时都统兵在外，要与他们协商，并得到大多数的支持，才可缓缓实施。

几天后，洪仁玕派人给容闳送去了一席黄缎和一枚四等封爵的印章，此举让容闳大惑不解，难道干王以为他是为了讨取封赏才来献上这些建议的吗？这不能不让容闳怀疑起了干王的人格。太平军领袖人物这般的行事方式和品格，让容闳觉得这是一帮很难成事的人。他决定回去，临行前向干王辞谢爵位：无功之赏，愧不敢受。如果天朝决定实施我的建议，我一定会卖力奔走。眼下已近年底，我决定回去，如果您不忘故人，就请发我一张护照吧，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了。

干王的人马护送容闳一行到了丹阳，复登原舟，于 1861 年 1 月回到上海。

可以想见容闳此行归来后的失望，“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他们的领导人洪秀全，在容闳看来，实际上已在昏聩和幻想中养成了一种病态人格。以是观之，他认为中国的所谓“革命”，不过是一家一姓之兴废，于国体和政体上从来没有重大的改革，就像蔓延了数千年的文化一样，“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

他把太平天国革命比之为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容闳分析道：这两面性，一是以宗教为原质，“以此粗笨之农具，而能所向无敌，逐北追奔，如疾风扫秋叶，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其魄力至伟，能自僻远之广西，由西南蔓延东北，而达精华荟萃之金陵，亦惟宗教之故”；一是道德上的整体滑坡，“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他断言，惨烈的战事过后，给中国的宗教和政治，都不会带来好影响，惟一的好处，是破除了国人顽固的积习，

让他们从梦中惊醒，有了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思想。

同时他也认为：引起1851年以来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叛乱的直接原因和逻辑上的原因，既不是基督教信仰，也不是宗教迫害。这些可能仅仅是导致叛乱发生的枝节原因或偶然因素，但却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政府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的腐败。帝国庞大的官僚组织千疮百孔，行贿成风，简直成了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组织：

> 设有人以耶稣教之关系及清政府之操切，为1850年革命之原因，则其所见浅陋实甚。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馈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五　一场改变了命运的谈话

本想借着太平军的力量一展平生宏愿，施行在教育和政治改良上的计划，现实却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失望而返，容闳决定考虑从贸易入手，积聚起一笔极为雄厚的资产，借此以图大业。一日在茶肆，获悉安徽太平县有大量绿茶积压的消息，他决定冒险一试。此地属太平军辖区，这些装箱的茶叶此时尽落于太平军之手，有无可能谈成这笔生意？谈成后怎么把这些茶叶运抵上海？计议停当，容闳携银四万，率四十余人分乘八艘运茶船直趋芜湖。历时半年，得绿茶六万五千箱运抵上海，容闳也累倒了。

此行他个人虽然赚钱无多，但他任难事而能坚韧、遇危险而能镇定的个性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想在安徽泾县境内深夜遇匪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死则死矣，只是维新中国的宏愿怕是真的要落空了。他想，于生命、于事业，还是"大处着墨"为好。此后他作为茶叶经理人长驻九江，半年后辞职自行经商，还是在九江。

1863年春天的某一日，茶商容闳在九江收到了一封署名张世桂的来信。张是他在上海时的旧识，曾任炮舰统带，后又入曾国藩幕，多年不曾联系忽通尺素本

已让他惊奇，更可疑的是信的内容。张世桂在信中说，总督（曾国藩）久闻他的大名，想邀他至安庆一见。这不禁让容闳满腹疑虑，曾国藩贵为两江总督，虽然在上海时见过一面，却素无交往，他为什么急着要见自己？莫不是造访南京和向太平军购茶的事情也传进了他的耳朵，要把自己诱捕处置？踌躇再三，他写信给张世桂婉辞谢却，说总督宠召不任荣幸，深谢礼贤下士之盛情，只是这个时节正值新茶上市，生意太忙，一时骤难舍去，方命罪甚，他日总当晋谒，云云。

两个月后，张世桂的第二封信又至。除了告容闳速往，信中还另附容闳的好友、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一封信。容闳这才知道李善兰也入了曾幕。李善兰在信中说，他曾竭力向总督推荐容闳，说容闳留学归来常思报效国家，总督常思求贤之心。信末说总督有一极重要的事请容闳办理，请他无论如何速往安庆一见。

得此二书，容闳暗笑自己先前的疑惧也太敏感了，当下复书，说几个月后一定来安庆。哪知到了七月，张、李信件又至，催他早日动身，还传达给他一个信息，曾国藩要他弃商业而入政界。底牌已经摊开，容闳意识到，这是实现自己计划的一个难得机会。当即回书作答，待手头之事交割清楚，一个月内必依约前来。

9 月，容闳抵达安庆，先在曾氏大营中见了上海时的故交旧识张世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第二日一早，即去拜访曾国藩。时年五十二岁的曾国藩在他眼里显得精神奕然而又神态威严。他目测曾的身高“约为五尺八九英寸”，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两颊平直，胡子一直披垂到胸前。他注意到曾国藩的眼睛，看人时喜欢稍作眯缝，显得三角有棱，眸子还是榛色的，眼睛虽然不大，那直线一般平视过来的目光却极锐利；让容闳觉得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有着杀伐决断之心的政治家。

那锐利的目光，将容闳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扫视了一遍，然后落在他的脸上，容闳有一种被穿透的感觉。他虽不忸怩，却也坐立不安。第一次谈话双方都在试探，小心翼翼，又礼貌周至。曾问了他在国外居留几年，今年几何，有无娶妻，目下有无投身军旅的打算，等等。曾还称赞容闳长得相貌堂堂，目光威严，一看就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必能发号施令驾驭军队。这让容闳觉得，曾是在物色一个冲锋陷阵的大将。他只得老老实实回答，从军之心是有，只是自己在军事上从无学识和经验。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这么着过了两星期，无所事事，真个是度日如年。当时总督府中幕僚百余人，

举凡法律、文学、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幕府之外更有形形色色的候补官员、真假名士排成了长队，曾大帅把自己邀来用意何在呢？在与李善兰、华蘅芳等一帮旧友的一次宴集中，容闳说出了他的疑惑。李、华诸友告诉他，总督正在考虑于中国建一西式机器厂，他已看中了你来擘划此事，等着吧，马上就会召见你了。

果然，第二次召见时，曾国藩向容闳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做一件事，这件事必须是最有益于中国、又是当下最迫切最重要的，你认为应该从何处着手呢？这话耐人寻味，却又不好草率作答。以容闳的志向，肯定是认为教育第一，但几日前朋友们都已透风给他，且自己又是客卿身份，蓦然提议教育计划冲撞了曾国藩不说，日后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于是他答之以应先兴办西式机器厂，具体是先办一母厂，再办各种各样的子厂，以中国本土原料和工钱的廉价，将来造出的机器必定比欧美各国都要便宜，当然这个机器厂不仅仅只是制造枪炮，但于当下情势而言，又以制造枪炮为要。曾国藩沉吟良久，说，这事我也不甚了了，你先与徐寿、华蘅芳他们商量怎么办吧。

又过两星期，朋友们反馈给他的信息是曾国藩对这次谈话结果极为满意，已选定在上海城西北的高昌庙一带建造厂址，并决定派他为全权代表，赴美购办机器。不几日，命令下来，要他领银六万八千两即行启程，同时札授他五品军功、赏戴蓝翎。自此，容闳把安庆之行视作了他“初登政治舞台”的人生转折点，其对曾国藩的好感也保持了终生。

六　留美幼童

十月自上海启程，抵达大洋彼岸的纽约已是来年春天。此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末期，谢尔曼将军率领的六万大军就像一把大镰刀一样，一路从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再经南卡罗来纳首府哥伦比亚扫向了北卡罗来纳。美国国内大多数机器厂都忙于承造国内战争急需的军火，无暇接单，幸得在上海相识的工程师哈司金斡旋，机器采办一事尚还顺利，只是协议签订之后，还须半年方可装船运回中国。趁着闲暇，容闳去母校耶鲁大学参加了毕业十周年纪念会。

旧友重逢，一堂聚话，自是一番热闹。同学星散之后，容闳忽作奇想，他准备

跑到华盛顿报名要求参加北方志愿军，报效他的“第二祖国”去了。他找到一个专管征兵的美国将军，请求允许他自备军饷，参军六个月，做一个在战场上跑来跑去的军中信使。他还与哈司金商量好了，万一自己发生不测，机器装运回国之事就要托付这位新朋友了。美国军方人士告诉他，传递军书以及赴前线杀敌，有我们呢，你担负着中国交给你的重任，事情办毕还是赶紧回国吧。此是闲话，不提。

容闳带着他的机器回到上海。他没想到离国才一年多，人间却已换沧桑。不久前，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荃的部队已经克复南京，纵横长江流域十四年的太平军已经平息。目下，曾国藩正带兵驻扎在运河上游城市徐州，调度诸军与另一股反政府武装捻军作战。在华蘅芳的陪同下，容闳溯运河北上，抵扬州后再坐骡车，陆行三日后抵达徐州向曾报告此行经过。

曾国藩对他完成的这一任务极为嘉许，专折请奖“熟习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的容闳，其奏章云：

> 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庶几宏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才。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以示优异，以励有功。

两年后，已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巡行至上海，容闳陪同他视察了江南制造局。他一一展示了从美国购回的各种机器，并亲自操作讲解，趁着曾兴致极高，容闳向他建议在兵工厂内附设一所兵工学校，得到了曾的支持。容闳觉得，自己像只辛劳的蜘蛛奔忙了那么多年，离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在容闳的心目中，曾国藩“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于己不仅有知己之感，其人识量能力，又足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容闳在上海时的上司兼老朋友丁日昌，在新事物的接受上与他可谓志同道合，凡有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勇往直前。容闳认为，比之曾国藩的心思缜密，丁日昌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尽管爱冲动，也是个值得托付大事之人。1868 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容闳前往苏州拜谒时提到了他的教育计划，得到丁的赞许。他让容闳赶紧写一条陈，由他托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代奏。

一个熟悉公文套路的朋友告诉容闳，官厅批答公事向来有准有驳，为了不让提出的建议对某些守旧官员带来刺激，容闳煞费苦心，把他真实的意图作为第二项掩藏在了其他三项作为陪衬的条陈中：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条陈递上去两月有余还是无声无息，随之而来的一个消息让容闳蔫了：文祥因母丧丁艰，按帝国官制，三年之内将不得与闻政事，更大的打击是他居丧不到三个月竟也去世了。事情刚刚有点苗头又走入绝路，容闳只觉失望就像潮水一样淹没了自己。但是他还是不忍放弃，一碰到丁日昌就提醒丁寻找机会向曾国藩进言。

1870 年 6 月发生在天津的一桩当地土著与教民的冲突事件给了容闳一个机会。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法国传教士强占民地激起公愤，法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开枪打死知县随从，被愤怒的民众杀死，教堂和法驻天津领事馆被焚毁，约有二十余名传教士和商人在这次冲突中丧生。时任直隶总督的崇厚因被指控须对发生在他的辖区的这一重大冲突负责而被革职戍边，朝廷派曾国藩、丁日昌等组成五人委员会调停此事，容闳作为译员赴天津，得以与钦派诸大臣共事数日。趁此良机，容闳又向丁日昌重提他的教育计划，并敦促丁向曾国藩提出此事。经多方努力，曾国藩等四大臣联衔入奏由邮传飞递入京。是年冬，清廷朱批下达，“着照所请”。容闳欣喜欲狂，只觉得走路时脚步都要飞起来了，执著多年的教育计划终于将要实现，“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应曾国藩之召，容闳径抵南京，商议筹措经费、遴选官员，选拔幼童等事宜，不久于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正当预备学校开学不久、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派送准备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时，传来了曾国藩在南京去世的消息。手植桃李的人没有亲见结果，实是人生一大憾事，但容闳以为，曾国藩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三十多年后，他还兀自不忘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

> 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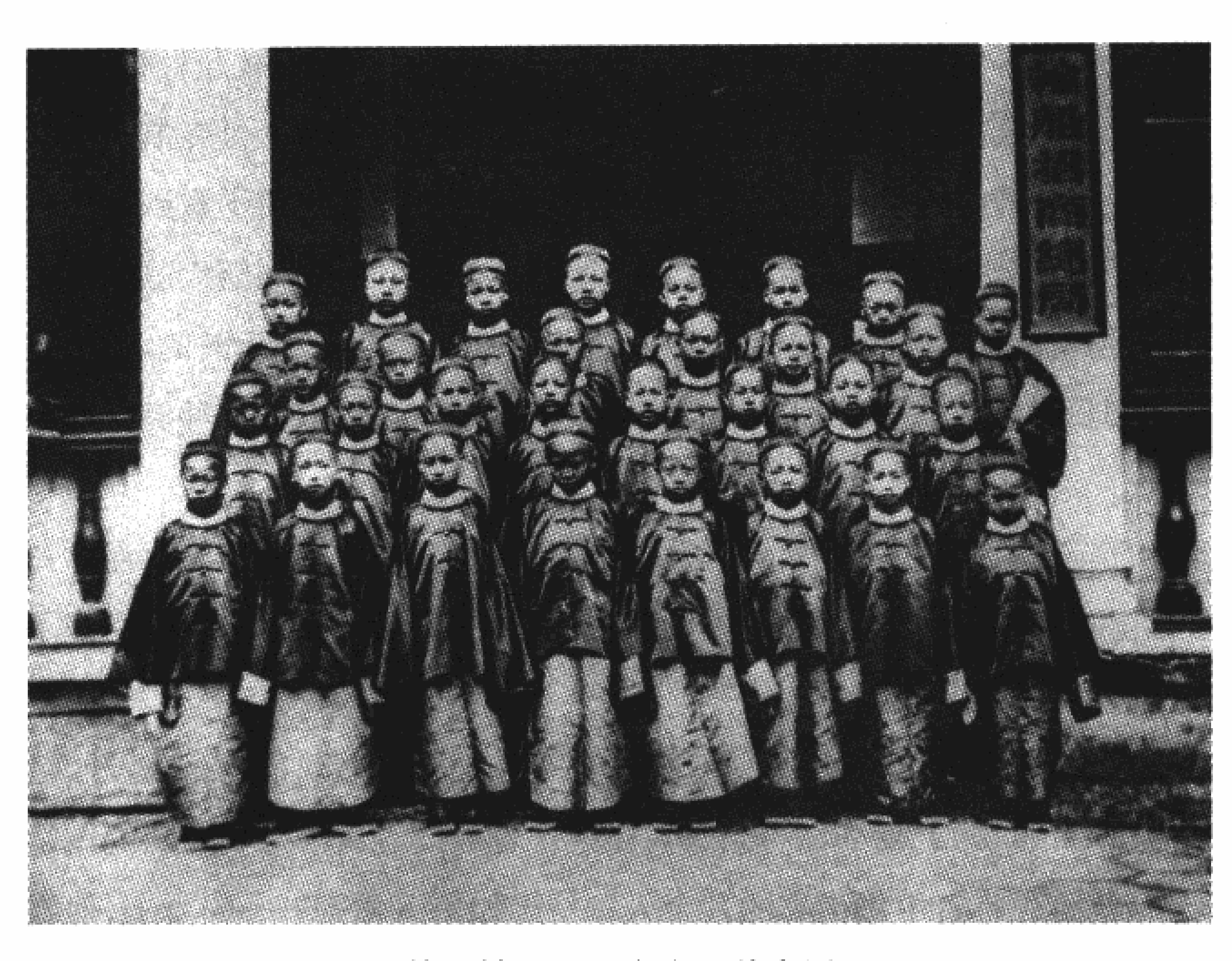
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三十人横渡太平洋，踏上了留学美国之路。当一队穿着蓝色长袍、酱色马褂，头戴缎帽、脚登缎靴的中国幼童在旧金山登岸，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前往新英格兰时，一路观者如云。《纽约时报》1872年9月15日以《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为题报道如下：

> 旧金山，9月13日电：
>
> 昨日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清国官员的教师陪同着他们。
>
> 清廷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清廷还计划每年送出3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这批来此地接受教育的清国小姐和绅士们受到了人们极大关注。因为先前一批清国学生在美国时曾受到基督教的熏染，所以这次将会在这批学生中严格传授孔子思想，让他们信仰儒教。另外，“四书五经”和康熙皇帝制定的律令也将是他们常规课程的组成部分。

按计划，将分四批逐年选派幼童赴美，十五年后学成回国。至1875年，最后一批留学生也抵达美国。

七　复活

在天津时，丁日昌推荐了翰林出身的刑部主事陈兰彬出任留学生监督，曾、李都以为可，李鸿章还向总理衙门发函特意说明此一人事安排之目的，在于让西学



第一批留美幼童启程前合影

和中学"相济为用","盖以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当时容闳看此人"胆怯而乏责任心",但顾念到此人翰林学士的身份可以稍阻反对派的阻力,就答应了。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陈和此人后来推荐的继任者吴子登,因思想和观念的差异与容闳的冲突日趋激烈,竟成了他费尽心力开创的事业最大的破坏者。据容闳说,陈兰彬甚至向李鸿章打小报告,称留美幼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尽管容闳作了种种努力,还是没有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1881 年,全体留美学生约一百二十名,被迫返回中国。撇开种种私怨,容闳认为这是中学与西学、新知识与旧文化的一次冲突。陈、吴"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他们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看到唯唯诺诺与墨守成规,而年轻的留学生们一旦呼吸到新大陆的自由空气,性灵上所受的压制尽皆消去,他们的行为和态度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呈现出与旧日专制教育体制下的差异。当这差异到达一定的程度,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现实面前,容闳不得不承认:随着中国留学事务所(即"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的突然撤销和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他像一只辛劳的蜘蛛一样为之织了大半生的网也不得不告终了。

当他晚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寓所里回首一生走过的道路,靠写日记及回忆录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度日时,还想念着那批他最早带到美国的留学生们,他说从这批先行者中最优秀的几个人——比如詹天佑等——的身上,他看到了他的事业的复活:

> 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1912 年 4 月 20 日,容闳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去世,次日的《哈城日报》刊发了如下一则消息:"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他的沙京街二百八十四号寓所去世……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关注,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星期六(四月二十日)

他刚收到新中国领袖孙逸仙博士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惜已太晚，因容闳博士早已昏迷不醒……"

据说，在他长眠的哈特福德城西带山公墓，一块方础圆顶的墓碑上，刻着一个由中文"容"字构成的巨大的心形图案。

附记：留美幼童自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推出"走向世界丛书"闻名于世的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在《从东方到西方》一书中，从书信和讲演中辑录了部分留美幼童对 1881 年遣返回国事件的反应，兹录如下，以资参照。

1873 年第二批赴美幼童中，有一个叫温秉忠（**回国后曾在美驻新疆领事馆服务，后为北京海关总局负责人、苏州海关监督等**）的人，1923 年 12 月 23 日曾在北京税务专门学校作了一场题为 *The Memory of a Boy's Studying in America* 的演讲，介绍五十年前幼童留美之经过，此演讲稿根据高宗鲁氏译文节录：

> ……一位广东青年新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返抵上海，此位青年即是容闳先生。……在他初入社会后，深感大学教育对他自己的裨益，而立一愿望，即游说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接受西式教育。……他说，派官费学生出国，由于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之知识及经验，增进与外国人民之接触，将有助中国在外交、商务及工业上之发展。
>
> ……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管大权；但对首倡幼童出洋之事，犹豫不决，且存戒心，因为毕竟此一计划在保守的中国是太激进了。因此，他联络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丁日昌会奏朝廷，最后终于得到清廷之批准。容闳被任命为委员。……容闳原订计划是连续四年，每年派遣三十名幼童。1870 年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招收学生学习中、英文，每半年举行考试，合格者送往美国留学。
>
> ……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之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上呈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

及理想(American Idea and Ideals)……幼童(在美国)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环境。……

幼童在学校的功课是日益进步。当时有两位委员,其中一位是翰林(按即吴嘉善,字子登),深感幼童因环境变化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为"美化"(Americanized)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上奏朝廷,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洋鬼"(Foreign Levils)矣。皇帝照准其请,立即下令全体幼童即日撤局回华。

1875年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梁丕旭(诚),和全休幼童一道被撤回国后,于1882年3月6日从天津写信给美国朋友Shaw一封信,叙说回国后所受的待遇和苦恼:

我们回到中国后,真的感到失望和沮丧。苛刻的待遇使我难以形容。……

十月六日,我们返抵中国,到达上海,乘独轮车去上海内城,被送往一个长年封闭的、潮湿的旧楼房中。……中国官吏靠贪污为生,层层克扣,(给我们的补助和食宿费用)转到我们时,已经只剩下很少的数目。几位同学已在那大楼中病倒,因为疟疾立刻流行起来。

……高级官员给我们两次考试。他们之中只有一两位懂英文……十一月二日,我们一行九人来到这所海军学校,是因为考试官觉得我们最适合学海军,却不问我们个人的志愿如何……(这里的)中国教习不知如何施教……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一字往下念……学校及天津兵工厂均有围墙围绕,我们在五年之内只许外出三次。

……将在此地受到的强横待遇与当年在美国所受到的朋友们的细心照顾相比,我只有叹息:上帝呀!这还要有多久!?

1875年赴美幼童薛友福回国后,在1882年1月10日从厦门写给美国女同学

凯蒂(Kathline)的信中说：

九月六日下午，我们乘“北京”号启碇回中国。……同航旅客很多，也有很多传教士。他们都去过中国，故我很乐于与他们交谈……

我常常独自看海。看海鸥或前或后，争啄船上抛下的残食。我常想：它们长飞竟日不息，入夜必然栖息在海上了。……

此间天气不冷，正如美国八九月季节。现在你们那里一定冰雪交加，而此处正是春暖花开时候。我真希望你能来此，共赏快乐的季节……我也盼望我能再溜冰，即使几小时也满足了……

首批留美幼童黄开甲(回国后先后充任盛宣怀秘书、轮船招商局经理、电报局总办、1894年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中国特派委员助理)，在1882年1月28日写给他在美国的居停主人和老师的妻子 Fannie Bertlett 的信中说：

在我们留美返华的幼童中，已有少数被旧习腐化；有人已散漫不堪、生活颓废；但大多数对恶势力、对官僚习气的抗拒仍坚定不移。

1872年赴美幼童容尚谦(回国后先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扬武号旗舰上受训，参加了中法战争，后为环泰舰舰长，参加中日战争，不久出任航运公司经理)，1932年10月22日写信给美国朋友 G. Robinson 说：

我们多年来都自称“我们幼童”(Our Boys)，虽然到今天我们都已超过七十岁，而且只剩下二十九人了。

人物档案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英文名 Yung 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人，近代著名教育活动家，系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归国后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

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 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七条建议。曾受曾国藩委托赴美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1872 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率第一批留学生赴美。此后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1882—1894 年侨居美国。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后辗转流亡美国。1912 年 4 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晚年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全书洋溢着他对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无限热情。他的一生也成为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

如云漂泊
——杨度在 1898 年

一　春日出行

新年的到来和往常并无不同。除了几声爆竹在石塘乡间寂寥的清晨毫无心肝地炸响，空气里偶尔飘来肉香和祭祀的香烛气味，再也让人觉察不到，这是岁在戊戌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第一日。

尽管早就厌倦了开春第一日里种种的礼仪，作为一个身有功名、薄有名望的年轻乡绅，杨度还是早早起了身。是个薄阴的天气，似雨非雨，天气倒不怎么冷。行诸礼毕，百无聊赖，杨度就和家人斗牌嬉乐。到了时交申刻（下午三时至五时许），他离开牌桌，走到庭院中，抬头向天，似有所待。不一会，又返身入屋，额头和衣襟都让微雨淋湿了一片。家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这一刻，应该正是日食，可惜阴云微雨，遮没了日头，看不到了。

新年的第一日就有日食，这一奇怪的天象是否预示着今年将是一个灾异之年？《春秋》之类的古籍上没有记载可以参酌，自己又不懂天文历数，未知何祥，忧虑不可名状，笼罩在了新年第一日杨度的心头。

他在想的一件事是，自 1895 年乙未科会试落第，不习八股制艺已忽忽三年，今年要不要再度公车北上？

正月初八，是母亲的生日，“衣冠上寿”，内外各摆酒二席，自然又是一番热闹。那两日亲友到得多，自然也有性情相契的，可以谈文说艺。前一日在橘园，刚刚劝了一个朋友改习《春秋》，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是讲“礼”的，“而礼乐必在百年平定之后”。那天他还对朋友说了一大通话，大意是，《春秋》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

里面有治世安邦的大学问在；眼下中国正遭逢极大变局，各国洋人涌入，而掌握了《春秋》，洋人来了也不必担心，因为洋人虽然富庶，却不懂“礼”。

寿宴既散，贺客散去，留着几个可意的，正好趁着酒性谈诗论文。稍嫌美中不足的，是这位皙子先生太过好为人师了些。一朋友刚说卢仝的诗粗鄙，不欲学之，他马上劝令学阮、陶、鲍三家诗，“皆清劲一派也”。不过朋友们都见惯不怪了，人家少年中举，又是名师门下，狂也有狂的理由。当年他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回来跟着王闿运学《春秋》，堂弟杨敞就这样半真半假地说过他：“有揽辔澄清之志，惟高视阔步，有狂士风。”

考不考得中自有天意，借此机会游历一番，也不失为美事一桩。过了元宵，开始打点出门的行装。正月二十三日，杨度离开湘潭姜畬石塘老家，向省城长沙进发。刮的是东风，船行甚缓，到得省城已是次日午饭后。舟泊城外，径往王宅拜访业师王闿运先生，未料先生去了衡州，出了王宅，正无处可去，听得康有为先生的得意弟子、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去岁十月来湘，此时正主讲长沙时务学堂，于是起了前去会会的心思。

这一年杨度二十四岁，梁启超二十六岁，都是年少得志、自视甚高的人物，又都师出名门，一个是精通经史、尤谙“帝王学”的湖南名士王闿运的得意弟子，一个师从名动天下的康长素先生，杨度此去，说是“乃往访之”，语气很是轻松，实际上先就存了一较高下之心。

梁启超自去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来长沙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此时正是湘乡学界风头正健的明星人物。同时代人曾这样记述那个时期梁启超的打扮：紫红缎的皮袍，天青缎的出洋灰鼠风的皮马褂，一副纨绔子弟的穿着。同样少年气盛的杨度初一睹面，先自不喜。

整个下午的见面几乎都在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对《春秋》、《孟子》的不同理解。在梁启超看来，《春秋》一书是治乱世的，《孟子》一书是致太平的；但杨度认为，孟子生当乱世而无拨乱之用，他生活的时代天下无日无有兵争，孟子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读书人又尽到了多少责任呢？从杨度这一日的日记所记“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可以想见两人会面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可能是梁启超过分的傲气激怒了他，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很低，说他是一个大骗子，“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争论到了天色昏暮，梁没有留饭的意思，口干舌燥的杨度拱手而出，

只觉说不出的懊恼与空虚。“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晚上翻开日记，对大他两岁的梁启超写出这番老气横秋的话来，方觉解了胸中一口恶气。(1902年，杨度东渡日本后，始与梁启超有更深入的交往，他给梁写过一封长信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写过一首五言诗为当年的长沙之辩作结：“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梁启超把诗文都收进了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中的《饮冰室诗话》，并在文前加了一段按语引杨为同志：“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之后，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娑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就这么在省城盘桓，喝酒、散步、读书，心迹一日日地散淡着，寂寞像荒草滋长，朋友说他是太孤高，他说自己是薄世难处。真个茫茫何所适，踌躇不得行，于是说出这般颓丧的话来：既无烈心，任其所遇而已。

二　上海风流

二月四日，杨度坐慈航轮船自湘江东下。此行目的地是北京，他早早动身自是为了去上海一转。旅途刚开始，日日阳光和煦，沿途景色时时惹动诗思，船行自然要慢些。六日清晨，船抵岳州，约了朋友同游岳阳楼，“水落山枯，惟云雾可观耳”。很扫兴地回到船上，继续前行，江浪滚滚，不复湘水清流，听着满耳的轮机声，诗兴不旺，只得辜负好题了。

七日晚，船泊一个无名的小渡口，看着烟波渺然，江心一轮皓月，吼了一嗓子大江东去，恍恍乎是东坡再世了。船上酒本不多，饮不多时却已醉容颠倒，自觉栩栩欲仙，说不出的狂态可掬。一夜无梦，也不知几时开的船，待得醒来，同舱人说已过鹦鹉洲，不远就到汉口了。

在汉口义生栈住过一晚，会过几个住在这里的湖南朋友，还去探望了嫁到此处的四妹。四妹正在病中，瘦得脱了形，思家，只好婉言劝慰了老半天。本想前往龟山一游，登山的竹舆都已雇好，不想中饭过后，城中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随后暴雨如注，街衢几成河流，只好闷在客栈里写信打发时间了。

第二日还是风雨天，和几个朋友在酒楼小酌，杨度颇觉坐立难安，连喝到嘴里的酒也像梗在喉头，难以下咽。傍晚，看雨势转小，就差人把行李搬上江裕轮船，

准备坐晚上八点钟的轮船离开这座城市。

看样子一场寒流正自北而南裹挟而来,江上行船寥寥,河水冻得如同一块绿翡翠。万物也噤声了,只剩下雨夹着雪片落在水面上的沙沙声。坏天气加快了航程,十一日午刻,船过九江,末刻,过彭郎矶。十二日,大风雨雪中,船抵南京,因风浪实在太大,好不容易船才靠了岸。"风涛怒吼,船颇振荡",趁着北风,连夜过了瓜洲。

十三日一早,雪停了,北风愈加凌厉。至午刻,船抵上海。原想入住长发栈,已无余房,就近住进大方栈。"夜上书楼访旧","所见又无佳人,使人意尽"。洗洗睡了,养精蓄锐,好戏只好留待明日了。第二日是个薄阴的天气,雨雪虽过,寒潮的尾巴尚有余劲,早饭后游张园,"细柳初黄,平芜未绿",竟是隆冬气象。再至愚园,看猫儿戏三曲。复至张园,再看戏,待得散场已是上灯时分。有朋友安排了在"乐天春"吃西餐,餐毕,一群人齐往一个叫王小香的妓女的"文寓"访春。"群妓毕至",怎不让一帮色友癫狂欲死。不知是不是没有可意的,这一晚杨度兴致不高,稍作游玩就先行告退,但日记中还是不忘评点一番群芳:"群妓中王小香善歌,颜色以吴云娥为最。"

次日上午,昨晚一起玩的两个朋友寻来,杨度宿醉未醒,竟还没有起床。稍作收拾,几人相偕着去找王小香、吴云娥。这一次,把酒席置到了她们的文寓里。燕瘦环肥,推盘过盏,喝过了酒再往四书馆寻春,"觅佳者不得"。在四马路闲逛时,忽然街市上一阵嚣动,有人说是前面一幢房子着了火,想去看个热闹,却挤也挤不过去,于是又一起回到文寓喝酒。这一晚,杨晚回到住处都过了三更了。

十六日,过萃秀里,想到从前游春有个相好的就住在此地,只是春风桃花忽几载,人面不知何处去,于是打听住址相偕寻去。还真让他找着了。此女惯作夜莺,白天从正午开始,晨昏颠倒犹是常事,杨度等一干人进去时,她还刚从床上起来。杨度看她除了面貌稍肥外,丰采依然如故,少不了会有亲近的欲望上来。可此女看着他的眼神却是空茫,似乎一点也记不得他这个旧客了。惊醒过来的杨度只好自叹多情,连名字都不愿报就返身而出。几个一起来的人都去找野鸡了,他就一个人跑到天喜园听戏,听罢,又喝了点酒,淋着雨失魂落魄地回了客栈。这一夜他失眠了。从前种种温存,俱作电光泡影,他觉得自己成了伤心的崔护和杜牧了,酒精的燃烧和着身体里的一股内热,使他一口气写下了一首香艳而又悲伤的《念奴娇》:

桃花再发，自记忆别离，犹如昨日。帘影垂青窗影绿，细省当年游迹。春扇余香，宵床梦远，皆向人前说。镜中偷看，却如从未相识。　　今日明月初圆，广寒楼畔，偏是孤游客。杜牧江湖重载酒，脉脉相思难抑。笑我多情，愿卿薄幸，免共花争发。悲欢何定，任它流水无极。

会试的日期一日日临近，北上的船票早已经订好，既然终须离开，接下来的日日笙歌夜夜欢宴也就不为过了，行乐须及时呀。

十七日，与欧阳霞仙、郭桐伯等人在雅叙园小饮；十八日，阴，终日不出，晚些时候有朋友招饮，说是席间有美妓。到了连呼上当，都是寻常姿色。叫了一个旧日相好的弹唱一曲，酒散后冒雨回客栈。十九日，又是招饮，酒罢已三更，因行李已搬上北上的轮船，就和几个朋友们一同睡在妓院里。"颜色为最"的吴云娥和他们挤在一块，"头相并，肩相摩"，一夜无故事。杨度以前常说坐中无妓、心中有妓为正心之要，现在身边有妓，心中无妓，这份定力，自己都不能不佩服了。

二十日，这是杨度在上海的最后一日。这日早晨，惨白的铅云阴沉沉地压着，有微雨。杨度一行先是在杏花楼喝酒，酒罢登船，看看时候还早，雨又停了，便又登岸买醉。从酒楼出来，天已下起了雪，黄昏时分的天色，竟已黑如深夜。走在租界区（**杨度称之为"夷市"**），但见电灯如月，大雪满天，这西洋景与古典的月色相交融，任是他熟读诗书，也找不到哪句可以用来比拟。积雪尚浅，踩去已有咯吱咯吱的声响，极欲搜出个四句八句来，心却像空荡荡的仓库，只觉冷风吹着醉颊，欲飞欲扬，这臭皮囊都可以割舍抛弃的。于是原本想做的诗也不做了，趁着酒性索性又游了数处妓楼，等到拖着疲软的身体回到船上，不知何时，大雪竟已停了，上海城早就像一粒琥珀沉入了黑甜之乡。

三　北京之行

杨度此去北京，坐的是太古轮船公司的"通州"号，此船专跑北方航线。二月二十一日，天色未明离开码头，到早餐时分，船已驶出黄浦江，扬帆入了东海。从船弦的一侧，杨度看到了东海上那轮正在喷薄而出的朝阳。那光，起先还只是胭脂红的一点，俄顷，就盛大了起来，烧得大海如同滚沸的钢水。在上海的一周，几

乎天天都是雨雪天气，甫一见到阳光，杨度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相信这是一个好兆头。

站在甲板上看海，诗性勃发，沉吟终日却不得一字，不是风景不好，实在是心思还在沪上那些小妖精身上。二十三日傍晚，船至大沽口，于口外停泊一晚，次日于塘沽换乘小舟上岸。惊风高浪，杨度一行人坐的小小一叶孤舟好像要随时倾翻了去，惊魂未定上了岸，衣衫尽湿，也不知是飞溅的海水还是汗水。次日从塘沽坐火车至天津，入住客栈，写下一诗，算是打发了一直盘旋脑海里的上海的莺莺燕燕：

人颦似花敛，人笑似花开。依屏若羞看，临池觉自窥。
蛾眉正窈窕，红袖且徘徊。花前喜郎至，翻嗔何晏来。

第二日，天色未明就起了床，稍作洗漱即径奔火车站。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将在黎明时分开出。

未刻，火车准时抵达北京正阳门外，叫了两辆骡车装上行李，不一会到了湘潭会馆。第二日，有朋友约一起住到内城去，走朋访友也可方便些，于是搬到了苏州胡同一家客栈。接下来几日，照例是一个外省举人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前的例行议程，会客探友、出拜座师、遍访同邑京官，天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到底是皇城根下，空气中飞来飞去的都是政治流言，什么俄日之事，什么向英人借款，什么皇帝日日临朝痛哭等等，也不知是真是假。

时序转眼就到三月，初春的北京，雪比南方更深。车船劳顿，再加途中风寒，杨度竟有些微的不适。同乡有懂医的，照着方子抓了几帖药吃，倒也好了。戊戌科的会试，是三月八日进场，正是临阵磨枪之际，杨度却像个游手好闲之徒，六日，一下午在看义胜和班的戏，到天黑才回寓所；七日，也是一整日听戏。

拥挤的贡院，站满了各省前来应试的举子。杨度抽得的是"淡字号"。入了号子，三更后，考题下来；按例先作三艺。自乙未科(1895)会试后，杨度已三年不作八股，一路上光顾着喝酒、耍乐，到了京城也是成天游逛、听戏，于是避生就熟，三艺都以骈文搪塞了事。三艺作毕，在窄小的号子里倚靠而寐，醒来不觉已是第二日的黄昏。北地夜空，风声萧然，帘外一轮明月，已将圆了，回顾四周，灯光帘影，

万户寂然，不知有多少举子正搔首捻须绞尽脑汁，于一个个黑漆漆的文字的尸体间打滚呢，杨度忽地有了文场而如武营之感。

十一日考经文，抽得“坐字号”，入了场，五篇文章仍是骈体文打发之。接下来的五篇策题，也不知他是自暴自弃还是故意撒野，仍是用华丽词章写的骈文。七日考下来，走出场外，和同年一聊，就知道这一科肯定中不了，因为十三艺全骈与十三艺全散一样，都是违反科场规则的。反正本就没存必中之心，归途也不会少了乐趣，夜聊既深，十六的月亮悬在头顶似个银盆，长歌踏月而归，心情还是很好。

这年春天格外得长，过了三月还有闰三月。就见他在京城无事忙，喝酒、看戏、饯行，纵谈国朝掌故，出席同年团拜，去琉璃厂看书。《题名录》公布了，金榜无名本在预料之中，所以也不恼，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期间，听说太后和皇帝要检阅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等卫戍部队，头脑发热写了篇《大阅赋》要去讽谏，托一个京官代奏，自然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只好嗟叹：“相如虽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嗟。”倒是王闿运知道这个学生的心性，托了两个进京的拔贡带口信给他，让他在京少发议论，管住自己的舌头，不要弄得什么都没捞着，反落得个罪名，这才打消了他献《大阅赋》的念头。

四月八日，朋友夏寿田——他高中此科榜眼——拉杨度去出游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坐在江亭，远望江湖，惟见蒲苇丛生，碧空苍净，回首城北则是一片黄色的宫墙，一派森然的王气，杨度写了一首小词《念奴娇》题壁，已经流露出了去意：

> 西山金翠，望佳气惟有，黯然余照。望远登高凭极目，一片暮云平草。指点斜阳，断肠流水，默默垂杨道。群飞高处，看它无数啼鸟。　　遥想当日燕王，千金市骨，往事堪凭吊。世事空知学醉歌，日与屠儿相笑。却忆江南，春风辞树，花落莺声老。暮烟横日，何时天际归棹？

夏寿田高中榜眼，春风得意，同样的景致进入眼里，引发的却是别样的心情：万顷孤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

这座江亭，杨度和夏寿田还将数次登临。每一次来，他们都会题下诗句。最晚一次是在1907年，此时杨度已署四品京堂衔供职于“宪政编查馆”，昔年的榜眼夏寿田则混在北京意气全无。那一次杨度的题壁是：“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

更好”，夏的题壁是：“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多年后，已成为佛教徒的杨度（他给自己取名叫虎禅师、虎头陀、释虎）在一篇谈论佛学的文章里由这事很发了一通感慨：“盖人生哀乐，全由心境，境既生心，心复生境，于境若有爱憎，于心即有哀乐，实则哀即是乐，乐即是哀，境即是心，心即是境。”此是后话，不提。

四月二十三日，史家向来把这一日视作百日维新运动的第一日，这天，光绪皇帝明发上谕，诏定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才。几日后，向被视作帝党人物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开缺回籍。有人说是太后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有传说是皇帝早就不看好此老儿了。政坛波谲云诡，就像这一日的天气，早上好好地还出着太阳，到了晚上就大雨瓢泼，杨度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作出了如下反应：“今日，康长素召见，自此有亡国之臣矣，翁常熟骤出军机，未知上意。王育桐先行革职，交刑部审讯……夜，大雨。”

政局面临着重新洗牌，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平衡已被打破，虽还密云不雨，说不定惊雷就在哪个时辰炸响了，其时的北京城，情状就像一个叫刘鹗的小说家在一本不无传奇色彩的漫游记中提到的一个隐喻：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得越来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诘诡。

杨度似乎闻出了空气中危险的气息，于四月三十日清晨悄然离京。为帝王师的雄心与困于场屋的窘迫让他感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只是他当时不会想到，三个月后，帝国的心脏将要刮起一场风暴，最终让所有的权力归于一个可怕的女人。他更不会想到，五年后，他东瀛归来，还要来京城参加一场“经济特科”考试，并在那个女人间隙性发作的疑心病的驱迫下为避祸再次远走日本。

眼下，这个年轻人是坐在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车窗外飞驰过河流、村庄与树木，为了解闷，他在车上开始读一本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本数度引起政坛和学术界争议的书他极欲一看，却一直苦于挤不出时间。车上无聊，正好解闷。书尚未完篇他就合上了，他再也看不下去。忍不住失望，他对康有为作了这一评语：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

到塘沽后，杨度把行李装上新裕轮船。几天后的一个午后，船驶出大沽口。傍晚海上起了大雾，白茫茫一片，船只好慢腾腾地走。到了晚上，水黑如漆，也不知行到了哪里，回到舱里，睡睡醒醒，醒醒睡睡，一会儿梦到湖南老家，一会儿梦到

京城,一夜无眠。

四　汉水之旅

五月八日清晨的一场细雨中,船抵上海。杨度掐指一算,距上次离沪,已三月有余。可惜此次不能久作勾留,不然那些书寓、堂子什么的还是要逛上一逛的。抓紧时间晚上去天仙园听了一场戏,归来夜已过半。九日早晨起床后,趁着微雨又到杏花楼独酌。饮罢,换上江孚轮,于三更开行。轮船时有停泊,他也不上岸,只佝着头读洪升的《长生殿》。十一日早晨,船从南京溯长江而上,一日里过芜湖、安庆,十二日过九江时,他手上的读物已换作了孔尚任的《桃花扇》。

十三日,船泊汉口,杨度入住义生客栈。终于好好洗了个澡,一路劳顿和烦闷的心情一扫而空。傍晚去英租界散步,一轮圆了大半的月亮映在江心,河水在道旁轻轻地呜咽。回到客栈,有许多兵在这里聚赌,还有卖春的女子花蝴蝶般穿梭其间,不时爆出一阵阵欢呼声,搞得杨度一宿未眠,天色将晓才闭上眼。隔一日,渡过汉江去看望病中的四妹,看她那模样杨度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怕这是兄妹的最后一面了,却只能强笑着安慰。逗留大半日,天色将暮才回客栈。此时杨度作出了一个决定,暂不回湘潭老家,而转去南阳,探视多年不见的伯父。

杨度的祖父杨礼堂,曾跟随曾国藩属下李忠武参与对太平军作战,战死后,由长子杨瑞生荫袭军职,此时已升任总兵一职,镇守在归德、南阳一带。杨瑞生下面有二弟、三弟,均早夭,杨度的父亲杨懿生为四弟。杨度的父亲因嗜酒吐血而亡时,杨度才六岁,伯父杨瑞生把他抚养成人,可说情逾父子。以《水经注》为旅行指南,踏访古迹,乘兴遨游汉水,想想就够激动人心的了,杨度当下主意已定,雇舟直奔南阳。

十六日傍晚,杨度带二仆随行登舟,水气风光,令人意爽,过行十余里即泊。十七日,是个大晴天,南风大作,把船帆吹得鼓鼓的,轻轻松松行了六十里,过乌林峰,泊于新沟。十八日,初伏第一天,出门那么多天了,杨度第一次有了客游之感。自云富贵非所好,军国大事又不是我辈可以筹划,我自玩我的芳草,却还是让一阵无名的惆怅堵得心慌。这一日舟行六十里,夜泊汉川县。

十九日,又行六十里,泊神隍港。二十日,天未亮就挂帆起行,这一日行了将

近百里，泊萧家口。连日南风，船行甚速，都没有机会上岸踏访。等到过了仙桃镇，因上游下过大雨，河面突然上涨许多，傍晚登上高堤，放眼看去都是莽莽苍苍的水。风比白天稍小了些，天边隐隐的雷声却越来越近，梦枕惊眠，一晚上都没睡好。二十二日，舟行六十里，泊彭水河市。二十三日，因汉水上涨，水流湍急，再加河道本就曲折，只行五十里天就黑了。孤舟独棹，"月昏水阔，莫辨西东"，而水声越来越响。有一段遇到了溃堤，奔流侧冲，船都坐不稳，勉强行了数里，泊在樟子港对岸。

二十四日，夕泊泽口。二十五日，行六十里，泊赌博湾。二十六日，晨过沙阳，河面更加宽阔，两岸堤上，遍植护堤的杨柳杂树，绿荫垂水，接枝连叶，"川风时来，如醉如舞"。此去直向北行百八十里，草青沙白，水净霞明，不复以前的水道纡曲苦于风浪。二十七日，晚泊转头湾。二十八日，舟行一百七十里，傍晚时分过鹿门山，"山枕汉水，日暮望之，更觉苍秀"。再行十里，宿刘家集。二十九日，晨过鱼梁洲，中午至襄阳，整日南风，至夜不息。三十日，荡小舟入山，拾级访一小寺，杨度记述了寺门外的一株紫金花，称它"娟娟红媚"。

六月四日中午，船至南阳南门外，已有人飞驰入署告知总兵大人。外门诸马弁迎见，内门又有两位堂弟候着。杨度见过伯父、伯母，拜过祖庙，又与各位长辈相见。这天惟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就在他走出内院与总兵府的诸位师爷相见时，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闪避不及，把他浑身淋了个透湿。

在大伯的官署里，杨度得知俄国强占旅顺大连、驱逐商民的消息。其实他应该记得，就在这年三月他到北京参加会试时，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廷与俄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允建南满铁路，此事还引得梁启超、麦孟华等人上书都察院力争。身处江湖，离庙堂日远，还是少操那闲心吧，国事不可为，此处山林还是堪可一看。刚到的几日，约了两位堂弟和总兵府的诸位师爷去游城外的玄妙观，又去浣香亭观荷，虽然暑气逼人，看远山层层叠叠，倒也令人意远。隔了几日，又游竹坞，那儿地较清幽，少有人至，喝过了道人用荷瓣煮的茶，俗人也会觉得自己雅到了骨头里去。没成想傍晚回署，就接到汉阳那边电报，说四妹病死了，杨度眼前顿时浮现出病中的妹妹那张黄腊腊的脸，叹息一句：活得无味，死得可怜。

整个六月都是坏天气，非阴即雨。雨中作客，尽可优游度日，但外面的世界却

颇不太平。一日，杨度从电报得知上海四明公所事件，法国人欲把四明公所的义冢圈为租界，激起宁波商帮罢市抗议，粤商也随之附和，捣毁法国巡捕房，酿成血案。又有某地闹教案、某地兵乱这些恼人的消息。惟一的好消息是从两个师爷处得知了以后朝廷取士将不试八股改试策论，对八股这一文体的极端厌恶使杨度完全有理由为此浮一大白，但今科报罢，谁说这不是一个迟到的好消息呢。

六月尚可一记的事还有：八日，玄妙观姚道人请喝酒，与刘、林两师爷和二弟同去。十六日，出城西行八里，与刘、彭两师爷游武候祠。祠旁有个古柏亭，亭中有块石碑，上面的字刻着这里是诸葛亮躬耕处，这颇让杨度疑惑了一阵，因为印象中，隆中在襄阳城西，怎么会在这里。但此地"山水重沓，漠色隐秀"，再加道人招待他们的酒清洌可口，疑虑也就扔到了脑后，大丈夫处世，何必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些鸡毛蒜皮上呢。十八日，又约了署中两位师父，出城十余里，去一个天主教堂拜访一个叫安满西的主教，这是一个意大利人，来东方多年，中国话讲得很地道。在教堂里看了各种西洋珍玩，还喝了美利坚酒，"香润异常"，少饮即醉，乘车而归。

此时的北京城，正经受着一年里最火辣的阳光炙烤，骄阳照射着这座帝都大小胡同的老槐树梢，让这些苍老的树叶仿佛镀上了金粉，闪闪发光。在杨度的视域之外，这城市里显然充斥着某种悄悄的激动。紫禁城通往西郊颐和园的御道上，传递急件的马匹和朝廷的命官显贵穿梭往来。公文和奏折不断地被制作，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明明暗暗地进行着较量。

这一切，一个放浪山水的自在客怎么会得知呢？现在，风雅是他的事业，游手好闲与喝酒乃是他每日的功课。这不，游毕城西景致，又由师爷陪着，出游东门外，访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墓。期间所做一件大大的风雅事，乃是在医圣祠憩息时，看到荷花皆重胎，茂密可玩，即取其叶为杯，饮酒欲醉。七夕之夜（因这年三月闰，此时应已是八月的季候），听秋风飒然，看明月入牖，不免会有诗人之逸兴，"卧看牵牛，绵绵思远，蓬山万重，不独盈盈一水矣"。城东城西都看了，又步出南门，复循女墙步至北门，去"山色如屏、耸奇竞秀"的伏牛山望气。

好在还有伯父署中的电报可看，知道外面的世界行进到了哪一步，不然真要成个聋子瞎子了。但是，那些不断下发的上谕、电旨和消息，也难让人有大的振作。某日阅电旨，道府著令专摺奏事，布衣皆可上书。杨度想到康有为四次上书，

算是敢言的了，朝廷确实也承认他有才能，结果又如何呢，却让他去上海办《时务报》，还说这是委以重任，所以杨度打定主意不上书。又一日，电报消息是英吉利四艘军舰泊于大沽口，说是俄国将不利于中国，“故为保护”，英国、日本、俄国，说穿了“其所争皆在中国”。连绵的雨日，以弈棋打发之，却想到国事真同棋事一般。

转眼到了中秋，杨度和伯父一家办过祭祀，拜贺过长辈，午宴方散，签押房送来一封电报，伯父看后，脸色大变。电文说的是皇太后已于八日垂帘训政，康有为等则被严旨捉拿。伯父叫来师爷商议，一干人听后也是呆若木鸡。杨度对康向无好感，这时却心生感佩，暗暗赞叹，直言获罪，荣哉长素矣。

因伯父要上省城开封办事，杨度欲往梁园一游，便与署中师爷王曙村先行。两人渡醴水、登首山、涉颍水、过朱仙镇，这一路水陆兼程共计走了八九日。在开封城外明道书院，和朋友们喝酒时杨度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皇帝剪发之说，四十宫禁看守之说，还有传说康广仁、杨深秀、林旭、谭嗣同、杨锐等六人已被砍了脑袋，徐致靖永远监禁，并革其子徐仁铸，张荫桓发往军台，陈宝箴并三子永不叙用。先前发出的政令悉被取消，“复冗员，闭言路，复时文”，杨度感慨：“又不如新政矣，波澜反覆，是非皆无可言。”

京中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各国有部队入驻北京；宫中时有刺客；洋人干预宫政；皇帝囚于瀛台；董福祥兵环卫于外；从西直门一直延伸到颐和园的御道两旁的槐树开始枯凋；昆明湖湖水变得浓稠……又有客自京城来，详述政变经过：王照怀密诏令袁以兵三千围颐和园，荣禄告密，太后初六黎明入宫，遂有八日垂帘之诏，但后来杨度又听说是袁世凯抵京后，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告于庆王，事遂败。他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真的，但不管怎样，变法失败、权力结构变化已是不易的事实。他把责任归之于康有为，“总之，长素之愚也”，又为康得脱而庆幸，“夫驱爵驱鱼，自此不能为中国惜人才矣”，然后又来一番自责，“余在京时，屡欲教以谁与易之之道，未果，长素竟败，是余之过也”。把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最后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去，让人觉得这个人也太过自恋了些。

在开封呆了十来天，每日也都安排得满满的：听戏，食蟹，遍寻书肆，购买碑帖，游艮岳遗址，游相国寺和建于北齐的鼓楼，陪同伯父登吹台等等。还经常参加些宴会，宾客踵至，有文官，也有武职，和以往不同的是，“论时事者颇多”。到了九月十一日，杨度陪伯父于大风中出城，踏上归途。这一日于沙暴中赶路，登车行四

十五里，车辚马萧，颇以为苦，天色未暗到达朱仙镇，即行入住。十二日，平明行车，夜宿洧川县城书院。十三日，行七十里，宿许州。十四日，宿襄城。十五日，宿叶县旧城。十六日，夜宿裕州。十七日，疾驰一百二十里至南阳城，黄昏入署，杨度接读一封家书，说是老师王湘绮可能快要出山了。“将为名乎？将为实乎？若如度者，必不出矣”，看样子老师真的熬不住了。

五　不如归去

时近十月，北风一日日紧了，出门大半年，杨度已生倦游之感。行前，伯父对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迂拘墨守之士不足以任事，康梁虽有小才，未闻大道，适足杀身，实在不是办大事情的料子。大才无不谨慎，可是你一议论起来多激切率直之言，这实在是很不合时宜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隐居求志吗？身都要隐了，还用得着言论吗？

杨度答：国家将有兵事，未敢言归，等我老了再谈归隐吧。

十月八日，杨度辞行出署踏上归程。未行二十里，伯父遣一个信使追至，说是刚刚收到电报，天津有洋兵登岸入京，“荣禄请练中军，以主董、袁、聂、宋四军”。这一消息更加剧了杨度的乱世之感。这一日，疾驰六十里至瓦店打尖。九日，正逢枯水期，前面的河道水不盈尺，淤浅难行，撑杠竟日只行二十里，泊光渡集。十日，行三十里，泊曹庄，此去新野十里。十二日，行一百七十里，欲至龙坑，三更搁浅于支津，“水寒沙浅，舟人甚苦”，只好停泊。十三日暮，至董家湾，放舟入汉水，“烟水甚阔”。船是双橹，行速飞快，至鹿门山下泊，“晚风沙落木，夜雨火明滩”。十四日，南风顺橹，行百四十里，泊浑落河。十五日，南风更大，四更至沙阳。十六日，水道在这里转过一个大湾折向东行，刮的又是东风，只好稍作停泊，风向转后再行，月夜行船，一夜未泊，舟中填词一阕《祝英台近》，中有“不如归去”句，可想见其急切心情。十七日，过三条镇、汉川县，三更至蔡店。十八日，傍晚至夏口，二更起，“视皎月当空，雁声远去，为之凄然”。十九日，以行李置舟中，登岸，宿回龙寺义生栈中。拜客，谈及时局，和开封时听说的差不多。

二十日，杨度晨起渡江，从武昌北门而入，至书局，出饮于茶肆。登黄鹄矶（**古黄鹤楼遗址**），昔人已去，楼亦不存，在这木落风寒的归家途中登临，自然不可无

诗，却还是“此时风景不胜叹”。这一天，杨度还步出西门，闻名遐迩的织布局就在此间，他想去看看，却不得其门而入，归来道旁见守军炮队在演习，如同儿戏，不由哑然发笑。傍晚时分，渡江登龟山，望江汉形势，一时胸怀激烈。

在武汉逗留的几日，除了读信写信，杨度还频频出入书肆，购置了不下数十种洋务书籍。原计划二十八日登舟动身，却不料这一天早晨天色大变，阴云时起，担心有大风，船仍泊龟山下。这一夜，他在船中看到了数里外汉阳城中的一场大火，火烧了好半天才止歇，红遍南天。回舱才睡处，又被船篷上的雨声惊醒。

十月二十九日，天色放晴，放舟出汉入江，出发时还无风，过了黄鹄山，突然北风大作，舟破浪而行，半日也行不得几里。入夜风声更大，“卧听江声，有如百万甲马，令人悲壮”。十一月一日，缆行过小军山、鸡翅山、大军山，激流行驶，正可系舟登岸，带了一名仆人入游大军山。满山大石，苔花青碧，虽然没有林涧之美，这满山的佳石也差堪一看。至高处，纵目千里，四面空阔，西望夏口城廓，依稀在烟雾中，南望洞庭以南诸山，则云气岚光，青葱一色。江流绕山，远看所来的那河，却如一匹白练从天空倒挂下来。二日，过赤壁山、聂洲，泊邓家口。三日，过龙穴洲，日暮风息，泊于沙阳洲。四日，南风，过金梁洲、扬子洲，“雨夕孤泊，绝无人烟”。五日，终日南风，停泊一日，闲步洲上。六日，缆行十五里，至宝塔洲。七日，过陆圻口，泊于新堤，堤内即是鱼市，傍晚入市步游，看弦月映堤。八日，趁着北风过乌林、鸭栏矶、鼓城矶、隐矶、黄金濑、晖落矶，入湘江。至岳阳楼下稍作停泊，沿途惟见霜寒翠冷，无水光之掩映。到了夜半，风声益厉。九日，过汨罗戍、望屯浦、铜官山，晚泊山下，彤云密布，天如欲雪，卧闻船篷上切切嚓嚓的声音，又繁又密，也不知是雨声还是雪粒子。

六　雪落潇湘

十一月十日，晨过桔洲，已远远望见长沙城廓。中午时分船至湘潭城。屈指算来，这一程从南阳归家，已走了一个月的水路。登岸后，杨度在城中稍坐片刻，雇了一顶轿子直朝石塘赶，到得家中正是掌灯时分。离家还是正月，归来已是岁暮，这即将过去的 1898 年，就像一个白痴画的不太圆的圈，他又回到了初始的地方。

熟悉的生活又把他包围了。大哥为买田置宅的事和人家起了官司需要打点，久未见面的亲友要去拜会，一大堆书信等着答复。所幸母亲无恙，儿子已牙牙学语，叔母虽然病得厉害，将息几日也大有起色。到家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从烦心的琐事中脱身而出，他也有心思戏作一绝了：夜半檐声入绮帷，风花吹散影霏霏，梦中欲觅衡山路，雪落潇湘何时归。

想想诗词歌赋毕竟不是正业，怎可“丧志”，于是说出这样的话来：“十年作赋，何如十日通经。”

过不了几天就是王闿运的生日。为了给老师祝寿，杨度和一帮同学溯涟水十余里赶到王家，寿宴散后他还盘桓了五六日。某一晚，想到十三四岁时，第一次来王家，王闿运目之为神童，忽忽十年已过，自己还像一朵云般飘来飘去，真是难过得要流下泪来。未来又将如何呢？与老师谈十年后世变，那样激切的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再思忖也是不可思议。王闿运评点几个得意弟子，一个不能安贫，一个有近名之心，指着杨度笑，你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隐居呢。

归途中，与同学登舟坐谈时变，狂态复萌——“几于击棹中流矣”。

吃过腊八粥，又复送灶神，乡间过年的气息已越来越浓。有朋友想成立一诗社，让他做社长，他说诗人不可多求，立社徒标声华，推辞了。没成想在这期间，杨度忽然害了一场眼病，严重时甚至到了不能开视的地步，书也不能读了，只好默诵，所幸几天后竟好了。一日去花园散步，看到梅花大开，想想到家才没多久，就搞得一点闲情也没有，这日子真是无趣得紧。

转眼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论公历已是1899年2月9日，但还算是戊戌年。想想这一年所经行的长沙、武汉、上海、北京、南阳、开封等地，杨度觉得自己真像一朵没有定向的云，飘来荡去，莫知西东。“人生几何，而修名未立，当此岁暮，离忧生焉。”人还未到中年，他却已深尝浮生之哀乐。旧年就要翻过，明天太阳升起会带来新的气象吗？杨度已不敢抱什么希望，他这样安排一年里的最后几个时辰：

> 夜，祀灶毕，早睡，奴婢亦早息，无守岁者。

窗外是沉沉的夜，积雪未融，愈添寒气。在这个没有守岁人的夜晚，当黑暗从

抱琴看鹤去

枕石待云归

杨度手迹

窗口进来把他吞没,他会做梦吗?他在梦里会透不过气来吗?

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就要过去,一切应当腐烂的东西都烂到了极限,仿佛悬挂在树梢的那些风干的果子,微风一吹就会跌落尘埃,而一切新生的事物,则在天边隐雷的鼓动下,正悄悄地爆裂开坚硬的冻土。

附记:有关《杨度日记》

本文有关杨度在1898年的行踪,出自《杨度日记:1896—1900》。这本日记记述了青年杨度波澜不惊地蛰居乡间的生活琐事,用周振鹤先生的话说是"一部流水账",逐日记去,连吵架之类的事也绝不遗漏(本书缺憾之处是标点错得太多)。由于是日记的体例,杨度的叙述或详或简,但在人和事的演绎中——尤其是在关键性的1898年,还是可以看出一个普通的乡村知识分子如何想象他与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种关系的处理,正是近世知识人真正步入现代社会的起点。

在浓墨重彩、热闹非凡的历史大框架、大趋势的叙说中,作为个体的声音如何呈现?这一呈现有什么意义?《杨度日记》的点校者杨念群先生引入了"历史的现场"这一概念,对理解本文主人公不无裨益,兹引述如下:

> (历史的现场)就是那种特别逼近个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网络关系和历史氛围,它们往往由特别具有个人经验的具体细节构成,好像如涓涓细流淌出的一种疏缓有序、波澜不惊的节奏,属于相当鲜活细腻的动态现象。哪怕是一段乡绅瞬间即逝表露的心态,一宗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琐事,一件乡间司空见惯的民事纠纷,都值得我们去细心体味,因为其中每个细节都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原先设想的历史剧情主线的设置。

人物档案

杨度(1874—1931),近代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字皙子,长沙府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参与创办《游学译编》,曾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1904年联络湘、

鄂、粤三省留日学生，开展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1907年为长沙华昌炼锑公司筹措资金十六万两。同年主编《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发起成立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黎元洪出任总统时，于1916年7月16日发布大总统令，通缉杨度等人。1918年3月，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杨度恢复自由。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杨度集》行世。

与中国巨人赛跑
——严复与近代中国

一　一个海军军官的人生初年

1866年初夏，福州的一个乡村医生在一场霍乱中死去，随之改变了一个十四岁少年一生的命运。

料理毕父亲的丧事，少年一家从父亲医馆所在的台南苍霞洲回到了侯官祖居。叔父们把正屋外原先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交给他们居住。日食艰难，只好靠少年的母亲和他新婚的妻子揽些绣花、缝纫的活计为生。不忍面对母亲焦黄而无助的脸，少年常常一大早就出门，借口去托亲友找事做，可一个穷困之家，亲友们避之惟恐不及，有谁古道热肠施以援手？游荡大半天，肚子饿了，少年就从口袋中摸出带着体温的一文小钱，在路边的小摊换得三条小咸鱼，权作果腹。回家晚了，怕荒废学业，复又挑灯读书，夜尽更残，母亲压抑着的啜泣声穿过薄薄的板壁传来，在黑黑的屋子里盘旋着，在他耳中真如裂帛一般。多年以后，在写给朋友的一幅题图诗中，严复回忆了父亲去世后母亲劬劳、家境贫寒、饱经世态炎凉的境况：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
……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
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人世的寡情，在人生的初年已把这个人伤害。他的敏感，他的颖悟，他的优柔与固执，决定他以后命途的因素之一的种种性情，也都已在此间种下。

在同治年间的中国沿海城市，如果你爱一个年轻人，就让他去学洋务；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去学洋务。洋务人材之亟需，已为郭嵩焘这般具有世界眼光的第一代外交家所意识到；洋务之可鄙，在于咸同年间的官场普遍视之为与科考仕进迥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对严复这样一个因父亲的突然去世而陷入家庭困境的少年书生来说，科考之路既已失去台阶，去学洋务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1867年初春，当少年严复跨进"洋务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的大门，他的寡母的脸上想必是挂着无奈的泪水，而严复自己呢，倒觉得就像一只船驶离破旧的船坞，眼前将会是神秘、崭新的一方天地。撇开远的不说，船政学堂优厚的月廪对他也不无诱惑：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全免，且每月可领到四两纹银养家。

近代海防史上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于本文开始的时间同治五年(1866)。这年五月，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因见福建沿海一带水深土实，形势利便，遂向朝廷奏请在福州马江一带创办福州船政局。这一建立海上防卫力量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总理衙门和皇帝的支持。几个月后，左被任命为陕甘总督离开福州，因为从朝廷的观点看来，左往西北平息回民叛乱的任务极端迫切。或许朝廷并不十分理解左宗棠的意图和海军造船厂计划的重要性，但还是接受了左推荐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担任海军新建设的首脑人物。从左的政治考虑来看，他在福州的这一改革和建设方案也亟需一个忠实的实施者。沈葆桢作为一个中过进士的干练的省级官员，他公认的行政能力、良好的道德声誉以及当地士绅集团的支持，使左宗棠无论从个人还是政治的角度看他，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左保举沈葆桢领导福州船厂，还有一层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沈是在道咸年间政坛上饶有清望的林则徐的女婿，而他的岳父大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是制造轮船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了，还有谁能更好地承担这一家族的使命？

作为同治中兴实权人物的左宗棠，是林则徐的忠实崇拜者。最初，他正是从道咸年间的知识分子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务实经世著作中获得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并形成了他的爱国主义信念。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左宗棠式的爱国主义无疑是充满着战斗和竞争的精神。熟读魏源的《海国图志》的左宗棠明白，这本书事

实上已为尚在蓝图中的海军船厂指明了性质和方向：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技艺，雇用他们的工匠和海员以教导中国人，发展近代海军，这样才有能力在海洋上对付敌人，所以左宗棠的本意并不是只创办一个制造舰船的近代化工业企业，他希望能够培养出自己的驾驶和造船人才。沈葆桢完全承袭了左的这一理念。他重申"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学习技艺固然重要，而技艺背后的原理才是核心。因此，船政局创办之初就开设了"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学"，福州船政学堂就是由"求是堂艺局"更名而来。

次年二月，船政学堂的马尾校址还没落成，学校就借福州城南的一座庙宇以一种简陋的方式开学了。同学中，有不少是像严复一样的出身贫寒者。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丰厚的津贴吸引而来，其中就有林则徐的一个父母双亡的孙子林泰曾。从以后的人生履历来看，船政学堂的五年对严复来说至关重要，他在这里接受了完全西方化的专业训练，以最优等卒业后，又多次下军舰巡历中国近海、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长崎、横滨等口岸。更重要的是，对他深为赏识的沈葆桢及后来的继任者把他作为海军官学生派遣出洋，曾入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

对于这所在几年后的中法战争中被彻底摧毁的海军学校，严复一直念念不忘。到了晚年，他还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回忆十五岁那年船政学堂开学时读书声与寺庙的梵呗相答和的情境，并为半个世纪后同学凋零不无伤怀："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

二　总教习的苦恼与屈辱

通行的严复传记（王栻《严复传》、郭良玉《严复评传》和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几乎都以夸张的笔墨记述了1879年严复回国途中遭遇的一次险境：由于大风打坏了船，时刻会有倾覆的危险，严复和几个年轻人跳入大海游到一个小岛，在野兽的环视中度过了一个惊恐不安的夜晚，后来鸣枪示警，终为途经船只所救。这荒岛余生式的传奇一节或许出自严复归国向朋友和同事的口述，但为何同时回国的林泰曾、刘步蟾都没有提到此事呢？考辨此事不是本文的任务，而这一幕也未始不可以视作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命途多蹇的一个征兆。

首先是他的同乡、对他极为赏识的前船政大臣沈葆桢在这一年去世了。

应现任船政大臣吴赞臣之聘，曾是福州船政学堂驾驶学堂第一届优秀毕业生的严复回母校担任教习。期间，朋友陈宝琛将他推荐于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佩纶，张又荐之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80 年 4 月的一个夜晚，张佩纶与李鸿章的一席对话，促成了严复于是年春天北上天津，出任甫始成立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一职。"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张佩纶如此推崇这个来自福建沿海的年轻人，想必使李鸿章与严复未曾谋面就对之留下了深刻印象。老母和妻儿还留在福州侯官，他只身北上，住进天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字号后的寓所。在这座北方城市，他将一住二十年，直至 1900 年义和团的炮火击毁水师学堂，他才正式脱离海军。那时的他，于一次次的跌宕起落之后，"年鬓亦垂垂老矣"。而长年奔波在外不能尽人子之孝，又使得妻子因过度劳累中年弃世，更是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恨恨不已。

但因官阶太低，又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从一开始就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负责人的严复，只得充任类似今日大学教务长角色的"总教习"一职。这对一个抱着政治热望的年轻人来说自然是不会满足的。看到国人沉沦不醒，而留学英国时的日本同学回国后一个个都得到了重用，不几年日本就吞没琉球，他既悲且忿，常常这样对人说，要不了三十年，藩属一个个都消亡了，中国就要像一头老牛一样任人宰割了！这般激烈的言辞，且不顾场合口无遮拦，连李鸿章听了都直皱眉头。关键人物李鸿章的由亲而疏，使他在北洋一直徘徊于局外人的角色。

出于改变这一尴尬现状的动机，大概是从 1885 年开始，连续八九年间，严复参加了四次乡试，以博取一个举人的功名，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每次都铩羽而归。一个经受了近代西方文化洗礼而自负的年轻人，转而向他一向鄙弃的八股制艺去找出路，这一事件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屈辱！

1885 年秋，已是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回福建老家参加第一次乡试。这一年他三十三岁。据他的儿子严璩后来分析，他之所以作出这一令人吃惊的举动，究其心态，是深感国人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而在一向视科举为仕进正途的官场，自己不是甲第出身，职微言轻，说出来的话没人听，听了也没人信，所以想考个科名，增加一点说话的分量，而一旦掌握了话语权，也好让知识界的风气稍作转移。

一试不中，再接再厉，下一次秋闱，就近赴北京应顺天府参加考试，还是不中。接连的失败或许会让人以为这个留洋学生的母语变得生疏了，但从他后来充满了古雅的形式美感的译笔来看，事情并非如此，或许这只能解释为他走进试场后没有完全遵守八股文体那种古怪的形式主义格式。

来年春，赴京再应顺天府恩科乡试，还是名落孙山。就在这一年，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由“总教习”升为了“会办”（校长），同时海军报案免选“同知”，以从四品的“知府”选用，用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出身”问题。但是，他还是那样郁郁寡欢。这一则是他在海军的地位虽有上升，但因不是李鸿章心腹，说是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二则是他在北京参加顺天府恩科乡试时，他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了。科试在即，他没有赶得上为母亲送终，而更揪心的消息是，他的结发妻子王氏在办完老太太的丧事后，也突然病倒了。

到了 1893 年，为了功名严复再次南下福建参加秋试。少年子弟江湖老！这一年他四十一岁了。为了一雪前耻，这一回他志在必得。回乡正是龙眼成熟的季节，数千亩桔柚林放眼望去一片碧绿。母丧妻亡（王氏已于去年 6 月去世），祖居已人事全非。怕他触景伤情，途经上海时结伴返乡的朋友叶大庄让他住到自己的玉屏山馆，好安心准备入试功课。但新人的亡灵和故乡的风水并没有庇护他，几乎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严复还是落第了。牢骚满腹的他如是感慨：“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大意是说，我都四十岁了，至今还是个穷教书的，没有混上个一官半职，我的志向有谁能懂呢?

屈服于考试怪兽的压力，四次秋闱，四次落第，这被严复视作了一生中洗刷不去的耻辱。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相反地，他把这些年来的个人痛苦全都倾泻到了对考试制度的异常激烈的抨击之中，成了这一制度不遗余力的攻击者。开始或许还是温和的：“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赘币而已。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及至在 1895 年发表的《救亡决论》、《原强》等篇中，专门探讨起了八股经义对当下中国的危害：锢智能、坏心术，并滋生一大批游手好闲之徒。他这般预言，中国不变法就会亡国，而变法的第一步，就是要废除八股。“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此前一年，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湖南老家去世的消息，给严复本就死灰般的心境更添了一缕阴郁。归国后的郭为当朝守旧的大佬所忌，也为清流所讥，可说是郁郁而终。严复与郭相识于留学英国时，郭对他极为欣赏，两人不管在年龄和地位上相差多么悬殊，却经常在一起"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在郭的出使日记中随处可见请严复和他的同学们"小酌"、"晚酌"的记载，郭卸任公使回国后他们未再见面，却还时有通信。

接闻噩耗，严复的眼前浮现出了他第一次见郭的情景，那是 1878 年 2 月 2 日，按中国的历法是农历正月初一，他和海军大学的几位留学同学方伯谦、萨镇冰等一道，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从伦敦近郊的格林尼茨大学来到坡兰坊 45 号中国使馆拜年。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详细询问了来英后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和他们尽兴欢谈。后来，郭又多次单独邀他前往公使馆长谈，告诉他要珍惜才华，切忌"气性太涉狂易"以至一事无成……出于对郭的知遇之感，更是悲哀于自己回国以来的种种不如意，他写下了一副著名的挽联：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氃氋，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据钟叔河先生解析，上联用《世说新语》里的"羊公鹤"典，羊叔子名祜，是经纬文武、位极宰辅的晋初名臣，这一联是说，你好像羊叔子，我就好像羊叔子养的鹤，你向客人称赞我会舞，可是别人要看我舞时，羽毛零落的我却舞不起来，辜负了你的赞赏，只有深深的惭愧；下联用《楚辞》里的句意，说屈原于众人皆醉时独能清醒，因而遭众人嫉妒，所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谣诼虽非事实，却使人无可奈何，只能靠牢骚排遣，古今同慨，难道岂只是一个屈原吗？

是啊，这一杯独醒的苦酒，岂只郭嵩焘一人品尝到了？

一次次鼓起勇气走进考场，一次次承受榜上无名的屈辱，再加家里不太平，母亲与妻子相继去世，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几年里，严复的心情自然不爽。究其性格上的原因，据同乡兼朋友陈宝琛的分析，一是他过于自负，牢骚太盛，二是他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过于激烈的政治情绪驱使下的放胆言论，使得李鸿章对他器重归器重，却始终不敢放手用他。作为朋友，陈宝琛也只能对他作"尚望

俯纳刍荛，珍重自爱"云云的劝慰之语。

让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一时期，这个曾经留学英伦的新派人物竟然染上了鸦片瘾！在一封家书里，他说自己抽鸦片的事中堂大人也知道了，李中堂这样对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感激归感激，还是没有下决心戒去。这种沉溺究竟是基于国家的困境还是个人事业坎坷的郁闷情绪的反应，抑或是他私生活的其他方面或个性的反应，我们将永不得知。本杰明·史华兹说，在某种意义上，吸鸦片反映了严复思想观念中最隐秘和最难以捉摸的情调。这一难以启齿的癖好，在十余年后他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际将成为政敌们揪在手中对他进行道德攻伐的一根小辫子，迫使他在上任九个月后不得不仓皇去职（他自辨是因为课程设置方面的冲突才辞职的）。

三　著述以醒世

这就是严复在归国后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十余年里的惨淡经历。一个技术专家，一个水师学堂校长，一个吸鸦片者，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一个好作耸人之论的口头时事评论家，一个用功而又总是运气不好的老童生（更有甚者披露说他那个监生的资格还是回福建老家花钱捐的），出现在众人眼里的严复就是这样一个由众多侧面交织而成的古怪形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谁发现这个人的身上竟然潜伏着一个天才思想家的禀赋。正是这场战争，搬开了压制他公开表达燃烧着的信念的最后障碍。他终于能说话了。他全部压抑着的思想终于有了一个通道倾泻而出。

1894 年那场于近代中国命运攸关的中日战争，严复和国人一同体验了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相继失守，海军倾覆直至马关和议，割地赔款，国势日危的种种惊愕、忧虑和愤懑，而作为北洋海军军官摇篮水师学堂的总办，眼看着多年经营在海战中灰飞烟灭，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觉无地自容，更感耻辱。严复认为，甲午惨败正是因为平日学问之非，士大夫心术之坏。那些"不学无术"和"私心未净"的人是靠不住的，"所最可痛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京师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他指责上司李鸿章用人失察、"昏庸骄骞，丧心误国"，"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辞其责

也"。他把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归结到了朝廷用人之失,"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

甲午战败对近世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乃是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大受刺激"(儿子严璩这般描述乃父的心迹转变)的严复正是在战后开始了著述以醒世的工作,写下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为人传诵一时的文章,并以飞快的速度开始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把书名意译为《天演论》,不数月即脱稿)。这些文章先是在天津的《直报》(德国人汉纳根所办一家中文日报)发表,后来又移到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重新发表。此时的严复就像重回大地怀抱的安泰,浑身充满着抑止不住的力量,而报纸这一新兴的传媒机器也彰显甚至放大了一个思想家的力量。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写下这些文章是因为甲午后,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1895 年春在《直报》发表的《原强》与《原强续篇》中,他谈到中国危机的关键是人才和人的素质问题,中西社会的本质差异在于西方各国"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近代社会精神。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标本兼治,而这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说的"鼓民力"是要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使国人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尽管他自己是一个瘾君子);"开民智"就是要扭转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废除八股;而"新民德",则是用"自由"和"平等"的西方思想观念来改造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他比洋务派知识分子走得更远,注意到了中西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器物上的落后。

关于眼下身处的环境,他在这个时期写给一个堂弟的信中说,京津官场,自去年威海一战北洋水师覆灭,搞得人人似乎都憎嫌海军了,尤其是福建籍的海军,自己作为学堂总办,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他回顾来到天津卫的这么多年里,诸事虽无不佳,也无甚好处,虽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但因不是中堂大人心腹,一切公事都多有掣肘,不得自在施行。甲午刚刚战败,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官之不达乎"?他已经萌生退意。

在另一封写给四弟的信中,他说"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已有了舍北就南投湖

广总督张之洞之意。在他看来，颇具开明形象、与自己"颇有知己之言"的张之洞将是继李鸿章之后能够左右政局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张那里做事或许会有所建树。在不久前与陈宝琛讨论时事的一封信中，他曾对张之洞表示了十足的好感，称张"极足有为"，"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他希望陈宝琛致书张之洞，"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军火为先"，并托陈宝琛代为引荐。

当《辟韩》一文以"观我生室主人"的笔名在上海《时务报》重新连载时，谭嗣同一下猜到了此文是严复手笔，连呼"好极好极"。在这篇文章中，严复借对唐代文人韩愈《原道》的批评表达了对民主的赞同。韩愈把圣人的形象抬高到了超人的地步，而把民众描述成了一个个完全呆滞的无灵魂的肉体。在严复看来，正是这种对民众体力、智力和道德的严重低估和漠视，成了近代中国可悲地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让严复大出意外的是，他一厢情愿引以为"知己"的张之洞把他这篇文章视作了洪水猛兽，授意一个叫屠仁守的御史撰文批驳，也刊登在《时务报》上，指责严文"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严复在一封家书中懊恼地说，其实他已经猜测到了写批驳文章的人十有八九是张之洞本人。其实严复大可不必为此懊恼，张借屠御史之名在幕后实施攻讦，正好见出了人性与历史一样吊诡。作为十九世纪末晚期帝国最著名能吏之一的张之洞，与曾、李、左等其他中兴名臣以兵戎发迹不同的是，他是摇笔杆子出身，遇事敢为大言的风格和官场上善趋风势的本能，使他以"清流"得宠于朝野，一步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并树起了开明、新派的政治形象，同时他还是一个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严复单方面地引张为知己只能说明他对此公的两面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据说，张之洞还放出风来要找严复麻烦，严复恐罹不测，找了郑孝胥等人说情，才平息此事。

尽管不时遭受攻讦和作出辩驳是一个思想家的日常功课，但为了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严复还是约同几个朋友，在天津租界办起了维新运动时期与南方的《时务报》地位相埒的《国闻报》。这一时期，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严译名著"的问世（《天演论》也在翻译完成三年后的1898年出版了，一时风行海内），使得严复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日趋提高，"西学圣人"的名望已不可动摇。

1898年1月，恭亲王奕䜣奏请破格选举人材咨送总理衙门，严复也在被推选之列。可能是他这几年的闹腾已经上达天听，光绪皇帝在一大串名单里选中他决

定单独召见。得知消息，他匆忙赶往北京，住进了琉璃厂海王村的“通艺学堂”。在这里，他有一个侄子担任着常驻教员，这为他短期居留北京提供了极大方便。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九日，皇帝在紫禁城内的乾清宫召见了严复，行礼如仪后，他观察到，皇帝的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郁悒之色。天津《国闻报》在八月初四日刊登了皇帝召见严复的一则新闻，并部分刊出了君臣对谈的内容，考虑到《国闻报》与严复的关系，这节文字或许出于严复手笔也未可知：

光绪皇帝问道：“本年夏，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馆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

严复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于该馆登报耳。”

光绪皇帝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

严复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次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

光绪皇帝曰：“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

严复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疣。”

皇帝说：“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

严复对曰：“大意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

光绪皇帝微叹道：“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

据严复说，皇帝向他垂询的问题还有很多，召见的时间约三刻钟之久。结束召见后，严复回到琉璃厂海王村的“通艺学堂”，连夜找出年初时的登报稿本抓紧修缮，以备皇帝御览。但皇帝再也没有机会读到他的洋洋宏文了，就在他觐见后的一个星期，戊戌政变发生，皇帝成了被困在瀛台的囚徒，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维新派头子康、梁出京仓皇南逃。严复终于有点明白过来那天召见时皇帝脸上的一丝郁悒为何总拂之不去了。他的耳边好像又响起了那个年轻人的叹息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

政治清洗开始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大学士担心严复因与维新人士的交往受

到牵连——当然更担心牵连到自己，派一个亲信通知他离开北京回天津。严复秘密离开北京回天津的日子，正是六君子在菜市口开刀问斩的那一天。回首这半年来时局的变化，他在《戊戌八月感事》一诗中表达了按捺不住的愤怒：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在帝党与后党的这场权力血拼中，严复能避过杀身之祸，或许是因为在最终的最胜者眼里他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危害性的西潮思想鼓吹者，百日维新期间也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政治活动（据传当慈禧太后震怒时，他受到了荣禄的袒护，而《国闻报》众所周知的日方背景也给了他一张逃生符）。

事实上，这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从来没有进入过康有为集团的核心（尽管他与这个集团的个别成员如梁启超、林旭等曾颇为交好），他有着急切的政治情绪，却没有康、梁的激进，他甚至埋怨康、梁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快得超出了当下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就像一个奔跑的巨人，看起来雷厉风行，却是上半身和下半身脱节。所以即便是在维新变法实施期间，他也基本上是置身事外，固执地坚持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自己温和的改良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更具操作性。

但往事已矣，机遇已经错失，又能若何？多年以后他在致梁启超的一封信里说：民国成立也有数年了，而情况却比以前更坏，可叹啊！“今日吾等所能为者，除以文字报国外，他何敢言？”言下之意是，你梁启超“以笔端搅动社会”、笔墨宣传做做政治鼓动是可以，至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你还是不行。

他对康、梁的嫌恶至死都没有改变。民国成立后，他说，现在共和了，康、梁“翩然回国”，依然享有大名，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着舆论，海内外都奉康、梁为“导师”，在我看来则是“祸魁”！甚至说出这样偏激的话来，“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他的逻辑是，如果没有康、梁激进的变革，以致扰乱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光绪和慈禧之间就未必会生衅，西太后归了天，政权不就光绪皇帝一人独揽了吗？到时缓慢而有力地推进改革，那就是人民之福了。他还引用了

一首民谣——“种瓜南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可为，四摘抱蔓归”，说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窃愿其慎勿四摘耳”。如此刻薄的评价，与他平时说话行文的风格大相径庭，可见其内心鄙薄之深。

对康有为，他的指责是康即便不是有意误君，也是“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对梁启超，梁真的是如他自我标榜的那样，“以今之我难昨之我，今日为是，昨日为非”，一直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吗？在严复看来，那不过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狡辩而已。他甚至从文化地理学上去找病症，康、梁出生于南方的广东省，那里是沾染欧风最早之地，可是广东人向来是去过美国的多，去过欧洲的少，他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停留在十七八世纪的水平上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更要命的是，这些维新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除了一些装装门面的话，同样谬误百出，其实是缺乏真切的了解，也难怪他们“逢迎变化之随波”了。他冷眼旁观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总觉得这个人徒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又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对当下中国实在是破坏大于建设，而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人太爱作秀了，“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在他看来，正是梁氏这班以社会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太不甘于寂寞，太爱出风头了，才使近代中国一次次有着良好开端的革新试验不得善终。

四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接下来进入严复一生中至为黑暗的一个时期，所幸他在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位置还是保住了，这使他免遭流亡之苦。在戊戌政变带来的压抑气氛和失去言论自由的焦灼中，他在天津大狮胡同大甡字号后的寓所开始了穆勒《论自由》一书的翻译。从他后来的回忆性文字，我们可以得知这部书稿在义和团排外运动爆发前的 1899 年已经翻译完成了。

不久，形势迅疾变化，京津一带随着蜂拥而至的团民和八国联军的进入乱成了一锅粥，他供职二十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也在炮火中关闭了，严复被迫离开天津，南下上海。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再度北上，供职于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他的新职务是译书局总办（著名的保守派作家林纾和他同

在此局供职)。据说本来他有望出任副总教习或洋文总教习一职,但因为某些不可测知的因素他只能屈居此职。对这样的人事安排他自然心中不爽,于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话:“鸡肋之恋,正在月薪。”到了 1904 年,他终于辞职离开北京转赴上海。

就在这年冬天,因为帮办开平矿务局的一些诉讼争端,他在归国二十五年后有了一次欧洲之行,这次为期约半年的行旅留下了他在英国和孙中山的一次在今天看来依然饶具深意的谈话记录,谈话的核心依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如何实施变革:

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而孙中山是这样说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思想家云云,想必严复也听出了其中的褒贬,一个崇尚铁与血的革命者怎能承受那种温吞水式的改良主义?几年后的南北和议,严复作为北方代表参与同南方革命党人的谈判再到上海,但再无与孙中山的私交记载。

为了避免陷身于义和团运动的狂热选择南下上海时,因为行动仓促,严复不慎丢失了一部分书籍和译稿,前述已经译就的约翰·穆勒的《自由论》也在其中。后来这些书稿为一个西方朋友获得,于 1903 年寄还严复。这一译稿戏剧性的失而复得,在严复看来真是“天意”,因为他相信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正为当下中国所亟需。

在把书稿略作润色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他把初译时《论自由》的书名改作了拗口的《群己权界论》。因为经历了戊戌政变后的黑暗、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此时正在兴起的“新政”改革等重大事件的刺激,使严复觉得如果直译“论自由”,强调人人都享有自由的绝对权力,或许会给正在混乱中的中国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这一改名,显然表明他更多地考虑到了个人应该对社会所负的责任,考虑到了个人自由的限度和强调社会权力的必要。他在出版这本书时所加的按语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到了晚年,当他倾向于谴责革命造成的动乱时,在给年轻的追随者熊纯如的信中这样说道,当初译这本书,正是为了教育激进的青年,西方的自由思想也有着固定的适用范围,而不是那些“狂愚谬妄”之辈能人人享用的。

不论孙中山称他“思想家”的本义是褒是贬,事实上可说是名至实归,自甲午

战败的1895年至出京赴沪的1904年的十年间，流传于世的“严译名著”已有：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原富》（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原名《社会学研究法》）、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原名《自由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原名《论法的精神》）、甄克思《社会通诠》。从书名可知严复的译法和他的老同事林纾翻译小说一样是意译，所不同的是严复自己懂英文，并写了大量的“按语”对本文加以发挥。他解释如此大规模翻译西方经典的用意在于“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尽管这些译著为世人所争议和诟病，但事实上为他赢得了“近代中国第一译手”的美名。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译著，他是用汉语古文来表达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的概念。严复并不奢望普通民众能直接阅读他的译著，他译西书的目的是要吸引足以左右大局却又保守成性的士大夫们的注意。这些人对外来事物有着深刻的疑惧，严复知道这些书对于这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来说是多么难咽的苦药，所以他在上面涂了层糖衣，这糖衣就是让中国士大夫们心折的古雅文体。在对先秦文体的刻意摹仿中，他试图寻找到一种既能表达严肃的哲学思想、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文体。他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一度名声显赫，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那古朴、典雅而可与先秦诸子文风相媲美的译笔。人们从里面找到了精确与华丽、简洁与深奥、明晰与雅致的巧妙结合。严复把这归结为他认为的优秀译著的三条标准：信、达、雅。其中的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他毕生的朋友（同时也是曾国藩的门生）吴汝伦称赞《天演论》译稿“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可作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致定评，但对胡适这样的小年轻来说却又嫌读起来太过古雅、不够晓畅，他们更欣赏梁启超那样激情洋溢的鼓动性文字。（胡适曾经这样回忆：“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2006年，秦晖教授来宁波作“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命运”的讲演，在讲到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大意是：“群己权界”四字虽是“自由”的意译，但阐明了西方自由民主原理的核心问题，这体现了严复的高明，更体现了汉语的

奇妙。

按照严复的理解，近代西方所谓的自由，就是要清楚地区分“群己权界”，它不是“有己无群”，甚至未必就是“大己小群”。经验和常识也告诉我们，“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并非西方社会景观，倒是奉行“集体主义”的国家，这种景观更为显著。儒家文化历来是个大杂烩，其中既有主张自由，也有主张国家专制，以致形成激烈的党争，而现代宪政国家的左、右派之争与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党争各有不同的机制，宪政制度下的左、右之争可以达致自由和平等的动态互补。左派推动福利国家，右派促成公平竞争，而专制制度下的党争却是“左派扩权不问责，右派卸责不限权”，以中国历史上的北宋而论，王安石的国家税制只知聚敛而搞不成福利国家，司马光的放任无为只养肥了权贵而搞不成自由市场。造成这种区别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权责对应”的机制，而这乃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专制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即在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群己颠倒，在这样的国度里，个人事务横遭“公权”干涉，而公共事务又被个人专断，以至国民既无自由，亦无福利。“使天下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是黄宗羲对群己颠倒的严厉批评。

严复提出的“群”、“己”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我们。“公权”任意侵犯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又被个人、利益共同体和一些不受制约的人所把持，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这正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问题。公共领域归公权，私人领域归私人，前者通行民主规则，后者通行自由规则。或许在“群”、“己”之间存在着一些模糊地带，东西方在把握群己界分上都会有一个摸索过程，左、右之争也会延续，“权界”可以游移，但“群己”则不能颠倒。

这是严复的语境，还是当下中国的语境？一个世纪过去，我们似乎在原地转了一圈，而光阴倏忽，人事已全非。这或许也正是在当下重述严复的学术和思想的意义。

五 “一个糟糕的时期”到来了

当初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时，严复表示这样做的本意，一是尽量避开北京动荡的政治环境，二是希望能够在教育上做些事。1906年，他先是被安徽巡抚恩铭请

去担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后又继马相伯出任复旦公学校长。他在这两校呆的时间都不长(部分原因与他不谙世俗事务有关),但都殚精竭虑地奔忙过。有一段时间,兼着两地职务的严复马不停蹄地奔走在上海与安庆之间,累得染上肺炎,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至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发发牢骚:“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喉音尚未痊愈,浑身时常骨痛,日间不高兴时多,若满怀怨愤无处告诉,奈何奈何!”

当他于次年夏天因学潮离开安庆高等学堂前往南京(此行是参加两江总督端方主持下的赴美留学生考试工作),一个月后,安庆发生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消息传来,还没等他于惊愕中作出反应,他已被怀疑与这一暗杀事件有关联。为洗去嫌疑,自然又费去不少口舌。

但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越来越明朗的前景在向他招手。先是受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之请担任同考官,考核归国留学生。1908 年,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邀充任“新政顾问官”,去职后任学部审定名辞馆总纂,同时兼任的其他闲职还有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清理财政处咨议官和福建省顾问官等。1909 年,五十六岁的他以“游学专门”,被朝廷授予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文科进士出身”。这或许是结束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归国后“局外人”角色的一个标志。回想起那时为了获得举人出身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败北,他真有今昔如浮云之感。此时的朝野,关于君主立宪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中,穷途末路的朝廷迫于压力也已在酝酿国家体制的变革,一向不遗余力译介西书的“西学圣人”严复自然引起了当局的关注。1910 年 5 月,朝廷为实施新政设立资政院,在同年 9 月发布的钦选议员名单中,严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列名其中,同时他还被授予海军都协统,特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可是,南方革命党人的武力行动一下断送了他刚刚变得顺畅的仕途。在三年前热播一时(后被禁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革命党人对晚清立宪之举的态度被表述为绝对的不信任:他们认为,既然共和的理想远高于立宪,既然中国有可能摆脱君主专制的体制而选择共和政体,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越过立宪、一步到位走向共和呢?当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中外之际,远在北京的严复在日记中如是记载:



1908 年严复与甥女何纫兰合影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夜九时,瑞徵拿革命党三十五人。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武昌失守。

10月14日(八月廿三日),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

众所周知,他不是武力革命的支持者,但革命既已发生,或许会把这个国家推入一个更好的境地也未可知。在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写的一首诗中,他把革命形势比作一个热切等待着心上人的恋人,静听着预示心上人到来的声音。那段不无希望而又难熬的日子里,他焦灼的是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收拾局面。

谁是他心目中的铁腕人物呢?

他瞧不起南方革命党人,不赞成他们的绝对共和的政治主张(理由是国民素质不够),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收拾旧山河表示怀疑,并进而怀疑他们的人格。在写给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信中,时事评论家严复分析说,如果革命党人(他称孙中山是"轻率的革命者")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他认为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办法还是保留帝制,但应受适当的宪法约束。他只是朦胧意识到中国的出路似乎应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找平衡,但世人看来,他比康有为的"虚君共和"退得更远了。

如果我们对历史有足够的清醒,自会发现,辛亥前后严复对民主与民智关系的判断(他的一个著名论述是,民智的浅深与君权的重轻成反比,以民智未开之中国仓促实行西方民主,可能会引起社会激变)、共和体制何以在当下中国并不适宜的分析,并不是盲目地要与时代主潮立异,而是自有其对现实中国的深切体认,但历史的惯性把他的思考远远抛到后面,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前进,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他的设想正好相反。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糟糕的时期"终于无可避免地来到了。

敏感的嗅觉使他把目光投向了隐居河南项城老家的袁世凯。尽管他与袁相交垂三十年(袁在小站练新军时他们就认识了),后者又曾公开表露对他的欣赏并企图罗致他入幕,但他对这个老上级作为政治家的天分从来没有过高的评价。在一封私信中,他曾不无刻薄地评价袁世凯充其量也只是帝制时代的一个能干的总

督或者巡抚，如果要统领国家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也太无世界眼光。他不喜欢袁的性格，也不喜欢袁对知识分子的轻蔑态度，但又认为袁是当下中国惟一的强者，代表着秩序和集权，即便不能立即采取强国的措施，至少也能尽快结束让人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制止中国走向分裂。“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1911 年 11 月 7 日，即发出一封与《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谈论时局的信件的当晚，严复在日记中写道：“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他已决意离开北京了。两天后他来到天津，此地的混乱超出了他的想象。或许是出于对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的信心，三天后他又折返北京。就在此时，与朝廷几经讨价还价后新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也踌躇满志地抵京履新。严复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随同袁的全权代表唐绍仪顺京汉铁路南下武昌参加与南方革命党人的谈判。激变的形势——清室垮台后短暂的权力真空、南京临时政府欲速则不达的激进变革引起的对其威权的质疑——越来越显得对袁有利，严复也越来越相信，这一回他搭上袁世凯内阁的战车是搭对了。1912 年初，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同时兼任海军部编译处总纂。1913 年，他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室国际法顾问，次年又任参政院参政。

有迹象表明，此时的严复即便没有进入权力核心也是个能对当事者决策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了。但正如一位严复传记作者马勇先生所指出的，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严复实在算不上一个成功的人物，早年的波折自不必说，即使在盛年、晚年成熟期的那些政治经历，也莫不因为他的优柔寡断、当断不断而蒙受冤屈，代人受过。严复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是他在 1915 年的复辟帝制中列名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第三号人物。新账旧账一齐算，加上他在辛亥前后的种种活动和反应（现成的帽子早就为他预备好了：反对共和，鼓吹帝制，尊孔读经，反对五四），使他的余生一直笼罩在巨大耻辱的阴影下。归根结底还是文人本性害了他，他太缺乏在乱世中做一个政客的决断杀伐之心，当断不断，徒留遗恨。

生活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严复想必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中国这个巨人跑得实在太快了，它已经在短短的几日间从专制时代越过宪政时代直接跑进了共和民主时代。尽管严复一以贯之地坚持君宪政体比之匆忙上马的共和政体更适合现代中国，但对袁世凯急吼吼地要恢复帝制的做法并不赞成。据一封未发表的致梁启超的信，他批评袁这么做实在是脑子进水，“愚之甚矣”。从这封信中我们

还可以得知，他赞同并支持南方共和党人对袁的愚蠢计划的批评，并真诚地希望这些声音能帮助袁早日觉醒：

> 日前匆匆奉报一笺，殊不详尽。连展手翰如晤语，言兄此次来京与各方首要密谈，数此皆不值项城所为。松坡现仍处笼中，虽朝夕过从，极尽奉承之能事。然英雄之身可系而志不可夺。项城其愚之甚矣。此时南北通信，各方劝阻者多滞于跋涉。计弟之所能为者，亦文字诛伐而已。沪上报章所论最为有力，时时为之，足成大用，幸勿自馁也。兄老且病，无能为矣。

袁世凯终究没有如严复所期望地那样醒过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落得个众叛亲离，一命呜呼。

从严复后来的多次自辩和同时代人的记述来看，他没有真正同意列名于筹安会发起人之一，他的名字被利用是袁世凯施加特殊压力的结果。日后，他的学生侯毅以《筹安盗名记》为题记述了近代史上这波谲云诡的一幕。

侯毅回忆说，竭力主张恢复帝制的杨度为了把严复拉进筹安会，在 1915 年 8 月间曾三次到严的住所拜访。第一次，未作深谈，略作寒暄而退。第二次，杨度是以谈生意为名，声称邀集一些朋友合股组织公司，确保可以赢利。这一话题引起了严复的兴趣，但他对杨度的意图还是摸不着深浅。图穷匕见是在隔日傍晚的第三次造访。当严复得知杨度一次次登门的真实用意，这个注定失败的政治人物不能不为自己的迟钝感到羞愧。

谈话是从一个叫古德诺的西方人写的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开始的。杨度话中有话地问严复是否读了这篇文章，严复回答说读过了，杨度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

严复答："此一时殊非易答。辛亥改革之倾，清室曾颁布宪法信条十九，誓以勿逾。仆于其时，主张定虚君之制。使如君言，清室怵于王统之垂绝幸续，十九信条，必将守之惟谨，不敢或背。而君臣之义，未全堕地；内外百官，犹有所慑；国事之坏，当不致如今日之甚。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

杨度说："惟然，我将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

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

严复听这话吃了一惊，这不是要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吗？他的脸色都变了，回答说：“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经变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赖以维系者，厥维人主之威严。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谓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在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吾国之宜有君，而明言告凶，此虽三尺童子知之。而所难者，孰为之君？”他强调，他说的君主体指的是象征性的威权，这一威权实际上可与权力相分离，然后中国可以获得和英国一样多的民主。

杨度继续向他保证，学会只是完全学理式地探讨中国是否适合于君主政体，而不采取任何建立君主政体的实际行动。严复企图避免被杨度紧揪不放，坚持说这样的学会没有必要。杨度毫不松口，说从理论上证明君主政体的合理性是绝对必要的，并且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假如学会决定反对君主政体，他就放弃全部主张。最终，完全是出于为了送走这一难缠的客人，严复敷衍了事地说也许以后会考虑参加这样的讨论会。

第二天，杨度送来一张请柬，邀请严复共进晚餐。这次晚宴的参加者即后来筹安会的发起人孙毓筠、刘师培、李燮、胡瑛等人。严复借病推辞了。半夜过后，他忽然接到杨度的一封信，说袁世凯认为筹安会发起人中没有严复是不可思议的，并说发起人名单第二天早晨就要载诸报端。严复个性中缺乏决断和果敢，使他最后还是取了明哲保身之策，被迫同意了。次日，筹安会成立启事在报纸刊出，严复在发起人中名列第三。

面对随之而来国人的责难，严复百口莫辩：

至于去秋，长沙杨哲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会之顷，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顾杨不待吾辞之毕，飘然竟去，次日报纸已列吾名，至杨以书来谢，谓极峰闻吾与会，极深欢悦云云，则灼然早知其事之必不轨于正矣。由是筹安开会，以至请愿，继续

劝进庆贺，仆身未尝一与其中。

尽管“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复所私衷反对者也”，但他也只能因自身性格上的缺陷代人受过，“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

事实上，事后严复没有参加过一次筹安会的会议，当后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重建帝制活动发动攻击，袁世凯以四万元金票的润格要他撰文批驳时，他也拒绝了。为此他还收到了一大堆恐吓信。他说，我六十岁的人了，病患相迫，正担心没法解脱，谁真能让我一死了之，那我真要好好谢谢他了。话传到袁世凯耳里，这事才作罢。

据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记载，严复还拒绝了为袁称帝写劝进书。他对袁派来的人说，共和实行已有四年，还是正视现实要紧，这个时候想要恢复帝制，就像要让已经滔滔奔流的三峡之水回流，实在已是不可能的事了。袁某人实在想这样做，只能徒滋纠纷，于国家不利，他自己也捞不着什么好处。来人还想劝他，他说，我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与袁公交往三十年，从来不是一个只顾惜自己羽毛的人，但真要我做这篇违心之言，我实在是无从着笔。

事实上，当君主共和之争初起，在他看来拥护帝制或反对帝制，实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权力之争——“揭开窗户说亮话，人人争权利（力）耳”。他对梁启超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心折于梁富有煽动性的笔墨，认为他的思想言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梁过于膨胀的私欲使其言论和主张大可置疑：“梁任公素日言论，固自可观，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诡于财政乃有特长，姑无论其政策如何，而处此中央号令不行之日，又将于何处期成绩乎？”

在翻手云雨的政坛老客们看来，这个人实在是太不懂政治，太不成熟了，有时急于把人人都知却又不能说破的事直接说出来，有时却又好像弱智到了浑不吝事的地步。袁复辟帝制失败，正是咸鱼翻身洗刷前耻的好时机，面对倒袁的风潮，他却出来为之辩护，认为袁虽然做过一些不可饶恕的事，但还是情有可恕，“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者，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在袁

取消帝制后不主张让其退位，并不是对袁某人个人抱有什么好感，只是为国家命途着想——“无他，所重在国故耳”。

当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于 1916 年 6 月去世，这个不识时务者写下一首《哭项城归榇》，流露了对一代枭雄折戟沉沙的不忍之心。“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等句，使人们相信他或许以为袁世凯有一天会像传说中的丁令威化鹤归来，而那时人民会认为他“是”了。其间的复杂情绪也只有他自己去咀嚼了。

给人的感觉是，他实在是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了。所以当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时的学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他差点被当作袁世凯复辟活动的支持者而遭到逮捕也没有什么值得多大惊奇了。他的老友、保守派作家林纾要他从速逃离北京，这个人泰然回答说，他过去、现在都神志清醒，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这些事件之后，他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在有生之年注视着中国大地上不断增长的混乱。在给年轻的追随者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回顾了一生经历，痛苦地感到一生努力，只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恶名，既无高官也无厚禄。“复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唉耳。”

六　过渡年代里的一代人

这个失败的政治人物，作为思想家的境遇在中国又如何呢？

他受过西式教育，熟读西方典籍，又有为世人称道的文笔，他不激进，也不保守，以常理推测，他会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最出色的思想家。但令人沮丧的是，飞快转动的时代总是把他和他的思想远远地抛在后面，甚至与他的设计背道而驰。在时人眼中，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过时的、保守的思想家。他讥讽梁启超在辛亥后的种种主张与设想不符国情，“皆成纸上谈兵，于世事毫无裨补”，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更为可悲的是，他没有政治家的决断与手腕，还要在唾骂与屈辱中背上黑锅替人受过。或许，以知识分子的学理研究去与现实政治过于较真，其结局总是悲剧性的。

然而，他还是一厢情愿地要发出他的声音。他就像一个与中国巨人赛跑的注

定的失败者，大声呼喊着，要告诉那个巨人前方何处是悬崖，何处是坦途，但他的声音总也追不上那个踉跄着前进的巨人。以严复为个案，或许正好印证了马勇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那就是急剧的政治变革往往超越时代思想，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几乎很少成为政治变革真正的先导；任何思想家都很难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引领着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如同春天的气候一般多变的近代中国时局，使得很少有几位思想家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原有思想并构成严密的体系，以加速度行进的时代导致了思想家们一个一个地落伍。

所以严复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糟糕的设计师。是时代的前行不需要思想之光的烛照，还是这本就是一个不需要思想的国度？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政客，只是凭着乌合之众的力量呼啸来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为自己的野心而你争我夺，而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如何摆脱专制时代的阴影，那是顾不上的。在这样的情势下，严复的思想就像一支支不失锋利的箭簇，铆足了劲离弦飞去，却总是脱靶。有几次看似已经命中了近代中国的软肋，但社会的巨人不知如何一转身，那箭还是轻轻滑过，飞驰着，落入历史和时间无穷的幽深处。

大概是在世纪之初任职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时，他与吴汝纶谈论中国文化的前途，总被一个问题困扰，那就是深知中国不可不谋新、不可不向西方学习，却又无可奈何地看着旧传统一天天逝去。他在晚境到来时批判西方文化（近三百年的欧洲文明史，他用了八个字评价之：“利己杀人、寡廉鲜耻。”）、重新向传统寻求精神资源，伏笔应该在此已经埋下。在世人眼里，他是由早年的全盘西化论者蜕化成了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而他依据自己的判断和发现，于新和旧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心迹则常常为时人所忽略。

作为中国知识界中所谓“过渡的一代”，历史似乎已经滑过严复这一代人落到了更为年轻一代人的肩膀，毕竟他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在旧文化的框架内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传统已经渗入到他们骨髓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以后的时日里，当中国的奔跑获得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后起的一群人丢弃传统就像丢弃一个恶梦的影子，严复们的思想、甚至他们就像套在长衫马褂里一样的囿于旧式家庭制度的模式的生活方式，也都遭到了奚落和嘲笑。

现在应该说说他生命中的三个女性了。他有过三个妻子，自己也从不讳言，“鄙人二妻一妾”——在他看来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在 1912 年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严复说到了他的家小：“鄙人二妻一妾，前后共生五男：长璩，字伯玉，年三十九岁。次瓛，字仲弓，最颖慧，不幸早夭。三琥，字叔夏，年十六，在清华学校肄业。四璿，字季将，年九岁，幼读。五玷，字稚骞，才两岁耳。此外尚有女四：曰香严、曰华严、曰海林、曰眉男。皆幼，香严仅十四也。”）如前所述，他是在十四岁那年娶的第一个妻子王氏，不久父亲去世，他去船政学堂求学，留下妻子和母亲在家中做针黹勉强糊口。二十一岁，他有了一个儿子。然后是离妻别子远赴英伦。到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去北洋水师学堂任职，尽管常有不得志的郁闷，经济上应该是宽裕多了，未料在他三十六岁那年赴京参加顺天乡试时，老母病故，王氏和虚龄十六岁的儿子一起办毕丧葬，因劳累过度也一病不起。此后这个苦命的女人一直在病榻和药炉边度日，终于捱到 1892 年，在她嫁到严家的第二十六个年头去世了。

想起王氏和他婚后含辛茹苦的日子，严复不无愧疚地发现，他们就像一条河的两岸，总是聚少散多。

就在王氏患病、家事无人料理之际，经人撮合，他又娶了一个叫江莺娘的十五岁的女孩做偏房。江氏在及笄之年曾请人算过一卦，这使得她自己还有她的家人都认为她这一辈子只是个做小妾的命。几年间，江氏生下了二子一女。王氏去世后，更是尽心做一个妻子的本分。尽管算命先生说过她只有做妾的命，但她还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扶为正室。未料到了庚子国变那一年，他的夫君还是跑到上海娶了一个继室朱明丽。朱氏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且懂英文（朱明丽在认识严复前已经读过他翻译的《天演论》，人称她归严复正是《天演论》作的媒。诗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己亥续怀人诗》载其事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胜是麻股背搔痒。”），江氏自知不敌，但等了九年还是个镜花水月，自是心中怏怏，只觉无比憋屈。再加到了年底，她最为疼爱的儿子严瓛出天花突然夭亡，受了很大刺激，江氏整个儿人都蔫了。

其实这九年中，严复并非没有动过要将江氏扶正的心思，看她出身书香人家，人又贤良，对儿女们悉心抚育，扶作正室本是应当，但那一卦的阴影总是驱之不散，于是这事也就拖下了。娶了朱氏后，严复的打算是把家安在沪上，一应事体让

朱氏去打理，自己则携同江氏去京津任职。但到了北京后，江氏的病不轻反重了，性情也愈加褊狭，以致京中人家的内眷们都说，严家的姨太面目孤冷得很。

此时的严复已渐入暮年，饱受肺病、哮喘和常年腰肌疼痛的折磨，他又像回国时一样吸上了鸦片。国事、家事诸多的不顺心，再加江氏的病，更让他心烦意乱。被闹腾得头痛欲裂了，只好给在上海的夫人朱氏写信大吐苦水，称自己为天下第一可怜人。他给朱氏写了数十封信，每封信里都自称“老爷”，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某夜，江氏不知受了什么惊吓，眼神发直，神思恍惚，请了大夫来诊视，稍稍好转，不几日又反复。这是典型的甲亢病人的症状加轻微的神经错乱：白日卧床不起，夜间却不睡眠，饮食极少，脾气傲亢。她说，自上月起，心事驳杂，耳边常听到有人对她说些稀奇古怪的话。问她说些什么，她又满口胡言乱语。联想到江氏的家族曾经有过精神病史，她的母亲就发过疯癫，严老爷只好尽量不去刺激这个女人。在写给三儿严琥（他和江氏所生）的信中，他说江氏“神识愈益瞀乱”，连女儿香严说的话也不相信了。

江氏吵着要回福建老家，严老爷摆谱说，要走可以，但你是严家妻妾，凡事应当听我调度，就是你十分愿意做的事也得和我商量，得我允许，自然一切经费也当代你筹划安排，不时接济，现在你要走，尽可以马上动身。你来时的陪嫁约值一二百元，就拿这数给你作为盘费。可是一离我家，便不是严家的人，一文不与你接济，你的一切衣物，全由我所制，所有儿女，系严复儿女，上海的家，是我的，福建的住宅是大儿媳的，你都不能住，以后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你不走我也要你走。

话说得这般绝情，实在是不想让她走。但江氏还是走了。严复说：“将来儿女长大，必然怨我，但也无法。”恼怒时也撂下这样的狠话：“我今生今世不与汝见面，即以后生生世世亦不必狭路相逢，罢了。”

说是“罢了”，这个厚道人还是不能忘情。作为三个女人（先后）的丈夫、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的父亲，他总记着自己要担的一份责任。江氏先是到了福建和长子（严复和王氏所生）一家住过一段时日，后又到了天津，住在长女香严家。其间，严复每月都寄给她四十银圆。

如果说第一个妻子王氏之死完全是穷困、劳累损害了她的健康，以至入严门二十六年后撒手而去，江氏的病，则多是严复囿于传统观念、缺乏决断的性情而导

致的后果。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活从政治、文化层面到日常生活层面的全面溃败。这种溃败首先将由他一直来并不太健康的身体来承担。严复的余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偶尔去上海和他的家乡福建省，去那里主要是因为健康上的原因，因为恼人的气喘病一直困扰着他。他不富裕，靠他过去译著的版税和他投资于商务印书馆的股金与股息来维持生活，虽然勉强，也够支付他个人的需要和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了。随着自己年老多病，他觉得中国的前途也越来越黑暗了。

在一个知识界中的代沟日趋加深的时代里，他以一种特殊的紧张感察觉到：朋友和同时代人正在迅速消逝，难说这不是老年心态的真正降临？在给熊纯如的一封信里，严复哀叹老朋友们一个个死去了，在他的眼里，那都是些具备新知识又熟谙旧传统的人。严复以一个阅世多年的过来人的态度，认为这些人远远胜过具有所谓"新个性"的年轻一代。

奔波一生，他在信中越来越像一个慈祥的老人了：

> 吾以老病余生，世事浮云过眼，所欲急急为计者，求一眠食稍安有余不败之地以终余年，他非所计，儿婚女嫁，香严以下尚有六人，邀天之福，将即以商务每年进款了之，不识有蹉跌否耳。世界从此平靖，难期虎尾春冰，儿辈真当谨慎也。

中国巨人还是在一股股变化不定的潮流中奔跑，因为尚未找到适用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固定原则来控制这无定向的潮流，谁也不知道这个巨人最终会跑向哪里。悲观之后，思想自然转向了"空"。由于日甚一日的哮喘病不堪忍受北方寒冷的天气，1918 年，严复回到了故乡的村子，在一封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故人不必为我悬悬也。"

作为生活于中国最不幸的一段时期里的那代人中的一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严复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起码他所预言、他所抱有过的希望都已落空。

对正在鼓捣白话文运动的五四一代学生他也不抱什么希望，斥为一帮乳臭未干的狂少年怎能救中国？当他在1921年秋天的福州即将走完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时，他看到的中国是一个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渊之中的巨人的背影。因为他发现，他曾经吹呼过的进化的力量，不仅使中国停顿了下来，而且似乎把中国彻底抛弃了。“惟有坐视时流，任其所之而已”，他的信里充满了悲哀与呐喊。他看不到一丝的希望，也不需要别人的任何安慰。

在临终前留给子女们的遗嘱中，他表达了走过这个世界后最终的处世哲学：

>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
>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
>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
> 须勤思，而加条理。
>
>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
>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就在这一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成立了自己的政党。

附记：内藤湖南记录的一次对话

1899年秋，日本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内藤湖南到中国旅行时，曾在天津与严复有过一次会面。严复当时以北洋候补道任水师学堂总办。内藤湖南对他的印象是——“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期，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人物”。在回国后以《楚山燕水》为题出版的旅行记中，内藤湖南记录了他与严复谈话中讨论中国政治局势的主要内容：

严：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到达天津的，打算逗留几天，去北京了没有？

内藤：我是公历九月十一日来到天津的，打算明天去北京。在北京逗留十天，还要来这里。

严:君子同类相聚,不拘于琐碎小节。能得到先生的邀请,实在令人高兴。

内藤:您的大著《天演论》,承蒙方先生(方若)惠赠。拜读之后,看到文字雄伟,不像是翻译,果然是大手笔啊。

严:为了让读者易懂,所以翻译的时候没有拘泥于原文字句的顺序。但这诚然并非译书的正统手法。我最近在译《计学》一书,便谨守翻译的正统。他日书成的时候,一定会送给您请教。

内藤:我国维新期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财政枯竭,以至于向富商借钱,以解燃眉之急。我想贵国当前,应当也有这个问题,冒昧地问一下,有什么充实政府财政的良策吗?

严: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一个定数。想要维持财政的充足,主管财政的人必须知道用钱的新旧缓急。实行新政,就必须删减旧政。如果新政不断增加,旧政也不废除,财政自然日显不足。这是我国近来财政管理的一大弊病。不遗余力地搜刮,来供给无用的军资,这尤其耗费政府的财政费用。比如现在的军队,虽有百万之众,对于战争的胜负也无济于事。先生以为我讲得怎么样?(**末节是讽刺刚毅在江南筹款一事的。——原注**)

内藤: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现在是二亿五千万两。贵国有我国十倍的领土,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却不过一亿多。大概是有贪污的问题吧。要防止这个弊端,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吗?

严:饿着肚子办理公事,是人情所做不到的。想要消除中饱私囊的问题,必须先增加官员的俸禄。不增加俸禄而要除去这个弊端,无异于自欺欺人啊。

内藤:北京有可以谈时事的人吗?

严:政变以来,士大夫们都钳口结舌,哪里有谈时事的人。我不知道啊。

今天能见到先生,特别高兴。希望能和先生结一个笔墨缘。

人物档案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朴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

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两生花

——碎片拼接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

一　自杀的女人

四月的一天，访问者鸿山俊雄乘坐国铁在须磨站下车后，沿着公路朝稍微偏东方向的一个叫兵电的地方走去。正是樱花初开时节，空气中充满了好闻的花香。

穿过一座立交铁桥，一个古老的日本式庭院出现在访问者眼前。

庭院依山而建，有谷、有河、有池，都是巧妙地利用斜坡设计的。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金融业主的别业。大概六十年前，这里成了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神户的临时居所。

访问者是来此地找一个叫鹤子的女人的。大约三年前的秋天，访问者曾短暂拜访过这个女人，并与她进行了一个下午的交谈。那次，女人向他说起了少女时代在康家做女佣的一段经历，以及与主人一家发生的情感纠葛。

如果访问者的记忆没有发生差错，那么鹤子这一年应该七十七岁了。

接待访问者的是鹤子的女儿绫子。绫子告诉他，老人已在两个月前自杀去世了。那天早上，她母亲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一点也看不出一个老妇人的老态龙钟，临出门时她对女儿说——她一直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她要到附近的王子公园散散步。但一家人等到天黑她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在铁轨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公园在家的这一边，她怎么走到了相反的须磨方向呢？是因为耳聋，还是腿脚不太灵便的缘故？访问者猜测。但绫子没有再说下去。她说母亲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访问者的眼睛发出光来。

绫子展开一张折叠得很好的纸,上面草草写着这几个字:

生活的煎熬已使我身心憔悴。

这一结局并没有让访问者感到十分的意外。他想起了三年前那次访谈结束时,鹤子说的那番话:

现在我把背在身上的沉重的命运的包袱全放下来了,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回想起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和以后的苦难生活,已像走马灯一样一幕一幕过去了。

二 天纵远游

在康有为日后的回想中,1898年的那个初秋肯定充满着肃杀和血腥之气。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日),忠于慈禧的军队开进城,才推行不久的新政即告夭折。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捕维新人士,变法领导人康有为自是首犯。他提前得到友人密报,在把文件和书信匆匆托与弟弟康广仁后,于前一日已秘密出逃到天津,登上一艘英国轮船经上海直赴香港。

康有为仓皇出逃的经历,在其女儿康同璧多年以后的讲述中,已成为天地冥冥自有神佑的一个明证:

他原本是打算乘坐招商局的海晏轮离开天津的,临走时又决定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慈禧电令直隶总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全力缉拿。荣禄派飞鹰兵舰追赶,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半途折返。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返回,重庆号已经开走。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密令上海道蔡钧"逐船搜查必获",蔡是一个贪功争耀的能吏,做事张扬且细致无漏,得到密电在上海铺开了一张大网,亲自坐镇吴淞竟夜等候,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人士看见许多兵弁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

这一回是死定了，痛哭而返。但是蔡钧过于积极的举动引起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的警觉，当重庆号甫抵吴淞口外，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找到康，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护送他坐一艘小型蒸汽船登上英国军舰埃斯克号(Esk)。此时，上海道派来搜拿的兵丁已经登上了重庆轮。

康有为确信，皇帝已经死了，“紫微移坐帝星沉”，他这个孤臣还有什么理由苟活呢？英国人劝他，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还是忍死须臾。康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但他在上海写的遗书还是流传了开来：

>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而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世间，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态，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　康长素遗笔

后来康这样对他的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关隘，只要碰巧撞上一个他就没命了：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假如迟一日出京，假如在天津搭不上轮船，假如追来的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返，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假如不是上海道过于张扬的抓捕行动促使英国人提前下手把他带离重庆号……似乎每一个偶然的闪失，都有可能让死神降临到他的头上，让他的命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而他之所以不死，乃是因为天降大任等待着他去完成。

在香港，康有为远远地注目京城，无奈而悲凉地看着这幕世称“百日维新”的大戏落下帷幕：皇帝被囚瀛台，太后再次训政，“六君子”人头落地——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康广仁。本该是剧中人的他现在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他人流血，这不能不让他有种负疚感。尤其是他的弟弟，简直死得毫无意义。康有为的父亲去世前，曾把这个聪慧的弟弟托付与他，康有为离京前，本来完全可以带上他，但出于某种自私的念头，譬如为了让弟弟帮他处理因仓促出逃未来得及带走的书籍和财物，他还是让弟弟留在了京城。他的这一决定不仅违背了自己对亡父许下的诺

言，更是直接让弟弟成为失败改革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因为据可靠的记载，广仁并非新政的核心人物，他只是有可能出于对乃兄无条件的信任介入了某些反政府活动的外围活动。

广仁死时才三十岁，留下了一个仅八岁的女儿。在日后的一首悼亡诗中，康有为为自己的疏忽断送了弟弟性命并未能亲自安葬深感愧疚：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神伤处，最是青山骨未收。几天后，康有为的妻女及广仁的遗孀和女儿抵达香港，尽管凄惶之状不可方物，但一家人渡此劫波后总算重逢了。为了不让母亲过度悲伤，康有为没有把弟弟的死讯告诉她，只说广仁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康有为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就是从这个秋天开始的。这年 10 月，惊魂甫定的康带着三名弟子一名随从踏上了东去日本之路。他是在发出"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的密电后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邀前往的。根据康的说辞，大隈确信康果真奉有密诏出外求援，他被允诺将会受到"适当的保护"。显然，由于不明康的政治地位及他宣称的手中密诏的真伪，日本政府过于放大了康的政治影响力。赴日不久，大隈内阁的倒台使他再也呆不下去。新内阁认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已经失败，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难有作为，因此对康的态度十分冷淡。来年春，他取道加拿大，踏上了游历欧美的旅程。眼看在国际上寻求支持的努力无望，他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保皇会"，并获得了七千多美元的馈赠和一个作藏身之地的小岛的使用权。

庚子年席卷整个华北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在康有为看来是一个实现保皇理想的大好时机。当时他已定居新加坡，在东南亚、加拿大及美国一些华人朋友的支持下，他决定在内陆的一些省份采取武力行动。由于资金、军备缺乏和康本人在军事上毫无经验，起义很快夭折。

1901 年 12 月，心力交瘁的康有为前往印度。几个星期的跋涉后，到了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此处距喜马拉雅山不过八十公里。他最宠爱的二女儿康同璧是年十九岁，在国内闻知父亲到了印度，这个弱质女子沿着公元七世纪的高僧唐玄奘的取经路，孑身独行，前去与他父亲汇合。"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这自况诗里隐约可见乃父之神韵。

在大吉岭，康带着女儿骑马攀登喜马拉雅山南麓，观赏雪景，呼吸山间的新鲜

空气，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这块高地体验了一段非凡的探险生活。这一段清闲的隐居生活，他的身体看起来恢复得不错，但心情的沉重似乎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写于这一时期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的开头部分，他把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在他看来，这世上的人困于“六大苦”：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名利之苦及人所尊羡之苦。人只有解开这六道悲苦的枷锁，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他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不过康有为并没有过度沉湎于玄学天地，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促使他给朋友兼学生梁启超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长信，呼吁恢复皇权——即使这个皇帝是满族人也无所谓。此时的梁启超年届三十，正流亡日本，他的思想已超越乃师，从一个君主立宪运动的中坚一变而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拥护共和制的政治明星。在他眼里，社会的动力已经变为“民族求生存的奋斗”。梁及其支持者们喊出了排满的口号，他们甚至主张在中国南方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府进而取代满清政权。康毫不客气地在私函中申斥以前的学生兼战友“流质易变”。（康有为这一指责，对梁启超刺激很深，以后梁在书信中屡次说到被康责“流质”一事。在七年后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提到了与乃师在政见上的分歧：“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到 1929 年梁启超去世，梁的“善变”已为世人所熟知，但章太炎认为，梁虽在外表上显得“恢诡谲怪”，实体现为“通道为一”，证明便是“再造共和赖斯人”。）

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危险的康有为从大吉岭下来就差点遇上一场暗杀。这场未遂暗杀案的另一个主角是横滨华侨出身的文人苏曼殊，一个日后写出《燕子龛诗稿》和通俗爱情小说《断鸿零雁记》的著名诗僧。这一年——1904 年——他二十一岁，忍受不了惠州的贫困生活，就偷了师兄的度牒逃到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他启用别号曼殊也当是从这个时候起）。他试图用手枪暗杀一度逗留在香港的康有为，幸被陈少白阻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普遍流行暗杀。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他的弟弟康广仁被杀害的那段郁闷日子里也曾计划过刺杀慈禧，甚至改革派也认为暗杀行动可以迫使上层进行有利的变革。康没有想到的

是，自己也差点成为这一革命时尚的牺牲品。

从1904年到1910年，康有为成了一个超级旅行家，他游历过的地方计有：罗马、米兰、巴黎、柏林、哥本哈根、西点、黄石公园、盐湖城、蒙特卡洛、阿尔汉布拉、菲斯、乌普萨拉、特隆赫姆、康提、卢克索、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每到一地必住最豪华的酒店。而这不过是他到过的一小部分地方。他这些年游历的金钱是无法计算的，因为那是一个实在过于庞大的数目。他到处跑来跑去，用梁启超的说法是生性好动和无家可归之感使然。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少年时代起就景仰的先秦哲学家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寻访有道之君未果，以其余生就乱世的人生与政治问题著书、讲学，这是他最为现成的人生楷模。

现在回头来看，1898年6月在京西颐和园的两个半小时给康的一生带来了深远影响。自那次觐见光绪皇帝后被任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他就丝毫没有动摇过对皇帝的忠诚。而更早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1895年春天，那一年康以举人的身份公车入都参加会试，给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倡言变法，"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皇帝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见到了他的上书，接受了他的观点，才开始厉行变法。游历各国的时候，康一直以光绪皇帝的私人代表自居，自认为受四万万人托命，是个世不二出的救世主。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他以一种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到自己担负的责任，就像传说中的神农氏，他要尝遍百草后为中国找到药方：

> 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以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惶既恐，以忧以惧，虑其弱而不胜也。

考察康有为的流亡行迹，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至光绪三十五年五月（1904年6月），除了在英国和加拿大短暂的逗留外，他一直在亚洲。此后

到宣统元年(1909)春,多次游历欧美各国,共计:十二次过比利时,十一次进德国,七次游法国,八次游英国,四次游加拿大、瑞士等国。自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年(1913)秋,康已感天地无可游者,"大地辙环吾倦矣",他不再远游,先居新加坡,再迁至日本须磨,时欲归国。

1911 年的日本之行,是这个超级旅行家十六载海外游历之最后一站。自此以后,他将再也不出国门一步。

三　鹤子

康有为来到神户当在 1911 年晚春,他从新加坡赴香港探母之后。开始他住在广东同乡麦少彭建在须磨海边的别墅"双涛园",第二年樱花开时迁居到了须磨寺附近,原上兵库地方小西先生的别墅,并自号为"天风海涛楼"。

康有为带着他年轻的第三任妻子兼秘书何金兰(又名何旃理)开始了这次旧地重游。山川历历,杂树生花,岁在辛亥的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十余年来,如同一股没有定向的风东流西窜,曾经雄心万丈的康圣人不会没有英雄迟暮、时不我待之叹喟。亡弟广仁的女儿考上日本女子大学,这消息让他既是欣喜,又不由得想起戊戌年的那些亡魂而心生伤悲。而在"双涛园"中与门人梁启超的再度聚首,更是相对如梦寐。在一首诗的副题中,他这样写道:"与任甫(梁启超字)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

这份伤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弥于无形,武昌十月起义的消息及随后发生的国内暴乱使他心忧如焚,因为这一系列事件把他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计划彻底打乱了。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朋友回信中说:"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共和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而完全的君主立宪又与形势不相符,作为变通,在随后写下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章中,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虚君共和"的理论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通过世袭的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不拥有实际权力,这个充当象征性角色的人,可以是满族小皇帝,也可以是孔子的后裔。

1912 年清廷皇帝的退位,逼迫康有为接受了走向共和这一似乎是必然的现

实。他在写给支持者们的信中表示，尽管对不幸的流血事件深感遗憾，但中国毕竟有了自己选择的共和制度。但他没有即刻返回中国，而是留在日本继续他的写作和研究。据说，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已相当紧张。1912 年秋天，当梁启超作出回国为新的国民政府效力的决定时，康有为与这个昔日门生之间的裂隙几乎是完全公开的了。

康有为后来得知，梁的归国之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船到大沽口，由于风高浪急不得入港，有三天时间，他那个以善变著称的学生只得在狭小的船上眼巴巴地遥望中国海岸。这个不祥的征兆，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时日里，归与不归，变与不变，他们所抱的希望都将在莫测的前方幻灭。

生于明治三十年(1897)的鹤子姑娘这年十六岁，正逢美艳而短暂的豆蔻年华。她的老家在南部的淡路岛，一个被蓝色海水簇拥着的小岛。甲午战争后，她的父亲来到神户，在市政府担任一个低级职员，她也跟着来到了神户。经一个远房婶母的介绍，十六岁的鹤子来到了康家做女佣。

十六岁的鹤子姑娘并不知道康有为是何方神圣，她甚至不明白，这个上嘴唇留着两绺威武的灰白胡子的老头为什么娶了一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妻子。她第一次去康家，在装饰一新的寓所房间里看到何金兰，心想这屋子的女主人真是太年轻了，比自己都大不了多少，说她是康有为的女儿还差不多呢。

这幢房子虽是日本式样的，但榻榻米上铺有地毯，地毯上放桌椅，房间还是按西洋风格布置。鹤子在康家的日常工作是打扫房间，把客人引进客厅、传话等。康家有不少客人，中国人居多，也有不少日本名流。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经常来访，但隐隐觉得他们都是一些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她才知道，康有为在中国是能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数一数二的伟大人物，这使男主人的形象在她眼里陡然高大起来。

鹤子很快熟悉了康家的其他人：康有为年幼的儿子康同凝，女仆张喜和日文秘书阮鉴光，此外还有两个中国厨子。她以乖巧和勤快很快博得了这一家子的喜欢，连一向严肃的康圣人看着她时，眼角也是弯弯的盛满笑意。

在须磨，康有为有时参加神户华商在神阪中华会馆的茶会，并发表没有多少观众的讲话，有时和梁启超等门人及当地侨民恳谈会餐。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到布引的瀑布那儿去游览，或到诹访山洗温泉浴，并从那里

北望神户港的景色。最远的一次，1912 年的深秋季节，他们结伴跑到了京都，参观了著名的寺院佛阁、庭院和壁毯。更多的时候，他住在须磨的“天风海涛楼”里，写字，作诗，沉思，或在鹤子姑娘的搀扶下到须磨寺前的大池边及须磨海边散步。

鹤子已经喜欢上了在康家的生活，这个聪慧的姑娘甚至都能自然而然地听懂康有为满口的广东话了。但到了 1913 年 11 月，康有为作出了举家迁回上海的决定。起因是他八十三岁的老母去世了，灵柩一直停放在澳门，作为康家的长子，康有为决定奉母灵归葬康家墓地，以尽人子之孝。同时他还想把弟弟广仁的遗骨从北京接到老家安葬。1898 年那个伤心的秋天，康广仁在菜市口被处斩后，是一位广东同乡的忠仆，把他的头缝接在尸体上草草安葬，尸体一直没有弄出北京城。康有为希望，母弟灵柩的归葬能够让多年来噬咬他内心的负疚得以稍减。而没有说出的一层意思是他累了，十多年周游列国一事无成，他已深感“大地辙环吾倦矣”。天地虽大，对五十六岁渐入老境的康有为来说，却已没有了早岁壮游的豪情与心志。此前不久，先期回国的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的消息，也促使他下定归国的决心。虽说城廓依旧人民非，但康有为并没有丁令威式的黍离之悲，这个固执的人一直以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十六年前如是，十六年后也依然如是。

订的船票是 11 月。康有为希望鹤子姑娘能和他们一家同船去中国，甚至何金兰和年幼的儿子同凝也很希望她能去。如果不是公务员父亲的反对，鹤子也就真的跟他们走了。对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来说，中国，是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国度！敏感的少女已经预感到，在康家呆的这两年将会影响到她一生的道路，但她终于没有拗过她的父亲和婶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康有为离开神户不久，因国内形势剧变，他政治上的对手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寻求政治避难。

四 “窗前的露水与雾”

三个月后，鹤子姑娘收到康有为的中国来信，邀她前去作客，她不顾父亲及家人的阻拦，与他们大吵一场，几乎是赌着气上路了。

这时已经到了 1914 年的初春，康有为葬毕母弟已从广东回到上海。年初，北

京政府对十六年前那场未竟变法的死难者进行了隆重表彰，袁世凯此举或许是为了抚慰康有为，为邀他前往北京任职作一情感上的铺垫。但是，康拒绝了来自北京的这一邀请。他在上海安顿了下来，在法租界寓园路赁屋而居，继续过他读书写作的日子，并像一只警觉的老狮子一般时刻观望着民国初年风云诡谲的中国政坛。

一场伴随着大雪的寒潮中，十八岁的鹤子姑娘来到了上海。尽管她想象过上海，按着康家人的描述一次次修改上海的面容，但当她一下子面对这座有着许多高楼和西洋市政设施的"东方魔都"，还是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在这之前，她见过的最大城市是神户，甚至京都——父亲多次答应过要带她去——都没有到过。这里和她以前的生活世界相比，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漫天的雪花落着，刚到地面就被喧嚣的热力融化了，街道上空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气，就好像这个巨大的都市在喘息。头发上雪融后的小水珠还晶莹地闪亮着，鹤子已经走进了坐落在法租界寓园路 192 号天游园的康公馆。

康公馆包括一幢砖瓦结构的西式洋房，一幢纯中国式的房子，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庭院中有池塘，一碧涵空，墨绿的池水里伶仃地立着几根荷梗，临水照影，一如凌乱的中国草书。鹤子还看到长长的走廊里挂着一长排日本风格的灯笼。以后她会知道，因为康有为喜欢日本风味，这些灯笼都是花了不菲的费用从日本托运来的。

让鹤子欣喜的是，她又看到了何金兰。何金兰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嘘寒问暖，还问她路上的见闻，说话间却控制不住地咳嗽。她咳得是如此剧烈，有一阵几乎要憋得背过气去，让手足无措的鹤子一颗心都悬了起来。鹤子注意到，几个月不见，她似乎瘦了一圈，脸色却愈发地灿若桃花。不一会，何金兰推说头痛，先上楼休息去了。在康家人的引领下，鹤子又一一见过了康有为的正房、第一夫人张妙华，第二夫人梁随觉，还有其他的家人，七七八八加起来有十来人。她这才知道，何金兰只是康的第三个夫人。

这里似乎有必要交待一下康有为一生中并不太复杂的婚姻生活：起初，他对自己的包办婚姻显然很感满意，但他的正房张妙华为他生下的五个孩子中，竟然两女一男夭折（三女、四女和长男），只留下长女同薇和次女同璧。1897 年，康快满四十岁时又娶了梁随觉为第二夫人，在槟榔屿期间，梁氏为他生下的一子（次男

同吉）不幸夭折，后又生下三女一男（六女同复、七女同环和三男同籛）。第三夫人何金兰出现在他身边是1907年的春天。那年，这个随父移居美国的广东姑娘年方十七。康有为在纽约国民宪政大会上对北美华侨的演说，触动了这个少女的心。当时的康正考虑找一个通晓英语的女子为伴，一来可以让列国之游不致于太过寂寞，二来呢，也可以对访问游说有直接的帮助。于是在朋友们的撮合下，快五十岁的康有为又一次做了新郎。何金兰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了康，做了他的第三夫人兼生活秘书。当张妙华和梁随觉在香港陪着她们的婆婆时，康正带着她年轻的第三夫人飞来飞去在世界各地旅行。每到一地，都由何金兰做翻译并打理生活。1909年，何金兰为康生下了四男同凝，但随后她生下的两个女儿也都夭折了。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的三位夫人共为他生下四男九女。其中长男、次男夭折，三女、四女、八女、九女也夭折，因此眼下的康家，本是三男、四男的同籛和同凝在子女序列中就成了长男、次男。

鹤子很快就熟悉了康公馆，甚至那些厨师、男仆、女佣，那两个头上包着卷起来的白布、满脸络缌胡子的看门的印度人，她也都熟络了起来。但她从来没有见过大少爷，二太太生的同籛。后来她知道，大少爷在念大学，平常都是住在学校里，连星期天也很少回家。没事的时候她会怔怔地想，那个据说和自己同岁的大少爷，不知是个何许模样的人？

鹤子在康家几乎像个客人，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重活粗活都有下人做了，她只是拿着鸡毛掸子扫扫家具上的灰尘。教英语和钢琴的家庭教师来了，她就和康家的孩子一起学习。

随着时间流逝，鹤子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生活上也习惯起来，不再太想家，不再感到寂寞。当康的长女同薇去日本新婚旅行时，她还陪同前往。就在那次回国的时候，她还跟随着拜访了有名的前首相大隈侯爵，这在从前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第一次进入康有为的书房，鹤子几乎吓了一跳。那么多书！简直像个小型的图书馆。书房的角落和博古架上，还摆放着一些古董。康告诉她，这些书画古董，每一件都称得上价值连城。每次进出书房收拾，鹤子都踮着脚尖不发出一点声响，以免打扰了沉思中的康先生。康有为在书房里总是伏在桌子上用毛笔写着什

么，有时写着写着就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有时，他又会把纸团捡起来，皱皱眉头，好像很无奈很焦躁的样子。鹤子要去开窗，康总是挥挥手阻止她这么做，因此书房里的光线总是昏暗的，如同一口孤立于外面世界的深井。

有一次，她正在擦拭书桌上的灰尘，书架嘎嘎地转动起来，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书架移到九十度角的位置不动了，露出里面一个有着简单陈设的密室。康有为从那一边的密室走出来，对着她笑。康告诉她，是为了随时提防袭来的刺客才建造了这间密室，在康公馆里知道这个机关的人也没有几个。康有为还把着她的手教她如何操作这个机关，只要转动书架的某一部位，书架就开始转动，这样就可以逃入隔壁的密室了。

但平静的生活因两桩接踵而至的丧事被打破了。先是康有为姐姐的死，到了暮春，患上猩红热的三太太何金兰也去世了。她还只有二十四岁，花儿一样的年龄，但在病床上的最后日子已经瘦得脱了形，就像一具干枯的木乃伊。当亡妻撒手西去时，康有为一定回想起了他们在欧洲各国如同一对神仙伴侣一般游历的日子。何金兰去世后，接连几天他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仆佣送进去的饭菜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出来。当他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时，他的脸瘦得厉害，脸上的胡子像杂草一样疯长了。看来这最小也是他最疼爱的妻子的去世对他的伤害不轻，回国后他本已郁闷不堪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

时间是疗治痛苦的良药，到了 1917 年，康有为终于从何金兰去世带给他的颓败情绪中走了出来。他开始带家人到周边的苏州、杭州等城市游玩。他几乎是在有意识地忘记从前。进入盛夏，上海热得像火炉一般，他便带着鹤子去青岛避暑。鹤子姑娘愉快地陪他去海滩进行海水浴，湛蓝的海水让她想起了须磨的海岬。有时，鹤子也陪他一起骑着毛驴到他喜欢的古庙古寺去，听他与僧侣们说佛法，并参观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书法碑林。这里的青山绿树、碧海蓝天又让康有了生之欢欣，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海上忽见神仙山，金碧观阑绚其间……楼阁倚山临海滨，碧波浩荡通天边。"

在康家人眼里，鹤子这个日本女子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康有为的第四任夫人。鉴于不久前第三夫人何金兰的去世，他们一致认为康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疗治一个男人妻子去世的伤痛，最好的法子还是女人，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人。但鹤子知道，自己与康，还算不上真正的夫妻，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同房过，

也就是说没有行过实质性的性事。在这一点上，鹤子很不幸地成了传统中国养生术的牺牲品。曾经有着强大繁殖力的康，奔波大半生，在坠入老境之年时，在性事上可能已每况愈下。对残生的珍惜和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使他长久以来就规避男女情事以防体力上的过度透支。这一物质性的吝啬势必也伴随着情感上的吝啬，说实话，他对从少女走向女人的鹤子的关心，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青年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康有为的长子康同篯，康的第二夫人梁随觉的儿子。这年他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鹤子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和大学生有的私情。一次家宴后？漫长假期的一个下午？还是他父亲不在的一个夜晚？她敏感的唇和肌肤所能记得的，只是那一次次甜蜜的颤栗、夜色中紫藤架下的拥吻和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快乐。如果说这么些年和康家人的交往中，康有为带给她的是父亲般的沉重和慈爱，那么这个大学生则是唤醒了她的身体，唤醒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潜伏的灵性。这乱伦一般的上海之恋啊，这暗夜里销魂的汗水和喘息，鹤子自己也没有察觉，自己已从一个青涩年纪的女孩，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水色荡漾的女人。

如同所有不伦的欢乐都要付出代价一样，当鹤子觉察到身体的某种不适时，她已怀孕数月了。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学生时，束手无措的大学生吓得脸都白了。

无可奈何又在情势之中，1925年（大正十四年），鹤子结束在中国的生活回到日本，不久生下了女儿绫子。其间康有为曾数次写信要她回中国，但内心的负疚感使她再也不想踏上去中国之路。几乎可以想象这个单身母亲回到国内后的苦难生活。她带着孩子投亲靠友，遭尽白眼，有时给人家帮佣以维持生活。迫于生计，后来她嫁了人，并有了一个儿子。她不幸的生活注定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因家境贫寒，女儿绫子小学毕业就去学裁缝了，后来结了婚，婚后生活也不是很如意。

1939年（昭和十四年），鹤子得知康同篯托到日本的朋友四处打探她的消息，但她悄悄地搬了家。以后的岁月里，她对自己和康家的交往一直都守口如瓶，她要让那件不体面的事永远烂在肚子里。

沉重的生活已让鹤子成了一个头发灰白、腰身佝偻的老妇人，似乎岁月的砂



1921年康有为与家属在上海愚园路游存庐合影

（中排右起第二人为市冈鹤子）

砾把她身上所有的水分都挤压了出去。有时回想前事，真如恍然一梦。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朵花，经过了两个男人就像穿过了两个季节，一瞬间灿然的开放之后就是世界的永夜，永远黑漆漆，看不到来日里的一点光。

她老了。当康同钱去世的消息传来，令她奇怪的是，她好像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死讯，几乎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原来，她还以为自己会号啕大哭呢。那个曾经带给她如许盛大的快乐的男人，在她的生命里真的是可有可无的吗？不，他，包括他的父亲，那是两个塑造了她的一生的男人。他们改变了她，塑造了她，又把她远远地抛开。而她只得一个人在被他们修改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老。她说不出对这两个男人是恨，还是爱。

孤独使她渴望倾诉。她需要讲述这些故事，并在讲述中确证自己的一生。要不是这样，她怕自己的一生真如草尖上的朝露。她七十四岁那年，那个有着历史考据癖的访问者鸿山俊雄出现了。她记得，那是一个樱花迅速颓败的季节，下着雨，空气中都是花瓣沤烂的气息。

此后，令她欣慰的是，绫子开始了与她在台北的同父异母兄弟的通信。这血缘上的一点系连让她确信以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梦。绫子和她同一个父亲的弟弟的信件以及她跑去台北的相会，似乎也就是世纪之初那场上海情恋的明证。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耳边一直响着电影《薇罗尼卡的双重生命》里的一支曲子，《两生花》。那是小令推荐我听的。那个唱歌的女孩，在一场突降的大雨里，唱出最后一个音符，擦掉额前的水珠，那么好看地笑着。然后死了。“她笑的样子真是好看极了。”小令说。

> 仿如黑的夜色四处走散，渐成晨光
> 白鸟未眠。那人窗前的露水与雾，呵，这件薄的衣裳！
> 轻笼住了她的肩头和心上。
> “她却先死于人间”。

正在进行中的这个鹤子的故事，让我一次次地想起小令说的那个先死于人间

的"她"。一场情感的暴雨过后，女人一生的道路几乎全被注定，不可逾越。温存的残梦，也全成了"窗前的露水与雾"，日光之下，消弥无形。

五　天堂漫游

康有为归国后的一年间，康梁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此时的梁，身为袁世凯内阁成员，而康则蛰居沪上，数次拒绝了袁世凯要他入阁的邀请。随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显然让他们同时感到愤怒，两人都卷入了二十世纪初的军阀政治中。

据美国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的统计，在 1914—1916 年的三年间，康有为曾同五十余位军界高级人士发生过联系。这些人手握重兵，占据着中国南方和北方大片的地盘。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旧部下，有的是受招安的土匪，有的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和一些激进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出身际遇与效忠对象各各不同，但几乎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本来，康为了养活这个庞大的家庭，每月需有两千元的进账才能勉力维持，而庞大通讯费的支出使他在上海的日子愈显拮据。

1916 年，与康有为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是一个叫张勋的军阀。这年早些时候，康在写给张勋的信中暗示说，中国已到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而恢复帝制，清室当仁不让。1917 年 6 月，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清废帝重坐龙庭。康应邀坐火车重返北京。这是他自 1898 年仓促逃离后首次返京。熟悉的宫墙和屋宇让他顿生怀旧的感伤。他出任弼德院副院长一职而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但联系到他历来鼓吹以孔教为国教重建国人信仰的主张，这一职务也算是名至实归了。在一首今已残佚的诗中，他描绘了自己那一刻的心情，大意是：丧乱已历六年，随着大龙旗再度飘扬，国家终于重返太平。

梁启超则站到乃师的对立面，在"丁巳复辟"发生的当天便通电反对，并说动段祺瑞驱逐张勋。闹剧很快收场，在反对派的枪声中，康有为躲进了美国使馆，闲翻儒家的典籍《春秋》以度时日。

梁启超后来又如何呢？他出任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这一新职务的实际职责，是为新的内战筹措军费。但是捉襟见肘之下的向日借款，使他在国人的反对声中成了北洋诸军阀联手抛出的牺牲品，就任财长四个月就不得不黯然下台。这

是他后来忏悔的"迷梦的政治活动"之终结，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能够重返政坛。（在1920年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把康有为尊为今文经学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批评了他为人为学的过于主观自信："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他批评康"过于自信"，"轻视后辈"，"今老矣，殆不复与世相闻问，遂使国中有一大思想家，而国人不蒙其泽，悲夫"！而实际上1920年的梁启超，也已被抛出了中国政坛，成了一个过气的政治明星。）

1927年3月，梁启超及康门弟子自北京南下，到上海为康有为庆贺七十大寿，并亲撰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矣！"把康比作至圣先师孔子。连离开紫禁城后在天津日租界避难的前清逊帝溥仪，也托人送来玉如意一柄，匾额一幅。此时的康有为已好久不公开露面了，他最近的一次公开表态，是致北方军阀的一封通电，要他们按照当初1912年制订的一份协议，恢复溥仪的俸给及住在紫禁城的权利。在生日的一片热闹和喜庆中，康却感到隐隐的不安。

此前的康有为已经沉迷于星际漫游的幻想中了。有一次他坐飞机飞临河北保定上空，如同他后来在一首诗里所写，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位自天而降的圣人，对众生的苦难耿耿不能释怀。自那以后，康的心灵一直在天堂漫游。此前一年，他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天游学院"，并且到处撰文和演说，大谈他的神游经历和神奇梦幻。他甚至梦见过自己在编一份火星地名索引，就像编一份传统的地方志一样。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诗中，他已经把西方的天文观测与传统宇宙论所说的天堂结合了起来。

过完七十寿辰后，康有为离开上海，去了山东省南部的滨海城市青岛。几年前，他在福山路靠近小鱼山的位置花一千银圆买下了一幢别墅，名之为"天游园"，并自号"天游化人"。据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康离开上海前，亲自检点文稿，并携带朝服，临行前又巡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相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就好像预先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到这座城市。

这次青岛之行，自然不会再有十年前鹤子姑娘陪侍在侧的快乐。康在青岛开始写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一份感谢溥仪送来生日礼物的长篇谢恩折。他的手虽

已发颤，但这篇文字依然布局优美，雅驯工整，书写方式完全按照前清的宫廷礼制。谢恩折追忆了从戊戌年的变法到十年前未遂的复辟期间的纷乱世事，作为一个清室的忠实追随者，康在文中自称老臣、微臣，凡是提到天，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高两字，凡是提到自己时，一律把字都写得很小。由于过分激动，未写数行他就开始痛哭，写完了告诉家人说："吾生毕矣！吾生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

1927 年 3 月的最后一天，康有为在青岛福山路的寄庐，把他的前清朝服铺在床上，依礼沐浴后，在朝服旁正襟危坐，半小时后死于脑溢血。（也有一种说法，说康有为是在这月底赴某粤菜馆的一次同乡宴后因食物中毒去世，由此引发对康的死因的种种猜测。有说日本人投毒的，也有说慈禧生前所遣杀手下毒的，莫衷一是。康同环在《先父的墓碑》中这样说："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得知乃师去世的消息，时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痛哭数日，率清华院全体学生在法源寺开吊三日。那时的他，肯定想起了十八岁那年的秋天在广州和康的第一次会面，以及随后的一次次争论。曾经，那次会面给了他以那么大的震撼，并进而影响到他一生的道路：在写于三十岁那年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他曾如是记述过当时的心情："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其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两年后，1929 年 1 月，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肾炎、肺病多症并发去世。

人物档案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1879 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1888 年 10 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

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1890—1893 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 年，刊印《新学伪经考》。

1895 年在北京应会试时，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政变后，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遭通缉，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1901—1903 年间，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 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

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 年返国，1917 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

生平著作甚丰，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辑有《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百年约园

——张寿镛的传奇人生

一　消失的石榴树

1876年暮春的一天，张寿镛出生在宁波城中的呼童街上。

此处是这个素称士乡的城市的中心地带，周边不过数里的地域范围内，汇聚着传统中国城池的各中心要素——府衙、学宫、考棚、鼓楼、城隍庙。一到童试（清代科举考试前的预选试，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分别由县令、知府和学政主持）时府试期间，衙役们大声呼喊从各县赶来住宿在这条街上的童生们前去应卯，因此这条二三百米长的窄巷子被叫做呼童街。帝制时代的中国，文人欲求仕进，必须参加从地区到省再到全国级的层层考试。科举考试中的童试，可说是向着文官秩级迈进的最初一块基石，得中者就有了秀才的功名，可以见官不拜，可以穿长衫，可以优先享受国家教育资源。总而言之，他就成了特权阶层中的一员，尽管还在低级地位。可以想见的是，只要该生员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参加乡试、会试高中乃至殿试时金榜题名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他就从低级特权阶层迈入了高级特权阶层。

张寿镛出生在这样一个考试空气浓郁的城市里，再加进士出身的父亲的敦促，除了钻研括帖制艺老老实实走科考晋升之路，几乎不可能再作他想。

张氏出生的1876年，是为光绪二年，时当农历五月，据说其时这条街上的石榴花开得正艳。2002年夏天，我住到了呼童街北端的白衣巷。以此为中心，西行百十步即至的孝闻街上的石库门建筑是民国时期藏书家冯孟颛先生的伏跗室，东行百余步，中山公园边上的仿古式建筑即是张苍水的故居，但走遍呼童街及附近

的尚书街、法院巷、穆家巷，我也没有找到一百二十多年前张寿镛出生的那幢房子。或许那幢房子，连同五月间开花的石榴树都已经消失了吧。“照眼榴花今古意，且从淡处矢精神”，也许他早就意识到了消逝，流转乃是生之本相。如今这条街上，多的是法国梧桐和香樟树，却已再无一棵石榴树了。

在这里考察一个人与一条街的关系显然有些牵强：在七十年的人生途程中，张氏在这条街上度过的岁月即便算上人生的初年，也不过十一二年。更多的时候，他像一只行踪不定的鸟穿梭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繁华都市，偶尔才会回到这里歇歇脚，梳理一下被雨淋湿的羽毛。尽管对他的早年生活所知无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个滨海的浙东小城度过了人生最早的几个年头，和他为数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在这条窄小的巷子里蹒跚学步，并用宁波土话相互争吵。

有据可查的是，六岁那年，他和母亲、大姐、二弟随着做京官的父亲去了北京。他们住在薛家湾的鄞县会馆里，这是宁波人在京城最早开办的会馆之一。严厉的父亲开始督促他读《诗经》。可这个贪玩的孩子更喜欢在天晴风畅的日子里去放纸鸢。他年纪不大，却称得上是此中老手，长长的风筝引线可以长达数里。远远地看到父亲回来，他就把线交到大姐手里逃回家中作用功状。这屡试不爽的一招使他多次逃脱了父亲的呵责。他对北京生活的另一个记忆，是在冬日的寒夜里，看母亲与大姐手持针线一灯相对直到午夜。这一幕映到男孩的眼里是多么温暖啊。多年以后，在上海，她大姐六十岁生日的寿宴上，他还说到这些细琐的事。从中显出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重情的男子，且在感情上有很强的依赖性。

因大姐即将出阁，十三岁那年，少年又随父母回到这条街上。他们兄弟三人在一位据说熟读诗书的族叔的引领下开始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还那么小，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却已令大人们费解了，比如不喜欢穿绸缎衣服，父母给的点心钱都要一文一文攒起来，不一而足。比之二弟的聪慧过人，张寿镛实在称得上是个笨孩子。二弟十岁就能文，一写就是洋洋数百言，而他每日读书八行到翌朝还不能背诵，写二三百字的文章如同挤牙膏一样艰难。这个孩子的愚鲁肯定让大人们为他的将来操过心。也许他们惟一的安慰是历史上一些大学者在年幼时都是极愚极笨的，比如王阳明，五六岁了还不能开口说话呢。话虽这么说，对他的功课还是督促极严。这次回乡时间并不太久，两年后，少年又随母入京，一家人住在了康家胡同。

尽管时间已经行进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个年头，可是除了在南方的一些通商口岸，西方文明对老大帝国的冲击还没有表露出明显的迹象，起码在京城，学子和士绅关心的还是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望子成龙的父亲为他物色了多个教师，那都是京城里满腹经纶且有功名的学者。以他父亲做过乡试主考官的资历，这一点应该不难做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教育与五十年前甚至与乾嘉时代几乎没什么两样，小学呀，训诂呀，一样枯燥的《尔雅》和《说文》，一样古奥的行文，如果不是时代的加速度把张氏这样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他也会成为一个粹然儒者吧。事实上，我们年轻的主人公就是这样自我期许的，在一些隐秘的文字中，他已经把自己的祖先推算到汉代的张良和唐代宰相张九龄了。

几年后，张寿镛和母亲到了上海。关于他的这次上海之行，较为可信的说法是为了迎娶未过门的妻子蔡瑛——当时租界内首屈一指的中药店蔡同德堂国药店老板的女儿。蔡氏家族以在汉口经营布业致富，大约是在光绪八年(1882)的时候迁往上海，以纹银二十五万两建起了这一闻名上海滩的国药店。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三，当一对新人在新闸路新酱园弄成婚时，新郎二十岁，新娘十八岁，正是花儿一样的年龄。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新夫人是个虔敬的佛教徒，还在闺阁中时，每日必进经堂二次，诵《金刚经》二遍。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张氏和他笃信佛学的妻子的婚姻一直是知识圈内的楷模。夫妇两人，书声呗韵，堪称神仙伴侣，一个热心社会公益，另一个也不遗余力予以支持，正应了张的母亲的一句遗言："屋上檐头水，点点不差沿。"当然这是后话，不提。

婚后不久，张寿镛携新妇坐招商局的轮船回到宁波，住进呼童巷的祖宅，为年底的府试准备资粮。他虽年已二十，但因还未进学，还只能算是列籍宁波府的一个童生。是年冬天，呼童巷的张家洋溢着一派喜气。张寿镛和他的二弟应童子试双双中魁，考中秀才，入泮为生员。考虑到他们的父亲当时还在北京做着清苦的京官，张的岳父、蔡同德堂药店的蔡老板有心为女婿捐纳一官半职，也好谋得一份俸禄，与女婿商量此事，没想到他一口回绝了，说，这恐怕不是父亲所希望看到的。果然，为人极是方正的张老爷子后来得知此事，就训斥儿子道：真正的学子，当从科举之途以进，岂可捐金谋禄？

转眼到了1900年，张寿镛的父亲在京亡故，扶柩南归后，身为长子的张寿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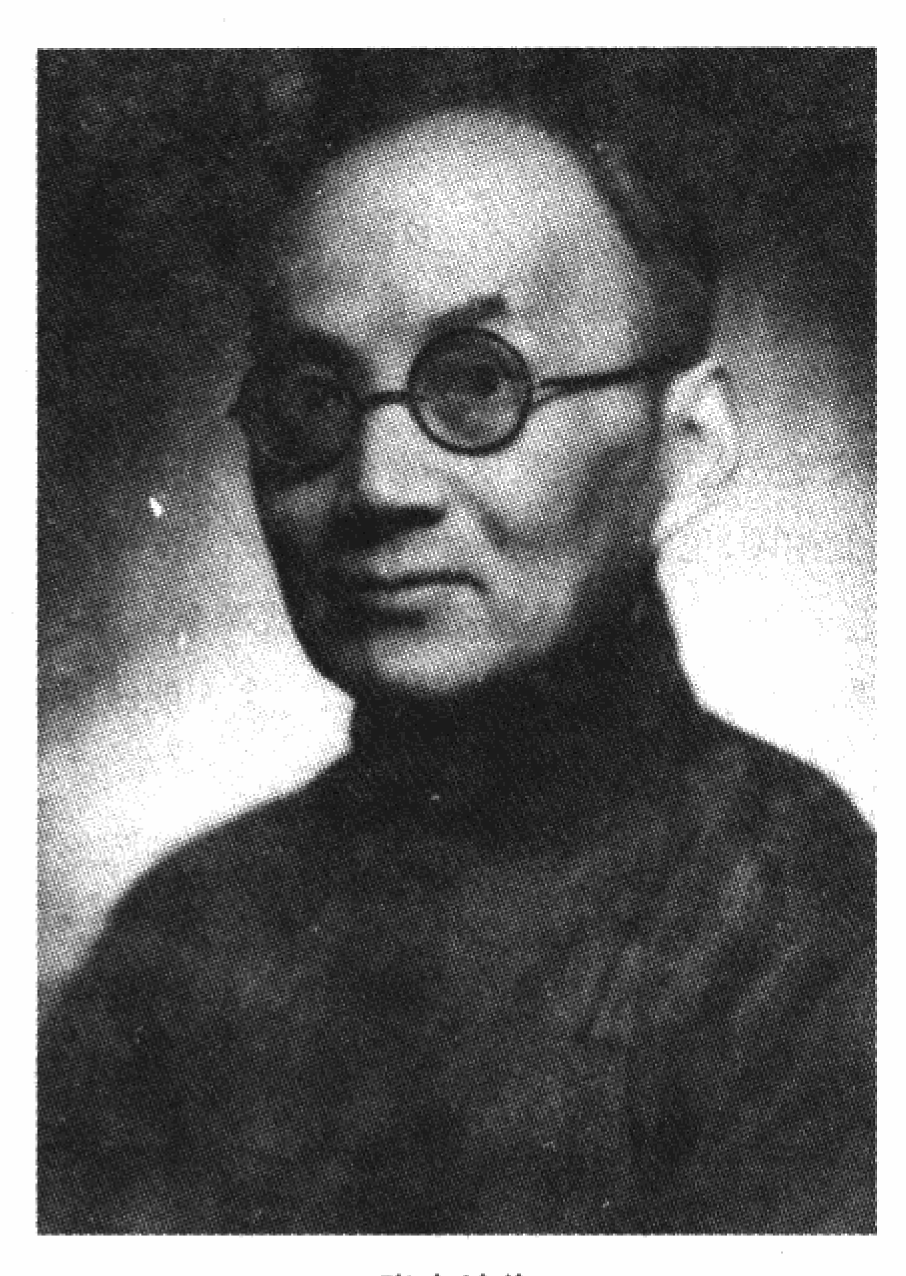
不得不考虑自谋衣食奉养老母照顾两位弟弟了。他听说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新任苏松太道，就跑去晋谒，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道台大人看在故交旧情的份上，给了他江南制造局文案的职务，月薪十六两银子。一年后，他还兼任江南水师学堂的采办。有了这些收入，他也差堪养家了。年轻的小职员把家人从宁波接到上海。公务之余，每日阅读曾国藩、胡林翼、林则徐所作的政书，并受托和二弟、友人一起编纂一本叫《皇朝掌故汇编》的大众读物。书出版后他很不满意，认为“庞杂无体”，“均为科场应用而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也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润笔。

1903 年 7 月，张氏参加顺天乡试。乡试名录脱漏了他名字中“镛”字的偏旁，捷报又误“庸”为“康”。“张寿康”心怀忐忑，毕竟好事多磨，他得中这科顺天乡试的第三十三名举人。来年二月，应会试不中，本想再试，看到父亲亡故后家中经济如此拮据，张氏决定先入仕途，于是以知府衔充任到江苏省。这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其时的帝制中国，也已拖着重病步入到了最后几个年头。

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张氏以一己之力，经略数省财政，创办光华大学，搜罗乡邦文献并集成丛书刊刻行世。近代中国，一个人能做成其中一件，已堪称不易，而本文主人公张寿镛却全都做成了。

现在能看到的张氏中年后的照片，几乎都戴着一副圆形黑框眼镜，镜片后一双明亮的眼睛似乎在凝视着什么。张氏喜着玄色中式长衫，做工考究的那种。肤色白皙，前额饱满，脸型线条柔和，抿紧的嘴角边若有若无的一丝笑意里似含着世事洞明之后的骄傲与不屑。这样一张饱润诗书又散发着浓郁的南方气息的脸，怎么看都像一个诗酒风流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与一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经验主义学者相去甚远。张氏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把诗人明净的心与经世者的坚定集于一身。张氏有个广为人知的别号“约园”，他还以此命名他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住所。关于这一别号的由来，他在晚年回顾平生时曾说，早年一溺于词章，再溺于简牍，三溺于夸多斗靡，于是思幡然易辙，自号曰：约园。他自称无文人之实，又不敢居学者之名，世衰道微，只求个心之所安。“余何尝有园，有约乃有园，园者囿我者也”，“余既不欲为物所囿，而我心不能不有以囿之”。这一道德自律不无清教徒色彩，却更显出了斯人浊世真君子的本色。

2006 年盛夏的一天，我站到了杭州约园的门前。正是台风过后，空气潮湿而



张寿镛像

闷热，约园所在的体育场路与弥陀寺路交汇处的路口满地都是伏身在水洼里的梧桐叶片，被大风吹迷糊了的小鸟还在惊惶地飞。这里应是张寿镛1912年任浙江财政厅长及1923年再任时在杭州的居所了。房子是中西混杂的风格，二层三开间西式楼房，砖木结构，青砖实叠。可能是文保部门刚做过修缮，外墙白灰的涂料和门窗的漆色还是新的。邻近居民堆放在角落的旧家具、废品，错综的电线，街口嘈杂的市声，让人很难把这幢建筑与它的旧主人联系起来。但是，围墙东侧那块写着“约园”二字的界碑，还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就是那位藏书家的藏书楼。堂前燕子，年年春风，或许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潜行在民间吧。

二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张寿镛最早为人所知，是他的理财才干。早在1912年初他初涉财政担任上海货物税收所长时，就因措施之得体深受上海商界之首肯，以致当他离沪赴杭履任浙江财政司司长一职时，沪商界各主要商会都纷纷致电浙江都督朱介人请求财司一职另选他人，把张留在上海。当张离任赴浙时，清理账目，上海货税所多出了洋钱七十八元，被誉为“天下第一厘差”。从来征收官吏与被征者都是一对矛盾，很少有税官不中饱私囊的，从这一多出来的厘差中可以想见张氏为官的清廉。

这年9月，张寿镛赴任浙江。民国初元，正是革故鼎新百废待举之时，财政更为种种矛盾集中的焦点。据张到任时初步推算，浙江一省的财政年缺口达七百余万元，而一年的预算连国税在内，也就一千六百万元，且可以征用的税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还要支付年内军需筹备三百万元，及光复时的军用票面额二百万元。张寿镛之任浙江财政司长（*后改任厅长*），其风格以稳健、严厉著称，对属下官吏的管理、整饬更是雷厉风行。经全力整顿，至1914年，浙江财政收入大增，岁余达五百万，解济中央政府三百万元。浙江财政由此成为全国之翘楚，张也始为当局所瞩目。于是一纸调令把他从浙江调往当时财政最显困难的湖北省。

张氏执掌湖北财政，为1915年至1918的三年间。在他到任之前，湖北财政一直不佳，连年“财政支绌，开源不易，节流无方”，其原因除了经济落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征收官吏的腐败。张还在浙江时，对湖北财政官员接二连三的落马应也有所耳闻：前任财政司长潘祖裕因“玩忽公务，损害公家财物”正在受审；继任司

长黎澍“整顿财政毫无成效，免去其官”；再继任的胡文藻因挪用公款参与赌博而被参革。当局另调蒋懋熙就任湖北财政厅长，老于世故的蒋深知这浑水不好趟，又故意拖延两个多月不赴任。中央政府决定抽调整理浙江财政卓有成效的张寿镛前往湖北时，他的同僚都为之鸣不平，张这样告诉他们：仕岂择地，岂亦畏难，虽云、贵吾往焉。

赴鄂就任前，张寿镛进京拜会财政部要员，财政总长周缉之面授机宜说：湖北的摊子全烂了，胡文藻所委用的各税厘征收局长，多不可靠，你到任后，应迅速认真考察，从严甄别。到任不久张寿镛就领教了湖北松垮不堪的衙门习气。一日他八时以前到厅批阅公牍，各员却大多未到。生气至极，张召集属下训斥道：“若以后如此怠惰，定于未便。”一句话，你就卷铺盖走人吧。不久后的考成中暴露出征收官员们亏短、包妓、贪污等种种弊端，各处厘差怕在人事调动中失去位置，忙着干谒、请托，张这样对他们说，本厅长“赋性拘迂，清勤自励”，有哪个不知自爱、罔顾廉耻要请托的你们就来试试吧，我把话先搁在这了，“害马不去，则闲厩不孳，莠草不除，则嘉禾不植”。

鄂居天下之中，道途四达，江汉之水过而不留，地薄土疏，理财之难，过于他省。历任司财政者，因预算出入相悬过甚，又不得不增筹收入，以资应付。本着“为地方辟一生计，即为国家增一税源”，张鼓励垦荒、办厂、开矿、通商，废除苛税杂捐。期间他对湖北某县拟购优质桑秧改善蚕丝质量一事的批复，简直就像一位农艺技师在宣讲《农桑辑要》。湖北一省财政在张的连续几年整顿下明显好转。因不满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扩充势力掠夺民财之举，三年后，张去职调京。行前，把任内牍稿一百一十五篇择要辑为《约园理财牍稿》，于 1919 年春天出版。在自序中，张回顾了任职湖北的经历：

> 寿镛服务民国，忽忽七年，由浙而鄂亦越三年……寿镛莅鄂之始，外察闾阎之情状，固已吸髓敲骨，而内觇国库之盈虚，则又捉襟见肘。于是殚精竭思，求所以足国足民之道。一面综核名实，严杜侵渔，一面培养税源，厉禁苛取，本是而行效，乃渐著。四五两年度收入，衡诸预算，则有羡余。收入与支出在预算范围以内，亦足以相抵。

1918年8月，张寿镛从湖北省财政厅长任上调北京财政部，在秘书上行走，开始闲散的京官生涯。“冷官事偏杂，平衡太渺茫。”本是闲官，长官多有推诿，部中入不敷出，差距甚大难以平衡。性情冲淡的他也禁不住发起了牢骚。也正是这年冬天起，海王村、琉璃厂等处的旧书肆开始频繁出现一个南方书生的身影。张寿镛后来在《六十年之回忆》中说起这段日子：“由鄂调燕，此数年中最无足述，然收罗书籍之多，实在数年中。随得随读，以补历年仕途中未读书之失。”

两年后，张被任命为江苏财政厅厅长，因江苏督军李纯欲用其亲信，挡驾而未成行。不久，派任山东财政厅厅长，但山东刚开完八团体财政会议，拒绝外省人士执掌山东财政，甚至派人到火车站阻他赴任。张在任仅七天，饱受排挤，尝够了像赌局上的筹码一样任人摆布的滋味。回到北京，他继续充任财政部库藏司会办的闲差，却难掩对仕途的失望与厌倦，自谓“此数年中，最无足述”。然而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件事给他以极大的触动：陈嘉庚独力捐资四百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他把此事郑重记入自订年谱，从这一事件中他隐隐看到了自己下半生的影子。

就像一辆在驿道上奔驰的马车，惯性还要驱使着他在仕途上走下去，继续出任浙江财政厅长、沪海道尹、江苏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等要职，见证并亲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云变幻。1927年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因军费开支庞大财源枯竭，财政部长孙科赴上海筹款遭到了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的一致谢绝，蒋介石托虞洽卿出面约谈在江浙财政界著有声望的张寿镛，欲以江浙两省财政相嘱，张再三辞让，最后还是出任了江苏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一职，为北伐解燃眉之急，后又兼任财政部次长一职。直到1930年，借江苏省政府全面改组之际，他才得以辞去财政厅长一职，并于次年终于获辞财政部次长。自此，他得以把主要精力放到编辑刊刻乡邦文献和从事大学教育上来，而这也是他辞官从文的动力之所在。

当了近三十年财政官，他最不愿意人们提及并谈论的也是他的官宦生涯。在退休后写的一首诗里，他感叹：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他说他要“欲遂读书趣”。他自述心志说：一朝卸职，如释重负。我的心愿，现在剩得甚少，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如何将光华大学办得完完全全；第二件事，即为编《四明丛书》十集。

辞官的另一个原因乃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张氏的司财理念及夙愿，是“藏富于民”——欲使财政富裕，必先使百姓富裕。“财政视国民之负担力，欲负担

之充裕，则在国民富足。”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牧羊，羊肥而毛自繁，剪之易易，而民国时期田赋捐税之繁多，在他看来已到了“吃羊骨”的地步。“国家无政治系统，社会无经济能力，所以财政弄得如此绌。”早在二十年代晚期的一场演说中，他把二十年财政之经过谓之“二十年财政之痛史”。

1934年，辞官三年的张应老搭档、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以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在会上疾声吁请当局减赋，罢除以前的一切苛细杂捐。“现在国难方殷，经济几濒破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近年来农村已到了总崩溃的时期”，“工价贵，米价贱，这是农村破产的一大原因”，这样的话在衮衮诸公听来或以为危言耸听，但张还是毫不客气地说：“寿镛今日以公民的资格说话，并以公民的资格希望于中央诸位先生及地方诸位先生下一决心，最低限度，自今日起，永不加赋。”他这样的司财理念自然与执政者的意志相左，废除厘金、推行良税等做法也就无法落到实处，既然不能尽其志，退居海上从事文化与教育也可说是他最佳的选择吧。

三　日月光华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25年5月底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向为抗议日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而游行的人群举起了枪。正是这一血光中的五卅惨案让时任沪海道道尹的张寿镛激流勇出，当仁不让地主持起了一所新办的大学。

南京路发生血案的当日黄昏，有个现场目击者、原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肄业的学生径奔母校告知此事，全校师生群情激昂，于6月3日上午八时自发聚集在图书馆前，降半旗致礼，为死难国人致哀。外籍校长赶至现场干涉，驱散学生，并侮辱国旗，张贴布告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学生受此奇辱，放声同哭，有五百余人签名宣誓集体离校。此时，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沪海道道尹一职的张寿镛一方面以官方身份与租界交涉处理五卅风潮善后，一面应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要求，接洽筹办新校之事。曾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松沪督办的王省三其时以耆宿居沪上，他和张寿镛都有子女在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就学，这一事件发生后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

摇头叹息道: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沪西大西路底置有地产约百亩,原先是准备建造公墓的,此时表示愿意捐献出来供建设大学之用,以容纳从圣约翰离校的师生们。他表示,这些地产与其日后让一家子弟受益,不如捐出来,让大众子弟受益。这个曾经出使西欧各国并任驻日使馆参赞的前外交官还对张寿镛说,昔年考察外交形势,我早就提倡收回教育权,今睹此情形,愈觉收回教育权之必要。有感于王的毁家兴学之举,张当即捐资三千元作为校舍建筑费。办学倡议得到了商界巨子赵晋卿、学界领袖朱经农及曾任江苏省交涉使的许秋帆等人的热情支持和赞助。一个由二十三人组成的大学筹备委员会随后成立,由张亲任会长。新校筹备委员会决定成立光华大学,因王省三、许秋帆诸人都已年迈,公推张为校长。是年 9 月,光华大学成立,先在霞飞路(今淮海路)及杜美路(今东湖路)租房上课。次年 9 月,大西路新校舍建成,即迁入上课。从师生们退出圣约翰到光华成立并开学,历时仅三个月,如此之快创建起一所大学,真是世所罕见。

年初,大西路新校舍举行奠基礼时,时年八十六岁的马相伯先生也来了,这位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为复旦和光华两所大学几乎相同的创办经历感慨不已:“复旦为退出震旦而组织者,今日光华,亦同此情,天下事真无独有偶。”并在即席演说中援引了古诗《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时这首古诗经作曲家萧友梅谱曲,正作为第五首国歌在全国推行)。张寿镛在演说中表示,一到他交卸了沪海道道尹这一职务后,“即专力办光华,尚望同学本全作精神,俾俯完成”。

在光华大学首届毕业典礼上,张报告校务说,迄至是日,已募集到经费十一万余元,课堂及宿舍都已完工,体育馆及化学室也已在开工,暑假过后大学即可迁入新校舍了。他在赠言中寄希望于光华的学子们:一、崇尚气节;二、培养博大之局量;三、维持坚苦之操守;四、有群无党;五、作事争人先,成功居人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则希望光华诸君,从“教育独立”走向“学问独立”。

张氏主持光华校政,其兼收并蓄、罗致人才不无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效仿。延请的教授张东荪、潘光旦、王造时、罗隆基、蒋维乔、容启兆俱为一时之选。1930 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专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解聘。为此,张呈文国民政府:“今旬奉部电遵照

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此事后来虽无可挽回，张对校中进步教师的着力保护和勇于担当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是一所尚在建设就已开办的大学，最让张校长头痛的怕还是经费问题。以他财政专家的精练，他算过一笔账，租赁的校舍，月开支需三千两，实在太不划算。但是，要在王省三先生捐赠的大西路的空地上建起一所大学，必须筹措到十四万。1930年，张校长在《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中回顾了草创时期的艰辛：

> 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反，借甲损乙，补屋牵萝，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诚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

至抗战爆发前，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等人的擘划下已蔚成规模，校基扩大至近百亩，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大礼堂等附属设施。“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正好处在两军激战地带，昔日书声琅琅的校舍成了一片瓦砾。站在大西路铁轨旁，远望抛掷了十四年光阴的校园在冲天烈焰中化为焦土，张寿镛的眼里流下了泪，继而破涕作笑：“我校为抗战而牺牲，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在日后的诗作中，他有“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之句以志其事。

炮火声中，张带领全校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继续开学。随着战事走向纵深，日军进入租界，张毅然解散大学，以“诚正学社”、“格致学社”的名义收纳文学院和理、商两学院学生，还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以维持斯文于不坠。

1938年五六月间，已年届六十三岁的张寿镛离沪去港，复转机飞往大后方重庆和成都。这次入川，除了在成都草堂寺商议兴建了一所光华分校，他还收获了一本记述川中风物和游历心情的诗集《游蜀草》。十几年前光华初创时，他发愿与大学终身相随不弃不置，其所行所历，履行了这一誓愿。

四 当书痴遭遇战争

南方文化传统的两个忠实继承者张寿镛和张宗祥于1923年秋天在杭州开始了一段密切的交往。在这之前，他们或许相互仰慕，并在北京、杭州的社交圈中有过初步的接触，但肯定算不上知己。是年初，离浙六年的张寿镛再度出任浙江财政厅长一职，其时的浙江经济已远不如前，积债已达数百万元之巨，但张还是雄心勃勃，离京前向故乡耆老发誓振兴经济又"不增重浙人负担"。也是在这年秋天，雅好文史、写得一手好字的海宁人张宗祥从北京回浙江出任教育厅长一职。曾任京师图书馆主任的张宗祥小张寿镛六岁，平生蓄书无数，又喜手钞古籍，曾发宏愿要抄尽天下古书。张寿镛去他家看书，发现好多书他见都没有见过。张宗祥自训诂至词章，各擅其胜，更令张寿镛惺惺相惜，视之为"畏友"。两人互通有无，张宗祥还手钞了自己的著述《三书异同论》、《千卷楼随笔》等相赠。

1927年，去职后的张宗祥蛰居沪上，惟以整理抄录、校雠《罪惟录》、《说郛》等古籍自娱。版税收入所剩无几，再加足疾复发，日子窘迫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时任江苏财政厅长的张寿镛介绍老友担任上海地区一个税务所所长的职务，每月可有四五百元的收入。不久，张宗祥调任到江苏宝应、高邮。两年后，因税局停办，回到上海。老友重逢，所谈还是宋刻元梓等种种书的话题，张宗祥赠送了手抄的《赵氏家藏集》等书。说到了税收及时政，张寿镛问："我平生以善办厘金自豪，然不能人人悦之。历时既久，匿名揭帖及公然上诉者，必然百十起，你办税务是半路出家，两三年来，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你是怎么来处理的呢?"张宗祥答："税局薪薄，或十二元，或八元，欲使恃月薪赡家，决无可能，然宝高地僻，习俗俭朴，各分卡人员无花钱之地，故确能做到我要求他们的不亏国库、不病商民的信条，若在江南无锡等处，一宴数十金，一赌数百金，那就一定弊病百出了，所以，这不是我的力，实在是环境使然罢了。"这番话让办了近三十年财政的张寿镛感叹不已。

作为一个传统儒家典籍熏陶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张寿镛很早就把自己纳入到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开创并延续的南方文人传统。这一传统中的修身与经世并重使他一直以来把"兢兢于君子之喻义、而不敢效小人之喻利"作为了一生的行动指南。"一生为人，不蹈小人一途者，阳明之学所赐也。"六十岁那

年，他这样总结道。

自宋以来，张氏的诞生地浙东涌现出了不可胜数的藏书家和天一阁、二老阁等著名的民间藏书楼，浸淫于这一文化空气中的张氏也堪称一个"书痴"了。他的藏书，先是从父亲的旧藏中继承了一部分，囿于科考，"经学为多"。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沉溺于词章，所得典籍以作家文集为主。且俸禄尚不足以养家，虽有志收藏却无力罗致，或有购买，也是零星的通行本为主。民国元年以后，三年在浙任财政厅长，又三年在鄂，政务繁冗，依然没有充足的精力去购书，但此时刊刻乡邦文献的志向已经初步形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购书之广，自庚申年，善本之得也肇于是"，也即他离开湖北任上在京任闲官的1918年。1921年，张仍在燕京，诗《留京》中有"陨坠虑风华，访书聊遣日"之句，可以想见他在京城旧书肆的频繁出入。这一年他购入了同乡历史学家全祖望湮灭多年的一部著作《全谢山句余土音》。这是他第一次以重价购书，花去了整整二百元。自此至1943年，他每年都有购书记录，且花费不菲：天一阁旧抄《职官分记》，以四百金得之于燕京；全祖望删定《晋书》，在甬上以五百金得之；王士祯珍藏过的《宋史记》，八百金分两次得之；《剡源集》以一百二十金得之；弘治本《五经白文》以四百金得之。当然还有一些来自亲朋好友的馈赠：族丈张让三赠《张苍水集》；族兄张之铭赠《钱忠介公集》（此书经冯孟颛整理后刊入《四明丛书》第二集）；胡适赠二老阁本《石鱼偶记》。

1930年，张氏收购的歙县宋氏一览楼书，有阮元等校《太平御览》，他按捺不住欣喜，称这是"生平购书之第一豪举"，"所藏雠校之书，亦以此为第一"。这些年的收藏越来越明确的指向是关于乡邦文献的：《两浙耆旧传》，《明遗献传》，《鲒埼亭诗集》，《管村文抄》，《剡源文钞》，《浙东山水簿目》，《类辑姚江学脉》，全祖望删定《晋书》、《范文正公集》，等等。到了晚年，追溯既往，张不无自得地报告他的藏书量，"积五十载之时光，储十六万之卷轴"。他在上海爱文义路地块建造的寓所里用带草堂、鸡鸣馆、临流轩、独步斋、燕贻榭、双修庵、听雨楼等十一处藏书处安置他的十六万册图书，并在静观自得中盖上"寿镛"、"咏霓"、"四明张氏约园藏书"等印章。尽管他自嘲以私人之力而欲与秘阁抗衡，"可谓痴矣"，但还是希望子孙们多作书痴，毋习为宦巧。看来他是打算在这个花费了一生心力打造的书城里终老了。

张寿镛的家族，与明末忠烈张苍水一系是近支，张收罗苍水著作的各种版本

二十年,所得不下十余种。1914 年 5 月,他寓居上海的一个族丈张让三赠给他一套《张苍水集》,一再劝勉他刊刻先哲遗书。但是,在宦途奔波的张一直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做这事。到了 1920 年,张寿镛藏书达到十万册,老人那些劝勉的话又冒了上来,他自忖:藏书不能读,读而不能用,何必藏书?他想做一件大事,混沌中他看到了此事的轮廓,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处着手去做。

1931 年寒食过后,辞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张寿镛回乡扫墓,在宁波与当地学者冯孟颛有过一次重要的会晤。张出示了他的地方文献收藏数种,其中多有宋理学、诸子之作。冯提议说,可以经史子集四部兼采,出版一套丛书以扩大影响。张为难地说自己的收藏还是太少。冯当即表示,自己愿协助编辑,并出历年所蓄孤本百十种,以供选刻。一个规模宏大的刊刻、编辑《四明丛书》的设想由是拟定。这项工作不久还吸纳了张的父亲的学生、象山人陈汉章参与。陈后来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历史学家。

1932 年冬,《四明丛书》第一集刊刻出版,收录黄震《古今纪要逸编》、戴表元《剡源文抄》、李邺嗣《杲堂诗抄》、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等著述共二十四种一百三十七卷。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发生的如下事件——是年初,日军袭击中国上海驻军,强占闸北;更早一年,"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尽沦敌手——自然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集文字中的"家国之痛"和编辑者思想理路上的"教导人民的色彩"。本集中的许多点校和评论,择其要点可以归纳为:当政府崩溃,人民不再支持其政策,这时必须冷静地考查教育和学习问题;但如果政府失去反抗敌国入侵的力量,人民有责任凭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所选作者,从宋遗民王应麟、黄震到明末的文人李杲堂、周容,既没有创造惊人的奇迹,也不是消极到遁世的隐士,他们都是与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休戚相关的鲜活的个人,这些人一方面参与了社会的实际事务,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中央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联系到张在多年官场生活后的辞职,这种编辑思路里不无他对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一种含蓄的批评和指责。

乱世需猛士,在张寿镛看来,明清之交的政治气候可与南宋覆亡时有一比,"气节之士"尤多于常时,而当下内忧外患迭乘,国难当头,更与晚明时无异。当书痴遭遇战争,从传统资源中寻求对外侮的回应几乎是所能报国的最好的方式之一。从 1933 年开始编纂的《四明丛书》第二集,入选作者几乎是中国历代忠义节

烈之士，尤其是把当时能搜罗到的投身明末清初抵抗运动的浙东知识菁英，如张苍水、钱肃乐、翁洲老民等人的诗文尽数收入其中。张在丛书序中引述了清中叶历史学家邵廷采的一段话，亦可看作他自己的文章观：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

当张寿镛从传统中找到了应对外侮的资源，这传统已经不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僵死的遗产，它是一种超越时间而有着相同主题和关怀的思想共同体。在这里，这种主题和关怀可以看作是各个时代的著作者们普遍强调的忠、孝、仁、义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但又未始不可以看作高涨的民族主义激情下对国家的忠诚。

众所周知，张寿镛的故乡浙东，自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自王阳明以降出现了一个绵延数个世纪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些刚烈之士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殊死抵抗表明了他们以气节相尚的传统，张苍水、钱肃乐、“六狂生”、“五君子”，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使得这块土地在后代人的记忆中“忠臣系踵，义士连闾”。而自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以来的这一脉络中，代代相袭的把一切史学视作当代史的务实经世精神，更是抵达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高峰。所以张在编选这些前辈学人的文字时，可以这样骄傲地说：今之所述者，一乡之士，而皆天下之士也。当然他也没有放过机会引述黄宗羲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在这座城市讲学时的一句著名的褒扬：甬上多才，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薪火之寄。

1935 年 6 月，张六十岁生日，在一首感受怀诗中他这样自剖心曲：勘书岁月销磨易，报国心肠抒写难。他想用十年时间刊成丛书十集，只是不知道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了。在稍后写下的《六十年之回忆》中，他说：我积二十年功夫搜到乡邦文献不下四百余种，就我已刊之四集，约百种，然已花费至二万金以外，再刻六集，非再有三万金不可。现在经济已形拮据，不知能毕我愿否？

1937 年 9 月，沪上战事正烈，在上海寓所的张“双鬓已皤，一卷不释”，把自己关于宋元学术思想脉络梳理的著述《宋元学案补遗》作为丛书第五集惟一的一种刊印于世。当他于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完成这项工作，一定想起了同样从事过江南学术史梳理的黄宗羲和全祖望，并把自己归宗到了他们所开创的浙东学术的传统中去。他州作客，垂老收书，斯世虽乱，吾心不乱，他自信，自己的著作和前人所作一样，在这个乱世中，都将起到坚定国人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作用。

张寿镛的这一全凭一己之心力发轫的文化工程，得到了前述如冯孟颛、陈汉

章等众多朋友的襄助，刻到第七集时，他有过一个统计，一百六十种一千零七十七卷中，清四库著录者十分之三，得之冯孟颛伏跗室十分之二，得之朋友及民间人士献其先世著述十分之一，自己四十余年搜罗的积累十分之四。从书陆续刻成的1932—1940年的九年间，正是战火从东北烧到东南、又从东南烧到武汉的过程，我们会看到，随着战事的深入，他在序跋文字中的感情也越来越激昂。

从书以下几集，他虽已编成，却阻于时势在生前一直未能出版，在一封写给“四明学社”诸君子的公开信中，他把这项工作的源头追溯到了清初历史学家万斯同那里，并再次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称自己虽是量力而为，却囿于学识，老境渐至，实在是“如蚊负山”，寄希望于后来者，“合天下之智以为智，合天下之功以为功……”

期间，他在做的还有一件与书有关的事，是与藏书家郑振铎、徐森玉等人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两年之中共收购善本古籍三千百八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这些劫后之书悉数从香港转运到了战时的后方重庆。在他们看来，一介书生，能以此报国，这比黄宗羲他们在天崩地解之际以私人之力收拾残余更有意义。

有着丰沛创造力的张寿镛在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据说他有六子十女，孙辈更是众多，但他垂暮之年，那些子女一个个都像鸟儿一样飞到了外面。不可名状的孤独的折磨——尤其是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去世后——以致天性豁达、素来坚强的他在病榻上发出了“生子为人子用，生子亦何为”的感喟。

1945年7月8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记下了他口占的一首七律，其中的一联“颠狂世界天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堪称他一生的自我论定。光华师生、校友前往祝贺，被肺病和哮喘折磨的他已经言语不清，但人们还是听清了他在病榻上低沉的吼叫：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7月15日，祝寿之后七日，张离开了这个世界。

再一个月，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张寿镛在世时就预见到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再也看不到了。

人物档案

张寿镛(1876—1945),近代教育家、藏书家。字伯颂,号咏霓,别署约园,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清末举人。曾任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宁波政法学堂监督、杭州关监督。辛亥革命后,历任浙、鄂、苏、鲁等省财政厅长,淞沪道尹、江苏省政府委员、财政部次长等职。

1925年五卅运动中,圣约翰大学师生抗议美籍校长侮辱中国国旗,愤而离校,创办光华大学,他积极参与,被聘为校长,邀约知名学者多人执教。爱好藏书,设约园,藏书十六万卷。1928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兼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抗日战争期间,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1941年,受教育部委托,与郑振铎等在上海为中央图书馆秘密收购一大批散失在民间的古书,其中善本甚多。收集、刊刻乡邦文献,竭尽余力,刊刻《四明丛书》八集,一百七十八种,一千余卷,卷帙之巨,为国内乡邦文献所罕见。1945年7月15日逝世。

著有《诗史初稿》、《经学大纲》、《诸子大纲》、《史学大纲》、《约园杂著》等十一种,五十四卷。

法官和他的另一个角色
——关于吴经熊的一桩公案

一　一脚踩上了一个好时代？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解说传统中国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蔓延两千余年，到明代而达到了极致。洋洋二十万言的《万历十五年》，也全围绕这一观点而展开。法学家吴经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道德一元论的法律观”：传统中国，向来认为道德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道德的工具。

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与人治的文章中，吴经熊评述道：以道德和其他非法律观念逐渐浸润到一种现有稳定的法律体系当中是很有益的，但对中国法律而言，已到了一种绝顶过分的程度，这引起一种毒化和梦游的状况。“儒家最终的胜利，把法学送进了坟墓，使之变成木乃伊达二千年之久，直到19世纪末期，西方的影响才开始把中国的法律精神从儒家传统的强制外衣下解脱出来。”

作为一个以孟德斯鸠自励的年轻的法学人，也是那个年代首屈一指的法律哲学家，身为南京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吴经熊还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被指定为初稿起草人之一。

在吴经熊的眼中，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肯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在他从事的法律领域里，出现了十几个西方一流的学术大师；在中国，传统法律在西潮的冲击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他觉得自己是躬逢其盛，一脚踩上了一个好时代。他希望中国的法学家很快就会有普遍得到承认的贡献，甚至还突发奇想：这门学问的中心为什么将来不能在中国呢？

1933年5月，吴经熊在上海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共五编二百一十四条。如此之快的工作速度，令国内外的同行大为

吃惊。6月上旬,稿子在报刊上署名发表,征求公众的意见,这就是世人所称的“吴稿”。

这一时期,吴经熊的法学研究从制度层面进入文化层面——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的试验使他最终离开了法学的道路,通过对东西方法律传统的观察与权衡,他提出了一个跨越东西方的法律发展的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法律如何尽可能地促进并充实人生的价值,并随时随地提高人生的意义?在他看来,法律是促进文化之工具,而道德不过是组成文化的一分子,是法律所应承认并予以保障的诸多利益中的一种,而当这些利益相互冲突时,法律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

二　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通信

1921年11月,在美国法学界享有盛名的八十高龄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 Holmes),与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中国年轻学子“约翰·吴”开始了一段充满热忱与智慧的书信往来。

这一年,东吴大学法科毕业的吴经熊刚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深造,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法学论文,旋即在获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所提供的奖学金后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国际公法。

“尊敬的霍姆斯大法官:让我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到欧洲大陆……”年轻人给他素所敬仰的大师写了一封信,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并杂志复印件,介绍自己“生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他坦言,我们的年龄相距很大,但对于永恒而言,岁月与世纪无足轻重;我们的出生地遥距天涯,但对于宇宙而言,汪洋与大陆又算得了什么?年轻人信中那种不受约束的蓬勃的朝气与激情肯定让垂入老境的霍姆斯法官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这些滚烫的句子那么深地感动了他:“我要善用巴黎的环境,我要尽最大努力多读多写,我要最大限度地观察和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一个国家要拯救,我有一个民族要启蒙,我有一个种族的热情要去激发,我有一个文明有待现代化……”

他复信给这个来自异国的年轻人,开始时不无过来人式的“人生忠告”:

你发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目前还未收到，但明天我会努力在省府浏览它。我想，你想要的是一句同情话。我只想进呈一点你很可能并不需要的忠告，但有些丰富的观念年轻人是需要的。一个人不能一步登天。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逃避生活所提供的细节详情和单调乏味的活儿，而是掌握他们，作为通往更大事物的第一步。一个人在成为将军前，先得是个士兵。

但当他读了吴经熊的论文后，又作一书解释“误会”：

昨天的信有所误会。我以为是写给一个初学者，因为你的信抬头是法学院。现在我拿到了你的论文，已拜读完毕，觉得我是在对一个见识渊博的学者说话，他可能哂笑我的建议。我相信你会把我的无知朝好的方面想……

这是一个老人与一个年轻学子之间的心灵对话。一个来自苦难深重的国度，一个正通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实践为一种文明繁荣的法律制度作出巨大贡献；一个是带着生命初始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断案无数、阅世多矣的经验主义者。一生专与麻烦打交道的老法官，深谙现实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考验。

在给“约翰·吴”的信中，霍姆斯欣赏年轻人身上“对法律表示出来的狂喜”，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我只是害怕当你潜入到生活的艰苦活动中时，这种兴奋会变得黯淡了”，“我的推论是，你剧烈地摇摆于狂喜与沮丧这两个极端之间”。但他自诩看到了年轻人胸中燃烧着的一把火，他希望这火，在现世的坎坷中能够幸存并且改变生活。当“亲爱的吴”在下一封信里建议他写自传时，老人告诉他，“我应该继续我的职务，直到真正力不能胜任为止”，他认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事实上就体现了自身精神的历史：“生活将我抛入法律，我就必须对它赋予无限的感情，尽我所能展示其微妙之处，使它在宇宙的伟大安排中得以突显。听起来有点自高自大，但它的确是我所欲表达的，当我所感觉的道理也许仅仅是被召唤去诠释某些当代的法条时，以致仅仅是解开绳子的小结，我也决不把这看作苦役。”

1924 年春天，游学足迹遍及欧美各著名大学的“约翰·吴”行将回国，并矢志以多年历练积累的才智报效国家。行前，他从剑桥给霍姆斯发出了一封著名的长

信。信中他告诉老人,6 月中旬,他将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这片古老的土地,当下正处于重大革命的前夕。信中他按捺不住兴奋,似乎他已经在革命风暴的中心,“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知识与精神的革命,一次文艺复兴!本世纪将目睹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的重生,迎接一个东西方联姻所产生的婴儿”。他相信中国将要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将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他这样安慰老师:“您可以确定,您播的种子将会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获得丰收。”

随后的近十年间,“约翰·吴”和霍姆斯法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络,他们的通信达七十余封之多。他后来检索往事,认为“这是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他是现代社会为数不多依旧严肃并虔诚对待友谊的人。在法律的艺术中,他是我的私人老师;在生活的艺术中,他是我永恒的榜样。犹如一个至善的精灵,他引领我走过荆棘。”吴经熊生前非常珍惜他与霍姆斯的通信,将每封信都重新打字整理后庋藏于阳明山家中,并在去世前托幼子保管。

1927 年 1 月,回国后即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的吴经熊在给霍姆斯的信中,告知受江苏省政府委派,即将担任新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一职,“我会有很多机会在法院表现创造力”。

1928 年 5 月,一封发自中国南京的信件中,吴经熊告知,他已经辞去了上海临时法庭的职务,接获了司法部的一项任命,成为民法典的编撰人。他接下来的工作,是开始考察中国的法律制度,并着手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民法作一完整的比较研究。关于他获得的这项新任命,他惊呼,“上帝!我最美的梦想已经实现”,“我将全力扑到这项伟大的任务之上”。

中国的法学道路在传统和现实的重轭下,自不免歧支纷出,危机四伏,霍姆斯不能感同身受,但以一个老人的智慧,他也约略预感到他的忘年朋友会遭受的挫折。他曾含蓄地暗示说,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考验就是看他在困境中对于生活是否还抱着美好的希望,因为人在春风得意之时,难免要高谈阔论。在 1928 年 11 月的一封回信中,他告诉“亲爱的吴”:“没有人能够指导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承受奋斗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磨难。”

1935 年 3 月,霍姆斯去世,吴经熊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霍姆斯和莎士比亚一样,“他们的心灵属于同一等级。他们的伟大在于将细节的掌握与对无限的经久

渴望结合起来"。在吴经熊看来,尽细微,方可致广大,霍姆斯和莎士比亚一样,对无限的渴望贯穿了他们一生并激活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世界的终极意义。细节与无限,有此二者,他们就可以从世界的细微处看到不可抗拒的整体,就有了把星辰和事物的普遍图景联系起来看事情的习惯,从而不断地追求普遍必然性。在寻常中发现意义,在貌似庄严中发现平常。"像莎士比亚那样,霍姆斯是一个世界的哲学的沉思者,对他来说,宇宙看来是无限的,而他自己算不上什么,并且他的心处于事物看不见的本质中。"(吴经熊《怀念霍姆斯法官》,译自吴经熊《法律的艺术》[*The Art of Law – And other Essays Juridical and Literary*,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Limited,1936],李冬松译)

吴经熊说,尽管他明白老人是非常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后而去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一死亡事件还是让他顿感生命虚空,而这虚空将再难填补。十四年中他已经习惯了不时收到大洋彼岸那个老人的来信,倾听他智慧的絮语,现在,死亡掐断了系连着他们的那条看不见的通道,这唤起了他生命中不可言说的伤感和对人生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质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死亡的意义是什么?人死可以重生么?上帝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上帝的目的又为何?在尘世,我们度过短暂一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这些终极叩问扑面而来,击穿了尘世生活的外壳,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忧伤。

他真希望那个老人到了天堂还能给他写信:"他曾如此年轻,他亦随岁月变老,而今,他不在人世。他去哪了呢?是否还会给我写信?"

三　从"约翰·吴"到"若望·吴"

当二十五岁的法学博士吴经熊揭橥未来中国为"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他对近代中国的这一社会/文化的转型是堪具理性的了解的,他对自我的期许——"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也是了然于胸的。关于他决心投身的法律事业,这位中国法学的开创者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法律比作"莲花"——它生长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契合点上,"它的根深深植入泥土,而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他还颇为浪漫化地把法律与艺术类比:"法律是一种把物质利益的磨擦转化为理想物之光的艺术。"

这般以永恒的眼光来审视常人眼中务实、冰冷的法律问题，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激情，吴经熊自己也觉出了"离谱的浪漫"。他的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是讲求科学性的，而思想视域上则有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广阔与悲悯。他自称这是"空灵的法学研究"。在一篇自述文字中，他说除开法学大师，他还求助于老子、莎士比亚、斯宾诺莎、瓦尔特·惠特曼、康德与杜威。他甚至在法律与音乐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之间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即使是在判决一个不甚重要的案子时，他自称"对于生命奥迹的意识，像幽灵一样不断伴随着我"，"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满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走近法律女神，或许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受过古典精神熏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出生于宁波一个经营钱庄的商人之家，并在六岁时开始接受"四书"、"五经"之类传统中国的启蒙教育。

从其一生行迹来看，这个温文善良的书生太像个诗人了，敏感多愁，忧时伤世，生活趣味上也不脱江南名士习性。这一切与他的职业可说是格格不入，但不能否认，他是二十世纪初叶的著名法学教授，又是一位重要的立法者。问题在于，他那些用英文写就、为他博得了首屈一指的"法律哲学家"美誉的法理文章，要在当下的中国转化为法治的智慧，其距离又是何等迢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誓愿"拯救"、"启蒙"的法学博士回国后的法学生涯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根本没有来得及发挥出自我期许的"孟德斯鸠式的作用"，竟尔在三十八岁那年尽弃所学，皈依天主教，与法学彻底分道扬镳，演绎出了近世中国法学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自此之后，诵经祈祷成了他的日课，圣母玛丽亚成了他灵魂的抚慰者，用这个成了虔诚的灵修者的前法学家的话来说，是"按圣经而生活，非靠圣经来生活"了。

从一开始吴经熊就错了。回国前，他意识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却以为那不过是温良的知识与精神的革命，而不是一场激进的政治革命。事实上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既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大变革的年代，更是一个多方力量角逐博弈、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年代。争夺印把子与枪杆子的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使时代的洪流充满着惊涛骇浪，不仅固有的形制被打碎、重组，日常生活更是被冲到一边。法律和法学的功用和目的，旨在于事实的基础上搭建规则，料理、规范人事，服务、造福人世。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实在是没有一个好的平台给他施展。于

是一边是努力将事情办成办妥的事功追求,而另一边却是事情总是办不成办不妥,因而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更不必说成为中国的孟德斯鸠了。吴经熊曾说:"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就在于这种事实基础的缺失,甚或颠倒事实,吴氏所指的"荒唐"事多了去了。面对这样的时代境况,法学人除了做些零打碎敲的杂活,又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像吴经熊这样生当乱世、却又怀着济世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又是这样温良的性格与悲悯的情怀,怎不失望?

到了 1937 年,生命中一个重要转折的年头。可以想象此前此后,他困惑过,抗争过,他的精神已经备受煎熬。他比拟活在中国就如同是在进行着一场永无止息的生死之间的搏斗。他说,中国正在瞬息万变,有时竟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正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永难踏上坚实的大地。"身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困惑的人",此时的吴经熊,从浪漫主义的峰面跌落到了悲观主义的泥淖,再也没有了十余年前的意气风发。

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完成于大洋彼岸的回忆录《超越东西方》中,他以一种幻灭的笔调回忆说:"无边的幻觉破灭了,不尽的泡沫爆没了,对于一切的新异,吾心早已麻木,惟怀戒惧。东风与西风,南风和北风,一齐袭来,彷佛将我撕裂。偶像纷塌,委地成烬,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 童心之我嚣嚣于新主已至,而讽世之我却置疑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这正可以看作他在外部世界的动荡与纷扰下内心焦灼的写照:

> 我渴慕上主,却忘记了基督乃是回归他的路途。我同情穷人,却忘了人不仅有身体,还有灵魂。我渴望智慧,却忘了智慧只能凭舍己而不能凭自私获得。我渴望权力,但我忘了,是善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才是力量。我渴望自由,却忘了自由只有通过服从神的诫命才能赢得。我渴望生命,却走在通往死亡胡同的大路上。由于道德上的邪恶,我迷失在生命的迷宫里。我越是想凭己力逃脱罪之罗网,我就越是深陷其中。世界变成了我的监牢……这是我的灵魂的忠实写照。

即便如此,他的内心省察的功课不仅没有放下,反而加紧了。这一年早些时候(或许是 1936 年的年底)写下的一则札记,职业的审视里无意流露的悲悯足让

人动容：

>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责任，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惟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对世界的宗教般的关怀，使他一直把法律当作普世的工具而非"利器"，但他并不相信法律真能救民于水火。他见多了世界的贫乏，终于明白最大的悲剧在于认识不到自身灵性的不幸。"那时，我没有认识到，救人先得救己。我也没有认识到奥古斯丁所曾看出的，即一颗灵魂的价值比整个物质世界还大。"这，也从另一方面见证了中国的宪政建设多么艰难。

以法律为业，法律和法学却难堪信仰之寄托，不足以慰藉心灵，他的内心希冀着更大、更广阔的东西。他还说不清那终将到来的是什么？内心的宁静与灵魂的得救？像所有精神世界发生剧烈地震的人一样，惟其信仰缺失时的空白，更觉内心的悲苦："年近四十，却仍未获得我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真是觉得不幸之至。"

知识的洞见无以消弭眼前的困惑、现实人生时时受到良知的感召却又难以自拔，他后来翻译的《圣咏集》中的诗句，也许可以用来描述他此刻的心境：

> 醒来，我的灵魂啊
> 醒来，诗歌和竖琴
> 我将唤醒黎明

真的只有宗教可以把生命摆渡到对岸吗？1936年10月的一则日记表露了他内心的挣扎：

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替代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书本?你越博学,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科学?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官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虚。钱?我曾挣过大量的钱,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名声?我也享有,但惟一的好处只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女人?我曾有够多的女人。孩子?是的,他们是迷人的,但他们认为我不过是一个会哭又会笑的玩具。动物?它们是好伴侣,也令我想到自己的起源,但仅此而已。花园?是美,但我听到外面不幸生活的回声。自恃?我不过是一根细柔的芦苇。

霍姆斯所言不幸成谶。吴经熊“对法律的狂喜”在残酷的现实碾压下瞬息即逝,“约翰·吴”成了“若望·吴”。而胸中那一把“火”,虽幸留存,却终于燃向了灵修。这是吴先生作为法学家的失败处,却是吴经熊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性灵的超拔处。

文人、学者专业兴趣的转向,总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痛,如沈从文的弃小说创作而从事文物研究,王国维的弃文学批评而从事金石研究,与他们不同的是吴经熊可说是尽弃所学、万事从头了。若是深究他何以在1937年作出这一改变了下半生的决定,他的内心又是如何去承受这变化,那将是一个人生命内部的秘密了。这秘密,或许就是他在日记中所泄露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得在黑暗里奋力一跃。”

他这般解释自己缘何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尽管我是一位律师,却总是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我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这也解释了我何以偏爱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而反感19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更重要的是,这个经验使我不喜欢儒家的礼仪主义,而全心同情基督对法利赛人主义的斗争。首次读到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神却叫人活”时,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

他的儿子吴树德则这样探究父亲心智和情感变化的历程：

对于中国和生为他那一代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一个他思虑着作出生命中的转折的阶段——写道，“精神必定备受煎熬”……在他的青年时期，他的内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动荡和文化纷扰的写照，对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归安宁，这发生在香港那一年的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将我从我自己拯救了出来”。

……在检视他的生命和作品时——我发现它们是不可分离的——我知道父亲坚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读者将《超越东西方》草草翻阅后就会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经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只引领着他的手，事实上，他感到是伟大的仁慈和对于上帝的同情，引导他进入上帝神圣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仅仅是他发现了上帝，而且是上帝发现了他。——上帝不是发现的对象，否则就是亵神。这也表达了他深深的谦卑。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规范人世、平衡利益的法律为“器”，精神世界的至一才是“道”。在讲述自己的皈依之路的《超越东西方》中，吴经熊说，“道”之一字，意味着无法诉诸语言的终极的存在，是一切美德和事物的来源。“它是朴素，它是至一。”他这样告诉世人。像任何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他还经常这样宣说，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当然也包括他一度沉迷其中的法学**）不过是神的预示，万物均在神的秩序当中。藉由对最具现世意义的法律和法学的放弃，他自认为抵达了精神世界的“至一”境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澄明。这是遁逃，还是更为勇敢的面对和担当？

四　一个天主教徒的安魂之所

成了天主教徒的吴经熊，天性中早就存在的宗教、文学与诗歌的成分日益增加起来。他翻译了《圣经》，译笔典雅，古色古香，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以致出版后被称为“经熊本”，与天主教“思高本”、新教“和合本”并称。他策划创办了一

份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全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他还写了一本把唐诗与季候相对应的有趣的小书《唐诗四季》。

1946年,吴经熊受命为国民政府派驻梵蒂冈全权大使。

1949年后,他成了美国多所大学的神学教授,讲授比较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同时开始把《道德经》翻译为英文,并开始思考技术时代心灵解放的可能性。以一种灵性自白的笔触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其宗教皈依的历程的自传也于两年后完稿,并在美国出版。

这个早在世纪之初就以一位国际性的法学家和学者知名于世的老人,终于在哲学和诗歌中安顿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诗人,但上主使我的生命成了一首诗,一首悲欣交集的诗。"

人物档案

吴经熊(1899—1986),一名经雄,字德生,西名 John C. H. Wu,浙江鄞县人。1920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次年赴美留学,1925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后历任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及国内东吴法学院教授,一度任上海临时法院代院长。1939年当选美国学术院名誉院士,1941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6年任罗马教廷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1949年后,历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新泽文化学院、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班主任,获美国波士顿大学、波脱兰大学、圣若望大学等法学博士,美国劳克赫斯大学、韩国岭南大学文学博士及园光大学哲学博士,台湾中华学术院院士。历任台湾"司法"、"立法"、"外交"部门要职及"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逝于台北。著有《法律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唐诗四季》、《法律的艺术》、《孙中山先生其人格及其思想》、《超越东西方》、《禅学的黄金时代》等。

参考书目

王韬:《弢园尺牍》,光绪癸巳沪北淞隐庐本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光绪己丑铅字排印本

王韬:《蘅华馆诗录》,光绪庚寅弢园丛书本

王韬:《淞滨琐话》,上海进步书局铅印本

柳亚子、柳无忌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 1929 年版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汪北平、刘林整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朱偰编:《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陈锡祺等编:《林则徐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64 年出版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 1970 年版

《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苏曼殊:《燕子龛诗笺注》,马以君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郑逸梅:《清娱漫笔》,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罗森、何如璋、王韬、黄遵宪等:《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主编,王晓秋等点校,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王韬、李圭、黎庶昌、徐建寅:《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随录》,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全二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7 年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宏业书局有限公司 1987 年版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王韬:《瀛壖杂志》,岳麓书社 1988 年版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美]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美]乔纳森·斯潘塞(Jonathan Spenser):《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

1990年版

[美]德雷克(Fred W. Drake):《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任复兴译,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王韬:《蘅华馆日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1》,上海书店1992年版

黎仁凯:《动荡中的历史抉择: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美]柯文(Paul A. 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张志春编:《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

杨国勇:《山西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

张寿镛:《约园著作选辑》,张芝联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中华书局1995年版

《自述与印象:梁启超》,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徐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美]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刘鹗:《老残游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三册)，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书店 2000 年版

[美]马士(Morse，Hosea Ballou)：《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郭良玉：《严复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董沛：《明州系年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年版

徐继畬：《瀛环志略》，上海书店 2001 年版

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版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李方惠等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清]曾朴：《孽海花》，凌时俊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念群点校，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雷立柏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 2002 年版

李康化：《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3 年版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俞信芳：《张寿镛先生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高阳：《柏台故事》，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罗耀九编：《严复年谱新编》，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张宗祥：《冷僧自编年谱》，见《张宗祥墨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高瑞泉、[日]山口久和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

[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

跋:历史地表下的人性之书

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

2001年,我开始读布罗代尔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是一次有如长途旅行的阅读,其结果是我开始把历史纳入写作的资源。在这之前,我是一个每年生产一定数量不好也不坏的故事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

据说有三种对历史的陈述方式:事件亲历者的陈述,历史学家事后的归纳和陈述,神话化的历史陈述(柯文语)。在"神话史学"中长大的一代人,当他与过去年代里鲜活的人和事劈面相遇,怎不耸然心惊于历史的丰富和吊诡。从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土豆、玉米、小麦和手持小锄的人们的描述中,浮现出了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在那部一百七十万字的巨著的某一页上,我用一支黑色碳素笔小心地划出了这样的句子:

> 人的生活一大半淹灭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以来继承下来,无章无序积累,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在的往昔注入了当今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河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于是我开始了这样一项工作,把过往年代里的人和事放到日常生活的视野——经济、婚恋、疾病、血液、身体——去观照,去捕捉沉潜在历史地表下的人性的幽光。其实那个时候,学界对历史从社会、政治史向着时髦的身体学的转向已有年头了,如同特里·伊格尔顿所说,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它可以投合知

识分子对复杂性追求的激情，它是文化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铰接点。但陡然从小说世界中撤身而出的我对此竟然不闻不问。在我的工作手册上，这些人起先只是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俞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等十几位民国时期的南方文人，尔后它就像一棵生长中的树，扩展到了王阳明、张岱、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戴震、邵晋涵、袁枚、汪辉祖等明清之际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近些年我又把目光投向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锋面上的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段光清等人。斯人已逝，而一部思想史像一条没有边界的河流总在不断的生长中，这样我就从这条大河中截取了将近五百年：从被称作"前近代社会"（沟口雄三语）的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一直流进了二十世纪初叶，一个现代中国。

如果有可能，我还会溯源而上，去唐朝或者宋朝旅行。

溯源

相比较习见的宏大叙事，我把我的工作界定为对一种"小历史"的书写，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2001 年的一个夜晚，我在一张 A4 纸上写下了几个字："叙事·文本·人事"。那时我就明白，我找到了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我对自己说，行，就这么干吧。接下去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知道以后会写些什么：

> 不应仅仅把视线局限于人际纠葛和事件的铺陈，要借用历史学家的技艺，要从地理、经济、权力结构分析、精神病理等多个层面来考察；要有小说家的警觉：历史潜行在温暖的细节里；要运用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文本细读和关键词解读，这些看似边缘，却是进入真实的通道。运用得妙，足以呈现时代的精神和一代人的生命景象。

其实在写于 1998 年短篇小说《明朝故事》里，我已经让文学和历史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了。这个不无先锋气息的小说，通过一个青年对画道的寻找来写徐渭

的传奇一生。小说的最后,我让徐渭消失在了他自己创作的一幅水墨画里。这一结尾的处理方式现在看来实在不无对尤瑟纳尔短篇故事集《东方奇观》的拙劣模仿,比如那篇著名的《王佛脱险记》。事实上,那时我还不知尤瑟纳尔是何方神圣。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在这个方向上我还乐此不疲地写过《一个雪夜的遭遇》、《三生花草》、《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等作品,里面隐约有着苏曼殊、陈独秀甚至魏晋时代的王子猷这样的人物影子。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几乎都有一种重述历史的热情,但"新历史小说"笔下的那种"历史",只是一种让故事展开的气氛和场景,一种假想式的让人物活动的布景,就像苏童、叶兆言在《1934年的逃亡》和《半边营》里做过的那样。从方法论上看,我那时对历史抱着的态度是去解构它,现在则是要从内部去整理、去重建。无疑,解构是容易的,重建更见难度。如果这重建指向的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则尤见其难。

说到历史写作渊源,我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这本书中竟然找到了十多年前自己在书中做过的记号和划痕。那时,一个把小说作为宗教的年轻人,他的床头读物是福克纳、博尔赫斯、昆德拉,是约翰·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他怎么会去读这样的书?又是"历史"又是"观念"的。但我回忆起了确曾读过这本书,并在记忆的角落里找到了它带给我的迥异于小说的愉悦。事实上,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和一个优秀的史家一样,历史意识与现实情怀都应深植于心。

师承

我们了解历史,其实是建立一个自己对历史的观察的过程。一个历史阶段中,可能基于一种视角的观察看上去"真实"一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时会变成垃圾。小说家辛格说,对事实的看法会过时,但事实本身永远不会过时。看着那些触手可及的年代和历史事件被抽象,被装订成册,被一元化,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原本新鲜的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消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一种写作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一场以民间性和日常化对强势话语的文化抵抗。它不可能彻底颠覆宏大叙事,但起码可以去制衡它,不让历史被一元化和公式化。

在影响我的文学和历史观的读物中,有一本绕不开去的著作,这就是黄仁宇

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91年夏天，我从余姚图书馆蒙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了它。当时，这本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的深蓝精装封面的书还没有被任何一双手打开，它在书架上躺了将近十年似乎就是为了我那一次偶然的造访。现在，关于这本书的评述文字和模仿之作已连篇累牍，但当时我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言说发现的喜悦。

到了2000年前后，《万历十五年》这样异质思维下的历史叙事作品开始引起惊奇和欢呼。"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啊"，他们说。其实历史应该是这样写，黄仁宇只不过让史学回归到了传统，回到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亦文亦史、文质并美的传统。

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学徒，我承认还向这些人学过几招：史景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被莫名其妙地被昵称为"瑟瑟"的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史景迁是历史学家中的普鲁斯特，尽管他写康熙皇帝自画像的《中国皇帝》未臻化境，过于蓬勃的想象力又时时溢出史料的堤坝，但他还是启发了我历史叙事应该并且可以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他的书常有一种电影般的特殊效果，并且在他的笔下暴力随处可见。从魏斐德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那种密实的叙事和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一直吸引着我。尤瑟纳尔从二十一岁开始就计划写哈德良了，那一年，她在创作手记中说(她写小说时总是同时写着创作手记)，她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努力去理解、然后描绘这个孤独而又与一切相联系的人。从她那里，我学到了耐心和坚韧，还有找到叙事语调的重要性。我还要提到的是我笔下的人物、我的同乡、历史学家全祖望。为了写出那些命定里的书，蹭蹬一生的他几乎把生命里所有的闲暇时光都抛在了打秋风的路上。"大家必有牢笼一切之观"(全祖望语)，他使一向积弱的南方文风呈现出了坚硬的一面。

历史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亦文亦史，介于文史

之间。

史学只是到了近代失去了想象的活力，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五四时期的学人傅斯年从他的德国老师那里，也可笑地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科学一般严谨。历史叙述需要重新拾起想象力。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关于历史想象力的一段话很精彩：

>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象，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高卢）的话，我们得想象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史学以叙事为正宗，叙事就要讲究叙事策略和艺术。所以我让历史和文学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这一相遇产生的意义，就是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学要去处理的一个资源，而是文学应该面对的事物本身——过去的人和事，指向的却是当下的心灵。探究历史的真实，需要科学的精神，更需要诗意的心灵。历史真实只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飞速变动的时代引发了双重的断裂——知识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传统的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白话文规范的建立和文学程序的建立，大半都是在西方文化和翻译文体的影响下。其实，传统并没有消逝，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传统里。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传统就像一面镜子，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哪里，总能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还可以照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

知识、人性和爱欲

《帝国的迷津》是我计划中的“知识分子系列”的第三部，也是与中华书局的第三次愉快合作。本书把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习惯上所称的晚清）知识的新旧交汇作为书写的背景。如果说《岩中花树》呈现的还是一个古典、自足、宁静的世界，那么，从本书叙述开始的时间起，随着武力撞击之下国门洞开，西学涌入，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使那时候的官员、学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量和挑战。

什么是知识？它是事物的秩序，它还意味着改变命运的力量。一百五十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从美国归来就认识到，知识的力量要远远重于财富："知识即势力，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在美沐浴八年的现代教育，已经明显地拓展了他的心智，心中之理想既高，道德之范围亦广，使他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在一个毫无知识的时代，一个身受痛苦与压制的人是绝不会体会他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制的。所以他以一个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发现了知识与快乐之间的一个悖论：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果真无知的人就是快乐的吗？容闳并没有滑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淖中去。他说，其实，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成不了什么大事。正如什么样的体制下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知识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容闳和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一代人正是这种新知识观最好的注脚。

本书的研究和描述方法，类似于瞿同祖先生所说的"行为分析"，即把那些行为放回到历史现场中去，按它们实际呈示的情形来分析和描述它。在此背景下，本书还试图从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对这些人物进行个案式的描述和考察。对堂皇叙事感到头疼的读者，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写法，身体和爱欲，比之思想史的厚重，似乎更符合了这个实用主义时代的口味。

我希望我写下的，是基于人性的、体察世道人心的带着几许体温的书。

一本书是心智成长的见证。一本书同时也是我们穿过时光的安全保护证。在旧历新年前覆盖整个南方的大雪中，回想写下这本书时那些已然消逝了的时光，一个个旧日子如同此刻黄昏时分窗外飞舞的雪花重又降临，这或许就是写作带给我的隐秘的快乐了。

感谢中华书局的厚爱，感谢徐卫东、李洪超先生的精心编辑，樊玉兰女士的热心推介，让这本书走到了读者面前，使之与此前出版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一起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列。书稿的部分篇章，曾在《江南》、《十月》、《西湖》、《书城》、《良友·闲话》等刊物发表，我要感谢王占君、赵兰振、谢鲁渤、吴玄、薛原、彭伦诸师友在编辑过程中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徐继畬研究会会长任复兴先生慨允使用他收藏多年

的徐继畬墨迹和著作书影。感谢朋友黄百竹阅读初稿并不吝借阅有关资料。感谢朋友吴学军提供十九世纪初叶宁波城的有关图片。书中有关十九世纪初叶口岸城市的铜版画，翻拍自哲夫先生主编的《宁波旧影》一书，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承担了巨大的劳动，放任我花如许多的时光生活在文字世界中。

赵柏田

2008年2月2日